

〔乌拉圭〕胡·卡·奥内蒂 等著



球星在情网中死去

湖南人民出版社

I782.4
1
2

情网中死去

球星在情



043433



女子学院 0061081

球星在情网中死去

(乌拉圭) 胡·卡·奥内蒂等 著

李明德 刘文波等 译

责任编辑: 译敏 霞蔚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246000 印数: 1—21800

ISBN 7—217—00304—0

I·123 定价: 2.45元

湘人: 87—12

目 录

1. 球星在情网中死去

.....〔乌拉圭〕胡·卡·奥内蒂著 (1)

李德明 刘文波译

2. 宝石与火石

.....〔秘鲁〕何·马·阿尔盖达斯著 (73)

赵振江译

3. 地 道

.....〔阿根廷〕埃·萨瓦托著 (131)

丁文林 赵德明译

4. 支 部

.....〔智利〕路·恩·德拉诺著 (249)

郭冰肌译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1909年生于乌拉圭，是拉美当代名作家之一，被尊称为拉丁美洲的萨特。他曾长期旅居阿根廷，先后担任过阿根廷和乌拉圭几家杂志的主编。

家庭环境和自身的经历，使奥内蒂养成了非常孤僻的性格。他的这种性格特点有时也明显地反映在他塑造的人物身上。奥内蒂的作品，正如他本人所说，往往象螺丝一样，他只拧开一半，另一半要靠读者自己去拧。他的小说深刻反映了阿根廷、乌拉圭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不露声色地揭露了社会的弊病。他作品的独特风格给拉美文坛增添了异彩。

奥内蒂的主要作品有《无人的土地》（1941）、《井》（1943）、《这一夜》（1943）、《短暂的生命》（1950）、《无名氏墓》（1959）、《船坞》（1961）、《让清风谈话》（1979）等，《船坞》是他的代表作。1980年，他获得了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大奖。

《球星在情网中死去》（1954）是奥内蒂的著名中篇。1976年阿根廷卡利坎托出版社再版这本小说时介绍道：“看来，这是伟大的乌拉圭作家送给他忠诚的

读者们的一部最令人费解的小说。一个看上去已经抛弃红尘的男人，过早地过着空虚游荡的死亡生活；而活动在他周围的两个女人用她们神秘的、不同的感情，构成了这出爱情悲剧的主线。小说的情节是在好奇、似乎怀有在理的蔑视和瞬息而逝的同情心的第三者们面前展开的，而这些第三者的推断和猜疑，又借助这出悲剧，拉美小说的杰作《球星在情网中死去》的真实情节，给读者布上了一层虚假迷茫的烟幕。”

这篇译文是根据卡利坎托出版社1976年的单行本翻译的。



他第一次走进商店的时候，我只想看看他的双手。那双长手没有晒黑，动作缓慢而迟钝。颤颤抖抖，不由自主。当他似乎要指点什么时，马上为自己下意识的动作深感悔恨。他问了几句话，便站在柜台最阴暗的一角喝起了啤酒；他转过脸去，背对着凉鞋、日历和已经发白了的肉肠，面向西斜的太阳，紫色的山峦。他是在等候公共汽车去老旅馆。

的确，我只想看到他的双手。本来，在我把100比索零钱找给他时，看到他的双手就已经够了。他用手指紧捏着钞票，理齐，然后用力卷成扁团，小心翼翼地藏进上衣的口袋里。只看到他的双手如何在满是油垢和刀痕斑斑的柜台上动作，就足

以知道他的病是治不好的，我不知道他从何处获取了治愈康复的信念。

一般说来，对这种人，我只要看一眼就能明了八九，我还不记得我有弄错过的时候。不需要任何其它详情，只要看看他们提着箱子走进商店时的各种不同表情，是羞涩怯生，遮遮掩掩；还是兴致勃勃，大大方方。在得知镇上的医生加斯特罗或贡斯的看法以前我就能作出自己的结论。

护士是知道我不会弄错的；每当他来吃饭或玩纸牌的时候，总要向我询问新来的病号，并且总少不了要嘲弄一番加斯特罗和贡斯。这也许是只想讨好奉承我，也许是真的尊重我。我在这个镇子上已经住了15年，就是从肺切除1/4那年起，在此地谋生也足有12个年头了。我自己也说不清我的判断为什么那样准确，但我知道，肯定不是因为我自己得过这种病。我观察他们，最多有时再听听他们的讲话就行了。护士大概是无法理解这一点的，就连我自己也并不完全清楚：我为什么能猜测出他们谈话的内容，他们到我商店来买什么东西，并且将这两者加以比较。

当这一位乘公共汽车从城里来到我的商店时，护士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上吃饭。我感觉到护士在用目光寻找我，想从我这里得到诊断结果。那个男人带着一个箱子和一件雨衣；他身材颇长，肩膀宽阔但有些弓缩；打招呼时毫无笑意，大概很长时间以来——从他得病的前几年开始——他的微笑就不吸引人了，那笑意不但毫无效果，而且适得其反。当他转身向着马路和高山喝啤酒时，我又看了他一眼；他在我眼底的柜台上理钱

时，我仔细观察了他的双手。可是，他没有付给我酒钱就离开了柜台，等酒喝到一半时，他才从那角落里慢慢吞吞、闪着并非傲慢的敌意目光、满腹忧虑地走过来向我付钱，他用那并不苍老，但不听支配，显得麻木的手指把找回的钱收起来，然后回去继续喝他的啤酒，那儿正好面对大街。他什么也不想看，只想离开我们，似乎我们这些身着衣裤、在春日黄昏的暗淡光线里几乎一动不动的人明光闪闪，比已经和黑沉沉的天空浑然成为一体的高山更难于从他的眼前抹掉。

“满腹忧虑的人。”如果护士能理解这话的含义，我一定会跟他这样说的。“满腹忧虑。”那天晚上，我一直独自重复着这句话。没有错，如果实话直说，确确实实是满腹忧虑。这种深刻的忧虑是他逐渐表现出来的。在这忧虑之中，孕育着一种毫无力量的绝望，而这绝望又很自然地与产生和滋长它的原因紧密相联。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望，并把这一绝望置之脑后。这并不是说他认为不能恢复健康，而是不相信治愈后有什么前途，有什么意义。

快40岁的样子，有时表现得那样懒散，说明他还没有成熟。当他离开商店去乘公共汽车时，护士的目光离开了我，端起酒杯，面向窗户。

“这人以后能活动，还是一命呜呼？如果他有病并去老旅馆的话，那将由贡斯接待他，我问问他吧。”

他用开玩笑的口气讲着，也许他在想办法给他注射针剂。我倒是很想坐下来和他一块喝杯酒，说说我看到的情况和我的猜测。时间我还是有的，因为上一班公共汽车没有下来任何旅

客，而且又是山上人在房子里开始做饭的时间。我很想和他聊聊，护士在对着酒菜微笑着，请我过去。但是，我没有离开柜台，在几个铁皮罐头上掸灰，连句话也没说。

“是的，他得了肺病，没错。但并不很严重，不是不可救药，不过，他好不了。”

“既然能治好，为什么好不了呢？是因为贡斯想把他宰了吗？”

我也笑了起来。话说起来很简单，他好不了，是因为治好与否已无关紧要。这样的病人，我和护士常常碰到。

我耸耸肩，继续掸我的铁皮罐头。

“我只是这样说说。”我说。

从那之后，我总是看到他从旅馆坐公共汽车到我店前，然后换车去城里。他几乎没有进过店，依旧穿着刚来时的那身衣服，总是打着领带，戴着礼帽。他与众不同，我是不会认错人的。他没有穿紧脚宽腿裤，没穿凉鞋，也没有其他人常穿用的衬衣和花色围巾。每次都是午饭以后来，一身首都人的装束，脸上还是那副孤寂的神情。尘土飞扬，天气冷暖，他全然不顾；怎样爱惜身体，他也毫不放在心上。他总是穿用那一套衣服，那一顶礼帽和那一双满是灰尘的鞋，为的是不给人留下生病和被隔离的印象。

我从护士那里得知，凡有火车开往首都的日子，他都要进城去发两封信。从邮局出来后，就坐到大教堂对面一家咖啡馆的窗台上喝啤酒。我想象得出他那时的样子：孤孤单单，无精打采，仰视着对面的教堂，就象在我的商店里凝视对面的高山

那样。他体会不到这些东西的存在有什么价值。他看着它们，想把它们从自己的视野里抹掉，想叫石头、圆柱和灰暗的阶梯改变形状。他用他那早已形成的固执性情，温情地说服他目睹的东西，让一切都能解释他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的绝望，解释他无意表露出来、或者虽然已经意识到然而已无法掩饰的不安心情。

为了不到我这个既是商店又是邮局的地方来发信，他每次得花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城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有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固执想法；这种想法不知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这是一种天真的戏法，要这种戏法只是为了证明他要去城里而不是在那里发信；按这一戏法的规定，效果比原因要重要无数倍，而原因又可以被改变、修正、遗忘。

他不是住在旅馆，也不是住在镇上，贡斯也不曾劝他去住疗养院；要是他不来我的商店发信，又不去城里邮局通过小窗口的橡皮垫把信送进信箱，这些事就无从说起了。如果他的信不象镇上其他人那样交到我的手里，而是去城里邮局亲自看看一只无名氏的手敏捷地在信封上打印邮戳的话，他的失踪也就不足为奇了。那只手藏在工作服的袖子里，看不到这个人的脸庞，也不知道哪一双眼睛能帮助他推断是谁在盖印邮戳。假如他看到邮戳敲击着信封，在表示姓名 首都或某个因事可以访问的城市名称的字迹旁盖上邮戳的话，那末，手啊，脸啊，眼睛啊，这一切就不复存在了。

但是，有时候他从城里回来时也到我店里来喝一瓶啤酒。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他来说是失败的下午。所谓失败，就是

说他在信封上写下的女人名字辨认不清时，在那决定性的一刹那，邮戳突然举起，又象弹簧那样轻轻落下。这时，那名字变得毫无意义了，他便恶狠狠地、冷冰冰地看着橡皮垫。这使人意识到，他大概确实与收信人久别未见，他的体温一直很高。

我看着他斟满酒杯，默默地喝光；他把臂肘支在柜台上，侧身对着我。他尽量摆脱这样的想法：过去了的事情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即使那些最不灵敏的耳朵，也应该听到沙钟的细小沙粒每时每刻掉下的声音；这些沙粒掉下离去，变幻着，继续存在下去。他总是不喝醉就离开商店，步行返回旅馆。

但是，从首都给他寄来的信都要送到商店，落到我的手里。我让莱维家的男孩把信给他送去。这个孩子不在邮局领薪水，而是由旅馆、疗养院和我付给他钱。大概那男人以为我对寄信人及其境况十分感兴趣，会拆开信封，好奇地偷看别人在讲述同样一件事情时如何故作隐语，采用另外的表达方式。大概也因为这一点他才进城去发信。而且，也许由于心情急迫，没过几个星期，他就常常在每天中午前后，即在公共汽车司机刚把细长的、皱巴巴的邮袋扔给我之后，来我的商店了。

他毛遂自荐，从存放香肠和挂历的角落里走过来，找话题和我攀谈。他倒没有强行说服我相信他的话，也没有掩饰他对贵族姓氏不同拼写法的漠不关心。他彬彬有礼，要达到的唯一目的是让我记住他的姓名，省得总要问我是否有他的信。

最初，他每星期收到四五封来信。我很快就辨认出了哪些是情书，哪些是一般往来。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定期而来的同

一手迹的信。那是两种信封，一种用蓝墨水书写，另一种是打字机打的。他拿到信后，总是设法用敏捷的目光准确地扫一下，确定是谁写给他的，然后才放进口袋，回到那光线暗淡的角落，恢复先前的姿势，侧身对着满是蝇迹的民俗画和烟熏的年历，象往常收到信时一样平静，继续灌他的啤酒。

贡斯大夫已经嘱咐他不要过多活动，然而，只要口袋里装着打字机打的信封时，他便坐公共汽车而不是走路赶回旅馆。这并不是因为他急于回去看信，而是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在床上，双眼盯着天花板，或者一只手捏着信，或者信仍旧放在口袋里，或者放在桌子上3本书和从来没有用过的大水瓶旁边的绿色吸墨纸上，着魔似地在门窗之间独自踱步。他对盼望的事情既激动又恐惧。

他最关心的信有两种，一种是女人的蓝色手迹，字体粗圆，大写字母写得象音符一样，两个连写的“Z”都写成了“3”字。至于那些木色的、细长的、使他能遵照贡斯的嘱咐，拿到以后立即爬上公共汽车回旅馆的信，很明显，也是一个女人写来的，几乎总是在中间折了一道，是用一架破旧打字机打的，看得出字盘肮脏，凹凸不平。

已是仲春时节了，太阳时隐时现，没有一点活力；夜间寒意甚浓，而且还经常下点毫无益处的雨，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不安。护士每天背着装满细口瓶子的药箱到旅馆的楼上去，脸上挂着得意的微笑，不时地跟人们说几句笑话。旅馆的女仆经常下山来，到商店买旅馆需要的食品，或者购置香水、彩带之类不能拖到每礼拜进城一游时才采买的东西。她们一来，总要

谈论那个男人的事，因为过了好几个星期，尽管又来了不少客人，他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是个“新客”，护士也经常跟我说到他，这是因为他早就知道我对他感兴趣，而他又需要不断地讨好我。这位护士就住在我商店的汽车房里。他除了把针剂分送给病人，把钱存到城里的银行去，别无他事可做。他孤身一人，当寂寞令人难以忍受时，我们什么丑事都干得出来。为了在一起过得痛快，眼睛和耳朵从不消闲。我谈论他们，谈论别人，不谈自己。

人们经常到店里来聊天，我开始注意观察他了。高个子，宽肩膀，宽得有点奇特，步履缓慢但并非谨慎，在忸怩和傲慢两种特殊的表情中间保持着平衡。他总是独自一人在大厅靠近窗户的桌子上吃饭，把头扭向一边，面对冷漠无情的高山和阳光，以摆脱对自己的身世的回忆，避开周围的脸庞和容易引起回忆往事的谈话。

酒吧间的大厅里摆设着小桌子，上面罩着台布。我常看见他在那里耐着性子看书或读报，露出一副烦闷的表情。这个酒吧间每天向游人开放三四个小时。在那里，为了置身世外，他总是离游客远远的，离把这些人聚到一起的原因远远的，尽量表现得一无所思，把一切都抛到了脑后，他觉得这样心情更舒畅些。他无精打采地坐在稻草椅子上，直挺挺地伸着双腿，嘴角微微露出亲切的笑意。酒吧间里，时紧时慢、时长时短的脚步声，怪里怪气的叫喊，扑鼻的香味，他都不感兴趣。游客们沉浸在香气中，他们各有各的秘密，这秘密使他们象部落一样团结在一起，聚集在一起。

在每天的这两三个小时里，他置身于游客之中，可又独处一方，他觉得——装出觉得的样子——那忧虑已经扎了根，化成了一种模模糊糊的东西。对他来说，把确诊日期以前存在的一切都联在一起记录在案，是一出情节曲折的喜剧。

我从来不知道我是否对他产生了好感，有时打牌的时候，我被“我大概永远不会理解他”的想法纠缠着。在旅馆的酒吧间里，他是个陌生人，背对楼梯旁平稳放着的磅秤——我敢保证他从来不曾使用过它。当人们爬上去看指针时，他对金属的响声和人们的议论置若罔闻。午饭前后，也就是他来到商店，一言不发地向我要他盼望的信件的前后，他一直在旅馆的周围溜达，甚至走到小河那边，在河床的白色卵石和石缝里流出的弯弯曲曲的小溪——那水闪着光，不停地流动着——旁观察和欣赏小桥的五根桥桩，然后穿过灌木丛，踏着红色的泥土，来到旅馆的垃圾坑，用鞋尖踢着坑里的纸箱、小瓶子、乱草叶、棉花和黄纸。

我每天中午都看到他穿着首都人穿的灰衣服，礼帽倾向颈背，走进商店；进店后便向我作短促的无声问候。当他口袋里装着来信——有时没有信——躲到角落里喝啤酒时，我注意观察他的眼睛，窥看他眼睛深处有没有愤怒或愤怒的流露。我看出那是一种用毅力控制着的不断加剧的怨恨。为了避开我，他扭过头去，看着刚刚收割完的土地和山间小道，看着在阳光照耀下的雪白房舍。

二

11月初的一个晚上，护士走进商店，一坐下就挑衅似地向我微笑着。我给他送去了酒、干酪和香肠，接着转过身，背对着他，一面拍打苍蝇，一面吹着口哨。

“难道您真的不知道？”护士终于开了口，“真是想不到，您记得那家伙吧？他好象要搬出旅馆。看样子闲话太多，他听厌烦了；或者他已经没有更多的话好说了，因为有一天下午，他在花坛与戈麦斯夫人的金发姑娘们相遇时，跟她们打了招呼。不屑说，他把问安的话说错了，他平时就故意颠三倒四的，经常把午安说成早安，或者把晚安说成午安。那是想让别人都以为他心不在焉，说错了也不改，他是故意说错的。他想给人一种印象，他的心并没有放在他打招呼的这些人身上，连说话时是什么时辰都稀里糊涂。”

护士不时止住话，咀嚼着干酪和香肠，还常常边嚼边说。我突然想到，护士这样阴阳怪气，表现出强烈的憎恶情绪，不可能是因为那个人拒绝注射贡斯大夫开的针剂的缘故。这种厌恶情绪的根源，是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侮辱，是一种暗中的诽谤。

“他准备离开旅馆。大概他说话太多，唾液都耗尽了，因为有一次他跟旅馆的伙计谈论下雨的事，问过女佣几点钟还可以喝到热水。不过，他还没有辞行，还没有凑足钱去结帐，也

还没有说明他为什么要离开旅馆，如果有人愿意听他说明的话。现在谁也不跟他搭腔了，即使跟他说话，也只是拿他作笑料，验证一下他是不是会用他的脑袋，是不是用木板一样毫无表情的面孔，或睡鱼似的眼睛来回答人们‘是’或者‘不是’。”

为了让护士高兴，也为了表明我一直在听他说话，我微微一笑了一下，没向他提任何问题，继续用拍子打着苍蝇。

“说他的双眼象睡鱼的是那个高个子女佣雷娜。”护士承认说，“他还没有辞行，但是，有天午睡的时候，他没有跟往常那样去察看垃圾，而是爬上山去和安德拉德洽谈，租用葡萄牙姑娘们的那套房间。他对那套房间里发生过的事肯定一无所知。他不跟任何人说话，谁还会主动告诉他呢。”

“既然他已经病了，那也就没关系了。”我说。

“这还用得着您对我说？我并不是说怕传染。但不管怎么说，那套房间里死了姐妹3个，加上表妹就是4个人……而且，都是25岁上下死的。这真是奇事。”

“那不是费雷依拉姐妹的表妹，”我打着哈欠说，“再说，他也永远不会再有他的25岁了。”

仿佛我嘲弄了一个人似的，护士笑了起来。我一面关好百叶窗，一面想象着那个男人上山去打断安德拉德午睡时的情景：他懒洋洋地拖着修长而麻木，更确切地说，幽灵一样的躯壳，走进昏暗的房地产租用代办处，用低沉生硬的语调打听租用的可能性、价钱和建筑方面的各种细节。别人说什么他都信以为真，双眼迟钝地扫视着墙上的一张大而怪的山区平面图。为了标得清楚，在那张荒诞可笑的图上勾画出许多白色的粗

线，以代表尚未修筑的蜿蜒的街巷和林荫大道。那些红蓝线条标志着汽车将要通过的路线。以前，汽车从来没有爬山越岭，磨损轮胎，驶过这古怪离奇的地方。那男人仔细观察着平面图上花花绿绿的圆头钉，那是安德拉德用来表示别人委托他或出售或出租的房屋的大致方位的。他想从覆盖房屋的尘土里发现启示和允诺的火花。

安德拉德则汗流浹背，脸上挂着笑容，开始是谨慎小心的试探，接着是以满腔的热情，迫不及待地把葡萄牙姑娘们的4间一套的客房租让给他。房间里陈设的家具都用透明薄纱罩着，家具的花纹是姑娘们自己设计、由能工巧匠精心雕刻的。

那个男人决定租用费雷依拉姐妹的房子，这很奇怪。奇怪的不仅仅是他住进后还富余3个房间，也不只是他从走廊里只能看到他下午常去游逛的那些地方的景色：干枯的石子河床上架起的桥，旅馆的垃圾坑。

“您大概会以为这个人有钱租用这么多房间吧？”护士临去睡觉时这样问我，“可是，这还不包括安德拉德必然从中揩的油呢。”

然而，时隔不久，事实向我们表明他的钱多得很；山上的房子租用了好几个星期，可他仍旧住在旅馆里。只是每天下午，午饭后到天黑这段时间内，他才爬上山去，独自一人关在房间里，或呆在走廊里凝视着小桥和山脚之间被小河切开来的那块地方。

“谁跟您说他没有和某个葡萄牙姑娘相爱过？”护士议论道，“说不定就是跟二姑娘，因为她跟他一样健谈。一天，他

在旅馆里买了五六瓶啤酒让人送到山上去了。现在咱们可算知道他为什么独自一人关在屋子里了；再说，这些酒很可能是从您这儿买的呢！”

三

一天中午，在收送邮件的汽车到达之前，他来到了商店，但他没有钻进他常呆的挂日历的角落，也没有来要啤酒。他站在店外，双手插在裤兜里，弯着腿，歪身靠在一棵树上，我第一次看见他没戴礼帽和领带。

一个女人，背朝外，先伸出一条有力的腿，稳当地踩到地上后，慢慢下了车。她不很胖，身材还算匀称。两人拥抱一阵，然后那男人走过去帮助车顶上的看守工取下行李。两人相视而笑，再次热吻，随后走进商店。那女人不想坐，他们要了一点清凉饮料便站在柜台光线最亮的地方喝起来，眼睛对视着。只听见那男人口若悬河，稍一停下来，就抚摸女人的手臂。他以为，不停顿的谈话可以使人看不出他枯瘦的面容。只要女人不提出他预感的问题，就会有一点点什么重要的东西得到拯救。

那男人每讲一句话，女人墨镜下面的那张嘴就想张一张，以这种方式反复表示自己的喜悦。当我去侍候他们时，她对我笑了两次，感谢我对他们无从说起的关照，过奖了我对他们的友谊和热情。

“不去，”他说，“没有必要，没有什么益处。倒不是因为钱，尽管我不想动用那笔钱。旅馆里也有医生，什么都有。”

“女人”悄声悄气地坚持了一会儿，她的话说服不了他。原来，她满以为有把握打乱“男人”的计划，可是发现不可能改变他那奇怪的想法。他离开柜台，径直走到树荫下叫莱瓦用小汽车把他们送到旅馆。莱瓦正在那儿等候疗养院的汽车，接两个女人去城里。后来司机还是答应了，大概是那男人多付了钱，或者司机想到他的汽车不开回来，那两个女人是不会离开商店的。

戴墨镜的女人对我微微一笑，那是名副其实的微笑。

“您看他怎么样？”她问我。我想，这是他在信中谈到了我，关于我们之间的谈话和友谊，他大概写了不少不实之词。

她还是兴高采烈地跟我说话，好象她的话能起点什么作用似的。

“或许您还记得起来，可能在报上见过他的名字。他曾是个最佳篮球运动员，人们都说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选手。他和美国人比赛过，最后一年随同球队去过智利。”

所谓“最后一年”，大概是指他们知道事情已经发生的那一年。我并没有表现出特别高兴的样子，但确实止不住激动，因为我明白了他的肩为什么那样宽阔，为什么现在弯腰弓背时那样沮丧；我明白了他眼睛里为什么充满变得平静了的怒火；而且明白了之所以有怒火，不单单是因为他失去了健康，失去了一种特殊的生活，失去了一个女人，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一种信念，失去了可以争得自豪的权利。他一直是依靠他的健康

而生存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他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他有没有好的身体。

一种新的同情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想，他可能比外表更衰弱，更空虚，更年轻。于是我记起了在《画报》上放大的照片中看到过他。他穿着印字白背心，短裤，被一群同样打扮的人围着，笑容满面，目光斜视，放射出既朴实又厌恶的光芒，俨然是一个圣人或英雄豪杰。他在那群青年人当中最年轻，在第六版的版面上，依然可以看出他那刚刚梳理过的油光光的头，皮肤闪烁着健康的润泽，浑身是男子汉那种精力无穷的油脂光彩。他蹲在地上，脑袋微微偏向一旁，照相机的闪光灯只能照亮他 $3/4$ 的面部。他装作把一只手的 5 个手指按在篮球上，或者是不叫人抢去。另一张照片是他一人独处昏暗的房间里，迷惑不解地查看第一次爱克司光检查时拍下的软质底片，周围套配着各次胜利的纪念品，奖杯，队旗，宴会时的大幅照片。不难想象他在亮如白昼的灯光球场上的情景：追跑，弹跳，弓身，挥汗如雨，充满信心，无限幸福，坚信凭他那高大的半赤露的身体，每场20分钟的激烈争夺定能取胜；观众们以感激和鼓励的心情呼喊着他的名字。他体魄绝佳，青春的火焰在熊熊燃烧。

戴墨镜的女人在这儿住的那段时间里，既没来过手写体信封的信，也没来过木色信封的信。他们同住在旅馆里，“男人”再不去察看旅馆的垃圾坑，也不到山上葡萄牙姑娘们的房子里去。他们挎着胳膊散步，租马骑，租小汽车坐，山上山下，来来往往，谈笑风生。他们紧靠在一起，在风景最优美的地方，

用“女人”来时挎在肩上的莱卡照相机拍照。

“象是在度蜜月，”护士若无其事地说，“原来这家伙需要的是女人啊！看来他忍受不了分居的生活。现在他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旅馆里，他们邀我一起喝酒，那男人向我提了许许多多问题，打听镇子上的事。病不病他们都不管，只要在一起就手拉手，大庭广众之下照样接吻。要是她能在此常住下去的话（可能周末她就要走了），我敢担保他的病能治好。您没看到中午他们来取开胃剂时他那神气劲儿！”

护士的话不无道理，我没有什么可反驳的，但尽管如此，我现在还没有相信他，我要相信什么呢！我不知道在我看到的東西里掺杂了什么不端的想法，是什么荒谬和令人扫兴的念头使我毫不感动，阻止我承认他们每天在我眼前致力建立的幸福；他们手不离酒杯，亲切交谈，谈论美好的未来。

“女人”走了以后，“男人”又回到他租赁的房子里去了；有时候带上一包东西当午饭，一大早去，直到晚上才回到旅馆的餐厅，在角落里的桌子上坐下来，孤孤单单，满腹忧虑地开始重建14天前推倒的使他与世隔绝的高墙。刚刚破土而出的温柔感情的幼芽，在他那灰暗忧伤的目光中消失了。

“女人”离开两天之后，他的信又开始到了，与以前一样，粗笔字迹的信和用老旧打字带打写的信总是同时到达。

“男人”和我还象他初来时一样，基本上互不相识。他经常一人安坐在柜台的一角，隔着啤酒瓶，侧身对着我——他又穿起了那套名副其实的首都居民的服装，系领带，戴礼帽——象是有意加剧我们之间未宣的旷日持久的决斗。他的目标是将

我从他眼前铲掉，彻底销毁我顽固提供的关于他失败与不幸的证据；而我则要他承认我的尚未见分晓的胜利，就是说，他的疾病，分居，死亡，这些都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他每次走进店门，总是盯着我的眼睛，用微笑问候我。一拿到信，他的目光便立刻把我撇到一边，将信装进上衣口袋，故意走得慢一点，稳一点，脑袋和身子一动不动，装出脑袋和身子跟摆弄着信的5个手指头毫无关系的样子。有时候要上一瓶啤酒，有时说一声“谢谢”就走。每当这种时候，他就微笑不止。而他微笑，他道谢，只是为了安慰我，告诉我，我和信里写的内容无关。

“贡斯发现他的病情恶化了，”护士跟我说，“就是说，没有好转，治疗没有效果。您知道，我们有时候会因为病人的病情稳定而感到高兴；但有时事情恰恰相反，器官功能减弱了，病情怎么能好转呢？我可以担保，他租那套房子，就是要在哪儿喝个烂醉，又不叫人看见。本来他是应该进疗养院的：我要是贡斯的话，一天24小时，都得叫他乖乖地四脚朝天躺着。贡斯应该吓唬吓唬他。”

我想，要吓唬他，就必须创造另外一种环境，另外一些人，另一些危险；死，他已经不放在心上了。他眼神和双手表现出来的恐惧，是不会因为死亡的威胁而加深，也不会因痊愈的治疗方案而减轻的。

当一群群穿着骑士裤、搭着花花绿绿披风、戴着帽子和墨镜的男男女女来往于山上、马路、旅馆、有舞池的酒吧间和我这个商店的时候，我和“男人”之间的关系依然和开始时一样。这是一个好年头，如此涌来的人流我已经见过15次了，

一次比一次多，一次比一次嘈杂，一次比一次兴奋。那个男人淹没在人流之中。护士和旅馆的女佣不再向我报告他的情况，他们找不到他的踪迹，甚至连我自己也因为忙于照顾柜台而对他失去了兴趣，只是胡乱地将信塞给他了事。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因为那场想象中的决斗仍然在继续。每当晚间我的店里空无一人，或者只剩下三五个男女喝最后一杯酒时——因为他们正在度假，商店的厅堂既简陋又肮脏；木桶里的酒他们认为质量不佳，味道不纯；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来没有进过这样的地方，所以，到我这里来的人不算多——我往往又想到了他。我断定他是利用游客大量涌来的机会故意躲开我，而我则认为有责任注意必然把他与残忍结合在一起的命运，以防我的预言落空。我确信，只要记住这个人，记住我发自内心的诅咒，他就会步步走向灾难。

年终前不久，他不再坐汽车进城发信了，他从旅馆步行到城里，有时从我店前经过，穿着那身没有地区与季节差别的衣服，郁闷不乐，心不在焉的样子，与我们这些人格格不入，好象他从来没有到过这镇子。他的一只胳膊僵硬，与他的步伐毫不协调，手揣在上衣口袋里。我知道，口袋里放着刚刚写完的信；他满腹忧虑和满怀希望地紧捏着信，仿佛谁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病，哪里疼痛和能否治愈。

四

尽管这不全是护士的想法，但确实是他提出来的。我想，他自己也不会相信这个想法。他之所以提出来，只是为了嘲弄，但不是嘲弄我，也不是嘲弄我的商店，而是嘲弄这个想法本身。正当我们看着华丽的轿车神气十足地在大道上扬起的飞尘中穿梭般往来时，女佣把一杯茴香酒往柜台上一放，格格地笑了起来。她叫雷娜，据说她准备和护士结婚。

“要是这辆黑色轿车往旅馆开去的话，”雷娜说，“一会儿准得返回来。您看它拐不拐弯，从星期一那天起，旅馆里一个空房间都没有了，我们到处架起了床。从现在起到2月，一个空床位都不会有。”

女佣表情严肃、自豪，尖着嘴喝完一小杯酒。她一个劲地看着我，讨取我对她的羡慕和钦佩。

“罗亚尔饭店也是这样，”护士说，“我不知道哪里能塞得下这么多人。而且，人流还在不断地涌来。圣诞节和31日晚上，罗亚尔饭店的餐桌全都预订完了，从这就可以看出人有多少了。要是我，就用消毒剂把这儿好好清理一下，摆上一台收音机，搞一次大型舞会。”女佣雷娜又笑了起来，那是短暂兴奋的一笑，是在用手帕擦拭汗珠和茴香酒时露出的微笑。

“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护士摆出一副真心诚意的样子，“我这是认真跟您说的。那两个晚上，肯定会有不少人找

不到地方跳舞和酗酒，那时候他们是什么样子您是知道的。”

因为我事先跟他说过，所以他心中有数。所有的人，身体健康的和病病歪歪的，在镇上小住的，自认为是在此呆不长的，看见那狂欢场面都会象在旷野遇到骤然而降的大雨那样惊愕不已。无论是住在旅馆的还是住在红墙白瓦小房子里的，从这两个节日的头天晚上起，都将用多种方式尽情地狂欢。事情总是突然而至，尽管人们有了打算和计划，掐着指头计算日子，对届时出现的场面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并且尽量避免过分激动，或者希望节日迟些到来，以保证节日期间有最大的狂欢劲头，然而，当节日真的来临的时候，谁都会露出惊愕的面孔；人们颇似牲畜，如狗似马，一方面驯服地接受命运的支配，一方面又有反抗精神和威慑力量，或佯作潜逃，或做出凶狠的冒险行为。我知道，在这两个夜晚，人们将把自己的这种兽性展现给年轻的小伙子，同桌就餐的伙伴，一切来狂欢的人们；展现给遥远的包裹着高山的夏日夜空和洗澡间被蒸气熏得昏暗的镜子；展现给他（它）们，仿佛他（它）们那热情和期望、责备和凶狠的眼睛可以永远作证似的。我知道，在舞曲中，他们有的将发出无声的呻吟，有的狂呼乱叫，敲敲打打，个个伸长耳朵倾听着男人或女人一般的呼唤声，从森林对面，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罗萨里奥，从远近不同的地方同类的灵魂发出的呼唤声。

我在护士和女佣之间，摇头，耸肩，装作回忆，而在记忆中又找不到足够的证据使我相信他的建议的样子。

“您知道，到时候一个个都会变成疯子。”护士说着，向

女佣转过身去，争取她的支持，“他们都希望有一个喝酒跳舞的地方，只要不在他们自己居住的地方，任何一个角落都行。”

其实，我当时已经根本不需要护士的动员了，我早已拿定主意，所有的细节问题几乎都解决了。

“确实是这样，”雷娜说着打开了梳妆盒画眉抹唇，“要是您多放几张桌子，为跳舞稍做点准备……舞曲，收音机里会播放的。”

我的思路远远离开了他们谈话的内容，而在考虑圣诞树的事，从哪儿能弄到它，怎样装饰点缀。这时，我友好地看了看护士，早把他提出举行舞会是为了嘲弄我和我的商店的猜疑丢在脑后了。当我想起他刚才说的“只要不在他们居住的地方，任何一个角落都行时”，又微笑着看了看他，发现他果真聪明过人，不单单会开药水瓶、打针和每星期六把钱送到银行里去。

女佣又笑了起来，绘声绘色地议论着圣诞节和除夕之夜在商店举办舞会的事。护士跟她开了一句玩笑，一个无足轻重的建议。于是，她又变得严肃不快起来，说：

“我说的是正事，能捞不少钱。”

于是，商店的厅堂里摆满了桌子，有的是借来的，有的是用箱子、木板、画架临时支起来的，我把所有的桌子都罩上了花花绿绿的彩纸。24日那天，尽管一下午雨没停，而且后来还下了几阵倾盆大雨，然而厅堂里还是座无虚席。看到柜台上方挂满灯泡的松树，每个女人进来时都热情赞颂，或给我一个笑脸。尽管下着雨，收音机还是整夜响个不停；舞场简陋，

又比较拥挤，但大家还是跳得很开心。他们喜欢这个地方，就象喜欢用缺口小酒杯，习惯喝次等酒和爱吃辣味肉一样。我的这些永生难忘的朋友们，尽情地跳啊，笑啊，唱啊；舞会结束时，都是冒雨离开商店的。

31日夜里人更多，更热闹，我不得不在店外摆了几张桌子；虽有莱维家的男孩帮忙，半夜时分我还是深感精疲力竭了。一听到汽车的喇叭声，护士就跑出去看；他回来时高兴得差点在我背上猛击一掌，满脸堆笑地告诉我说，城里来的汽车到了，有几位游客，还有许多到我店里来跳舞的人。我脸上现出又惊又喜的表情，不过，我还是希望这个除夕之夜尽快过去。

大概所有的人都醉意朦胧了，至少，我已经卖出了数量可观的酒。人们唱着歌，互相询问着时间。在一个角落里，和来自布里格顿的英国人坐在同桌的一个女人扔起了卷纸筒。开始，她向别的桌上扔，接着，又往横穿整个厅堂、拉在圣诞树梢和窗户铁横档之间的铁丝上扔。这铁丝上边挂满了花环和纸花。她让卷纸筒挂在上边。这个女人身材瘦削，一头金发，表情忧郁，全身素装，袒胸露背，颈套宝石项链，胸挂纯金徽章，常常神经质地做出怪相，露出上牙床。这种欢快、讨厌和恶心混杂在一起的痉挛动作，使得她很快抬起上嘴唇，接着又慢慢地恢复常态。她那一桌的主人是个身躯肥胖、脸色红润的男人，他发明了白酒色酒掺着喝的高招。那女人在喝这种酒前后，脸上总是挂着那副怪相。

她身子后仰，靠在板凳上，把一个卷纸筒举过头，仔细观

察着已经弯得很厉害的花环——上面的花好象凋谢了似的——的位置，然后猛地向前弯身，衣服吊了起来，几乎露出了整个前胸和不太丰满的乳房。卷纸筒扔了出去，发出嘶嘶的响声，尽管离得很远，她却百发百中。于是，我和莱维家的男孩使劲用托盘扇动吊挂着的卷纸筒。那些舞伴们的脸碰着卷纸筒，既要转动身子在卷纸筒中间摆动，又要尽量不弄坏它们，这样只能放慢转动的速度，顾不上舞曲的旋律了。

我们就这样度过了午夜时分最兴奋的时刻。我现在只记得当时头很疼，太阳穴怦怦跳个不停。人们都站立着，端着酒杯和酒盅，互相祝贺和拥抱。不知是谁在山上放起枪来，同收音机最大音量的嚎叫声混杂在一起，人们茫然不知所措，顾不得地上的乱砖，象潮水一样，涌向罗亚尔饭店，跑到大路旁的房子里。那个英国瘦女人由两个男人扶着站在凳子上，手拿一串白葡萄不住地吃着；而那串葡萄，并不是我卖给他的。

我不清楚是以前见过她，还是当时才发现的她。她靠在门框上，灯光下只能见到她裙子的一角，一只鞋和手提箱的侧影。也许直到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刻，我还没有看见她。我只是想象——已经记不起来了——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确切地说，站在欢乐场面和黑夜之间。

但是，事后我真切地记起来了。当时有的人觉得无法继续在店里呆下去，便站起身来，其余的人也因为喊声笑声响成一片，忙着拥向车门，开动马达，拉开二档爬上山坡，向老旅馆和松林村驶去。我的确记得她，不是说我真正记得她，她的腿，她的手提箱，而是记得那些摇摇晃晃走出门的男人，他们

不时地转回身子，好象往后传什么话，好象陪伴他们的女人失去了女性的特征，询问或虚假地邀请被灯光照得明亮的裙子、手提箱和鞋那边的那个“东西”。

稍后，我停在柜台后面，目不转睛地看了她一会儿。店里只剩下布里格顿的英国人，其中两个男人抽着烟斗，3个女人有气无力地唱着甜蜜多情但不甚好懂的歌曲，那个瘦女人把最后一个卷纸筒搓烂了。那时，她已置身店中，坐在离门不远的地方，手提箱放在两脚之间，一个不大的宽沿帽放在裙子上，抬起头跟困得睁不开眼的莱维家的男孩聊天。她穿着一件加工精细的灰衣服，手戴着白手套，肩上挎着一只黑色小提包。我说这些是想尽快把她的情况全部介绍出来，而不是描绘她那在花环和卷纸筒后面热得绯红闪光、时隐时现的圆脸蛋。当时，天色微明、晨风徐徐。

莱维家的男孩要去照顾英国人，撇开了她，回来时他告诉我说英国人要结帐。我算好总数，从那女人面前走过去，但没有看她，为的是不使她对我存有戒心，以便在柜台后面继续观察她。但是，等我把英国人送到小汽车旁，向他们道过谢，感谢他们对我举办舞会的赞美，并和他们中最年长的一位议论了下午的天气是否适合到堤上钓鱼之后，我发现护士已经坐到了她的身边。我立刻明白了，这小子是趁她起身用眼睛寻找莱维家男孩想要点什么的时候坐到那里去的。他应是很高兴的，尽管她那姿态不是对他，而是对另一个男人，实际上是对随便哪个男人做的。不过，他并不显得扫兴，不断地问这问那，那姑娘低声说点什么，他都热情洋溢地表示同意，好象听懂了这

个，明白了那个，包括姑娘的每一句话以及语音中所涉及到的过去与未来的详情。

我让莱维家的男孩关好店门，简单整理一下店务。

“小姐跟你要了什么吗？”

“没有。”他眨眨眼说。他完全被疲劳和困倦征服了，脸上满是脏斑，“不过，她说有人应在这儿等她，还说她发了一份电报，火车晚点了。”

“谁必须在这儿等她？”我问。脑子里想着，这个姑娘太年轻啦，她没有病，可以用三四个形容词来描写她；不过，应是几个含义矛盾的形容词。

“您想让我去问问她吗？”莱维家的男孩问我。

“别管她了，反正会有人来找她的，不然咱们把她安置到罗亚尔饭店，或别的什么地方。不过，你去问问她是不是饿了，想不想吃点什么。”

我开始闭目养神，男孩慢慢走到桌子那里，又转身回来。

“她要啤酒，不要冰，她不饿。”

我拿着一瓶啤酒在冰箱里摇晃着，把啤酒冰镇一下。“太年轻啦！”我又这样想，但并不懂得“太”字的含义，也不知道我想把她——不单单是她，还有她的青春——从什么不愿想到的事情中解救出来。当我起身时，看见护士正把臂肘支在柜台上，对着他的双手发笑，摆出一副胜利者的神态，但说起话来谦恭，甚至支支吾吾。

“您知道吗？”护士终于开口了。当时，我正在擦啤酒瓶，检查给她的杯子。

“等等。”我跟他说，心想还是不马上听他的好。我走到桌旁，打开啤酒瓶。跟她在店门旁的黑暗中比较，她的表情没有多大变化，脸上也许还挂着乘火车和公共汽车旅行的倦态，如果不是我凭空想象的话，还能看得出她一人独处和谈情说爱时的表情。

这一点，在护士问我“您知道吗”的时候，或许在那之前我就知道了，但我觉得模糊不清，因为她太年轻了……但是，在护士面前我不能倚老卖老，因此，当我用手摆弄着瓶盖回到柜台旁，看见护士还是那样微笑不止，迟迟不开腔说话，用表情问“您知道吗”的时候，我只好忍受着。莱维家的男孩连着3次都没有关上百叶窗，我便让他去睡觉，自己去关，并告诉他中午再来帮我清扫和收帐。我是从护士肩上说这话的，当时他靠在柜台上，他那交叉着的双臂，节日的领带，扣眼上的白色丁香花，一直挂在嘴角的粗犷无礼的微笑，我全然没有顾及。

“您知道吗？”我终于听他说话了，“真是不敢相信。那个姑娘发了一份电报，通知她要来，叫到这儿——汽车站上，商店里——等她。火车晚点两个多小时，等候她的人走了，没有等下去。您知道是谁吗？一个既住在老旅馆，又住在山上的人，您猜得出吗？就是那个家伙！原来如此，春天是一个女人，夏天是这个姑娘。说不定他已收到了电报，呆在旅馆里，或独自一人在葡萄牙姑娘的房间里洋洋得意地畅饮呢。夜间我到老旅馆去了两趟，路过老处女和助理会计师那里，都没有看见他。我可以断定他在山上那个幽雅的风子里喝醉了。姑娘希

望有人陪她到老旅馆去，电话在后边，她没有想到从这儿往旅馆打电话。您说，那家伙在不在？也可能接到了电报，但就是不愿来接呢。他是能干出这种事的。”

“我这里一份电报也没来，电报总是迟两天才到。”

“那么，”护士坚持说，“电报不送到这儿，不送到您手里。要是加急电报的话，您知道，减少周转，直送本人。”

“为什么要加急呢？”我几乎怒不可遏地问，“就是为了通知她要来？她跟您说过是加急电报？您为什么不让她打电话？”

“当然可以，”护士不耐烦地为自己辩护说，“可是，您别急。”

“您让她进来，给旅馆打电话，”我忿忿地对护士说，但又马上平静了下来，“3天之内电报是不会到的。要不咱们打个电话吧。”

“请等一下，”他举起一只手，又笑了起来，“咱们当然马上就可以打电话，从罗亚尔饭店搞一辆小汽车把她送过去，要是那家伙不在旅馆，我们还可以把她送到山上的那套客房去。但是，现在请您告诉我，真实地告诉我，这姑娘是不是有病？能不能治好？是肺病吗？”他醉了，很激动，瞪着双眼，射出精明的、咄咄逼人的目光，“也许是这样，她在那个戴墨镜女人之后来陪伴他，为他解闷？您说说，山上那套房间，一定是他为这个姑娘租下的。您不认为这个姑娘还过于年轻吗？”他醉得比我想象的要厉害。他傲慢无礼，冷嘲热讽。然而，我更强烈地感到，他心情很不安，茫然无计，他把我找来，发泄对许多事情的不满。

“咱们打电话去。”我拍着他的胳膊，说。

这时她已经站在店门口了，脸朝外看着，两腿笔直，双手戴着白手套，背在身后，好象在期待着电报随时送进老旅馆，那男人定会下山来接她。我走到门口，跟她搭话。她答话时目光尽量避开我，看着黑暗的地方，看着稀稀落落散布在山上的灯火。她认为现在往老旅馆打电话不尽合适，她想要车把她送去，或者请人陪她步行前往，或者给她指一指路。当护士向罗亚尔饭店走去的时候，我把店门关上了一大半。护士把一辆翁卡提沃牌粉色小汽车停在我面前时，屋里的电话铃响了。他走进去接电话，我努力不再多想，害怕想到形容姑娘的修饰语，也害怕将这些修饰语连同她一道同那个躺在老旅馆或山上小客房里的男人联系起来。护士走过来对我说：“不要等了，走你们的吧。”他说他得回罗亚尔饭店为金发姑娘拉马斯小姐打针，她病情恶化，已经不省人事。这时我如梦初醒，突然明白了，那些用打字机打写的木色信封原来出自这个姑娘的手。经过我痛苦的仔细观察，她那总是挂着淡淡笑容的脸庞，原来在前篮球运动员侧身对我流露出来的忧虑的温柔表情中，我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过了。

当我把手提箱放在她的裙子旁，驱车前往老旅馆的时候，我明白了这一点，明白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乃至事情的必然结局。一路上，我没有再想看她，眼睛盯着土路上不断跳跃的灯光。用不着看她我便知道她的相貌如何；甚至知道她在阳光灿烂、或我们正度过的这样的村镇夜晚死去时是什么样子。她的脸肯定会吸引虚假和笨拙的男人的。她的小鼻子，无论头部取

怎样的姿态都能使人看见可爱的弯曲的鼻孔，下唇过厚，眼部平坦，象是用深色铅笔在不那么灰暗的纸上淡淡勾画出来的。当然，她那脸蛋不只吸引男人，那些在我们正去找的“男人”之后接踵而来的男人，那些她肯定会使之幸福的男人。她不欺骗他们，强做慈祥 and 同情。不过，那些男人将会抛弃她，因为他们一向把温存的面孔，把并非出自内心深处的微笑同爱情混淆起来，而那笑意只不过是满足肌体快活而表明尚有一息生命罢了。她那圆圆的脸蛋没有涂脂抹粉，任汽车的颠簸而摇晃着。那脸蛋不只吸引男人——她将以单纯、放荡的习性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在她暂时、巧妙和欣慰地安顿生活时，男人只不过是一些象征物、标记和可供挑选的东西；她的脸生来就是为了吸引男人的特有的东西。她永远不满足，对任何东西都不会真正感到惊奇，她要把眼前的一切印在脑际，变成遥远的经历。我想象着她的脸，那是一张兴奋的脸，机警的脸，饥饿的脸；我也想到了她年老临终时，那双扁平的眼睛会流露出怎样秘密的神情。

“您认识他吗？”姑娘两肘支在手提箱上，转动着宽沿帽，问我。

“他常到店里来。”

“我知道。他身体怎么样？”

“这最好去问医生。但是，几分钟之后他会好起来的，这您是知道的。”

“我知道。”她又说了一遍。

我把汽车拐向右方，开进了老旅馆的花园。她没有让我提

手提箱；她跟在我身后，迈着大步，昂着头，仰视天空中已经开始隐去的星斗。我跟值班人说了几句话，然后我们在旅馆的酒吧间里默默地等待着，相互之间保持着一段距离。值班人按了按电话钮，姑娘不时转动着脑袋，显得很焦急，但尽量耐着性子。为了度过她的余生，她想熟悉一下那男人每天进进出出的这个地方的大小、墙壁、地板和家具。

那个男人在楼梯上出现了。他瘦削、眨着一双失眠的眼睛，只穿着睡衣，一副肯定遭人嘲弄的样子。在没有看见姑娘之前，他一步一梯地往下走，显得失望，愁容满面；这时，我用手打了个招呼，便径直走到门旁。姑娘抬头望着步履蹒跚的男人，微笑着。她大声对我说了两声“谢谢”后，再没有回头看我。我在外边透过玻璃门的遮帘，看见男人停住脚步，靠在扶手上，脸上一瞬间闪过掩藏在内心的怪诞和天真的忧虑之情。我一直在门外观看，直到他们在楼梯上一动不动地拥抱在一起。

我这样想有什么好处呢？对他们，对我，对谁都没有好处。我开车返回的时候，决定不再想下去了。罗亚尔饭店的经理正在一个短工的帮助下搬动桌椅。我坐了下来，想跟他聊一会儿，喝一点东西。

“要是每天都象除夕之夜这样，那我只要干一年就行了，以后不必再劳神了。”经理象背书似地脱口而出。看来，这句话他不知说过多少遍了。这位经理身体肥胖，秃顶，肤色红润，表情忧郁，很年轻。”看来拉马斯姑娘过不去今天夜里了，护士和两个大夫都守在她身边，不早不晚，恰恰是在辞旧

迎新的时候。”

二楼有个房间的窗户开着，里边的人还在跳舞，欢笑。不一会，说笑声突然变小，变成了辞行再见和窃窃私语那样的声音。人们一直在窗口附近跳舞，手风琴演奏着《玫瑰色的生活》。

“咱们应该再多搞点宣传，少来一点限制。”经理对我说。什么话题他都谈得来。他象以往一样，带着感激的表情，神经质地窥测着我的面色和动作。

“再喝一瓶啤酒？旅馆业非同一般，绝对不能象别的生意那样经营。这一点您是最清楚不过的，人是决定性的因素。”

夜空渐渐放白，山上的雄鸡间或啼鸣。人们已不再跳舞，一个女人以柔和的嗓音用法语唱了《玫瑰色的生活》，就是唱机里唱过的那首歌。

“主显节您还可以再好好搞个活动，”我跟经理说。楼上的那个女人还在唱歌，她把节拍唱得很重，休止符拉得极长，好象有人在跟着学唱似的。“假如天气作美，您可以放心，每个周末旅馆都会满满的。”

“我倒也是这样想的。”经理说着又打开一瓶啤酒，我端起了杯子。

“肯定是个好年景，您放心吧！”

“所有的单数年都是好年头。”经理表示同意我的话。

从这个单数年的头几个小时起，那个男人就离开了老旅馆，人们在第二天近晌午时才知道这一点。当时他回来取衣服——没有取走所有的衣服——并且与旅馆联系，每天中午让

人把午饭和晚饭一次送到山上葡萄牙姑娘的房间去。尽管那姑娘在这里时，他一直不去旅馆住，但并没有退掉旅馆的房间。

我看见他们在楼梯上拥抱之后不久，他们就到山上的房间去了。拥抱时，那姑娘改变了身体的姿势，不再象开始那样疯狂，只是做些不需要接触身体而能做的动作：她自重，沉着，留心。他们大概上楼到他的房间去了，但只呆了一会，那只是因为“男人”要上去穿衣服，姑娘要看看他房间里的摆设。他们连夜爬上山去，他在姑娘前边半步远的地方带路，一只手提着姑娘的手提箱，另一只手拉着她。他精神焕发，想尽快抵达目的地的焦急心情已经完全占据了他的心灵，变成了全身独一无二的感觉；她象是被抢来的，他要尽情地享受。他知道，一旦小房子的门锁上，他将依然要过孤寂的分居生活，除了一直伴着他的绝望外，他没有任何永存的东西，没有任何真正的东西。

姑娘在镇上呆了不到一个星期。那些日子里，我一直没有再见到他们，也没有人对我说起见过他们。实际上，只有每天中午旅馆的伙计腋下夹一份报纸上山给他们送饭时，我们才想到他们两个人的存在。对我来说，当我把两封蓝墨水写的苍劲字体的来信同其它函件分开，保存在邮件柜里时，他们已经在我心中存在了。我想到了他们的一切——那是出于一种帮助他们的模模糊糊的虔诚想法——他们在那个黑洞洞的夜晚步履艰难地登山的情景，两人手拉着手，默默地爬着，他在前面，不时捏捏她的手，以提醒注意脚下的危险。他宽大的后背向前弯弓，象是不让人看出在用力拉她，两个脑袋倾向高低不平、

难以辨清的路面，头顶上一些黎明前首先展翅的小鸟在啼叫。他们不紧不慢，一步一步地在潮湿的山地和草地上走着，仿佛他们的房屋位于高耸云端的山顶，而时间，新的一年的第一个黎明仿佛止步不前。

直到主显节的前夕，我才又见到他们。他们有气无力地走着，手拉着手，在漫漫黑夜中攀登着。那天下午，护士从罗亚尔饭店来到我的商店，把一只臂肘架在柜台上，学着布里格顿英国人的腔调，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嘀嘀咕咕地说：

“您看，给我来一瓶冰镇啤酒好吧。”说完放声大笑起来，并且用手拍了拍我，“事情是这样的，他终于出了洞，他们是在旅馆吃的午饭，她今天就走。很可能两个人整天关在一起受不了。不管怎么说，这种生活是一种自杀。这事我跟贡斯说过，他必须给我解释清楚。那个家伙还要付旅馆费，是一个星期的全部费用。从全面看，他的事也是坏在她身上。他又不是游侠骑士，不该把她带到旅馆来，让大家看着他和另一个女人住在一起。自姑娘来了之后，两个人一直睡在山上的房间里，这是尽人皆知的。吃午饭的时候，您可以想象得到，她连头也不敢抬，一直盯着鼻子。怎么说他也不该把她带到大庭广众中来，在大家面前亮相。要是我，是绝对不会干出这种蠢事的，我相信，您也不会。”

就在这时，我看见他们挽着胳膊从大路上走过来了，那男人拿着手提箱，一副要去乘火车赶回首都的打扮。他们停下来，站在太阳下说了一会儿话，然后转身朝商店走来。我弯身拉开邮件柜，但手没伸进去就又关上了。我看着他们，仿佛从

没见过他们。心想，如果这是我头一次看到他们，能从他们身上发现点什么呢？他们就要分别了，但看来他很高兴，只是有点羞怯，不太自然，用一掠而过的笑意看了看我和护士。

他俩坐到护士坐过的那张桌子上，也就是除夕之夜英国人坐过的靠近窗栏的那张桌子上。他们要了咖啡和白兰地，是她，是姑娘向我要的。她要东西时，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他。他们嘟嘟囔囔，但不是在交谈。我仍然站在柜台后面，护士在前面，背着我，脸朝门外，他本想把那张若有所悟和含有嘲弄之意的脸对着餐桌，然而却对向了店门。我和护士谈论着冰雹；谈论着采石场主人生活中令人怀疑的秘密；谈论着人的衰老和命运；还议论了物价、交通、死人的面容、病人的回光返照、金钱的万能；议论着与人类命运形影相吊的灾祸；说到了巴罗索弟兄一天下午坐在小麦田边估产的事。

起初，那男人和姑娘只是嘀嘀咕咕。他们不是在谈话，每人指出一样东西，然后组成一个三韵句。两人按次轮流说出在对方脸上毫不费力发现的东西；两人都着了迷，连眼皮都不眨一下，轻轻地呼吸着。他们是在做“游戏”：看谁记的东西最多，最重要，但并不在乎谁胜谁负。我一直看着他们。无论是我还是护士，谁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当我们谈论到采石场主人的风湿病以及他对马匹的溺爱时，他们不说话了，面面相觑。护士没有留意到他们已经安静了下来，或者以为那是他们每句话后的停顿，看看谁可以取胜。护士的腰斜靠在柜台上，对着门口的脑袋微微偏向我，说：

“莱瓦在采石场里曾是工头一类的人。我说是‘一类’罢

了。我想，在那个美国人面前，他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仆人而已，其它均属扯淡。但是，当小母马骨折后，那个美国人一枪便结果了它；那一天，整个庄园谁也没有吃饭，因为美国人不让吃，连帐篷里的牧人也没有吃。”

他们默默地坐在那儿互相看着。她张着嘴巴，“男人”不再抚摸她的手，而是把手放在姑娘的肩上。姑娘安静地坐着，不过有些做作，脸对着我这边。我继续说些闲话，以分散护士的注意力，不去看他们。我谈论了那个美国人的高大身躯如何弯曲着，拄着拐杖；谈论着困难和障碍；说到了人和小母马；谈及了那个美国人对准小母马神经紧张的头颅和惊惶的眼睛射击时如何发出清脆有力的响声。他断言那结局肯定是悲惨的。

他们默然无语，透过不可测量和分割的时间相视对坐。而我们则感到时间在和我们的血液一起流动。他们坐在那里，木然不动，有时候姑娘启齿，但不知道要干什么，也许是要笑一笑，或者是给她的胜利留下的一种新的回忆，也许是瞬息消逝的内心表白——表白她是何许人。

有几个人走进商店来买东西，同时给我带来一些传闻。一个司机停下卡车要水喝并打听地址。那时，夕阳把高山的影子慢慢拉长，开往松林村的最末一班公共汽车摇晃着车身缓缓驶过店前。我推算着时间，看着挂在架子上的闹钟。他们仍然一动不动，坐在桌子那里。姑娘双臂交叉在胸前，为了让距离稍近些以便看得更清楚，她使劲靠在前边的椅子背上；虚弱的宽身子的男人背对着我，他的手仍然搭在姑娘的肩上，宽沿帽盖住了他的后颈。“除了毫无目的、不厌其烦地凝目而视外并无

其它意图。”我从他们旁边绕过去时这样想道。我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不要告诉他们一声进城的公共汽车就要到了。现在我看清了那男人瘦削的身躯，忧伤的面容。护士无可奈何地微笑着看了看我。

“公共汽车，”我对他们说，“公共汽车马上就到了。”

他们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我又回到了柜台后面的老位置上，对护士说，人要想摆脱自己的命运是徒劳的。护士补充了好几个这样的例子。

公共汽车在店前停了下来，行李员走进商店喝啤酒；他一直盯着姑娘身边的手提箱。

“我不知道，”护士这样说，脸上露出死板的奸笑，“不过，咱们倒可以问问。”他使劲拍响双手，几乎要发怒了，“这是最后一班公共汽车啦！”

他们纹丝不动，护士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腰靠在柜台上。我朝行李员笑了笑，眼睛没有离开他。

进城的公共汽车开走了，夜幕开始徐徐降下。我想，即使他们与一切隔绝也是不够的，因为这“一切”将继续存在，等待着这样的时刻到来，即他们不再对视，不再沉默：“男人”把搭在肩膀上的手从灰色的衣服上放下来，去抚摸姑娘的手。可是，房屋和道路是存在的，汽车和灌油嘴总是不会消失的；还有人在呼吸，在思想，在想象，在做饭，他们烦闷地沉思着，他们是善于掩饰能思考问题的。

他们面对门口紫色的灯光站起身来，他提着箱子，对我眨着眼睛，微笑，看来允许我继续活下去了。姑娘抬起一只手，

数到“男人”的面颊上。

“你步行去吗？”她问。而他还在继续看我。

“步行，为什么不能步行呢？有时我走的比这还要远。咱们不用急着去赶火车。”

我站在故意装得厌烦的护士身后，那个男人对我，对其他人，对我所代表的所有人，露出殷勤的笑容，象是准备照相似的。我本来没有想到他会笑得那样甜蜜，可姑娘对这种微笑一点不感到惊奇；他以这种微笑表明自己决心保护姑娘到底，驱散暂时遮在姑娘心上的愁云，使姑娘脱离护士、我、商店和高山所象征的一切，尽管这是不大可能的。

他们挥手告别，走出商店上了路。他们先沿着罗亚尔饭店的网球场和牛奶店的后面走过两个街区，然后向右拐去，在高高的红墙之间顺着弯弯曲曲的坡路下行，一直走到城中心，挂有旗子的警察局就坐落在那里。他们一定挽着胳膊，比那天晚上走得慢得多，两人心不在焉地听着左边机场大楼传出的震耳欲聋和富有节奏的声响。他们大概在回想着姑娘刚来的那天夜里他们到小客房去时爬山的情景；也许，他们仍然在进行那次秘密的、激动人心的、还没有作为记忆牢固地印在脑子里的夜行，并且给那次夜行以新的明显的含义，去掉所有原有的含义。

五

信重新开始寄来，现在是两种信封的信同时到达，一种是蓝色粗体字的手写信封。一种是打字机打的。我倒不是为“男人”，而是为当他来喝啤酒并且一声不吭地要信时我所回忆起来的事情而感到遗憾。他的动作，缓慢的语调，耐性，这些都没有任何变化，看不出那些不可否认的事实——来访者的到来和离去——的任何痕迹。我曾猜测到的他那依然如故的神色，或是谨慎，或是缺乏信心的征兆，可能被人们牢牢记在心里，信为真情。因为，我确实一直在探寻他的变化、漏洞和新情况，而我最终臆造了出来，这也是事实。

一二月份正是夏天，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起来，各个旅馆和山上的别墅都挤满了成群涌来的游客。盛夏之际，我们——他和我——一直在玩耍着怜悯与保护的游戏，尽管他本人并不知道或者以为知道别的事情。我想着他，承认他的存在，这意味着我对他的同情心和他的不幸都在增长。我已经习惯了不看他，不听他说话，给他递啤酒，交给他信件，象对待任何一个穿着五颜六色夏装来我商店的人那样对待他。

“您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护士说，“您不愿意谈论那个家伙，对吗？难道您也被弄迷惑了吗？老旅馆的事情真叫人不敢相信。他跟谁也不打招呼，可是人们并不说他的坏话。对姑娘，人们可就议论纷纷了。贡斯也是如此，和他也谈不得那个

家伙是活还是死，好象他根本不知道他的情况，并且也没亲眼看到过上百个比他情况还要好的人相继死去似的。”

那男人每天中午都要来取信，喝一瓶啤酒，对我稍稍点头表示问候后便向外走，毫不犹豫地钻进盛夏酷暑中去。这时，他那一天天支撑不起的双肩引我看上两眼。走路时，从身后看上去，可以发现他身上勇敢的气质和仁爱慈祥兼而有之。

狂欢节刚刚结束，那女人又来了。她背朝外走下公共汽车，由于要扶小孩，她下得慢了些。她在大树那儿没有停留，也没有去寻找“男人”那萎缩的修长身影。她对“男人”是不是在那儿等她已经无所谓了。她不再需要他了，因为他已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抽象的东西，随时都可能隐遁，但也易被捕获。或许，她为下车后没有立刻碰到他而感到高兴呢，或者有了安排不让他来迎接，她要自己一个人好好回忆一下往事，以便适应新的环境。那小男孩四五岁的样子，长得既不象他也不象她，刚刚剃过的脑袋抬得老高，目光冷淡，既不怕生也无笑意。

在暗色的镜片后面，无从知道“女人”是怎样的神情。小孩在她身边，坐在椅子上，两条腿垂吊着。她递给孩子一杯汽水，又替孩子正了正苏格兰领带结，用唾液把他前额上的头发压了压。看来她不愿认我，害怕发生预想不到的事情，担心走漏风声和失言。临走跟我打招呼时，她的嘴只稍稍一张，好象她的嘴唇，她的眼镜，她毫无血色的面容，湿润的鼻孔，肥胖而安详的身躯，这一切只不过是她自身的代表物，说明已转化成为某种企图，似乎她认为有必要维持这一企图，以防被触

摸，受损伤；她丝毫不放弃她一直致力搜集和加固的东西，以便在老旅馆发动一次突然袭击。也可能她根本没有这种想法，也许没有看见我，没有记起我，而是身处一个无人的世界，一个只有一样东西她可以争得或失去的世界，她象一头单纯的动物，没有真正的目的，只是要顽固地保留一个已经不被人们称赞的时间段，即从在一个舞厅给世界篮球劲旅队的前卫颁发奖章和奖杯时他们相识起，直到那一天下午来到我的商店，直到她用双膝推动着无所畏惧的小男孩钻入老旅馆的那个房间里，求他发慈悲、忆旧情；高呼老天为什么要那样处事，求助于圣人。

空空荡荡的商店里，只有我们3个人，洗耳静听着，等去松林村的公共汽车开来。我看了看她那圆滚滚的肩膀，注意着她照料小孩时的可笑缓慢动作。她慢慢地喝完了桔子汁。我把从她和姑娘身上看到的東西不偏不倚地加以比较，但要说出她们各自的长处和缺陷，实在拿不太准，只是对戴眼镜的女人更容易辨认罢了。我能想象得到她怎样走进旅馆的房间，预见得到她怎样抓住又推搡小孩，嘱咐他快些跑到床上的那个无精打采的身躯前，跑到那张午睡初醒，正恢复令人怀疑的刚毅的老朽面孔跟前。

在这两个女人中间，若是打赌的话，我无论如何要把赌注押在那个女人和孩子身上。他们年龄相当，习俗一致，情投意合。这下子护士可是赢了我，因为就在第二天，在与上次的同一天色中，我又看到了那个小手提箱在公共汽车门口晃动，同样的灰衣服，那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拿着一顶不大的宽沿帽。

她走进商店门时脑袋仰得特别高，身子微微倾斜，显得稍矮。她那表情象是在哄骗人们，不需要什么斗争她就能离开她将看到和想到的一切。她示威似地向我问候了一声，然后就直挺挺地站在柜台前，手提箱放在两脚之间，3个手指半插在衣袋里。

“您还记得我吗？”她问我，可口气又不象是在问话，
“12点钟我能到旅馆去吗？”

“您得等半小时。如果您需要，我们可以弄辆小汽车。”

“象上次那样。”她评论说，但没有笑。

无论如何，我不再送她去。也许她想到了不会再有第一次那样的旅程和惊人的场面，也许她不好意思再提那样的要求，她说她要等一会，说着便坐到她熟悉的那张桌子上。吃的是护士的饭菜——干酪，面包夹香肠，沙丁鱼——即我的商店所能提供的那些东西。她把一只胳膊撑在窗栏上，看着我来回奔忙着，向我做出她在旅途中想象出来的舒展宽容的表情。

“我这时到旅馆，他们可能吃完午饭了。”她对我解释说，说明如果去的不是时候，餐厅为她重做饭菜比要一辆车送她去旅馆更麻烦。

有几个顾客走进灯光昏暗的商店，目不转睛地盯住我的脸，脑袋一动不动地朝我和柜台走来。他们象是专门到商店来打断我的监视似的，一个个压着嗓门说要买东西，然而，我是在不是接待他们，他们却毫不介意。他们纷纷把目光转向了姑娘，好奇地看着摆在她面前的盘盘碟碟；然后，一道道异常惊奇的目光，伴着嘲笑挑逗的神情向我射来。所有的人——男人和

女人，特别是那些午睡时从山上下来的疲惫不堪、性情活泼的女人们——都想在我的谋划中找到象是受良心谴责的征兆。似乎大家都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赌押在了同一个女人身上，而担心她会失败似的。姑娘继续吃她的饭，脸既不躲闪，也不故意让人看。顷刻之后，她点燃一根香烟，并要我坐下来和她一块喝咖啡。

于是，我可以冷静地进行研究和推测了，认真关心起她的短处来，估计她有多大年龄，品质如何。“要是我从心里厌恶她，我就会感觉更痛快些。”我这样想。她一边点燃第二根烟一边对我微笑，那微笑在喷出的烟雾后面依稀可见。可是，突然，或者说，也许是我刚刚发觉，一切都变了。在我和她之间，我成了弱者，误会了的一方。我发现了自己在这个镇子上的15年中一直是不幸的，后悔为孤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悔经营小店过这种毫无意义的生活。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活得毫无价值，我是一具死尸。她来了，并且还要回去，这一次是来遭受不幸和失败的，是奔向对她来说预感到与否并不紧要的另一种形式的痛苦和失败。想必她已经发觉了我的“要是从心里厌恶她，就会感觉更痛快些”的想法，并想在这方面助我一臂之力。她一面说着一些不痛不痒的话，一面用僵硬的手指摆弄烟卷。她在手指后面继续对我微笑着，并且根据我的需要，变化着她那动人的不知羞耻的微笑和充满敌意的眼神。

我后来想到，她当时那样做——微笑，冷漠，不顾羞耻——也许不只是为了使我恨她，让我舒畅，叫我逆来顺受。她大概还有别的企图：在不远的将来，在我预言的失败时刻，

或者在骄傲以外的另一个遥远的决定性时刻，使我的怜悯之心不复存在；她认为是自己命不好。

“生活在这里犹如时间停滞了一样，仿佛我并不感到时间在流逝，仿佛时间擦身而过但我没有任何变化。”当公共汽车来到店前的时候，我撒谎说。

她拿出一张10比索的钞票，平放在用来当台布的报纸上，然后戴上手套，拿着没有多重的手提箱走到柜台前。

“她不是来长住的。”我边给她找钱边想。她只是带了过一个晚上的衣服，也许她不能在这里过夜。她知道她这次来一定被拒之门外，她要清醒过来，接受现实，要变成那个男人余生中的一个得不到安慰的神奇之物。她低声说了句告辞的话，对着地板笑了笑。

我继续看着她，并且还清楚地记得她的样子：漂亮、高傲，但有一副乞求相；身子向提箱子的那只胳膊倾斜；心情不是不急迫的，她不知道什么是耐性；双眼总是低垂着，用微笑表明她希望继续活下去；她想用眨眼睛或晃脑袋告诉大家，她对这个不幸并不在意，所有的不幸都只不过是用来标明日期的，只是记录我们这些过去和现在生存着的人的生卒年月的。所有这一切，对柜台另一边的我来说，纯系廉价臆造出来的东西，就象被盖在大钟里，闷在昏暗的商店里，被浑浊潮湿的气味笼罩着。姑娘象前篮球运动员那样歪着肩膀在公共汽车司机的身后走了过去。

从那时，从那一天下午起，或者是若干个星期之后——时间准确与否已无关紧要，因为从那时起，除了他们各种各样的

失败结局之外，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们的任何东西。护士和女佣雷娜开始给我讲述发生在旅馆和山上客房里的这段故事的“尾声”了。“尾声，”我自我辩解地想，“这段充满争议的故事的尾声，也许只有他们两人才能想象得出来。”

每天下午，午饭过后，护士和女佣都在我的商店里相会。他俩能在任何一个地方相会，而在这个镇子上，或者说整个世界上，谁也不会看重他俩的相会，没有一个人想过他俩不是天生的一对。然而，我有时候却想到，护士，或者她——肥胖的雷娜，嘴半张着，目光冷漠，不象是等待得过久的女人的那种眼神——或者他们都以为：午睡时间在我的商店里约会，或者在我面前，在货架前，在刷得雪白的墙和墙上的鼓泡前，假装互不相识，微微点头打招呼，或者他们中的某一个轻轻地点着头或随便找个借口坐到桌子上去低声耳语，这样会给约会增添异样的色彩。

他们可能感到郁闷，不过，没有真正的障碍，没有真正的追踪。他们总是把圆圆的笑脸转向我，但小心互不相碰。他们怀疑我把赌押在了戴墨镜的女人身上，因而想法在帮助她，精心列数她本身固有或她所象征的美德，列数两个女人中年长的那位在旅馆和山上客房的48小时里所获得的大胜利。

“应该宰了他，”女佣说，“把他宰了。那个小娼妇，对不起，我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如果考虑到人家是有了孩子的，杀了她也不解恨。”

“一个孩子夹在中间，”护士说。由于想到我无法提出异议，他没有对我笑，露出一副洋洋得意、幸灾乐祸的样子，

“除夕那天晚上是您把她送到旅馆去的，您当然不会这样想的。”

“他怎么能知道！”她尖叫起来，看着我的眼睛，为我解围。

我听着他们讲述和重编那场戏的“尾声”，想到我们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高高的山坡，坎坷不平；想到在我们之前来这儿生活的人们的历史；想到那3个人和孩子，他们到这个镇上来，关在屋里，怒容满面，争吵不止，解决与他们脚下这块土地毫无关系的共同生活的往事。我一边想着这些事和其它事，一边照看着柜台，刷洗杯子，称量商品，收款找钱。护士和女佣雷娜总是午后来，坐在角落里，我听着他们窃窃私语。我知道，他们的手正紧紧地握在一起。

姑娘到达旅馆的时候，那个男人、那个女人及小孩还在餐厅里默默地用餐，喝着咖啡。她，“女人”抬起头来，看见了姑娘；姑娘在离他们两张桌子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手里提着她不愿放在门房里的提箱；她昂首微笑，但不高傲，用宁静的扁平眼睛表明，她既不想伤害别人，也不想被别人伤害；是输是赢她都不在乎；她刚刚发现，那一切——山上的3人聚会，可想而知的争吵，许诺作出牺牲——都是荒诞不经毫无意义的，他们达成任何协议都不会是公正的。不过，她还是不露声色地看着空空如也的桌子，用过的杯子和杂乱的餐巾，假装——雷娜最讨厌这一点，同时她也无法理解这一点——没有认出这几个面色忧伤，还没有喝完温热可口的咖啡的人。

她走上前去，看到了那孩子，她羞得面红耳赤。

那女人看到姑娘停下脚步，又满脸不高兴地走来。她立刻认出了她。她从来没见过姑娘的照片，没有从那个男人嘴里听到足够说明她所畏惧和憎恨的人的形象的材料。但是，她还是考虑过这个是什么脸型，多大年岁，多高身材；然而，她所想象的没有得到证实的东西，她所仇恨的那个变幻不定的对象——同时也是她自我怜悯、本来冷却了的热恋和蜜月的骄傲得以复苏的源泉——不可能同这个侧脸腼腆微笑着向桌子走来的姑娘有任何联系。那男人站起身来，他脊背已经萎缩得惨不忍睹，10个指头按在桌布上，嘴上那根饭后点燃的香烟慢慢烧着，没有取下来。他只低声叫了个名字，既没有说句表示欢迎的话，也没有给她们介绍；他没有再坐下去，因为姑娘没有坐下。她站在那里，高高的个子，看着另一个女人的墨镜和灰暗色的嘴巴，看小孩好奇地眨着的眼睛；她没有必要微笑了，沉思着，忘记了自己的谎言，就象一小时之前在我和柜台前面那样站在方形餐桌边；她把手提箱的一角支在椅子上，疲倦突然袭来，她已力不可支了。

那女人忘记了先前的种种形象，记起了她想象中的女人跟面前的姑娘一模一样。她看得出她有多大岁数，有昙花一现的美貌和天真感人的表情，但有些做作。她又不知不觉地恨起了姑娘，这是她长期形成的习惯；她突然觉得有生以来一直在恨她。

那女人手上剩下的烟卷掉到了咖啡里，她慢慢地垂下脑袋，看了看戴着戒指的手，抚摸着男孩，微笑着；双唇微动，发出的是响声而不是话语，仿佛那里只有她和孩子存在。这

时，身躯瘦长，弯弓脊背的“男人”鼓了鼓勇气，从桌布上抬起了双手，取下嘴上的香烟，给姑娘让了一把椅子。但是，她，脸上露出既不是高傲，也不是威严和爱的微笑，连看都没看那男人一眼，就从椅子上提起她的手提箱，转过身去，沿着进来时在桌子中间走过的路退了回去。

“我没有让她到这儿来，”“男人”毫无表情地解释说，“没有让她到旅馆来。”

“谢谢，”“女人”的手不停地抚摸着孩子的头发，用手指捏着他的面颊。“在这儿，在那儿，都一样。难道不都是一样吗。再说，我们不是已经定了吗；有时候我们忘记了钱是谁的。你应该邀她来吃饭。”她看看他，表示她还是有意微笑的。小孩快要睡着了，张着嘴巴，一打饱嗝身子就抖动着，“女人”揩了揩他鼻头下边和额角上的汗珠。

姑娘背向餐厅，迈着缓慢的步子，一直穿过阴暗的酒吧间，从门房钥匙柜前走过去。她在花坛那儿停下来，把箱子换到另一只手上，然后走下台阶。她无意流泪哭泣；她步履轻盈，不慌不忙；是胜是负，不得而知。开往洪吉略的公共汽车在旅馆前停下，司机按着喇叭招呼人们上车。一个男人下车想活动活动腿脚，在那里踱来踱去。这人矮小，神色茫然，肩上搭着一条淡红色的斗篷。她也许在注视着一群在足球场上奔跑的衣衫褴褛的孩子。

“我愣了一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说清楚的是，他象个疯子似地跑出去追她。”护士对女佣说，“他站在空空荡荡的餐厅里，看着‘女人’和那个象是生了病的男孩。直到那

个女人战胜了羞怯和自尊心，他才说了一句什么话，然后迈平时那种疲倦的步子慢慢走了出去。也许他求得了谅解。他在汽车前追上了姑娘，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可是姑娘甚至没有回过头看一眼究竟是谁抓住了她。”

当旅馆的伙计拿着行李跑到公共汽车前时他们正站在太阳底下争论。汽车拉开制动器，向下驶向我的商店，这时，姑娘笑了起来，并且让人接过手提箱。两人拉着手，慢慢地在山路上行走。他们从围满观众的足球场旁边走过去，在上边的牙科医院拐了弯，然后沿着弯曲的山路，一直走到葡萄牙姑娘们住过的客房。“男人”在走廊里停了一会，俯视干枯的小河、岩石和老旅馆的垃圾坑，他没有进屋；有人看见他拥抱了她，接着下了走廊的台阶。她关上了房门，但当“男人”走远之后她又把门打开了，一直目送着他，直到他消失在采石场办公室后面。她又看到了他，看见他从球场旁走上了大路，他的身影变小了，模糊不清了。

我想象着“男人”和姑娘拥抱之后是怎样迅速下山去老旅馆的；他清楚自己的身材，清楚自己的疲劳，他清楚，过去的事情之所以还存在，那是取决于我们现在怎样重视它。当然，我们可以注意少一点，也可以全然不顾。拥抱之后，他走下山来，感到年轻，浑身是劲，敢于去冒各种风险——几乎是去挑起风险了。

“他们不在了。他回到旅馆的时候，那个女人已带着男孩离开了餐厅，孩子在楼梯上跳着玩了一会。房间的门反锁着，那男人只好用力敲门，在走廊里等候，每走过一个人他都致以

微笑，以掩饰所处的窘境。他一直等到她醒来，或者说等到她想给他开门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尽管她提着手提箱进来时贡斯大夫也在餐厅，可是这位大夫硬说他什么也没有看见。然而，他不得不强调说明那家伙从到来的头一天就应该老老实实呆在疗养院里。要是能那样的话，我们也许还抱有希望。”

他一遍一遍地敲了很长时间。在狭窄明亮的过道里，他感到害臊，因为女佣和饭后到公园散步回来的老处女们来来往往。他一边等着开门，一边回想着一些已经不甚难听的老名字，他在很久之前为一个现在已经离开人世的女人而发明出来的名字。“女人”终于半裸着身子走来开门，她没有戴眼镜，显得很难为情和困倦。她打开门后立即又躺到床上。他看得一清二楚，大腿，光脚，孩子张着小嘴巴睡得很香。在启步进房间之前，他又沉思了一会，他发觉，过去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遥远的梦。

“对！最好一刀两断。”他坐到床上时这样说。此刻，他除了要证实“一切都是如此简单”是一件痛心的事外，他不感到有任何其它痛苦，“有道理，太荒唐了，没有好处。”

接着，他交叉双臂，惊异地听着“女人”的啜泣，他感到痛苦，仿佛有些后悔，不过不是为了某一个行为，而是为某一个可恶的念头而后悔。那啜泣声指向他是不公正的。他身子缩成一团，微笑着，“女人”的哭泣使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他使劲在“女人”的臀部拍了一巴掌。

“我都快死了。”他解释说。

这一天的下午白白过去了。很可能“男人”曾想和“女人”亲热亲热，想通过作爱重新恢复欢快的心情。天黑时，他走出房间，下了楼，跟门房和酒吧间的管事开玩笑去了。

“下楼的时候，跟往常一样穿着一身既非冬装也非夏服的灰色衣裳，高领口，系领带，皮鞋擦得油光锃亮。他没有别的衣服，身上的穿戴好象是刚刚买来的。看他那副样子，仿佛午饭时什么也没有发生，姑娘没有来过，谁也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人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下来时那么高兴和话多。他跟门房开玩笑，非要酒吧间的管事和他喝一杯不可。这可真是想不到的事。他对每一个进来吃饭的人都爽朗地笑笑，打招呼，以至不知道是谁还向贡斯大夫问了问他是否出院了。”

晚饭的时候，他们在花坛旁摆了一张桌子，刚刚坐下，姑娘就拖着疲倦的身子，但和颜悦色地爬上台阶，向他们走去。她向“女人”伸出一只手，并同他们一起就餐。人们听到他们欢声笑语不断，喝了几瓶酒。胖女人把男孩撇在一边，倒是另一个女人——姑娘——一只手频频抚摸孩子额角上的头发。

伙计跑去告诉“男人”花坛旁的桌子已安排就绪，这时他从酒吧间的柜台上直起身子，向戴眼镜的女人伸出一条胳膊。到那时他离开房间下楼已经有一两个小时了。这一两个小时，以及这段时间里他以浓厚的兴趣和近乎幼稚的礼节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夺回他在旅馆度过的时光，使别人对此有所印象；这样做将使日子好过些，并与其他人度过的时光一致，交融一起。他对别人微笑，邀请他们同饮共餐，用响亮的声音打招呼，勇敢地关心和询问体温和治疗方法，亲切地拍男人的

肩，用尊敬和热切的眼光望着女人，这些，都是他在这一两个小时里根据人们的心理所做出的。他希望他们把这一切也带到他前几个月的生活中去。这场小小的喜剧，还包括为在酒吧间里与他一起喝酒的人解囊付款，他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抬起手来以得到支持和默许；以警惕和尊敬的目光看着贡斯医生——他刚刚走进厅堂，一边解开上衣的钮扣一边要下午的报纸；轻盈快步走向磅秤，挺直修长的身体，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一动不动地站在秤台上：“七十五公斤”，他重新走到柜台前，松了一口气似地向人们宣布说，可能磅秤不准，“我可以用别的秤。”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他露出了感激的神情。当别人拍着他的肩时——他在人家背上拍了许多下——他不住地笑着。这时，他惊奇地想到人们可以很容易地驱走死神，这真是奇迹，人们可以长生不老。他谈论政治或默读货架上酒瓶商标的外文字时，不是使人断然失望就是当众出丑。由于他急着一下子还清第一天起就欠下的帐，他请趴在柜台上看玻璃板底下旅游广告的人让开些。他端着满满的酒杯，走到一张藤桌旁，贡斯大夫正在那里看足球比赛消息，护士在本子上记录着夜间巡诊时的注射情况。

我多么希望您能看到他呀，很难相信那就是他本人。

他用笨拙的手指端着酒杯，露出光闪闪的领带和真丝衬衫，好象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夜晚，象办喜事一样。他不住地微笑着，面对贡斯金黄色的胡须，面对他的金丝眼镜，听着他鼻音很重的连珠炮似的话，机警地微笑着，乖乖地微笑着。

那时，我在餐厅里来回奔忙着，一会儿送餐巾，一会儿端

菜送饭，因为那天另一个女仆病了，或者她自己说是生了病。我正好从储藏间拿着东西出来，在酒吧间的柜台和他们占用的桌子间走过去。那时，那个女人还没有带孩子下来，几分钟之前她跟我要了阿斯匹林和矿泉水，我从背后看见他头发梳得油光，坐在一把大椅子上摇晃着，时而笑出声来，手里拿着酒杯，不时喝上几口。他们象是在随便交谈着，谈阴雨，谈网球场上的水井。

他对所有人都露着一张欢乐的笑脸，象是情谊深厚的故友；他也以同样的表情询问医生有无治愈的希望，问这几个月的病情变化。这时，他那无从说起的讥讽显得更为明显，更直接。那讥讽不是针对贡斯的，不是针对护士的，也不是针对忙得手脚不停的女佣的。那讥讽是他为夺回失去的时间而迅速掀起的运动的内容，以改变留在旅馆和镇上人们脑海里的不愉快的记忆。在他倾听贡斯讲话时所流露出来的微笑里，大概包含着难以掩饰的疑虑——这，我一眼就发现了，他第一次感到脊背隐隐作痛时就该知道的，护士和女佣作证，他那天决定接受诊断，即他已麻木不仁，身不由己了。

但是，他能把这归于贡斯不尽心吗？贡斯早就说过要彻底治疗，他一向如此。他一开始就劝他进疗养院，以求完全恢复健康。可是那家伙想必是喝醉了，不过并没有失去理智，他笑着对贡斯说他忍受不了疗养院的生活。而当“女人”抱着小孩在楼梯上出现时，他开始跟我们讲起了同美国人的一场球赛——有人说比赛是因为他而输掉的。他说，比赛结束，当人们拿着麦克风向他走来时，他差一点哭出来。他告辞走到酒吧间

的柜台，让“女人”和孩子从身后走过去，到花坛那里。我去问酒吧间的管事有没有我的电话，看见他在那儿一字一句、一个球一个球地讲述着怎样与美国人比赛的。

我到楼上40号房间去送阿斯匹林和矿泉水时，她待我特别亲热。小家伙站在窗子附近的一把椅子上，看着外边，唤猫玩。她帮我托把托盘放在桌子上。我记得她对我说穿胶鞋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我说这种鞋非常舒服，但人显得矮了。她穿着衬裙，没戴眼镜，眼睛很大，描得绿绿的，眼圈灰暗。我启瓶塞时，她靠在墙上，双臂交叉在胸前，手几乎抓着双肩；我觉得她在看着我，仿佛我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我到40号房间是想跟她说点我不感兴趣但她想听听的东西似的。我走时，她挥着一只胳膊，叫住了我，并非开玩笑地对我说：“要是您象现在这样看见我，而对我以前又毫无了解的话……那末，您认为我是一个坏女人吗？”“太太，您，”我对她说，“无论如何，您不是坏女人。”

为什么他要从许许多多与他无关紧要的事情中挑出一场篮球赛来讲呢？我想象着他端坐酒吧间的方凳上，翻来覆去跟人们讲着他那无人感兴趣的故事：过失，失败，青春。我看见他象挑选最好的衣服——做为最完美的象征——穿一样，选择那一夜在卢纳球场进行的比赛津津有味地回忆，那是一个不太真切的、多次被篡改的回忆。那时热闹异常，人们为了看到球赛竟以100比索的高价买转手票，他汗流浹背，巧施妙计，失败时兴致一落千丈，灯光下头晕目眩，人群离去时叽叽喳喳，没有欢呼雀跃。

也许他选择的不是对往事的回忆，而是一个令人羞愧的、尽人皆知的、尚能忍受的过失；对这一过失造成的损失，他承认负有责任，而现在这损失任何人都不觉痛心了。他可以重新回忆起来，心感自愧，自愧得那样厉害，乃至成为一场大难，压倒了内心的其它一切痛苦。

他们在花坛边用餐，象要好的朋友，4个人仿佛组成了一个亲密和睦的家庭，这真是天下一大奇闻。晚饭后，那家伙陪姑娘到山上客房去，女人抱着孩子走下台阶，一直送他们到旅馆大门口。把孩子哄睡之后，她又回到餐厅要了一杯烈酒，一直喝到餐厅里只剩下贡斯一个人。她把大夫叫了过去，谈了半个来小时。这正是那家伙在往返路上耽搁的时间。

“男人”在餐厅里发现他们时，“女人”表现得既不忧伤也不高兴，好象更年轻更成熟了。憔悴的“男人”挺着身子朝他们走去，一脸滑稽相，神色警惕。贡斯一面擦着镜片，一面慢条斯理、若有所思地说了几分钟话。“女人”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男人”的手。她显得很多情，不过没必要那样，在她那做作的表情里，除了看得出她忠于爱情外，内心却充满了诧异和惊奇。她注视着“男人”，好象贡斯刚刚把他介绍给她。贡斯向她介绍了前一时期的情况，预言过的、可信的情况，这情况从那时，从那次际遇算起已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这段时间里她从来没有和他一起睡过，对他的习俗和悲观厌世情绪一无所知。

贡斯离开之后，他们又默默地喝了一会，心照不宣地把座位间隔得很远。上楼准备去睡觉时，她不由自主地扶在骤然

强壮起来了的“男人”身上。他们慢慢地走着，想象和修正着他们两人可能给守夜人和酒吧间哈欠连天的人留下的印象，并且发现——他们那刚刚启动的激情令人难以置信——一切都不复存在，永不复返。

“那一夜的事是千真万确的，”护士说，“事情太奇怪了：两个女人如至交之友，亲热地吻别。第二天的事更令人不可思议。午饭后，不是别人，而是她独自一人到山上小客房去，拿着一个想必是装着食物的小包。那家伙和孩子留了下来，他带孩子到他这些日子看到的最美丽的地方——垃圾坑——去散步。他只穿着衬衣，用宽沿帽遮住眼睛，闭眼躺在太阳下，用手扯下干枯的野草，送到嘴里咀嚼。小孩攀登山石，随时都可能滑倒摔坏。可是那家伙根本不闻不问，也不管山上客房里的两个女人在议论什么，他活象一头在圈里昏睡的猪一样，枕着外衣，眼睛上盖着宽沿帽，在烂纸片，破瓶子和脏棉花旁边，四脚朝天躺在太阳下。天气开始凉了，男孩也许饿了，也许玩腻了，走过去摇晃他，直到他站起身来。‘男人’把孩子放在肩上，向旅馆走去。大约5点钟，她回来了，看上去又老又瘦。她独自在酒吧间里要了一杯酒，手托着腮，木然而坐，双眼发直。喝完酒上楼去，在房间里和‘男人’争论了好一阵子。”

“不是争论，”雷娜温情地纠正说，“我那时正好在收拾对面的一个房间，躲不开，只好听着他们，但听不真切。她说她唯一希望的就是看到他幸福。他也没有高声吵嚷，有时还笑两声，但那是奸笑，愤怒的笑。‘贡斯对你说过，我活不长

了。正因为这样，我才作出这种牺牲，断绝来往。’ ‘男人’说到这里，女人嚎啕大哭，小孩也跟着哭起来。‘就是这样，’他说，‘纯粹是为了折磨。我已是死尸一具了，这，贡斯告诉过你。一具1米80公分长的尸体，这就是你送给她的一切。她也将这样做，你收到的也是同样的东西。’ ”

“这不是说她爱他，”护士说，“但是得考虑到他是个不可救药的人。两个女人之间有某种默契，这不可否认，尽管这正是‘男人’所希望的，但到事情发生时，她才恍然大悟。当然啦，他是早就知道这一点的。然而，事情却总是如此。您是看见她带着小孩来乘公共汽车的，可以断定，她此去不会复返了。他俩现在住在山上的小客房里，饭菜由人从旅馆送去，他们几乎从不出门，只有晚上才偶尔看得见他们，那是在走廊里抽烟。贡斯跟我说，现在不再强求他住疗养院了，事情快了。”

她是从我商店门前过去的，这是确定无疑的。她抱着孩子，没有进商店，在树荫下等候公共汽车。我一面刷着杯子，一面象侦探似的从柜台后面看着她。我很想递给她点什么东西，送给她点她想喝的东西。我本想告诉她，我们——我认为是我和她——一致认为，她给另一个女人留下的不是“男人”的尸体，而是帮助他死去的特权，即那个家伙生命的整体和关键。

那两个人直到冬季来临时还关在山上的客房里，直到一年中唯一的一场雪降下之后好几天才出屋。没有再来什么信件，只收到过一个包裹，上面写着：旧衣服。

房地产租用代办处的安德拉德到他们那儿去看过4次，每次都是姑娘默默、客气地接待他，毫不理会他的好奇心，使他

骑在自行车上想好了的多呆一会儿的借口顿时无效。有一天，门响了，只有安德拉德才敲得出那样的声音。她穿着黑色网眼针织上衣和皱皱巴巴的裤子。听到响声后，她立刻走了出来，就好象早就等着开门似的，她准确、迅速，象小伙子一样做了她该做的一切：问候，默默地付钱，留下收据，然后送别。安德拉德骑上自行车，沿着蜿蜒的山路，直回代办处，或者绕到他管辖的山上别的小屋；一边蹬车一边想着他看到的情景，想着可以接受的推测，想着可以叙述，可以骗人耳目的事情。

“女人”带着孩子离去的当天，“男人”在旅馆里结了帐，搬走了。他已不再是来来往往的旅客中的一员了。他肩上搭着雨衣，用最后的一点热情，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转向那边，对人们微笑着，与他们默默告别；他装好收据，走下旅馆的台阶。从那时起，他最后一个夜晚在旅馆里慷慨献给人们的礼物和其它东西开始被遗忘了。贡斯和加斯特罗的病员们立刻比以往更为愤怒地绘声绘色议论起了“男人”区别于他们的桩桩往事，特别使他们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他硬是不承认已经染上了把他同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疾病。

他们在他们中间生活时所遭受到的无辜和不能容忍的非议是难以言状的。那些人把愤怒集中在山上葡萄牙姑娘的客房里。当看到他们在花坛休息，或在公园和河边散步时，更是火冒三丈。直到黑夜变长时，旅馆的伙计一直一天两次夹着报纸，拿着饭食上山去，而第二次病员们只能看到他出发时的身影；见到伙计上山去，走向红墙白瓦的小房子。他们想到房客会因羞辱而窗门紧闭时，怒火冲天，仇恨成倍增长。他们掌握着伙计

送给管家的啤酒定单，认为“男人和姑娘在山上客房里的生活场面一定富有挑逗性，与世隔绝的生活招惹众人的痛骂”。

六

护士讲完了众所周知的丑事。那时天已黑下来，我点亮了灯，让莱维家的男孩替我照看商店，我去和罗亚尔饭店的经理一起喝几杯，扯扯有关死亡、治疗和税率一类的闲话。灰蓝色的夜空下，冷空气迎面扑来，风好象不是从山上刮来的，而是在路旁的树梢中形成的；冷风阵阵，每一步都是艰难的，然而又是愉快的。我低头走着，听到飞机制造厂上空断断续续的马达声。我一边望着洒在土路上没有尽头的灯光，一边估计罗亚尔饭店经理会以怎样疑惧的心情和天真的愿望告诉我，今年冬天多雪，道路将被封锁。我停住脚步，昏黄的灯光照着我的脸，我听到了一阵笑声：那是有意发出的挑衅性的干笑。“男人”重新把提灯放到地上，看了看天上的云彩，把灯熄灭了。

“这灯，我是回去用的，”他说，“我在车库发现了这盏灯。您不在，咱们是偶然相遇。不过，我是专门找您来的；我要跟您谈谈，商量点事。”

他呆立着，显得很高，背后是模糊不清的山峰，他脸色灰蒙蒙的，头发蓬乱，风吹得他的大衣扑拉扑拉直响，响声与他一口接一口的咳嗽声混杂在一起。“男人”抬起手和提灯，捂着大衣。

“我以前并不认识您。”我说。想到他的往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向他伸手，“咱们到商店去，好吗？起码那儿没有风。”

他默默地跟在我后边，脚步落在地上，仿佛要踩扁什么似的。“这是他头一次跟我说话。”走进商店的时候我这样想着。以前他总是用单音节、哼哼声、面部表情或孤字单词跟我打交道。他醉了，但不是酒醉，他需要继续讲下去，他象是从悬崖上跳下，希望尽早落地一样。

我一边搓着双手，一边脱下大衣，店里也很冷，而且还有点风。我不想回过头去看他。我拍拍莱维家孩子的肩，他在柜台后面半张着嘴巴，帽子压在眼睛上，睡得很香甜。屋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我倒了两杯苦艾酒，他把手从铁窗栏上放下来，微笑着张开双臂向我走来，手里的镀镍大提灯晃动着。他弯下身子，想止住咳嗽，然后又笑了笑，脸涨得很红，眼里闪着泪花。

“对不起，”他小声说，“要是不麻烦的话，请换一杯甘蔗酒。”

我给他倒了一杯他要的酒，举杯之前我说了“祝您健康”，但我的目光仍然没有移到他身上。我开始打量他的外套；黑色，陈旧，特别肥大，大钮扣，天鹅绒领子八九成新。

“您要去办事，”他说，“我不愿您为我……一会就说完。”他停下来，认真地、惊奇地、询问似地环顾了四周，然后轻轻转过来，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他身子不动，噙着上唇，不管是不是看见我，总是把目光死死地盯在我身上。为了向人表明散发着香味、样式陈旧的黑外套里的身子直立不歪，

他用指尖在柜台上敲着。他的手腕瘦骨嶙峋、毛茸茸的；他时而痛心，时而心爱地低头细看。除此之外，只能看到高高的颧骨，死板的笑容和孩童般活泼的眼睛。我实在不敢相信一张脸只有这么一点可怜的东西。那就让我给他加上点东西吧：蜡黄的宽额，灰暗的眼圈，鼻梁两边青紫色的线条，连在一起的两道浓眉。

“再给我来一杯，”他对我说，“事情很简单，我们的食物被断绝了。他们想我只能活几个月，可是，我的死期延迟了，没有象他们期望的那样在预定的时间里寿终正寝，我现在还活着，在这儿活着，咳嗽着。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对这些想法坚信不移，甚至发誓要实现，可是，最后总是实现不了。对不起，我不想占用您的时间。实说吧，就是今天，旅馆里的人烦了，中午伙计给我们送饭时，说是以后不再送了。他感到很不好意思，不住地用脚尖蹭着地板，最后可能对我们产生了同情之心。我们付了钱，给了小费。她，为了不让我看见她哭，悄悄躲到走廊里去了。显然，事情很糟；她说要治好我的病，使我幸福地生活，她母亲给她遗下一笔钱，她把钱花在这上边，用来给我治病。总之，我得吃饭呀，要吃到我完蛋那天，这是我们一致的看法。所以，我来找您，看看您这儿能不能一天给我们送一两次饭，这是短期间的事。并不是说我想死；我们有可能很快离开这里。”

我撒谎说“可以”，因为我还不知道怎样才能给他们弄到每日两餐饭；我心里嘀咕着，他为什么不去找别的旅馆和客店，偏要跑到我这儿来呢。他侧着身子，紧紧地靠在柜台上，

摆弄着提灯，他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告辞。我又给他满满一杯，心想，山上的姑娘趁他不在会多哭一阵子的。

山上的一个老太婆讲过，一个星期天她走进他们的小房子，去讨几根火柴。一扇窗户开着，“男人”光着身子在立柜的镜子前照着，还不时地摆动胳膊，脸上显出好奇的、稍带惊讶的微笑。我想，这不会，肯定不会是结束了床上的兴奋后的“男人”经过镜子时照出的身影。他为了看看自己，面对着镜子慢慢脱光了衣服，露出骷髅一样的躯壳，身上毛发斑斑；那不是他有意涂上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迹斑，而是胎生的。他百分之百地记得他身体原来就是那样的，根本不相信现在这两条腿还能支持他的身躯，吊在两根大腿骨中间的是那东西。他在镜子里不只骨瘦如柴，而且还在瘦下去，他几乎不敢再去看，再去想了。

他动了动插在外套口袋里的手，但没等他把手抽出来我便开了口：

“这没有什么，我包下了。一言为定，两个人的饭，一天两次。”

他用提灯照了照墙壁，脸上露出了笑容，渐渐地浮现出骄傲的神色，仿佛他刚刚照到了目标。

“谢谢，您给我们送去的东西一定会很好的。不会再来信了，我要她别再写了。”

他挪了挪身子，向我凑过来，抬起头看着我。他笑逐颜开，但那不是发自内心的笑。他衰老了，死去了，毁灭了，躯壳变空了，但是，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年轻，他的脑袋跟孩童

时从第一次肺充血中解脱出来时躺在枕头上一样挺得很直。他的微笑变成了一种响声，并把手伸给了我；他无畏地、健步走出店门，外套被风刮得飘来飘去，有时直卷到胸口。我看着他提着灯，一步一步爬上山去。

以后有三四个星期我没有见到他们。饭菜是从罗亚尔饭店由莱维家的男孩送去的。现在是他出面接待，每天都付清饭钱。

姑娘又成了护士闲谈笑语的话题了。一天傍晚，她走下来，到旅馆找贡斯大夫。她在花坛上等着医生，对旅馆的小伙子们，对可能认识她的旅客们笑着，哑然无语。据护士说，贡斯耸耸肩，说不行；后来他又把头低向姑娘和桌子，唧唧咕咕说了几句话。姑娘从医生身子上边眺望远方，好象那里只有她一人似的。最后她说了声“谢谢”，并付了咖啡钱。贡斯陪着她走到旅馆大门口，然后双手插在裤兜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她远去，爬上山冈；她穿着鼓鼓的坎肩，在刚刚降临的夜色中前进。

据女佣——她不准备和护士结婚了，现在独身一人到商店来，而且总是护士不可能来的时候——说，一天夜里，姑娘到旅馆里把贡斯大夫从床上叫了起来。当时在酒吧间里闲聊的昏昏欲睡的人们发现她表情与其说是忧伤，毋宁说是惊慌。贡斯最后冷冰冰地答应了，抓着姑娘的一只胳膊，走向山上的小客房。

在女佣或护士告诉我他们要走以前，我又突然看见了他俩。那是一个早晨，六七点钟的样子，两个人一起到商店来，

带着自己的手提箱，寒风中只有他们两个人。

“又来啦！”“男人”直起身子说。

他们靠窗子坐下，跟我要了咖啡。她，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微笑着看了我好一阵子。她用那笑想解释点什么，想使自己平静下来。我望着他们那失眠的眼睛，冰冷但满意的面容。我很容易想象出刚刚过去的这一夜他们是如何度过的，我带着清晨的兴奋感情勾画着一些细节，他们一定彻夜不眠，一次又一次地凑到一起作最后的拥抱。

姑娘裹着毛线外套，戴着一顶蓝色滑雪帽，有一张圆圆的娃娃脸。她不时眨着眼睛朝外张望，寻找着什么。“男人”一副迷离的神情，显得孤寂无伴，用巨大的手掌托着颌骨默默地看着空杯子，一只特大的手表，套在手腕上显得晃晃荡荡的。窗子蒙上了水汽，室外的早晨变得灰蒙蒙的，太阳只露出了半张脸，店里的泥地板给人一种寒意。

“我们到疗养院去，”“男人”这样说。我走过去收钱，他刚才拿着钞票在空中摇晃。姑娘皱了皱鼻子和嘴唇，似乎想说什么，但没吭声，继续观察外边的晨景。“昨天我已经跟男孩说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想再告诉您一声，到此为止。表示谢意。”他又说。

我倚在桌子上，演了一幕很好的喜剧：请原谅饭菜做得不好，仿佛是出自我手。不知是谁——根据习惯，那时只能是米拉维拉——牵着一头挂着响铃的奶牛从店前走过。姑娘把后颈倚在“男人”的胳膊上，倾听着小鸟的啼鸣，最早传来的马达声。黑夜已经结束了。

“贡斯大夫说，”“男人”有气无力，警惕地微笑着，他的声音很低，即使姑娘睡着了也不会被吵醒的，“在疗养院里过3个月的禁闭式生活，治好完全有把握。”

“贡斯是个好大夫，他经验很丰富。”

“经验很丰富，”他开心地慢慢重复说。他望着店铺的中央，我感到那里正是堆积寒气的地方。这时，他用手盖住脸，指尖摸着垂在太阳穴的蓬乱的长发，“这样，以后可以重新开始。您知道吗？才3个月，6个月也没关系。”

我觉得他并没有提高嗓门，然而，姑娘的目光却离开了满是水汽的窗子，象“男人”一样，转向商店地板的中央。第一个真正的顾客用“嘶哑”的声音间接地打了“招呼”，那是凉鞋擦地发出的凄惨声音；那人戴一顶贝雷帽，长胡须，围着黑围巾。姑娘抚摸着“男人”的胸部，向上一直摸到他支撑着脑袋的粗大的手指，并且用力抓住。

那个围着黑巾的男人很怕冷，清咳着嗓子，把一张钞票平放在柜台上，跟我要杜松子酒。我在往杯子里倒酒的时候，看见疗养院新漆好的救护车摇摇摆摆地朝商店开来。姑娘和“男人”明白了，吃力地立起麻木的身子。他们走时没有跟我打招呼，“男人”拿着两只手提箱，而她则跟刚从车上下来的司机开起了玩笑。那司机把印字的遮檐帽扣在肚皮上。

3个月就行，那是贡斯骗了他；“男人”说6个月也可以。我想象着那两个被暂时安顿在山上疗养院的一个房间里，静静地躺在洁白的铁床上，鼻子和下颚死死地对着白灰屋顶，继续玩着自欺欺人的游戏，他们没有抗议，没有评东论西，不

约而同地等待着别人承认错误时刻的到来，即借助小小的托辞，否定过去举止的话语和温情的抚摸，将他们重新送回人间，被人丢弃，被人谩骂，被人遗忘。我想象着“男人”如何在私通，满足自己的欲望，姑娘如何拒绝或答应、或竭力反抗，象强汉一样反抗。

七

3个月也好，6个月也好，反正时间刚刚过去几天。我在和莱维家的男孩一起打扫商店，提前盘货时，从邮件柜放挂号信的黑夹子底下，发现两封信，信封是蓝色粗体字，这两封信在夏天寄来时我没有交给那男人。我没加多想，就把信揣进了口袋里。那天夜里，关好百叶窗，我独自拆阅起来。其中的一封，那是第一封，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什么爱呀，别后之情呀，还有对过去的谈话和举止的猜测或牵强附会的解释。谈到了她的感觉和看法，惊奇的事情和遥遥无期的等待。第二封信可就不一样了，其中有一段说：

“我怎么办呢？特别是现在更是如此，我想，归根结底她是你的亲骨肉，她愿意为你恢复健康而慷慨解囊。我不敢说她是一个闯入者，因为，很清楚，夹在你们中间的是我。我不认为，只因我给了你一点微不足道的帮助你就真心说你亲生之女是闯入者；说我是个障碍似乎更合适些。”

我感到羞愧和气愤，有好几分钟，我感到无地自容，那羞

愧还包含着凌辱，暴怒，被损伤了的小小自尊心象长蛇一样缠绕在心头。我想应该做几件事，上山到旅馆去，把这件事讲给大家听听，讽刺讽刺他们，仿佛我早就了如指掌，而且除夕舞会上我只要看一眼姑娘的面颊或者眼睛——甚至连这些都无须一看，只要看一眼她的手套、提箱，她的耐性和文静——我就不至于象别人那样把事情弄错，不至于下意识地希望那个女人遭受不该遭受的失败和不幸。我想上山到旅馆去，手里捏着信，或把信装在口袋里，在人们中间走走，而对这件事只字不提。我想到疗养院去看望他们，带上一点水果，坐在床边，用深情的微笑看看“男人”长长的胡须，以便在姑娘当着我的面轻轻地抚摸他的时候偷偷地松口气。

然而，我的兴奋和激动是无从说起的，感到兴奋和激动的与其说是我，毋宁说应该是护士，因为，即使我对信的理解准确无误，说到底那也只不过是一个姑娘和那男人有点什么关系罢了。总之，是一个女人；另一个女人。

我做的唯一事情是把信烧掉，并且尽早忘在脑后，我最终从失败中渐渐恢复了过来。我不怕护士、贡斯、军曹和安德拉德可能听到我的话，我掀开盖在“男人”面上的遮布，耸耸肩膀，离开床上的躯体，到葡萄牙姑娘小客房的走廊里去，到寒气逼人的黑夜中去，装作慈悲的样子，压低嗓子，用轻蔑的口吻说：“‘男人’除了死亡别无它路，他没有想到死。”

“什么？”护士抑制着激动的心情，毕恭毕敬地问我。他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

我走到室外，扶着走廊的栏杆，看着灯火辉煌的旅馆，寒

喋累累。我只要把最新的发现放到故事的前面，一切都会简单和可预料了。我浑身都是力量，就好象那男人、姑娘，还有那个胖女人和男孩都是按照我的意志而降生，并根据我的安排而生活的。我笑着，不禁又想到了这一点，对这个篮球名星的最后贪求表示宽恕。天气干冷，大地光秃秃的，没有一点绿色。

我走进房间，满怀同情地从嘀嘀咕咕的4个人身边走过去。我在小房里踱着，边看边用指尖摸着图画、台布、窗帘、大枕头、套罩和凋谢的花朵，看着，抚摸着那4个死去的姑娘制做和撤下的这一切在单调无知的谈话中，在猜测和反抗中，在交换烹调方法和配料的时候手工制做的区区小物。我用手指反复地数着在新的、黑色的多余的横梁支撑着的屋顶下有多少人咽气死去。我有些漫不经心，失敬地想到保持处女贞洁的3姐妹和他们的女友——一个很年轻的金发胖姑娘。里间屋子里，我发现一堆旅馆伙计送来的报纸，那些报纸从来没有打开过，厨房里，有几只酒瓶一排放着，也没有打开过。

我慢慢走回放尸体的房间，那里有很多人。

“他没有耐心，太太。”贡斯的披巾盖到了头上，操着肯定的语气对一个身体瘦长的女人说。

“的确是这样。”安德拉德忧伤地附和着。

护士跟军曹谈论着如何处理后事和运尸。看见我进来时，他们笑了笑，想问点什么，但我扭过头去，看着那男人露在外边的裤子和鞋，看着被单底下那令人无法理解的姿态。

“血不多，太太。”护士用质疑的口气对贡斯说。

“他身上就那么多血。”医生打着哈欠，开玩笑地说。

我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床铺，觉得有可能弄清楚他为什么订了报而不看，为什么买了酒而不开瓶，我觉得弄清这些是很重要的。

“我把验尸证明给您留下吗？”贡斯问。

“您看着办吧，大夫。”军曹用唱腔回答说，“不过，您是否能等……”

地上有一支漂亮的黑色小左轮手枪，这是他藏在白色衬衣和手帕里带来的，他一直放在口袋里或别在腰间，小心地藏在身边。他知道，这是为他自己藏在身上的，他心里感到坦然，有力量，因为他可以象保存这个或那个女人的礼物一样把它藏在身边，而置自己于不顾。

军曹和贡斯到走廊里等候警官去了，只能听到他们慢慢吞吞的讲话声，模糊地看到他们嘴里冒出一缕缕雾气。我的背后，那个瘦长的女人摆脱了慌乱、惊奇和恐惧，站起身来问了句话。

“您没有看见吗？”护士得意地说，“死相很自然。瘦了些，这很可能，显得更安静些。”他停住了，我知道，他在焦虑地看着我，悄悄地重述他的话，生怕我再次听到。

“尽管人们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你想，谁能跟他说这些事呢，可他总觉得没脸见人，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20天前，他们进了疗养院，我们给他打针，使他平静下来了。对他的治疗要求特别严格。他的病没有好转，也没有恶化，一直很高兴，他是一位绅士。姑娘和他在一块，夫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照顾他。可是，今天早晨，当她醒来的时候，病人不在房

间里。于是我们在疗养院里找了个遍，后来才知道，他乘车下山去了。那些几乎不能走动的人总想出去转转，这一点司机已习以为常了……不该这样，太太，那是疗养院，可是他偏偏出去游逛。但他没有再回来，司机等他等得都不耐烦了。安德拉德给我们打电话之前，我们不知道自己胡思乱想了些什么。”

“就是这样，太太。”安德拉德说。这时候，我入迷地看着他们，不住地活动身子，想使自己暖和点，“有人告诉我说，中午看见他进来了。他已把钥匙退给了我，我不相信这一点，我甚至没有去打扫房间。但是，太阳落山时，我看见一扇窗子有灯光，于是我过去敲门。您想想，我推开门走进来的时候……很可能他藏有一把厨房的钥匙。”

“他还很年轻呢，这个可怜人！”女人似乎想放声哭一场。

我，护士和安德拉德都耸了耸肩膀。立刻听到了马达声，那是汽车在慢慢停下来。军曹和贡斯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每迈一步都仿佛有意拍击着明亮灯光中的寒冷的寂静，冷酷而无情的夜晚。

“警官。”护士庄严地说。那个老太婆摇了摇头，说了一声“是”。

我坐在长沙发椅上，既平静又不安。姑娘进来的时候，我的身子动也没动。她径直走到床边，象我一样，用令人难以相信的迟缓动作掀开又盖上。

军曹和贡斯把着门口，老太婆和护士紧紧贴在墙上，安德拉德手里拿着贝雷帽退了出去。我几乎屏住呼吸，看了看姑娘。她俯首面对着那堆——鞋子，裤子和床单——平放着的硬

邦邦的东西。她呆若木鸡，没有眼泪，紧锁眉头。她终于明白了几个月前当“男人”第一次走进商店时我所发现东西，“他除了那种东西之外没有别的，但他并不承认。”姑娘显得庄重，还是那样美丽，不可征服，准备应付未来的任何一个狂暴的夜晚，尽管她现在还没有预感到。

何塞·马里亚·阿尔盖达斯（1911—1969），秘鲁印地安文学作家。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印地安人的村社中度过的，到11岁时才开始学习西班牙语。20岁时去首都利马攻读人类学。以后，在广泛的调查研究中，他发现从前描写印地安人的文学作品，大多歪曲了他们的形象，于是决心在自己的作品中，恢复他的印地安人兄弟们的本来面目。经历了两种千差万别的生活，掌握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给作家在反映印地安人的现实生活、传统习俗和纯朴感情的创作活动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他尤其擅长刻画他们的内心世界和塑造他们的叛逆性格。他是以印地安人社会为创作背景和题材的代表作家。

1935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反映白人地主对印地安人残酷压榨和后者的反抗精神的短篇小说《水》；1941年，出版了风俗画式的长篇小说《血的节日》；1954年发表了中篇小说《宝石与火石》；4年后发表了他的长篇名著《深深的河流》；1961年，发表了但丁式的小说《第六号》，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并控诉了监狱中的非人生活；1964年，发表了他最后一部

完整的长篇小说《所有的血》。

1969年11月28日，由于对秘鲁的社会变化和印地安人村社的瓦解感到绝望，在久病不愈之后，自杀身亡。1971年，他的未完成的遗著《山上的狸狐和山下的狐狸》问世。



他在村里客居，快满3年了。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外乡人。

他，小眼睛，窄前额，高颧骨；五短身材却很结实。腰带扎得紧紧的，上面绣着鸭子和公牛的图案。

惟独他是这种装束。卖水果的印地安人不时从遥远的家乡给他捎来一条崭新的引人注目的腰带，那是姐姐们送他作纪念的。在这针织物的红色或蓝色的底子上，由公牛、鸭子或骏马组成的图案栩栩如生。

印地安人和麦斯蒂索^①人停下脚步，欣赏马利亚诺的腰带。他们仔细地打量着；女人们简直着了迷。

村里的乡绅，那些大人先生们，冷笑着。

马利亚诺对褒贬全都不露声色。当人们欣赏或端详他那光彩夺目的服饰时，他保持着缄默和平静。

① 麦斯蒂索人是欧洲人和印地安人的混血儿。

马利亚诺会弹竖琴，是裁缝的助手，养着一只被他称作“聪明的小伙儿”的红隼。

裁缝铺占据着一座无人居住的高大房屋的唯一的门面，马利亚诺在那里看守店铺。

房主是邻乡一位十分显贵的妇人。据说那个乡的大部分土地和印地安人都属于她。她去省城时，总是由她的独生子和几个被她称作“侍从”的人陪同，从小镇上经过。在他们到达街角之前，马利亚诺一听到那杂沓的马蹄声，就知道是主人来了。他连忙将手中的活计扔到一旁，跑到院子里去开门。女主人呆在镇上的时候，马利亚诺从不在车间露面。

房东太太的儿子是个大高个儿，两道眉毛连在一起，显得焦躁不安。他和母亲一来就要搅得四邻不安。他总是请朋友们喝白酒，一醉方休。这被大家传为笑柄，视作丑闻。他那放声大笑，老远就能听见。村民们将这种情况当作笑料。那些“海量先生”的丑态要持续好几天。人们对他们酗酒的细节肆意渲染：

“听说唐阿帕里修叫好几位先生在地上爬，还骑过好几位呢。”

“听说他叫唐埃斯特万爬上柜台去演讲……”

“听说唐阿帕里修象调皮鬼一样哈哈大笑，震得广场都嗡嗡直响。”

“多开心呀！上千个印地安人给他干活。”

马利亚诺在街上等着东家，夜里陪他回到那座大住宅。他跟在主人身后，唐阿帕里修一声不吭。

有几个那样的夜晚，唐阿帕里修让马利亚诺把竖琴带到家中的大厅里。他舒舒服服地坐在安乐椅上，对裁缝说：

“弹一曲《田野上的小鸽子》吧。”

马利亚诺坐在门口的小凳上，奏着主人点的《瓦伊诺》和《特里斯特》^①等曲调。

“现在弹《忘恩负义的柳树》……《埃尔奇瓦科》……《埃尔都基托》……现在唱我家乡的狂欢节！兰伯拉的狂欢节！”

马利亚诺嗓音浑厚低沉，象一只善于歌唱的青蛙。因为在那个村子的田野里潮湿荒芜的草丛中，青蛙的歌声悠扬甜润，在夏天深邃的星空下或漆黑的夜色里回响。

“唐马利亚诺，我只是不打扰你一个人，因为你唱得好，琴也弹得好。”兰伯拉大腹便便的先生对他说，借着多枝烛台上唯一点着的蜡烛的摇曳的光芒在客厅里踱来踱去。

“唐马利亚诺，你说为什么？我们女人们都不让我安静；酒呢，不管是甘蔗烧酒还是法国白酒，都更糟糕。睡去吧！不过你还得在院子里随便给我弹一支家乡的《瓦伊诺》。”

马利亚诺用力地弹着内地果园的《瓦伊诺》，这是最偏远的深山区的乐曲。那里的苹果树、梨树和桃树在深深的山沟里生长、开花、结果。花开时简直象花园一样。到时，果树会结出晶莹美丽、光彩夺目的果实。

马利亚诺用力地弹着欢快的《瓦伊诺》。琴师用一只手在金属琴弦的高音部位反复奏出欢乐的曲调，用另一只手在竖琴

① 《瓦伊诺》和《特里斯特》都是印地安人的民间乐曲的曲名。

的上部弹着低音。

“唐马利亚诺，只许你为我一个人演奏，为我的心灵演奏……”主人说着，一步一步地走上台阶，向自己的寝室走去。

“乌巴”在唐阿帕里修面前，一声不吭，几乎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年轻的主人总是自言自语并点着曲子。

“为什么？他为什么不虐待马利亚诺呢？可他又为什么不把马利亚诺带到自己举办的舞会上去为他的情妇们演奏呢？”镇上的人们疑惑不解。

唐阿帕里修对裁缝的敬重激起了人们的妒嫉，也使得卑贱的“乌巴”马利亚诺得以保持自己的习俗。

印地安人管呆傻或半呆傻的人叫“乌巴”。琴师马利亚诺确实有点“乌巴”的劲头：当他去观看区里的节日活动、欣赏印地安人和麦斯蒂索人的大型舞会、丰盛的宴会以及歌舞时，总是远远地站在一边。有时，在结婚典礼上，妇人们给他拿一碗“帕塔奇”汤和另一碗精美可口的肉汤，可他却不要，尽管人家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他跟前，而且她们的衣着是那么漂亮，长长的、毛茸茸的披巾搭在背上。

“马利亚诺大叔，”她们用克丘亚^①语对他说，“请尝一尝我们的甜食吧！我们都给你拿到这里来了，怪难为情的。”

她们把盘子藏在披巾下面，走过了半条街。

① 克丘亚语是南美安第斯山区一种印地安人的语言。

马利亚诺用他那双充满了恐惧和惊奇的灰色的小眼睛望着她们。他的嘴唇有点发抖了，什么话也说不出。他似乎想逃走。他都快跪在地上了，躬身站在女人们面前，用他那低沉而又温柔的声音说：

“不，姑娘们！姑奶奶们，不，太太们！好心的人们！”

女人们不肯罢休。马利亚诺的声音饱含着凄凉的柔情擦过她们的耳边。

“这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她们议论着，抱怨着，回去了。

马利亚诺站在那里，靠在反射着灼热阳光的石灰墙上。他看到了印地安人怎样围成大圆圈跳舞；看到了琴师们在那高大房屋的拐角处弹着竖琴。有了他们才有舞会，男男女女才能如此欢乐地歌舞！傍晚，马利亚诺走近了人们跳舞的院落；他也轻轻地随着乐曲的拍节晃动着身躯。

天一黑，“乌巴”就匆匆地走了。从大门里的小门进去，穿过那高大房屋，向自己的房间走去。这是放鞍具的地方。那里有一些空的家什，四周放了几个石头门墩。唐马利亚诺点燃了小油灯。他通常用这个点脂肪的小灯碗儿照明。他调着琴弦。他不弹刚刚听过的歌舞曲，而是弹他的乡音。他俯下身子，前额都贴在长长的弓形琴架上了。街上寥寥无几的行人都止住了脚步，好听一听竖琴手的演奏。没人敲门，谁也不打扰他，也不从外面叫他。

“可能是圣卡夫列尔，可能是那天使在演奏！不会是‘乌巴’！马利亚诺是个笨货！”印地安人用克丘亚语评论着。

“这是外乡的民歌。”那些高贵的村民们断言着。

要是哪个喝醉了的印地安人或麦斯蒂索人听见了，便走到门前，坐在人行道上，用膝盖撑着头，侧耳静听。

有时马利亚诺也感到有些人停在门口。

“是他的灵魂在演奏。”一天晚上，一个生活放荡的麦斯蒂索人说，他是个专门勾引有夫之妇的老吉他琴手，“纯粹是他的灵魂！看他能不能让我的灵魂干净一点。我就是喜欢女人。唉，真该死！……”

黑暗中，他仰卧在马利亚诺的门旁。

内地果园的音乐与这寒冷的大村镇的音乐迥然不同。这里地势开阔，与白云缭绕的高高的山峦相距甚远。而马利亚诺是在一条小河的岸边，在一个平缓山峰的脚下成长起来的，那里树木矮小，野草在一月开花，到6月便因酷热和干旱而枯死了。树木也开出小小的花朵。只有桑柯（大仙人掌）和矮矮的索科会在清晨突然开出硕大的鲜花，前者洁白，后者嫣红；二者都光彩照人，灿烂生辉。要想把一朵桑柯花拿到手，需要用弹弓把她打下来，或者把那多刺的花茎弄断，这时花茎会落泪的。而索科则不同，它悬挂在绝壁上，花儿在可望而不可即的陡峭溪岸的上空象火苗似的飘着。“哎！索科花，阿伊帕伊枯伊克曼！（要能摘到她多好哇！）”孩子们高声叫着。

马利亚诺弹着琴，回忆着自己的山沟儿，自己的家乡。太阳从那里落下，把石头烤滚烫，透过灰尘，使鲜花、河中雏鸭的羽毛以及象绣花针一样在静静的水中游玩的小鱼的肚皮闪烁着光芒。

“可谁能伴着马利亚诺的竖琴跳舞呢？”听众这样说着，
“‘乌巴’弹得与众不同啊。”

除非在兰伯拉的财主家里，唐马利亚诺在任何地方都从来不肯弹琴，连教堂也不例外。

“不，老兄！”当人们想拉他去为一个印地安人或麦斯蒂索人的节日演奏时，他这样婉言拒绝。

“谁要是带头硬拉唐马利亚诺到别人家里去演奏，我就踢死他！”唐阿帕里修在许多场合这样斩钉截铁地说过，“我踢死他！这儿有二十几位竖琴手，谁也用不着唐马利亚诺。”

令人奇怪的是一位如此有权有势、趾高气扬的青年，竟然称“乌巴”为“唐”^①。这尊称可能比他为了保护竖琴手而发出的威胁更有作用。

没有任何人走起路来比马利亚诺更显得谦恭，也没有任何人比他在城内主要街道上出现的次数更稀少。当他在街上走过时，仿佛不是个人似的。年轻的主人在酒馆喝酒时，他就老实地呆在柱子的阴影里。唐阿帕里修走出来去另一家饭馆或回家时，“乌巴”就跟在他后面，在街道中间走着。年轻人要到一个情妇家里去过夜，也得叫他陪自己走过一两个街口才与他告别。“明天见，唐马利亚诺。”阿帕里修用克丘亚语对他说，马利亚诺就独自回主人家。没有任何麦斯蒂索人或有身份的先生敢在大街上象对待区里的印地安人那样，打他耳光或大

① “唐”是一种尊称，如同“先生”的意思。

声侮辱他。

二

唐马里亚诺为什么离开了村庄，又是如何到达省城的呢？他为什么偏偏喜欢象一块永不开花的岩石一样，做一个外乡人，居住在这个分成这么多区的庞大而又寒冷的城镇呢？这里同内地小小的水果之乡的生活，真有天壤之别！那里很穷，耕地稀少，桃子、苹果和梨卖3分钱半斤，一般的仙人果两角一斤，黄色的3角一斤，别无其他贸易。不过天高皇帝远，村社社员们依旧按照他们的古老风俗生活着。那里实际上没有贪婪的恶霸地主；生活节奏缓慢，平淡无奇；为数不多的节日是一成不变的，人们一年到头都在筹备这些活动。那些活动一般要持续两三天。在那些盛大节日里，人们跳舞、唱歌并摆上丰盛的筵席；男男女女都穿上了节日盛装，女人们打扮得花枝招展，孩子们看着歌舞，在果园里嬉戏玩耍，有时也大声嚎哭，因为在晚会进行时，他们在漆黑的夜里迷失了方向。

马里亚诺是家里的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8岁开始学弹竖琴。父亲和祖父都是竖琴手。父母及哥哥、姐姐们很早就发现马里亚诺有点“呆傻”。他的肌肉反应迟钝，长得象个聋哑儿童，总是睡不醒的样子。可他懂事而且会讲话！他们从不让他干那些需要灵巧、机智或动脑筋的活儿。叫他到果园里去赶鸟，种地时牵牲口或陪姐姐们到县城去买东西。大哥，也

就是家里的长子，有点看不起他，并为他感到难堪。大哥名叫安托林，高个子，薄嘴唇，鹰钩鼻，闪亮的颧骨非常突出。会弹十二弦琴，是个赶脚的商贩。他将村社享有盛名的水果运到最远的村落，在那里桃子和苹果能卖到最高的价钱。大部分村民都将卖水果的事托付给他。人们将水果装好，让歇了半年的健壮的驴子驮上，交给他。

安托林起程时，全村人都到村口一块长满了灌木和杂草的巨大的岩石旁来送行。马利亚诺看着他大哥远去，就象看着一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巨人一样。美丽的少女们，最贪心而又最漂亮的姑娘们，用鲜花打扮着安托林，向他献上瓦尔科，那是一条系满了鲜花和水果的带子，就象总统绶带一样。大家都和安托林拥抱，可不太用力，然后把手放到他肩膀上。尔后他就动身了。马利亚诺呆在那块巨石的阴影里，听着送别的合唱卡恰尔帕里，孤零零的，因为是“乌巴”，谁也不愿意站在他旁边。女人们用披肩遮住半个脸，围成一个圆圈，唱着送行的哈拉维。男人和孩子们，老太太们，都呆在那儿一动不动，默不作声。

安托林沿着山坡远去，女人用目光注视着他，跟随着他，用歌声打动着。用最尖的噪音唱出来的缓慢的长长的哈拉维四处可闻，连那西沉的太阳也流连忘返了；安托林跟在牲口后面，大步流星朝山下走去。马利亚诺望着他，兄长的形象在他的心中翻腾着。他看到哈拉维已经使世上的一切都停滞了，只有强健快活的安托林还活着，在那深深的山口里行走、雀跃。傍晚，在鸟语声中，饱含着离情别意的太阳消失了，全体印地

安人都回到村里，先是在广场，然后就到安托林家的茅屋里跳起舞来。

“乌巴”马里亚诺孤零零地落在人群后面，因为他是全村唯一的“乌巴”。

“我也要弹竖琴。”当庆祝活动转移到他家的时候，他向父亲请求说。

父亲终于把竖琴给了他。他弹着琴，就象一个害羞的外乡人一样，把头低低地埋下去，前额贴在竖琴的弓背上。

“因为他白天是在小鸟的歌声中度过的，所以他弹得这么甜。”老人和妇女们这样说。

村口那巨大的岩石——送行台以及五颜六色的鲜花闪耀在马亚里诺的心中。他在那块岩石顶上吆喝着，弹弓打得嗖嗖响。鸟儿飞着，炫耀着她们五彩缤纷的羽毛。他高兴得手舞足蹈。

“啊！百灵鸟，你就这么快地飞吧！”他叫着。

带着这些回忆，他的头埋得更深了。几乎把下巴贴到胸脯上了，竖琴发出了时而温柔甜蜜，时而铿锵有力的声音。女人们用仰慕而又可怜的目光望着他。男人们跳着舞，根本没想到弹琴的人是个“乌巴”。

父亲死后，安托林决定把“乌巴”打发到省城里去。两个姐姐和姐夫赞同赶脚人的决定。安托林恐吓他们。他提醒他们，“乌巴”都是淫荡而又奸诈的。

“有他，我可不敢娶老婆，”他说，“他是个汉子了。到

了夜里，可管不住那鬼东西。”

那时候，马利亚诺一心一意地饲养着他那“聪明的小伙儿”。那猛禽机灵地看着他。乐师容光焕发的幸福的脸庞映在它深沉的眼中。马利亚诺弹一首狂欢节的武士舞曲，然后大踏步跳起舞来，两眼盯着红隼锋利的鼻子。

“他们成了朋友！彼此心领神会！他们俩的灵魂是一个，肯定！”看到在那快乐的时刻，马利亚诺和红隼互相目不转睛地望着，安托林叫了起来，“‘乌巴’的心象一只鹞一样跳着；他的内心很活跃，灵魂里可能有鬼火，有地狱。滚吧！我要从高山上把他赶走。”

在干燥而又冰冷的季节，安托林逼着弟弟在天亮之前动身到那陌生，广大而又遥远的城镇去，那里居住着“主宰一切”的人们。

“竖琴手在那里是深受欢迎，高居人上的。”安托林对弟弟说，“一次节日活动所挣的钱比两个果园的收成加起来还多。村长们都得向你乞求；管家们都向你求情；有钱有势的人也不例外。官府、老板，都会象对待朋友那样，管你叫美男子。马利亚诺，你的生活将是了不起的！从那遥远的地方，你还可以照顾自己的家庭。把你的红隼也带去！死去的爹爹肯定猜到了你的远行，才为你买了这只鸟。它和你一样了不起！无论在哪儿的天空，它都会使老鹰甘拜下风的……”

他慢慢地吹捧着“乌巴”，说得天花乱坠；他促使“乌巴”下定决心。晨星闪着微弱的寒光宣告黎明的到来，他便叫醒了弟弟。

快要出庭院了，在迈门槛时，马利亚诺迟疑了一下，他想反悔了。

“快走！快走吧！”安托林一面催他，一面叫着。

红隼在竖琴弓背上扑扇着翅膀。马利亚诺闭上眼睛，紧紧地闭了一会儿，就上路了。

他们一起上了山。

夜晚，他们沿着村落周围的果园和山坡赶路。天亮时，他们离最后一条山谷已经很近了。

兄弟俩在山头上坐下来休息。安托林用克丘亚语祈祷，并用一点甘蔗烧酒祭了山谷和从近处雪山脚下扩展开来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潘帕草原。

这是秘鲁最平坦也是最高的台地，湖泊星罗棋布。从山顶上，安托林能象在地图上一样，指点所有通过大草原的途径。

“从这儿走？到哪儿去？”看到瑟瑟凉风从模糊不清的天边吹来，“乌巴”叫了起来。

“纯粹是风，象水一样！好象很远。纯粹是风！不远！这鹈知道。”安托林扯开嗓门对他说，“我就在这儿看着你。你要是回来，我就用这圣山的石头砸碎你的脑壳。走吧！快！”

“乌巴”开始下山，向潘帕草原走去。

安托林看着弟弟走了几个小时。浮云时聚时散，飘忽不定的阴影在金色的潘帕草原上绘出了奇形怪状的块块斑痕。红隼紧紧地抓住竖琴的弓背，马亚里诺快步疾行。他背着竖琴；琴弓的一端伸到头的上方，猛禽就落在那儿。他俩都盯着茫茫天际，什么也不想了。深奥莫测的眼里只有一种表情：战胜那

漫长的征途，穿过那沉浸在寂静当中又不时被鸭群惊动的奇异世界。晶莹的雪花在湖面上也在那游子的心中闪烁着银光。

已经看不到弟弟的踪影了，赶脚人安托林又在山峰上撒了一点烧酒，才下山回村。

在穿越高原的过程中，竖琴手渐渐恢复了勇气，虽然传说在那里有喷火的恶魔。既然那寂静没有把他吞没，既然他的心脏还在跳动，既然那毛发倒竖的公牛和羽毛翻卷的怪蛇没有从湖中跳上来，用它们的吼叫吓得他发疯并把他拖走，那么他就能战胜天下所有的魔鬼。想到此，他大步流星地加紧赶路。

“老弟！”马里亚诺对他的红隼说，“那冤家在哪儿？你的对手在哪儿呀？在卡亚卡塔这里，你是老板，我也是老板。”

从一座不高的山顶上，他观察着那庞大的村镇，那分为6个区的城廓，那里有6座印地安人的小教堂和一座长长的用白色的石块建造的大庙，屋顶是用锌矿石盖的。辽阔的地面上布满了房屋，与他的家乡真是天壤之别，在那小小的山村，只有被果园和庄稼隔开的简陋茅舍，然而这并未使他吃惊。演兵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一片开阔的空旷的场地，纵横交叉的路上铺着瓷砖；达官贵人们的寓所，两层的楼房，两层的院落和畜栏，被高高的院墙围着。

一个虽然模糊却已坚定的信念激励着“乌巴”：“永不回村了！”下面，红色山梁和山坡上那些迷宫似的房舍将是他的栖身之所，他将在那里生活。

“我是竖琴乐师！我是勇敢的老板！哈，娘的！”

他一边高声地为自己壮胆，一边走下了最后一道山坡。

但是“乌巴”干什么去呢？镇上有20多位有名的竖琴手在省城和周围各村节日活动中抢生意，他还干什么去呢？那些乐师又是谱曲人，这些乐曲流传在各个区地的500多个村镇。

6月23日晚上，那些竖琴手就纷纷沿着小溪的河床下山了。那小溪汇成激流注入大河，汇入奔向大海的主河道。在那里，在落到黑色的岩石上而分成湍急的支流的大瀑布下面，竖琴手们聆听着。只有那一天夜里，当水落到岩石上以后，银光闪闪地流动时，才能创造出新的曲调！每个竖琴手都有自己秘密的瀑布。他们有的趴在地上，藏在随风飘舞的芦花丛中；有的吊在胡椒树干上，脚下就是水流湍急并发出呜咽的深涧。次日，以及在全年的节日当中，每个竖琴手都演奏出前所未闻的新曲，是流水把这崭新的乐章直接注入他们的心灵。

那么，“乌巴”马里亚诺能干什么呢！

当他到达镇上时，快中午了。他从上阿尔卡马莱区进城。区里唯一笔直的大街与波隆格内希大街相连，绅士们就住在那里，住在市镇的中心。当时，阿尔卡马莱空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印地安妇女看见了马里亚诺走过去并注视着他，一直到他在大街上消失。他们能清楚地辨认出那只落在竖琴顶上的红隼。马里亚诺很象那些从遥远的地区来的虔诚的印地安人，他们到城里来是为了在最古老的恰尔瓦区的圣像面前祈祷。

马里亚诺进了富人区，在唐阿帕里修家的对面，停在一个

阴凉的地方。年轻人从兰伯拉来，有两个侍从跟随着。他看了乐师一眼，后者的相貌使他吃惊。马利亚诺打量着那雕梁画栋的阳台。

“你是谁？”年轻人用洪亮的声音问。

竖琴手转向青年人，眼皮微微跳动。

“是我，老板。”他赶忙回答，“我，竖琴手！”
红隼扑扇着翅膀。

“它不凶，老板。又老实，又漂亮！”

他让那猛禽跳到自己手上，微笑着给对方看。他的心已经平静了。唐阿帕里修将信将疑地看着它。

“进来吧！我需要个看家的。”

他等着外乡的印地安人进来。到了大走廊里，他才走到竖琴手身边。马利亚诺依然叫那猛禽落在自己的食指上。

“他是不是个巫师？”那地主这样想。

他的体形很少见；脊背圆圆的，象驼背一样；两条腿细细的；几乎长了胡子……

“弹一弹！”他吩咐说。

那时马利亚诺的小眼睛发亮了。唐阿帕里修遇上了那目光，觉得他的灵魂中响起了一声深沉的呼唤，就象在童年的节日里沐浴了第一道光线一样。

那红隼落到竖琴高高的弓背上，马利亚诺演奏了一支庆丰收的《万卡舞曲》。侍从们凑到了主人身旁，在竖琴手的周围聚了一小圈观众。

“乌巴”又演奏了一首《凯旋曲》，是内地村社的社员们

将一捆捆的小麦或玉米从田里运往打谷场时唱的。这是类似《瓦伊诺》的一种伴奏曲，带着一种欢乐和祈求的神韵。用这支男声演唱的曲调，这印地安人打动了大地的心灵。在他的琴声里，“乌巴”将这乐曲和情歌的旋律糅合在一起了。

唐阿帕里修撇开了听众，慢慢地向楼梯走去。他边走边问边说：

“你以后就专门为我演奏，先生！你叫什么名字？”

“马利亚诺。”

“你就留在这里。把他带到鞍具房去。那儿就是他的家。厨房也让他使用。给他最好的皮褥子，毛毯子。每月付给他20个索尔。^①给他玉米、土豆和白薯！要叫人给他做印地安人的服装，要好的……”

唐阿帕里修在台阶上继续说着。马利亚诺站在那儿，探着头，倾听并注视着他。通过他的表情和姿势，兰伯拉来的“侍从们”已经明白，那乐师是个半“乌巴”，是沐浴过神光的奇人。

三

在“乌巴”马利亚诺到此3年之后，镇上来了一个苗条、短发的金发女郎。母亲陪伴着她。她们住进了镇上唯一的一家

① 索尔：秘鲁的货币单位。

旅店。旅店占据着镇上一座最古老的房屋。那里有一个长满了青草的宽敞的院落，青蛙和无数的蟋蟀在那里唱歌，投宿的游客却寥寥无几。一些买卖房屋的经纪人，新上任的公职人员和教师，旅途中的军人以及极少数的游客都沿着这条路线深入亚马孙河流域，因为中部安第斯山在这个地区的通道没有其他山口那么寒冷和险峻。

金发姑娘的到达和下榻搅得省城及其周围村镇的青年人心神不定。她容貌美丽，又打扮得花枝招展；她是沿海地区的人，出生在一个重要的上等城市。她并非出身名门贵族，但却打扮得与利马市的小姐们一模一样，身着最新时装。披散着的金发很短，本地的姑娘们是不敢梳这种发式的；走起路来有着海滨城市的漂亮姑娘们所特有的风韵。

就在见到金发女郎的当天，唐阿帕里修买下了镇上一座最新的房子。

几乎城里所有的小姐都感到焦躁不安和灰心丧气。对于刚刚到来的姑娘，太太们唇枪舌剑，进行着淫秽狠毒的猜测。

唐阿帕里修将新买的房子的卧室、饭堂、客厅和厨房用简单的家具布置了一番，然后就满怀信心地向旅店走去。他以出租的方式，将这所房子让给了金发姑娘的母亲。

旅店的客房只占着那古老建筑的第一层，因为二层因年久失修损坏了。那里房间昏暗，墙壁潮湿，斑驳满目；铺砖地面磨损厉害，落满灰尘，坑坑洼洼，高低不平。

唐阿帕里修没有为登门拜访而更衣，没有专门打扮。他足蹬马靴，颈戴围巾，头上是一顶编织精细的草帽，手里提着马

鞭。他用那炯炯有神的灰色眼睛贪婪地望着姑娘，那目光近乎疯狂、残酷。眼中闪烁着逼人的寒光。

“太太，”他对姑娘的母亲说，“我有一所祖辈居住的老房子，又买了一所新房子，原以为它对我更合适，因为我年轻，又在利马受过教育，可谁知我不能住在那里。我不过是兰伯拉的一个善良的居民，那是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小村子。我只是隔一段时间到省城来一趟。如果你们母女肯住到我那所新房子里去，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在另一所房子里我雇了个看门的……”

他彬彬有礼，又会随机应变。说服了那位太太，就一起去看房子了。他同样说服了她们，决定马上迁居。

回旅店时，唐阿帕里修和阿德莱达并肩走着；他边走边想：“上帝呀！多漂亮的金发小姐啊！多苗条啊！天啦，我并不是想娶她为妻。在我的村庄，她会象一个冰做的美人那样溶化的；看到狂欢节的彩旗她会放声大笑的！至于她是不是处女，有没有疾病，对我都无关紧要！我为什么要爱她？懒家伙！这就象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占有她一样。我要给她设个圈套，就象套一条贪婪的狗似的，它们不怕死，围着豹子转就象围着驼羊转一样……马上动手！”

姑娘发觉他在沉思，就不和他讲话。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纯洁而快乐。那太太看了小伙子好几次，从上到下打量着。

告别时，母女俩都对他表示感谢。

“我们是穷人。”母亲对他说，“我是个寡妇，丈夫是个意大利乐师，生前在国立学院任教并在许多豪门大户做家庭教

师……我们在这里呆几个月……”

她坦率自然地说着，这是沿海地区中产阶级家庭的善良妇女的典型性格。

阿德莱达想走了。她没有看那位青年。

“我呢！我喜欢的是田野里的鲜花。”她打断了母亲的话，出人意外地说，“旅途中，在和本镇一样高的地方，花真多呀！蓝的和红的，蓝的和红的呀！就象飘动着的大披风一样……”

“您还没看见白色的呢，那大朵大朵的白花！只要肯赏脸，是有机会的。”

“您是一位正人君子……好心肠。”

姑娘表现出了一种纯真的热情。两颊燃起了柔和的红晕。

“我的老天爷，”唐阿帕里修心想，“我要给她采高山上的花。她的脸蛋不就象红色的阿枪卡莱花瓣和朝霞一样吗！我不是说过吗？阿枪卡莱花和法尔恰花就象天真少女的脸蛋一样。真是美极了！我的马，我的马，你这懒家伙，我要跳到雪山顶上去！”唐阿帕里修的嘴唇显然在蠕动。他有点晕晕乎乎地走了。

“对不起，小姐，”他对阿德莱达说，“说到我们这里的花儿，使我想了许多事。您同意我派两名庄园里土生土长的印地安女人来服侍您吗？她们是卑贱和恭顺的人。有的能听懂主人的西班牙语的吩咐。”

没等母亲开口，阿德莱达就接受了这殷勤的好意。

“有一个就够了。”太太说。

“一个可不行，太太。一个在厨房，一个干杂活。”

圈套做好了，可不是套疯狗的那种。而是更高级的和无形的，用胆量和气魄设下的：房子，奴婢，送给她们的只收成本的食品，这些就构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圈套。

镇上的太太们长出了一口气；小伙子们强咽了一口气，姑娘们则盼望看到那金发女郎怎样走路，也看她怎样受苦。唐阿帕里修发誓说，谁要敢说新来姑娘的坏话，就叫他家破人亡。他说到做到。说不定哪一天夜里，就会有几百个印地安人闯进庄园，精明忠诚的麦斯蒂索管家领着他们，拆毁栅栏；杀猪、宰马、剥牛；把她们驱赶到悬崖绝壁上……这位兰伯拉的先生可是个实干家，还没有任何别的青年能和他并驾齐驱。象他那样坚强有力和处事果断。此外，他体魄健壮，是个出类拔萃的骑手；他要是一生气，两眼发红，浓眉倒竖，令人胆寒。他不用拳头打人，而是用右手掌砍，那只手活象硬木头一样，据说是利马市的一位打架能手教他的。

金发姑娘和她母亲的到来，在省城的生活中激起了波澜。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会到什么地步呢？她已经属于他了，还是他从心眼里真的爱上了她，就象一个小学生那样喜欢她呢？在达官贵人区里，人们议论纷纷。

到了结婚年龄的青年，小伙子以及半大小子们，在唐阿帕里修回兰伯拉的时候，就在她居住的那条街上溜达。这些大人先生们的居住区确实被阿德莱达的形象镇住了。只有在印地安人的村落，人们很少谈到她。只是说一个漂亮的姑娘到镇上来

了，金黄的头发，就象教堂里的圣母一样，所有的太太以及她们的女儿们都恨她；许多姑娘对她又羡慕又嫉妒，夜里不禁失声痛哭。

在阿德莱达和她的寡母搬出旅店的当天下午，唐阿帕里修走进了家院，他手足无措却又故作镇静。肩膀和脑袋靠在支撑着二楼走廊的白色石柱上。然后他大声招呼琴师。马里亚诺从鞍具房跑了出来。

“马里亚诺，把你的竖琴拿来。”他说，“把你的红隼也带来。”

猛禽在乐器的弓背上扑扇着翅膀。乐师几乎是跑着来的，到了走廊里并坐在石柱旁边的门墩上。

“弹什么呢？东家。”

“高山上的《瓦伊诺》，要特别悲伤的。”

马里亚诺弹了一首最悲伤的歌曲，开头的歌词是：“黑色的鸭子，你为谁哭泣悲伤，我有终身的丧服，而且不仅在羽毛上……”

唐阿帕里修已分不清是真正的爱情还是悲伤了。

“唐马里亚诺，唱吧。”

“乌巴”开始唱起了前几句歌词。他的声音低沉、温柔，就象激流在越过崎岖的山涧之后平静下来，在心爱的土地上，在鲜花盛开的原野上哭泣一样。此时此刻，他的歌声加剧了主人的朦胧的激情。“这是怎么回事，‘乌巴’马里亚诺？你的琴声使我更激动了！”兰伯拉先生在心里说，他再也不能继续听

下去了。

“马里亚诺，把我的马牵来！”他命令说。

印地安人把竖琴斜靠在墙上，向马厩跑去。那只红隼显然用食肉猛禽在观察时的细心打量着这位年轻人。它的双眼时睁时闭，象一潭深水一样。东家对此全然不觉。

唐阿帕里修没要他的篷秋^①。让乐师给他安上马刺，便飞身上马，奔驰而去。

“乌巴”关上了街门，迈着轻快的脚步向村口走去。他登上城边河岸上一块长满了红色苔藓的巨石，从那里可以看到他的主人在飞快地爬上山坡。

四

第二天下午，一位白发苍苍、肤色黄黑透青的村长领着10名印地安妇女，从兰伯拉方向沿着小溪岸边来到了镇上。每人手里拿着一束白色和紫色的阿枪卡莱花，草帽带上装饰着一圈蓝色和灰色的法尔恰花。印地安人老村长手里拿着粗粗的桃榈木的手杖，上面镶着一道道紧紧的银箍，这是他权威的象征。手杖的上端，也就是粗的那一头，包着一块银片，银片中间有一个十字架。

① 篷秋是阿根廷的高乔人和其他美洲印地安人的衣物，是一个长方形的毛织物，中间有个洞，头可以钻进去，披在身上。

在手杖黑色的硬木上，银箍在闪光。每一道箍就是一个“帕芽依”，一条经过加工的银带。上面雕刻了花、鸟、马、鹿的图案，四周是用一条线勾出的轮廓。

恰尔瓦区的印地安人都拥向了那一队人必经的空场和街道。男男女女都向老村长脱帽致意，但他们闹不明白这手持鲜花的队伍去干什么。从那深蓝色的衣服和那帽盔上金色带子搭成十字形的装饰上可以认出，这是兰伯拉地区的人。

那是个普通的日子，手持鲜花是为了谁呢？有的想或许是为给恰尔瓦显灵的上帝还愿的。然而谁也不打听。老村长穿过这里的栅栏和胡同，一声不响，旁若无人。那些印地安妇女跟着他，面无喜色，表情木然，印地安人区的妇女们莫明其妙。

“这可是干什么呢？”她们寻思着：“怎么不唱歌呢？穿着节日服装干什么呢？也不是办丧事呀！”

然而在中心区，太太和小姐们，后生和先生们，对此却一目了然。

“真丢人！”一个男人说，“村长要为唐阿帕里修找姘头效劳！”

“这小子疯了！”一位太太想，她是唐阿帕里修母亲的朋友。

大家都喃喃自语，非常惊奇。看到印地安妇女手持鲜花过去，有些姑娘笑了；另一些则受到了打击。“要到雪山脚下才能采到这些花；昨天夜里他本人也上去了。还要当着我们的面，让他的印地安人沿街列队行进，象孝敬圣母一样，献给她奇花异草。就在这里，在我们的镇上！”她们这样想。

因为阿枪卡莱花和法尔恰花是在冰天雪地的乱石堆中开花的。它们在冷冷清清的地方散发着浓郁的芳香，那里既不生禾苗，也没有家禽，连驼羊都不能到达。人一看见这花，血都要沸腾起来的。谁要是在茫茫雪原里发现了它们，就会高兴得发抖，还会跪在地上。年轻的印地安人情侣们，都是在狂欢节之夜去采这种花；从砍断的花梗上会冒出一种透明的汁液。

村长和女人们来到了阿德莱达和她母亲居住的房子门口。一群好看热闹的人也跟着来了，只听得人声嘈杂。

“他疯了！”一些人喊道。

“他疯了，还跪下了！”

老村长敲敲街门，阿德莱达出来开门了。她茫然不知所措，愣住了。

“阿德莱达小姐！唐阿帕里修少爷叫我们来的！”

姑娘们毕恭毕敬地摘下了帽子。她们的长辫子梳得一丝不乱，帽子上插满了花，手里举着大把的鲜花；而那些印地安人，脸色安详而又肃穆，整个集体似乎都在向她致敬，一种奇怪的致敬仪式。

“请进，先生！进来吧，姑娘们！”阿德莱达说着，走到了街上。

她让那一队人进了院子，其他人，她连看都没看见！她根本没注意那群以好奇、嘲笑和起哄的表情盯着她的人。她关上门，进了院子，这才开始仔细打量那位村长和那些女人。这时她母亲也到走廊上来了。

印地安妇女们一批接一批地走过来，将一把把鲜花献给

她。太阳使她的头发金光闪烁，10把鲜花在她的怀中成了一大束。她那细嫩的脸蛋在鲜花中显得喜气洋洋。印地安女人们见她如此快活，就一齐拥到她的身边，吻她的双手，然后再退回原处。

“妈妈！多美妙呀！这一切都是多么美妙呀！”

她几乎是跑到了印地安姑娘们的身旁，用左臂紧紧地拥抱她们。她们感觉到了金发姑娘那小小的乳房，并仔细打量她的眼睛。只有深深的河流岸边的闪光的岩石才有那样的颜色。阿德莱达也拥抱了老村长。老人用克丘亚语跟她讲话。

“妈妈，他讲什么呢？”姑娘急切地问。

“一切都这么离奇，孩子，我们得赶快走。”

“只有他的名字是可怕的；还有他的眉毛，”外地来的姑娘低声说，“还有他那……可是……他的心眼多好啊！”

五

在目睹兰伯拉的印地安姑娘们走过的人当中，有一位少妇痛哭不已。她就是奥科班巴的姑娘伊尔玛。

一次跑长途买卖回来的时候，唐阿帕里修把她从那遥远的村庄带来了。他去卖了20匹骏马和100头骡骡，然后用那笔钱买进了牛。

对伊尔玛的征服和抢掠是司空见惯的冒险。唐阿帕里修是在骡骡的买主为了款待他而举行的游览活动中和民间舞会上认

识她的。

奥科班巴村附近有一个湖，周围是绿草坪、玉米田和柳树。玉米田一直伸展到远方；沼泽地上长着高高的蒿草和狗牙根；湖岸的大部分被垂柳环绕，枝条长长的，象披肩的长发，有的垂到水里，与倒影相接。奥科班巴湖是全县人民的骄傲，是人们休息和消遣的好地方。就是出过远门的人也没见到过比这更美好的地方。在湖岸上，人们会返老还童，焕发青春，就连最严肃的先生们都会在绿柳荫下奔跑，并在枝条上荡秋千。湖中心有一个坟茔，一座石基的土山。这是“蒲蒲地”，即湖的中心。这里高高的芦苇随风摇摆，是到这里观光的红翅小鸭的栖身地。

为唐阿帕里修举行的游览活动规模盛大。显赫客人的光临一向是举行宴会和庆祝活动的良机，有身份的村民对此都求之不得。

伊尔玛不是出身显贵的姑娘。父亲是个磨坊主，有少量的玉米田和一个果园。他只有一匹老马，动作缓慢，无精打采，是多灾多难的主人的牺牲品。伊尔玛是衣裳褴褛的5个孩子中的长女，孩子们使得父亲总是愁眉不展。

伊尔玛的嗓音甜润，而且酷爱《瓦伊诺》歌曲。她并不是全村最美丽的姑娘，可是在节日里要是没有她，就不成其为节日了。她那张线条分明的珍珠色的脸引人瞩目！她的对手们就说她是“黄脸姑娘”。她的眼睛又大又黑，环视周围，好象总是在寻找在场的哪一个人似的；从这头到那头地观察着院落、客厅和原野，目光温柔，一副毫不在意，心不在焉的神态。

唐阿帕里修缠住她不放，跳了几回《马里内拉》和《瓦伊诺》之后，马上便和她攀谈起来。

“伊尔玛！”他对那姑娘说，“我回去时，要用一匹马把您象女王一样驮回去。我们要过两座大山。我要把我的摩尔骡马让给您！就连我的亲娘都没骑过它。”

伊尔玛非常激动。他，个子高高的，两道威严的浓眉。所有的姑娘都会对他百依百顺。

“啊！您骗我！不会是那样的！”她回答说。

唐阿帕里修感觉到了少女的灼热的呼吸，便一面用手搭住她的一个肩膀，一面盯着她那对被紧身小袄箍得紧紧的乳房。

“啊！我知道她是黄花闺女！”他一字一顿地说——又要有一个外乡人淹死在奥科班巴湖的情海里面了。

唐阿帕里修毫不掩饰他的抉择，一味向伊尔玛献媚讨好，但他既不妨碍聚会也不刺激她的父亲。

她唱着《瓦伊诺》曲子，大家翩翩起舞。外乡的贵客弹着竖琴，用他那有力的双手鼓掌，连喊带叫，为跳舞的人鼓劲，总是站在他那“对象”的旁边。

傍晚，客人们都骑马回到东道主的家里。

唐阿帕里修早已吩咐人为伊尔玛牵来了他的摩尔骡马，备好打偏坐的鞍轡。两个青年人一同上马，坐骑是两匹最漂亮的骏马。唐阿帕里修骑的马和那匹摩尔骡马碎步奔跑了一阵，然后又缓缓而行。

在整个节日期间，姑娘的父亲非常担心。他不知所措。一

会和这个，一会和那个喝啤酒和皮斯科酒，见了谁都不停下来讲话；归途中，他骑着他的老马独自落在后面。他没有折磨那畜生，没有用马刺刺它那衰老的溃烂的两肋，马刺在那里来回蹭着。他想用所有的时间去思考。那匹马一步一步地一直把他驮到家门口。下了马，进了院子，牵着缰绳。他的女人无法说服他回去陪伴女儿，去保护她。

“不！说什么我也不去！”他用克丘亚语斩钉截铁地说。他回到卧室，躺下了。

他老婆不能去，因为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她披上一条大围巾，在自家门口坐了好一会儿。然后她决定亲自去。她打定主意：“我就呆在举行庆祝活动那家的对面；用大围巾蒙住脸，等在那儿。反正他们快出来了！”

在昏暗肮脏的街道上，弥漫着一股猪粪的臭气，草丛里的癞蛤蟆呱呱地叫着；在果园栅栏的后面，树枝轻轻摇曳，沙沙作响。从广场的拐角处来了一对恋人。他们手挽着手。母亲等候着。正是自己的女儿和那个卖牲口的青年。

“孩子，怎么耽搁这么长时间？！”母亲说着，抑制不住哭声。

唐阿帕里修向她解释说，他们去找姑娘的父亲了，等了他一阵，而且现在也是来找他的。他恭恭敬敬地陪着母女俩！直到家门口才分手告别。母亲已经镇静下来了。

“娘啊！娘啊！”她边喊边走进了院子，“就在这儿祝福我吧！我想听到上帝的声音！”

女儿那么激动地抱着母亲，使她有点害怕。

“你和那位先生不般配。”她镇静自若地劝着女儿。然后用克丘亚语对她说，她爹心神不安地回来了。躺在屋里，但并没有睡着。他睁着两眼，深邃的眼睛里闪着痛苦的光，只有不幸的人，只有睁眼睡觉或死不瞑目的人的眼睛里才闪着这样的光，这是罪孽！极大的罪孽！上天警告了！你可别叫那爱的激流卷走！

可是那爱情的激流是甜蜜的、强大的。“不行，不行。我们拿定主意了。”她想。

她在院子里赶上了母亲，叫她陪伴自己，等着那闪着多情的光芒的半圆的月亮升上天空，激情满怀的伊尔玛想等着欣赏那神秘莫测的月光。她相信在月光中能看到圣母和圣婴骑在马上。她没有乞求他们的保佑。她感到幸福，并知道她谁也不再需要。果园里那棵靠着院墙的高大胡桃树的枝条，开始在撒满月光的地面上摇来摆去。

“娘，咱们走吧。我心里踏实了。”她对母亲说。

她，姑娘的母亲，在用克丘亚语祈祷。女儿的话更加深了她的担心，她无限虔诚地跪在那里。

清晨4点钟，姑娘逃出了家。她假装克制骗过了母亲。那天清早她骑上了那匹在河岸上急不可耐地踢脚的强健的骡马。唐阿帕里修和牵着马缰绳的大管家早已在那里等候。他拥抱伊尔玛，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象拿一根羽毛似的把她抱上马去。马儿撒腿奔驰起来。

“我亲爱的，我最亲爱的！你是黄花闺女！你的嫩肉多可

爱啊！”他说着，骏马的奔驰更激发了他的喜悦和活力。

金雀花的树丛在田野上散发着馨香。河岸上的鲜花象清晰的斑点。下弦月并没有使星光暗淡，月亮渐渐靠近了矗立在晴朗天空的边沿上的山峰；群星在安详的月光下闪烁，并不那么刺眼。世上的万物从没有象在这月光下那样和谐融洽。那星光能照到万物的底层，照透山山水水，照出鸟兽花木的颜色，照亮人的心灵！一切都被宁静的月光连在一起。距离在消失。那个男人在奔驰，群星在他的心灵中歌唱，在他的手中抖动。高天已不复存在。

伊尔玛就是那么纯洁无瑕。当天色渐渐发亮，太阳已露出笑脸时，她看到在山谷深处如此遥远的小小村庄和果园，看到湍急的河流，她的村庄的河流，这是属于她的，是她的童年的主人。

“我的妈呀！”她叫了起来。

管家担任向导，他停住了马。

“别停！”主人叫道。

“把我带到哪里去呀？我真可怜！”

她俯下身子，抱住了散发着汗味的马脖子。

唐阿帕里修用皮鞭在那骡马的臀部抽了一下，它向前跳了起来。

“走！”他命令说，“马过山口时，你可以哭。可别嚎，那样我不喜欢！”

从那时起，她就成了主人众多的情妇中的一个，或许是最

宠的一个，尽管她是同样的恭顺，好象是他在养活着她们。

阿帕里修在阿尔卡马莱区为她租了一所房子，那里离达官贵人居住的地区很近，是麦斯蒂索人、小业主和工匠们居住的地方。

伊尔玛学会了弹吉他。唱歌会使她更加痛苦。可她并没有失去希望。

“他要再爱上别人，我就自杀，只要他不结婚，我就是最受宠的。可是，天晓得！”她寻思着。

她不愿在镇上与人来往。其他的情妇们想使她也卷到打架斗殴中去。她们大喊大叫，可是枉费心机。她们辱骂她，或让麦斯蒂索女人和混血的醉汉们污辱她。她冷静地看着他们，一言不发。她那双瞪着的大眼睛是温柔的、少见的。对其他的情妇们的争风吃醋和酒鬼们的虚张声势她都知道如何逆来顺受。

“可她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呢？”人们这样思忖着。

不用说那些情妇和仆人，就连财主们的儿子、军官，甚至那些地主本人都喜欢她，有些人简直到了狂热的地步。

“多钟情的杂种美人！多温柔的混血姑娘呀！”他们评论着。

他们觉得“杂种”二字对她并不完全合适，他们是带着贪婪和恶意说出来的。

唐阿帕里修的其他姘头们曾和警察，邻村的小牧业主或小地主逃走过！当兰伯拉的绅士回原籍时，镇上的显贵们夜里去勾引她们中的某些人，这并非难事。

伊尔玛从未在中心大街上出现过。她在深夜或中午唱歌。

记忆帮助姑娘用吉他琴来演奏她遥远故乡的乐曲。秘鲁的深深的富有音乐感的河流都从那里通过阿布里马克雪峰：左老湍急的河流象钢刀一样，在安第斯山最高的部分将它切开——分成了火石和宝石——形成了深涧，银带似的河流，从绝壁上的丛林中流过，站在峭岸上一望，会使人浑身发抖，头晕目眩。

伊尔玛不给她的主人唱歌。她在床上抚摩他，那是一张高高的铁床，支在一个土布帷帘的后面。

只有一次，唐阿帕里修要她唱阿布里马克的《瓦伊诺》歌曲。

“也许以后我能唱，可现在不能。”她回答说。

唐阿帕里修没再坚持。

他早早地走了。在情妇的家里，他从不呆到天亮。不安的心情袭击着他。他匆忙地穿上衣服。有些情妇挽留他。女人还哭着，他就走了。起初，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挨过打，他把她们往墙上撞。等到了街上，他又难过起来。“我是鬼迷心窍了！我是个坏蛋！”他叫着。

奥科班巴的少女从没向他表示过那种失望。她让他走，不哭。没过几天，他就回来了。伊尔玛拥抱他，有时脸上带着微笑。

夜里，他常常很晚才来敲门，叫她。

“我就是专为你来的，奥科班巴姑娘！”他说。

的确如此。马淌着汗水，口吐白沫，在门口等候着。

那位沿海姑娘的到来也搅乱了伊尔玛的心情。

一天下午，唐阿帕里修去看她。

“伊尔玛，现在你来唱支歌。”他说着，坐到土布帷帘外面的一个砖墩儿上。

她调好了吉他，就唱起了那支每段都以“啊，孔雀，河流的雄鹰！”为结尾的《瓦伊诺》民歌。

“再唱一遍，就这首！”唐阿帕里修向她要求。

小伙子的眉毛好象很乱，连眼睛都遮住了。

“再唱一遍，奥科班巴美人，再来一遍！”

他闭上眼睛，倾听着，听了很长时间；然后起身，没看她一眼，就开门出去了。

3天过后，兰伯拉的村长就到镇上给阿德莱达送鲜花来了。

于是在当天晚上，伊尔玛早早地就到唐马利亚诺那儿去了。她酝酿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琴师打开了那扇小小的街门，好看看是谁，伊尔玛果断地走进来，并亲自上了锁。

“咱们来谈谈你的东家。走吧，你住哪间屋子？”

唐马利亚诺把她领进了鞍具房。那只红隼快活地站在一根钉在白墙上面的木棍上。伊尔玛突如其来地打断了主人与猛禽的消遣。“乌巴”常在“聪明的小伙儿”面前得意忘形地跳舞，那只红隼也时而直立时而低头，就象在模仿人的动作一样。房间的地面上铺着新的干草，生长在高山峻岭上的金黄色的干草，粗糙、坚硬，还反射着夕阳的余辉。

“姑娘，姑娘！唐阿帕里修！东家！他怎么啦？”

姑娘使马利亚诺大吃一惊；当乐师叫着唐阿帕里修的名字

时，心神不定又无可奈何地向少女摊开了双手。

“没什么。你坐下！”

她用阿布里马克那甜润而又凄苦的克丘亚语向他诉说着。唐马利亚诺聆听着。他听到的克丘亚语和他家乡的、内地果园里的差不多。亚马孙河从那里起源，形成了一支大动脉，咆哮着流入在山峦中冲刷出的河床。伊尔玛对他讲的克丘亚语就带有那些河流的韵味，那些在河岸上嬉戏着、呼喊着，召唤着人类的鸟语莺声的韵味。

伊尔玛渐渐地使他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以及他自己是个“乌巴”。她湿润的眼睛，她年青的痛苦的脸庞，还有他听到的故事和希望，都把他弄糊涂了。他跪下了，毫无顾忌地把头轻轻地支撑在姑娘的双手上。温柔的手指激起了他生命的活力。那颗最美妙的星——神秘莫测地镶嵌在夜幕上的天狼星在他的眼中闪着光辉。

“姑娘！太太！孩子！”他站起身，高声叫着，“咱们在这里，在这里受苦！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干！用我的竖琴！也用我的灵魂！”

自从来到镇上，伊尔玛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哭了。

“乌巴”容光焕发，象透澈明亮的湖水一样，在它的岸边，人们可以不停地哭泣；小鸭会摇摇摆摆地游来，微风吹皱了湖面，搅乱了群山和香蒲在水中的倒影。

“姑娘，我到你的家里去给东家演奏！你把竖琴拿走吧！”琴师说。

回去时，他一直陪她到阿尔卡马莱区，一直到她家门口。

谁也没看到他们，因为在天气寒冷的村镇，人们很少在夜间出门。乐师匆匆地走回了家。一进鞍具家，就为他的“小伙儿”跳起舞来，然后躺在闪光的干草上。

“我的女主人！她将是我的女主人！啊，哈哈，我的‘小伙儿’！啊哈哈，我的‘小伙儿！’”

他斜视着那深情而又安详的红隼。

六

唐阿帕里修在兰伯拉逗留了10天。这一天上午来到了省城，由两个骑着高头大马的管家跟随着。唐阿帕里修骑着自己绰号“猎鹰”的黑色马驹，用的是他节日里才用的马具。他不从兰伯拉方向的路口恰尔瓦区进城；从高处就拐了个弯，下来就直奔阿尔卡马莱，这样就一定要穿过市中心。鞍轡穗子上的400个银环光彩夺目；宽大的马蹬上穿着银带；脚上套着纯银打成的马刺，上面有一个大型的钢叉。那马驹神气地走在街上，骑手驾驭着它；黑马驹威风凛凛地踏在石子路上，趾高气扬；根部宽厚结实的马脖子，微微地弯成弓形；一双小巧玲珑的耳朵象剪刀一样竖着，随着那牲口体内热血的沸腾而颤动。

人们都聚集在街上看着他们走过；有的就跑到阳台上。

“猎鹰”的蹄声和兰伯拉绅士马刺的铿锵声都是镇上居民所熟悉的。

唐阿帕里修披着最精细的驼羊毛的篷秋。那篷秋并没有因

为风也没有因为马驹的行走而飘动，它的重量恰到好处，一个角搭在骑手的肩上，正好使人能看见圣彼得罗出产的垂着流苏的蓝色皮袍和镶着银边的小巧玲珑的马鞍。

管家们紧跟着主人。

“这位阿帕里修，在利马受过教育，可是什么也没学到。”

“就喜欢招摇过市，就会用这财主的派头欺骗女人！”

“也就是骗那些见识短的女人。利马那些有教养的女人才不理这老一套呢。”

他博得一些人对他的顺从。有些小姐对他的习惯表示轻蔑。“象他的乡巴佬祖先一样，是个蠢货！”她们说。然而她们几乎都看着那马驹走过，看着它的主人。他在向人们点头致意。他那不安的神情越来越明显。要到他家所在的街道，必须从一个街角向左拐。他一磕马刺，那匹马的前腿腾空站立起来，马驹迈着碎步跳了几下，小伙子也就来了劲头。管家们也刺了自己的坐骑，狂奔起来，马掌碰到石头路面上，闪出火花来。

那天上午风言风语和道听途说的话题不光是关于唐阿帕里修，也关系到那位沿海来的姑娘。

“这野小子今天会向她提出要求的！姑娘的母亲不会做这件事的，他非亲自开口不可。”

“那不是在姑娘的门前下马了吗？”

“可为什么带来两个骑着高头大马、身穿节日盛装的管家呢？”

“他不会向姑娘要求。他会碰一鼻子灰的。虽然他有钱有

势，可人家并不了解他，可能还没有感情呢。”

“可谁又知道她们母女俩是什么样的人呢？也许娘或闺女是个痨病鬼呢，患痨病的穷人到这里来吃土豆、喝牛奶。气候也好哇！她们说不定会跪着接待他呢……”

唐阿帕里修只想逗留几天。他在镇上耀武扬威，而且只要阿德莱达在此，他就不会改变这种做法。他总是从那最主要的街道上出入，而且随从越来越多，尽管他当天就把他们打发回兰伯拉去。

这一次他没回自己的家，从街上走过，到了阿德莱达的家门口。

几匹马猛然一停，引起一阵嘈杂混乱，年轻的阿德莱达出来看看。唐阿帕里修就在她家门前，他骑的马驹的肚带上缀满了银环。

他摘下帽子向姑娘致敬；管家们也模仿着主人。3匹马向后退了几步。

“您的仆人在此，小姐。”

姑娘的面颊泛起了红晕，他已经注意到了。心里似乎有一团火，少女害羞了。他磕了一下马刺，让马向后退；然后踏着碎步，在狭窄的街道上转了几个圈。“老实点！你看谁在夸奖你呢！”他对马驹说，并意识到阿德莱达在注视着他们。

“您要骑它吗？”他在门旁下马，问那姑娘。走到她身旁，并把手伸给了她。少女金黄的短发，纤细的小手，在唐阿帕里修的记忆中唤起了一个遥远的梦幻。“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心里想。小时候，他曾在无边无际的高原上的雪山顶

上的印地安人的草棚里睡过觉。黎明时，父亲把他抱出来。在草原上罕见的家禽的凄凉的啼叫声中，太阳出来了。它的光线沿着地面微弱地铺开。在没有树木的原野上，高高的闪光的黄草，每一棵都沐浴在光辉中。

“阿德莱达，您骑它吧。别看它威武得象个国王，这匹马可是最温顺的。”他说。

他拉着姑娘的胳膊，来到马旁边。

“要是我和大家都离开这里，并且把它忘记了，我想它饿死也不会离开这里的。我买它时，它还很小。我把它驯服了，我驾驭它。往这看，‘猎鹰’驮着小姐走吧，就象驮一朵鲜花那样！”

她拉着缰绳，让它微微低下了头。那匹马真的用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她，既不骄傲也不强悍，而是沉静安详，只是那一双耳朵直直地竖着。

“阿德莱达，现在您可以揪它的耳朵。揪吧！这样可以知道它认识您。也许您不知道，这是一匹骏马是否驯顺的最好证明。”

姑娘抚摩了马驹的一只耳朵。在手中，没有任何毛皮、没有任何东西比它更细腻了。高贵的畜生好象在克制自己，似乎在抖动。有什么东西从它闪亮的前胸流下来。它把头垂得更低，然后又直起来。脖子上的鬃毛倒在一边，颜色更深，闪烁着一种美丽的光泽。

“好吧，我骑它。明天我骑它。咱们一起去告诉我妈妈。”

她叫了自己的母亲。随着那位太太出来了两位兰伯拉的印

地安妇女。在年轻主人面前，她们都跪下了。他没有理睬她们，只叫她们离开。“真漂亮，心灵和脸蛋都漂亮！”她们一边用克丘亚语大声说着，一边走开了。

太太同意了他对女儿的邀请。他们将骑马到邻近的一个湖边去。那个湖很出名，因为周围有一圈窄窄的黃沙滩。路很平，而且要穿过苜蓿地和小麦田。

不能再晚了，唐阿帕里修这才与母女俩告别。两位管家一直站在对面的墙脚下，恭恭敬敬地等候着。3个人一齐上马。两个管家跟在后面，鱼贯而行。

“快来，费利克斯！”主人命令说。话音未落，走在后面的汉子立刻赶上他。

“她的胳膊真秀气。”唐阿帕里修对大管家说，“简直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宝贝儿。我要在咱们教堂的前厅里看到她。”

“您会把她带去的，东家。”

“跑着玩会更使她高兴；我们的空场最合适，又有荫凉。”

“您得让人每天打扫，先生。”

“不过……门不当，户不对。不，不是！”

“全看您的了。”

费利克斯长着络腮胡子，是最好的放牧人。

“你说什么？费利克斯，我父亲会笑话我吗？”

“他在九泉之下会仔细观察的。要好好了解一下那女孩子。那些印地安女人叫您来着。”

与此同时，阿德莱达在院子里对她母亲说：“我没跟他说花的事！没想起来。他不给我时间。他每次都象是另一个人，

好象越来越高大。”

在唐阿帕里修家的街门附近，费利克斯问他的主人：

“那位奥科班巴的姑娘呢，孩子？”

“什么……？”他转过身来象要惩罚那管家似的，眉毛都要竖起来了。

“是啊，唐阿帕里修。您打算怎样发落她呢？”

“一如既往！维持现状！就得维持现状！”

费利克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每一次旅行，每一行动，他都奉陪过已故的主人和唐阿帕里修。在那个抢人的清晨，他见过在潮湿的胡椒树林中，奥科班巴的少女在慢跑的马背上啼哭。她那高尚的情操，她那线条分明、充满活力的脸庞，她的眼睛，都曾打动过他的心。“要是象这样，用欺骗的手段，把我从亲人中抢走，抢到另一个村庄去，而且还要当牛做马呢？清白无辜！清白无辜！总之，如果我的灵魂生来就是肮脏的，好色的……”

唐阿帕里修已经觉察到自己的大管家在寻思着什么。对他来说，费利克斯就是自己身体和灵魂的组成部分。

“到她那里去，向她请安。叫她今天晚上等我。”他吩咐说。

他这样做使管家高兴起来。他微笑了。竖琴手打开了正门。“猎鹰”一步一步地走了进去，在走廊正中的柱子那儿停下来。费利克斯沿街向前，飞驰而去。

年轻人没有停下来和乐师说话，慢慢地上了楼梯。

唐马里亚诺坐在门墩上等候着。心中充满了一种幸福的自

信。

等到大管家回来时，主人已经出去了。马利亚诺不在院子里。费利克斯在马圈里找到他，他正在看马呢。

“你甬做饭了，”他对乐师说，“我请你一块到饭馆去吃。”

马利亚诺从不和麦斯蒂索管家们说话，只有当主人的母亲带来“侍从”时，他和他们说克丘亚语。印地安人“侍从”们到鞍具房去找他，夸奖他的红隼，赞扬那些自由的猛禽的本事：“它们能使老鹰落泪；能从太太们的深宅大院里把山鸡抢走，甚至连长大了的火鸡也不例外。它们象箭一样俯冲下来。他们能隐蔽在空中，人们只能听见翅膀扇动的声音。”有的“侍从”就睡在鞍具房内。天亮时，唐马利亚诺几乎是在那些印地安人的耳边弹着琴。因为太太不信任他。

“只因为他喜欢我儿子，我才不叫人把他送回他的村子。我觉得他是个巫师。他能听到我们听不到的声音。”

有一次老太太把他叫到二楼走廊，叫他跪到台子上，几乎是叫喊着用克丘亚语问他：

“你听到什么了？你整天在听什么？你这天生的畜生！”
乐师无法回答她。

“你给我低着头跪在地上，就象铅铸的一样！”太太叫嚷着。她径自回自己的卧室去了，却叫他依然跪在那里。

腿都跪麻了，他才站起来，一级一级地走下楼梯，喘着气，生怕人家发现他走了又把他叫回来。

现在他怎么能和大管家一起到饭铺里去吃饭呢？

12点了，大管家把他从暗门后面拉了出来。

在街上，管家没和他讲话。他们去饭馆里间走廊上的一个小桌旁坐下。席间，费利克斯亲切地注视着他；唐马利亚诺看得出管家要开口了，要对他说点什么，可没拿定主意。他们喝着奇恰酒。管家喝了半罐。他微微笑了，杯子里的酒已经不顶用了；他捧起了罐子，慢慢地喝起来。抹了抹胡子并叫道：

“再来一罐，姑娘！快点拿来！”

他邀请乐师也喝，把满满的一罐放到他手上。

“象我那样，干！”他对乐师说。

唐马利亚诺可没那么大的酒量。

“我喝不惯，老兄。”

午饭吃完了。

费利克斯靠近了乐师。绕过桌子，和唐马利亚诺一起，坐在同一条板凳上。

“唐马利亚诺！唐马利亚诺！为我，也为我的女主人，伊尔玛姑娘！也是你的女主人！”管家对他说。

然后拉着他的胳膊叫他起来。在桌上放了几枚硬币就出去了。他领着马利亚诺在街上慢慢地走了一段路，把一只胳膊搭在乐师的肩膀上。唐马利亚诺是五短身材，几乎都圆了，而管家是个彪形大汉，因此好象后者在搀扶着他，领着他，保护着他似的。行人都注视着他俩，有几位还惊奇地停住了脚步。

“琴师‘乌巴’喝醉了？”“和兰伯拉的大管家一起？”

后来他们就分开了，可是还继续朝前走，唐费利克斯在人行道上，而乐师在石子路上。

“乌巴”进了主人的家。唐费利克斯继续朝前走。

唐马里亚诺坐在鞍具房门口晒太阳。苍蝇在潮湿的地方飞来飞去，有几只嗡嗡地互相追逐着。一只短腿大身子的蜘蛛，挥舞着小小的前腿，几乎是藏在一块落满了灰尘的石头后面，窥伺着。唐马里亚诺听着小虫子的声音，看着它们沾满了自己的泪水。

“我哭什么呢！姑娘！我哭什么呢！”他用克丘亚语对自己说道。

是世界，是整个世界使他哭了，是明亮的卧室，是天之骄子的情人使他哭了。

唐阿帕里修一直没来。

当最后一丝光线在天空中消失而沉沉夜色降临的时候，大管家进了鞍具房，把竖琴拿走了。

“你就去啊！”他从院子里对琴师说，“唐阿帕里修在沿海来的母女俩那里。他肯定从那里直接去。”

琴师出了街门，看着费利克斯抱着竖琴的背影，很快就在黑暗中消失了。

星星在遥远的天空闪烁着。刮着风。一片片的乌云在空中飘动，星星时隐时现。星光下，青蛙的歌声响成一片。它们之所以发狂，也许是因为那乌云忽高忽低，有时甚至贴到地面上。于是它们就用最低沉的声音，饱含着夜间大地的深沉，多情地演唱起来。

唐马里亚诺听着蛙声而忘记了一切，坐在前厅的小门外面，久久地不动。然后他摇摇头，关上门，朝阿尔卡马莱的方

向走去。当他停在那平房的对面时，伊尔玛出来了。唐费利克斯在那里，靠在墙上，捋着胡子。他看出管家的心情忐忑不安。

“我走了。”他说，“我去侍候主人。他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好回本宅去。”

一盏灯管很干净的煤油灯把屋子照得通明。伊尔玛的家不是楼房，只是一所平房。平房既没有前厅，也没有很大的庭院：唯一的门就是房门，马匹进不去。骑马的客人只好把马放在街上，房门的对面。

一间卧室，一个小院和在狭窄的过道一端的厨房就是这所平房的全部结构。在过道和小院里，伊尔玛种着三色堇和天竺葵的盆景；长青藤在寒冷中挣扎，沿着女主人从房顶上搭下来的一条绳子向上伸展着。厨房门口附近的一棵金雀花树缀满小小的花朵。这使她想起阿布里马克那碧波粼粼的河流两岸的树林！

粗布帷帘把卧室和“客厅”分开。伊尔玛把“客厅”里当家具用的砖墩儿铺上了坐垫和毛皮。一个高高的支架成了油灯座。墙壁都刷上了白灰。

伊尔玛拉着乐师的胳膊，一直来到寝室，竖琴就在那里。

“肯定，他快来了！已经不早了。”

唐马利亚诺检查了一下竖琴。他很坦然。伊尔玛听到了调弦的声音，就进了卧室。

“亲爱的大叔，慢慢弹吧。弹个曲子吧。”她说。

唐马利亚诺弹了一首东家经常点的《瓦伊诺》舞曲：“河里的虫，为什么你把丧服穿？为什么你爬得这样慢……”

响起了脚步声。

“现在来更好！”她说。

她出去开了门。

正是唐阿帕里修，身着节日盛装：穿着黑色大衣而不是篷秋；打着领带，系着窄围巾，而不是那条宽宽的驼羊绒的毛穗围脖；没穿白靴子，着一身礼服；漆黑的皮鞋，油光闪亮。

“奥科班巴美人，我是专来听你唱歌。”他说。

到了灯光下，他已经不那么神气了。

“我的天呀！你多美呀！你的辫子为什么带一朵天竺葵呀？你怎么了，奥科班巴姑娘？希望！爱情！你那象处女一样的硬实的胳膊会保持到什么时候呀？你的眼睛也一样，奥科班巴姑娘。你会永葆青春的！你今天为什么在辫子上戴那花呢？你使我想起了溪边的鸽子。你每只眼睛都象一个会唱歌的岩洞；不过只有在下大雨的时候才唱。好！唱吧！”

他们坐在了一起。少女有点怕开口。

“我都学会了！”唐阿帕里修对她说。

河上的鹰，我在把你等

河里的泡沫，山里的鹰……

下一句的曲调要反复，她便提高了嗓门。唐马里亚诺听了那句歌词，合上了眼睛，把脑门支在竖琴的弓背上。日光照亮了他记忆中的往事；他欣赏过果园和可爱的小溪……“姑娘啊，小姑娘啊！”他自言自语地重复说。于是就随着两位青年

人的歌声开始演奏起来。过了一会儿，也不知是用耳朵还是用眼睛，唐阿帕里修意识到了这伴随着他们歌唱的异样的声音……

他站起身，向前迈了一步。他觉察到是竖琴发出的声音。他进了寝室，碰见乐师还在那儿弹呢，埋着头，专心致志。唐阿帕里修又出来了。伊尔玛微笑着、爱恋地注视着他，比任何时候都更象他家的女主人。唐阿帕里修做了一个假动作，因为他手中没有皮鞭。

“出来！印地安人！”他吼道。

伊尔玛想跳起来，可那位兰伯拉先生两眼喷火，似乎周身都燃烧起来了。

唐马里亚诺拿着竖琴出来了。唐阿帕里修从他手中夺过来，把琴弦和琴弓摔得乱跳。一顿乱踩乱踏，把琴毁了，踩扁了。一开门，把琴师推了出去。

“滚！”他用克丘亚语叫道。

他转身对着姑娘，又说：

“再见吧，奥科班巴姑娘！再见，再见吧！”

他走了。

唐马里亚诺象一只逃跑的熊一样在街上跑着。

前厅的门没有上锁。他进了院子，心中惶惑不安，不知该投奔何处。唐费利克斯也许在睡觉，或者在后院的哪间屋子里等着他呢。他不愿回鞍具房，也不愿见他的红隼，走到马厩又返回来，在台阶下面走廊的砖地上坐了下来，朦胧中听见一片蛙声。他站起身来，开始跑着一级一级地爬上楼梯。上完了。他才站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到了唐阿帕里修的卧室门口，盘着

腿，靠墙根坐下。

主人没过多久就回来了。他拨开门闩，弄得叮当直响，费利克斯连忙从后院跑来。

“我什么也不要！睡去吧！”唐阿帕里修命令说。

他在一楼走廊的砖地上来回踱了一会儿，然后就上楼了；看着阴暗的天空，倚在栏杆上呆了片刻。他坚定地向寝室走去。当他把钥匙捅进锁孔时，唐马里亚诺紧紧抱住了他的膝盖，哀求说：

“少爷！少爷！”

唐阿帕里修推他的脑袋，把他推到一旁。可是乐师还是叫着，用力抱住年轻人的膝盖。这时，他拖着“乌巴”猛地走了一步，并抓住他的脖子和大腿把他举了起来，跑向栏杆并把他向空中抛去。

落地时，他都没有叫出声来。兰伯拉的阔少连一声呻吟也没听见，听到的只是乐师的身体与院子里的石头地面的碰击声。唐阿帕里修侧身扑向卧室的房门，而他已经开不开门了。他又一次扑向房门，倒在了地板上。这时他用了钥匙，进去了。点起了大烛台上的两根蜡烛，靠着墙，坐在地毯上。蜡烛的火焰摇曳着，光线在抖动。

天亮时，费利克斯进来了。

“东家，您没关门，没睡在床上？蜡烛点完了。唐马里亚诺死在石头地上了。您把他杀死了？东家！”

“费利克斯！去把阿尔卡马莱的区长叫来！叫他到我的卧

室里来。马利亚诺从栏杆上摔了下去。我相信他要杀我，是他要杀我。费利克斯！去叫区长来！叫他们敲响阿尔卡马莱的钟声。我一个人在这里，我躺在地板上。去叫区长来！”

他站起身，黄色的脸上，两只眼睛好象在燃烧。纷乱的眉毛使他的脸上笼罩着阴云。

费利克斯跑下去了。

阿尔卡马莱的钟声响了。在晨光中，缓慢的钟声宣告着一个人的死亡。区里的印地安人划着十字。凄凉的钟声传到很远的地方。在区里高大的岩石上生活的红色的潮湿而又软弱的寄生虫，在黎明时冰冷的寒风中瑟缩着，吸收着这纤细的哀乐。白色的塔顶上，鸟儿已经在歌唱，那是哭泣。

阿尔卡马莱区的区长走上了那座高大房屋的楼梯；拿着他的权杖，走路时便拉着它。

他摘下帽子，进了兰伯拉先生的卧室。雪白的帘子挂在高高的铜架上。唐阿帕里修坐着的深色的木椅，上面铺着红色的椅垫。

“区长，”唐阿帕里修用克丘亚语对他说，“我的门卫唐马利亚诺死了，我把他交给你的单位埋葬。要厚葬。就在这里设灵堂。在你家里举行第5天的仪式。我给你2000索尔的用费。守灵就在院里进行吧，全齐了，我不出面。唐马利亚诺是从你们区到这儿来的。就让他留在那儿吧。墓地也在那里。请大家都来，都来参加殡葬！他是您的孩子。他从天上会为阿尔卡马莱区的节日演奏竖琴的。在九泉之下他会永远弹竖琴的；同样会在我的心灵中弹的！”

区长站在那里听着，一动不动。唐阿帕里修把一叠黄色的纸币递给他。

“我的先生，”区长回答说，“我们将象送别一位完成了职责的了不起的村民那样为你的仆人送葬。受过了人间的苦难，他将在天上为上帝演奏优美的乐曲。听说是黑马驹踢了他。”

“夜间死的。让人来吧。”

区长祷告着走了出去：“贞洁的圣母玛丽娅！”

费利克斯留在门口，他身体的黑影伸展到唐阿帕里修那里。年轻人盯着那影子。过了一会儿，他才抬起头来，他的目光是坚定的，就连太阳在雪地上的反光也不会使他眯眼。

“马驹呢？怎么了，‘侍从’？”他问道。

“唐马利亚诺头上有血，一直流到脖子上，流到脸上。一落到打谷场上。那匹马就把这压场的把式踢了，并伤成了这个样子。把他踢死了。”

“黑马驹比你强，费利克斯，‘侍从’！你嫉妒它！在阿尔卡马莱，都会说是‘猎鹰’把他踢死的，我再也不能骑这马驹到那个区里去了，再也不能去了。你也不能再去了。两三天以后，每个印地安人都会在心灵深处把‘猎鹰’埋葬。他们将会认为它散发出的是死亡的气味；从它的眼睛里射出的是死神的视线；死神会揪住它的尾巴和脖子上的鬃毛。它那响彻兰伯拉上空的嘶鸣……他们会怎么说呢？他们在敲丧钟了，‘侍从’……可‘猎鹰’会死而复生。它活着！象我一样！我也活着！叫另一位管家到我这里来。叫他站在门口。你别来了。和各区告辞，回兰伯拉去吧。别叫我母亲到这里来。对，‘侍

从’！干脆就这么办！”

费利克斯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了。

从大门洞开的前厅，阿尔卡马莱的村民们走了进来。3位区长率领着众人。人们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正区长的胸前带着一个银十字架；十字架挂在一条发黑的古老的银链上。受难的耶稣有张宽宽的脸，鼻子是实心的。区长走在总管和农田助理的中间。大部分的男男女女都穿着黑色衣服，没穿丧服的就穿深蓝色的衣服。

参加葬礼的人挤满了两层院子。里院的厨房和所有的房间都被占用了。里院走廊的一张桌子上，铺着黑色桌布，遗体就安放在那里。按着歌手的示意，全体村民开始祷告。人们就象一群大黄蜂一样，一齐唱起那肃穆的歌词。含糊不清的歌声一直传到唐阿帕里修的卧室。在门口肃立的二管家摘下了帽子，粗硬的头发几乎盖住了他的前额；他竖起了耳朵倾听着，也开始高声祈祷，模糊不清的话语和众人一模一样。唐阿帕里修起来了，向房门走了一步。二管家那低沉浑厚的声音使他心烦意乱，比那葬歌的合唱更厉害。那是在大黄蜂的嗡嗡合唱的协奏下唱出的清晰的歌词。他又重新坐下，觉得自己比以前重了一倍，因为他的心比全身还重。

祷告结束了，沉静了片刻。唐阿帕里修知道了！轮到妇女们唱《送葬曲》了，他闭上了眼睛。一群妇女用头巾遮住了半边脸，开始唱起来。她们不按单词唱，只管音节，用的是世上最尖锐刺耳的声音。年纪大的男人，站在遗体旁边，慢慢咀嚼

着挑选出来的科卡叶子；另一些人表情坚定地倾听着，把遗体围得水泄不通。女歌手们提高了嗓门，拉长了音调，让那歌声响彻四面八方。送葬班的女人开始哭起来，她们互相感染着，哭得越来越令人悲痛欲绝。她们都席地而坐。二管家踱来踱去。唐阿帕里修为了避免女人的哭声，塞上了自己的耳朵，送葬歌烧着他的心。那歌声压抑着他，并使他的血汹涌沸腾；那歌声使他的生命上升，把他带到了死亡的边缘。生长在兰伯拉附近的高大的兰桉树，象山坡上的一片污痕，似乎在凄惨的气氛中正向他走来。

歌声停了，可那青年人觉得最好还是在那令人压抑的声浪中活着。

那合唱又不时象摆锤一样，一次又一次地从苍天中央打将下来。

暗无天日！太阳就象在日全食时一样，以颤抖的黄色的光线沐浴着大地。在这种光线照耀下，那个从高山区来的人心事满怀地走着。

人们抬着一口兰桉木的沉重棺材，里面放着乐师的遗体。唐阿帕里修看见人群上了山坡，墓地就在山顶上。送葬的人漫山遍野。直到那群人进了墓场，兰伯拉的绅士才离开了他家的阳台。

他突然决定，并命令管家：

“备黑马驹！”

他在高高的走廊里踱来踱去，穿着他的黑皮鞋，黑礼服，

打着浅蓝色的领带，并且戴着礼帽。

管家把黑马驹牵来了。当有人牵笼头时，那马驹不跑，一步一步地走着。

唐阿帕里修不慌不忙地下了楼梯，接过了缰绳，刚要上马，又停住了。

“马刺！”他命令说。

他自己带上了马刺，就上马了。管家已经打开了街门。

街上空荡荡的；各区的人都送殡去了。马驹小跑着。身份显赫的太太小姐们从窗户里看见年轻人过去了。“骑着那马驹？”她们自言自语地说。“他还戴孝？”有的人叫了起来。但是在这样的时刻，她们不能再恶语伤人。

在为公墓当作门户的光秃秃的山上，几个酩酊大醉的汉子踉踉跄跄地走着。“唐马里亚诺，孩子，天使！”唐阿帕里修下了马，听见他们说。夕阳平射的光线照亮了公墓蓝色的大门；在拱形门中间的石头上，雕着一个灰白色的、非常醒目的骷髅，面向着村镇。

在公墓宽阔的场地上，各区的印地安人在窃窃私语。

当他们看见唐阿帕里修时，立刻让开了一条通道，好让他过去。高高的牧草，还是绿的。他来到坟坑旁边，尸体已经下葬。死人穿着咖啡色的教士的长袍。只能看见一双黄色的赤着的脚。一个带帽子的斗篷盖着他的头，脸上盖满了棉花。一个小小的原驼的雕像拴在手上，是用木块做成的，用驼羊毛织的布包着。原驼在寂寞的旅行中，将永远陪伴着他，直至那伟大的宝塔，按照印地安人的说法，这座死鬼们建造的宝塔在科罗布

娜山顶上，是永远也不会竣工的。

唐阿帕里修闭着眼睛，对尸体说：“马里亚诺老弟，我的灵魂也象一条白狗一样，在你必须经历的全部旅程中陪伴着你。此刻在我的身体中，我的血液象在冰冻的五六月份一样，象在高的雪峰上一样，那里有被判处得得不到安慰的幽魂在哭泣，在飘荡。永别了！永别了！永别了！永别了！”

区长面朝西站在那里，主持最后的仪式。面对兰伯拉绅士，他一言不发。头天晚上，他一整夜都在喝酒，脸上泛着光。他站得笔直，表情无法再严肃了，眼睛盯着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他有一种看来是必不可少的凝重。他点头示意，一位歌手就唱起了《我们的圣父》，人群便响应起来。唐阿帕里修站在区长面前，凝视着尸体。他也看到了印地安人区长的胸前的银十字架闪烁着暗淡的光。

祷告结束了，区长望着年轻的财主，好象这部族的首领是从一个虚无飘渺的遥远世界向他走来一样。

“你，第一个来！”他用克丘亚语命令说。

一个印地安人将一把铁铲递给唐阿帕里修。

他手握铁铲，站在一旁，并看到了他的大管家。几步之外，只见伊尔玛身穿丧服，几乎用头巾蒙着脸，眼里充满了晶莹的泪花。唐阿帕里修摇了摇头。多么巨大的太阳啊，在他的心中熄灭着！他站在公墓里。他跪下了，用铁铲铲起来一点土。他没有扔到脸上，而是盖上了赤着的双脚。

“行了！”响起了区长威严的声音，他以自己的表情和高深莫测的双眼表明，在那里他是主人，是主宰。

唐阿帕里修服从了。农田助理把铁铲传给了区长，他弯下腰，铲了一大铲松土扔进坟坑，再直起身把工具传给了总管。

在公墓门口，一群妇女唱起了送葬歌。唐阿帕里修在区长面前低下头走了。

他骑上马驹，几乎是奔下了山。一到那石子路上，他就勒紧缰绳，让马碎步行进，就象从兰伯拉归来时那样。经过家门口时，他扬长而去，到了阿德莱达的寓所前面才翻身下马。敲了几下门，出来了一位印地安人女仆。

“去叫小姐！叫她独自来。”

她开了门，穿着一身黄色的衣服。太阳还能照到她的短发，金色的光线是从背后照射过来的。

“你怎么了，阿帕里修，你象是要死了似的。”少女对他说，并抓住了他的双手。

“我从来没下过这样的决心。”他回答说，“我要到奥科班巴去旅行了。要翻过3座大山。我是专门来向您告别的。就在这里分手吧。”

他躬下身，吻了她的裙边，然后便翻身上马，狂奔而去。

“真是个野人！山里的野人！”她叫了起来。

“唉，小姐，漂亮的姑娘啊，小斑鸠呀！”

兰伯拉的印地安少女哭起来了。她目睹了那告别的场面和唐阿帕里修冰冷的表情。难道是死神装成兰伯拉的先生的模样来登门拜访吗？可除了他，还有谁要死呢？是那狂奔而去有权有势的阔少，还是这美貌温柔的金发女郎？

“姑娘！啊依！小宝贝儿！”她呻吟着，跪在了地上。

阿德莱达的母亲出来了。母女俩把她搀了进去。

唐阿帕里修决定等到晚上到伊尔玛家里去，将她一顿鞭打，然后把她送到兰伯拉去。

“天一亮，我就早早地和她结婚。要叫她受一辈子苦。让她连广场上毕索娜衣树的象红地毯一样的花朵都别想再看见。费利克斯也许想安慰她。他会拜倒在她的脚下，也许还希望能把头枕在那奥科班巴臭女人的裙子上。他以为我会叫他搬到平房那里去！可我要是铁了心，就没有钥匙能够打开它。我要是死了心，就象已经把它葬入了坟墓一样。从现在起，我已经把她的蓝眼睛从我的记忆里抹掉了，一条短裙！黄色的短裙！照耀着她头发的太阳，把她照得象是小麦仙女一样的太阳！咱们把她杀掉了，“猎鹰”。这将是最后一次想到她。我的麦田已经在高高的兰伯拉随风起伏！就象一面旗帜那样飘舞，太阳从那里落山。麦田还在闪光！因为在兰桉树那里将是夜晚了。”

黑马驹在面前等着他。唐阿帕里修坐在门墩上。

他听见脚步响。是二管家来了：

“东家，那红隼怎么办？我想它是饿了。它在支架上来回转圈。”管家对他说。

“没有肉了吗？”

“没有了，东家。”

“等着，小子。”

他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刀子。打开刀片，在石柱上磨了磨。他走到马驹身边。

“你，千里驹，把你的肉给它吃吧。”

他揪住马脖子上的一块肉，左手用力抓住，然后一砍，就割下来了。管家颤抖着。马驹向后退，立刻又站住了。

唐阿帕里修向鞍具房走去。猛禽用渴望的神情望着他。年轻人割了一块瘦肉，喂了它一口。猛禽把肉吞了下去。他一块一块地喂它。最后他手里只剩下一块皮，鲜血染红了他的指头。

“现在，过来吧！”他对红隼说。

他用双手抓住红隼，走到院子里，将猛禽放到自己肩膀上。红隼抓着年轻人的上衣。

“咱俩最好一起走！镇上的生活随它去吧！”他突然快活地说。

马驹的胸部全是血。

“‘猎鹰’和我一样！和我一模一样！”说着，他骑上了马。

管家打开了街门。夜幕在降落。

区长，两位总管，区议会的成员，担任过公职的人们以及一些妇女，陪伴着伊尔玛到了她的家。费利克斯走在后面。

区长，总管和农田助理走进了平房。阿尔卡马莱的村民们挤满了街道。

等伊尔玛自己撩起了披巾，区长望着她。印地安老人的眼睛，并不模糊，而是庄重的，象大梦初醒似的，开始亮了起来。他扶着权杖的宽宽的银柄，更加挺直了身体，用克丘亚语清清楚楚地对她说：

“姑娘。我们已经知道，只有你一个人是死者的‘家属’。你和我们，和你的村社一起痛哭，你也坐在地上守了灵。唐马里亚诺已经成了阿尔卡马莱的儿子。我们已经把阿尔卡马莱的十字架立在了他的坟上。我们要在这个区里给你盖房子，要有栅栏、胡椒树，还要修个庭院。阿尔卡马莱是伟大的。两个月之内，就会建好的。你将为你的村社做针线，做衣服还有……你会痛苦一段时间。”

他吩咐妇女们进来。他和总管们退了出去。

她相信自己会嚎啕大哭，第一次呼唤着母亲，呼唤着弟弟们。她的泪水从脸上流到胸脯，默默地流着。阿尔卡马莱的妇女注视着她，仍然不知道如何接近那位年轻女子。

《地道》（1948）是当代阿根廷著名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的代表作。

萨瓦托1911年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罗哈斯。曾就读并毕业于拉普拉塔大学数学物理系。1937年取得物理博士学位。40年代初他放弃了科学研究，开始致力于文学创作。他的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杂文。《地道》是他的第一部小说。自1948年出版以来，陆续被译成英、德、法、葡、日、瑞典等许多国家的文字，受到欧美读者的欢迎。

《地道》一书没有复杂离奇的情节，从头至尾都是主要人物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在讲述他杀死玛丽亚·伊利瓦内的经过。作者用精炼的文笔，着力刻画了卡斯特尔这个人物的心理活动。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40年代阿根廷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状态。

萨瓦托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旧秩序发生动摇的时代，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大社会事件，在全世界，包括阿根廷的知识分子中造成了一场精神危机。他们开始对资本主义旧秩序产生了怀疑，用各种方式

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探索新的出路。但是又感到前途渺茫，看不见希望。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对社会进行消极的反抗。萨瓦托笔下的卡斯特尔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厌恶周围的人和事，对所处的社会环境持抵触态度，由于找不到知音而烦恼，苦闷。他画布上的小窗口代表着他追求的东西。然而，他追求的究竟是什么？那小窗口意味着什么？他却说不清楚。最后承认那也许意味着“失望”。这正反映了当时阿根廷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那种看不到前途，孤独失望的心情。

在《地道》一书中，作者的意图并不是向读者讲述一个杀人的故事。在这里故事情节是次要的，主要是分析画家卡斯特尔的心理活动，或者说“心理变态”，并通过这种细致的心理描写来揭露社会的丑恶以及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伤害。作者对玛丽亚这个人物着墨不多，她只起到陪衬的作用，用来深入地挖掘主人公卡斯特尔的心理活动。

表面看来，卡斯特尔是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人，似乎因此才导致了他犯杀人罪。然而，仅仅把卡斯特尔的行为看成是生理上的病态表现未免过于简单。作者的真正用意在于说明卡斯特尔这种“变态心理”的形成是当时的社会所造成的，是社会的产物；因而真正的凶手是这罪恶的社会。作者以这种方式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出了悲愤的控诉。

当然，《地道》在读者心中产生的效果决不是愉快的和令人振奋的。相反，给人以阴郁和悲哀的感觉。这应当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分析。萨瓦托创作这部小说的时代，文化艺术在阿根廷受到了严格的控制，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压抑感。这一点对小说格调的形成不无影响。作者正是为了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才选择了卡斯特尔这个有着“变态心理”的人物加以描写。

此外，这部作品在艺术风格上也颇具特色，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见长。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就曾称赞说：“我十分钦佩《地道》一书中的出色的心理分析。”萨瓦托在文学创作上的努力使他成为当代拉丁美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因为《地道》一书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阿根廷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状况；艺术上且有许多可取之处，所以，把这部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也许并非毫无意义。惭愧的是笔者限于水平，不能精当地传达原著之神韵，还望前辈师长及读者同志们批评指教。

可能一说我是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就是那个杀死玛

丽亚·伊里瓦内的画家，也许就够了。我猜想，那个案件大家一定还记忆犹新，因此对鄙人的情况也就无需多做说明了。

恐怕连魔鬼也不晓得世人会记忆些什么和为什么要记忆。实际上我一向认为，并不存在着什么集体的记忆力，这大概是人们的一种辩护方式吧！“今不如昔”这句老话并不意味着过去发生的坏事少。而是说坏事已被人们所忘却（这是值得庆幸的）。当然，这种话并没有普遍意义。比如说我吧，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善于记住坏事，因此，若不是我感到今昔同样可怕，我可能会说：“昔不如今。”许许多多不幸的事，许许多多无耻而又冷酷的嘴脸，许许多多卑劣的暴行都留在我的记忆里。因而，对我来讲，记忆宛如一束令人望而生畏的灯光，照亮了一个污秽不堪的耻辱博物馆。我常常在画室一个幽暗的角落里读完报纸上警务栏里的消息，就会垂头丧气地发呆。这种情形发生了多少次呀！然而，事实上在那一栏里登出的并非总是人类最丑恶的东西。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讲，罪犯还是些比较清白无辜的人。并非因为自己杀过人我才这样讲，而的确是我的一种始终不渝的信念。某人是坏蛋吗？那么除掉他就万事皆休了。我把这称之为行善。诸位请想一想，如果此人继续为非作歹，人们不除掉他，反而试图用写匿名信，谩骂及其它这一类卑劣的手段来对付他，这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啊！至于说到我本人的情况，可以坦白地说，我现在很后悔：当初没有充分利用有人身自由时的机会去消灭六七个我认识的这类家伙。

人世可畏，这是一条无需证明的真理。不管怎样，仅举一例便可说明这一点：在一个集中营里，有一位钢琴家抱怨常常

挨饿。于是人家就强迫他吞食一只老鼠，一只活生生的老鼠。不过，我现在要谈的不是这件事，如果有机会，以后我再详细叙述关于吃老鼠的事。

二

我已说过，我叫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人们可能要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写自己的犯罪经过（我不知是否说过我要讲述自己的罪行），特别是为何要出版它。我很了解人们的心理，我想人们一定会认为我这样做是出于爱好虚荣之故。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这都无关紧要。我刚才说过了，我不在乎别人的议论和评判，让他们认为我将这段经历公诸于世是出于虚荣吧。但是，归根结底，我和别人一样，也是个血肉之躯的人。我觉得人们要求我具备特殊的品质，而且只要求我一个人，是极不公平的。有时，一个人会自认为是超人，但最终他会发现自己也是个碌碌之辈，下流无耻而又背信弃义。关于虚荣心我不加评论，我认为没有人不具备这一推动人类进步的巨大动力。哪些处处摆出爱因斯坦等一类名人的谦虚架势的先生们，实在可笑。我的回答是：谦虚易在成名时；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人貌似谦恭。即便当你认为虚荣决不存在的时候，也会突然发现它的最微妙的形式：出于虚荣的谦虚。此类人我们碰到过不知有多少！甚至基督这样的人，不管他是真人还是象征，也说过出自虚荣心的话，或至少说过傲慢的话。莱昂·布卢瓦

曾反驳指责他傲慢的人说他一生都在为许多远不如他的庸人效劳。那么，对他这番话又该作何解释呢？虚荣存在于所有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存在于仁慈，自我牺牲精神和慷慨大度之中。小时候，每逢想到母亲终有一天会死去，我心中就很难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明白，死亡不仅可以忍受，甚至可以给人以激励），当时我不相信母亲会有不足之处。现在她已不在人世了，应该说她是再善良不过的人了。但是，我记得在她晚年的时候，我怎样开始痛苦地发现她那美好的行为后面也隐藏着些微虚荣或自负，那时我已长大成人。另一更为有力的证明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当时母亲做了癌切除手术，为了及时赶到她那儿，我整整两天两夜未合眼，日夜兼程。当我站在她床边时，她那垂死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慈祥的笑容，并且嘟哝了几句怜悯我的话（她竟对我的疲劳表示怜悯）。于是，由于自己迅速地赶到这里，我心中不免隐隐生出一种虚荣的自豪感。我供认这一秘密无非是要诸位看到，在很大程度上，我并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强。

尽管如此，我讲述这段经历却并非出于虚荣。或许我可以承认含有某种自负或傲慢的成分。但是，又何必非要寻求所有生活现象的答案呢？当我开始写这段经历时，就决计不做任何解释。我仅仅想讲出自己的犯罪经过，如此而已。谁若不喜欢，谁就别看。但是，我不相信他们不愿看。因为恰恰是那些一贯爱寻根问底的人好奇心最盛，我想他们谁也不会放过读一本完整的犯罪故事的机会。

我原本可以对写这份自供状的动机避而不谈，但是我无意

让别人说我性情乖戾。因此，我要说出真情，无论如何，真情是十分简单的。我认为会有许多人读此书，因为我现在名声在外。虽然我对大至全人类，小至本书的读者都不存太多的幻想，但是仍对得遇一位知音抱一线希望。即使一个知音也好。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此书会有那么多人读到，怎么仅仅抱一线希望呢？”我认为这类问题毫无意义。尽管如此，仍需预见到这类问题的出现，因为人们常常会提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而只需稍加分析，便会发现这种提问毫无必要。我可以在一万俄国人参加的大会上讲话，直至声嘶力竭：大概不会有人理解我。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曾经有过一个能够理解我的人。而她恰恰正是我杀死的那个人。

三

众所周知，我杀死了玛丽亚·伊里瓦内·翁特尔。然而，我是怎么认识她的，我们之间的确切关系如何以及我怎样产生了杀死她的念头等等却无人知晓。我将尽可能如实地讲述一切。因为，我虽由于她的过错而吃了许多苦头，但却并不执意把自己打扮成完人。

我在“1946年之春沙龙”^①展出一幅画，题为“母爱”。

^① “1946年之春沙龙”，是阿根廷每年9月21日举办一次的全国美术、雕塑展览会。

它与我过去的许多画风格相同。正如评论家们用令人讨厌的行话所说的一样，这幅画结构严谨，布局合理。一句话，此画拥有那些夸夸其谈者一向可以在我的画布上找到的特征，甚至还有“某种深刻的思想内容”。在画幅左上角，通过一个小窗口可以看到一个不大的远景：一片幽静的海滩和一个眺望大海的女人。那女人似乎在盼望什么，也许是等待着远方一声微弱的呼唤。我认为这场景展现了一种绝对的孤独，而且包含着某种不安。

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场景。人们把它当作次要点，大概当成了一处点缀，目光从上面一扫而过。除一人之外，看来再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场景就是本画的精华之所在。一位陌生姑娘停在我的画幅前良久。看来她对前景上那位看着孩子玩耍的伟大女性并未注意，相反，却目不转睛地看那小窗口的场景。我可以肯定，她盯着画面的时候已完全置身于尘世之外了。她没有看见从我的画幅前走过去或停下来的人，也没听见他们说些什么。

我一直焦灼不安地望着她。后来她消失在人丛中，与此同时我却踌躇着，一方面感到无可遏制的胆怯，另一方面又迫不及待地想叫住她。我怕的是什么呢？也许这种胆怯与在一场赌博中不惜倾家荡产而孤注一掷时的担心相类似。然而，在她走了之后，一想到她已消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千千万万不知名的居民之中，我再也见不到她了，便感到懊恼、晦气。

当晚，我焦躁不安地回到家中，心情沮丧，闷闷不乐。

以后，我每天都去展厅，直到展览闭幕。我呆在画幅附

近，从那里可清晰地辨认每一个停在我的画前的人。但是她却再也没有来。

一连几个月我一直思念着她，一直想能有机会再见到她。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画完全是为她而作。仿佛小窗口的场景开始膨胀起来，侵入整个画面，占据了整个作品。

四

一天下午，我终于在街上看见了她在对面人行道上匆匆走着，象那种必须在预定时间到达预定地点的人。

我立即认出是她；即使在杂乱的人群中我也能认出她来。我激动得无法形容。几个月来我一直思念她，想过许多，现在看到她却又不知所措了。

说实话，我曾反复思考和筹划过一旦遇上她时如何行事。我大概说过，我胆子很小。所以对于能否碰到她，碰上她之后又如何行事，我全都翻来覆去地想过。在那些假设的相遇中，一个不可避免的最大障碍就是搭话的方式。我认识许多男人，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同一名素不相识的女人搭上话。坦率地说，我一度很嫉妒他们。我并非好色之徒，然而，也许恰恰因为我不是这种人，才为错过几次同女人交往的机会而惋惜。只在这仅有的几次机会中，我才摈弃了女人与我的生活无缘的想法。不幸的是，我同任何女人都没有缘份是早已命中注定了。

在设想那些会见时，我分析过各种可能性。我了解自己的

性格，知道一旦出现突如其来，出人意料的情况，我会由于手足无措和胆怯而晕头转向。因而，我事先准备了几种合乎逻辑的，或至少是可行的应酬办法。（一个人寄匿名信侮辱他的至友是不合逻辑的，但是众所周知，这是可能发生的。）

看来，姑娘是经常出入绘画馆的。如能在展厅里遇上她，我就靠近她身旁，不用费什么周折便可就展出的某幅画同她攀谈起来。

经过一番琢磨，我撇开了这种可能性。以前我从不去绘画馆。一个画家这样做大概会令人非常奇怪。但是，实际上却讲得通，而且我相信，如果我决定这样做了，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我不无道理。那么，当我说“所有的人”时，也许有点夸张。不是也许，肯定是我言过其实了。经验告诉我，在我看来清楚。明白的事物，我周围的人却几乎从来都不这样看。我现在很烦躁，每每在对我的行为做出辩解之前，我都踌躇犹豫一番。结果往往是把话憋在心里，缄口不言。这正是我直到今天才决定讲述我的犯罪经过的原因。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是否有必要详细讲述关于画展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不提及此事，只怕人们会认为我的行为是纯粹的癡狂症，尽管事实上我有极其充分的理由这样做。

做这件事的理由的确很充分。首先，我要说，我憎恶所有的一切组织、宗派、社团、行会；总的说来，我憎恶这些由于职业，爱好或是相仿的怪癖而聚在一起的丑类。这些人有许多可笑的特征：都是一路货色，讲行话，有虚荣心，自以为高人一等。

看来，问题在变得复杂起来。但是，我找不出简化它的办法。另外，不打算继续阅读本书的人也就不必勉为其难了。我可以直言奉告：诸位完全可以悉听尊便。

我说的“一路货色”是什么意思呢？诸位大概注意到，当您碰见一个歪嘴巴的人或总是眨巴一只眼的人时，会感到多么丧气。但是你们想到过所有这样的人集中在一个俱乐部里会是怎样的吗？当然没必要把事情想得这么极端，只要观察一下所有人口众多的家庭就足够了。在这种家庭成员之间总有某种共同的特征，相仿的表情，或是近似的声调。我曾爱过一个女人（当然是暗地里爱上的），当将要认识她的姊妹们时，我吓得躲开了。在这以前，有一次我遇到过一件可怕的事：我在一个女人身上发现了非常惹人喜爱的特征。但是认识她的一个姐姐后，我曾一度很泄气并感到羞愧：原先使我羡慕的那女人身上的特点在她姐姐身上却被夸大而走了形，有点丑了。除去这种感觉之外，前一个女人的形象在她姐姐身上被丑化还使我产生了一种羞愧感。好象我对那位姐姐丑化我倾心爱慕过的女人也负有某种责任似的。

也许由于我是画家才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发现平常人是不关心家族当中的这种丑化现象的。应该加上一句，这有点象某些画家，他们专事模仿一位绘画大师，比如那些可怜巴巴的模仿毕加索的画家们。

此外还有行话，这是我无法忍受的另一件事情。只要看看下述例子就足够了：心理学，法西斯主义，新闻事业。我全都不喜欢，我讨厌这一切。

就用“心理分析”作例子吧。普拉托大夫才华过人，我一向把他当作知心朋友。当所有的人都开始折磨我时，他也同这些人站在一起，以至伤透了我的心。不过，还是不提这个吧。有一天，我刚来到他的诊所，普拉托便对我说他要出去一趟，并邀请我同去。

“去哪？”我问道。

“去参加协会举办的酒会。”他答道。

“什么协会？”我不无讥讽地问道。因为我对所有这类专有名词前面加定冠词的习惯很反感：比如心理分析协会，共产党，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等等。这些词前面都要加定冠词。

他不解地看了我一眼，而我却故作天真地看着他。

“就是心理分析协会嘛。”他用那双敏锐的眼睛看着我回答说。弗洛伊德式心理分析家认为他们的职业要求他们具备这样的眼睛。此刻他似乎在考虑：这家伙又出什么怪点子呢？

我想起刚刚看到关于一位名叫贝尔纳特或贝尔特兰德的大夫主持什么协会的消息。虽然我明明知道不是这个协会，但却故意问他是否这个协会。他带着一丝轻蔑的微笑看了看我。

“那都是些吹牛大王，”他说，“唯一得到国际上承认的心理分析协会是我们的协会。”

他转回自己的办公室，在一个抽屉里翻了一下，最后把一封用英文写的信拿给我看。出于礼貌，我看了一眼。

“我不懂英文。”我解释说。

“这是芝加哥来的信。信中承认我们为阿根廷唯一的心理分析协会。”

我脸上显出钦佩和尊敬的样子。

随后，我们走出来，驱车赶到协会，那儿聚集了很多入。有些人我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比如：格登贝尔克大夫。他近来名声大振。因为他试图治愈一名妇女，曾让人把他同那妇女一起送进了疯人院。他刚出来不久，我仔细观察了他一下，却并不觉得他比其他人更坏，甚至觉得他更安静，也许这是曾被关在疯人院里的结果。他夸奖我作的画，这一来反倒使我明白了他讨厌那些画。

一切都那么典雅，因而，我开始对自己这身旧衣服和膝盖上的补丁感到脸红了。不过，我感到难堪并非完全出于这个原因，而是由于某种说不上来的原因。当一位苗条的姑娘一边递给我几客三明治，一边同一位先主谈论着什么性欲狂的问题时，我的难堪之感达到了极点。大概是因为这些衣冠楚楚的太太先生们在这样洁净、舒适而又时髦的家具中间讲着性欲狂一类的字眼而让人感到不伦不类吧。

我想躲进角落里去，然而却无处躲藏。大厅里挤满了人，并且全都不停地谈论着同样的题目。于是我只好逃到街上去了。当我同普通人呆在一起时（一个卖报人，一个孩子，一名司机），我突然觉得在一间大厅里聚有那么一大堆人真是莫名其妙。

但是，在所有各种协会当中，我最讨厌画家协会。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最了解它。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对他所了如指掌的东西最有理由感到厌恶。但是，我讨厌画家协会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讨厌那些评论家。这是我一直无法理解的一个灾

难。假如我是一个著名的外科大夫，而某个从未摸过手术刀的先生，既不是大夫又毫不懂医术，却对我手术中的缺点评头品足，您将怎么想？

美术界也同样。奇怪的是人们却没发现这一点。尽管他们对那些大言不惭的医学评论家嗤之以鼻，却过分敬重美术界的摇唇鼓舌之徒。如若某个评论家能画上几笔，哪怕是些蹩脚货，那么听听他的意见倒也无妨。然而，即便如此也是荒唐的，因为，让一个蹩脚画家去说教一个杰出的画家，怎么能通于情理呢？

五

我一直举棋不定。这是我的坏毛病又在作祟。因为我总想给自己的每个行动找到正当的理由。有什么鬼理由来解释我不去参观画展的原因呢？我觉得每个人，只要愿意，都有权利去或不去看画展，没必要长篇大论地摆理由。否则，这坏毛病能引出什么好结果呢？但是，尽管我还能就画展的事说上许多，比如，同行们的流言蜚语啦，公众的愚昧无知啦，负责筹办展览和布置展厅的人的愚蠢啦等等。但说到底，这些都已成为事实。好在（或者说“幸亏”）我对这一切都已不感兴趣了；否则，我也许会写一篇长长的评论文章，命题为《画家应谨防美术界同仁之方式说》。

应该丢开在画展上碰到她的可能性。

相反，有这样一种可能：她的某个朋友同时也是我的朋友。在这种情况下，只须简单介绍一下就行了。我被这不光彩的怯弱想法迷住了心窍，兴奋地埋头思考着。一个简单的介绍！一切都变得轻而易举了，太好了！我头脑发热，不可能马上看出这个想法的荒谬之处。当时我没有考虑到找一个她的朋友与找到她本人一样困难。因为，显而易见，连她是谁都不知道，要找到她的朋友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假如我知道她是谁，还有什么必要找一个第三者呢？当然，别人介绍也有一定的好处，我并不小看这一点。但是，很显然，关键问题是找到她本人，然后再千方百计找一个共同的朋友给我们做介绍。

相反的一条路子是：看看在我的朋友中间有谁恰巧是她的朋友。这样就可以不必事先找到她了，只要向我认识的人打听一下，有个姑娘身高多少多少，头发如何如何就行了。可是，我又觉得这种做法有些轻浮，便又放弃了。只要一想到向马培利或拉狄盖这样的人打听此类事情我就感到羞耻。

我最后决定，不管这办法多么荒唐，还是不放弃它。我认为这样选择是对的，原因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当然，可能有人 would 认为设想我的熟人同时又是她的朋友这件事本身就荒唐，因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想法太浮浅，一个惯于思考的人决不会这么想的。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的阶层，这些阶层各由情趣相投的人组成。在各阶层人中间，偶然的相遇并不罕见。我就曾在柏林的一条街上碰到过一个人，后来在意大利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小去处又遇到了他。最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书店里再次遇见他。将这几次相逢都归结为巧

合能讲得通吗？但是，我说的是很平常的事：任何一个爱好音乐的人，喜欢世界语的人，笃信巫术的人都清楚这一点。

然而，我必须考虑到最可怕的结果：在街头相遇。有些男人不知怎么一搞就能拦住一个女人，同她攀扯起来，甚至从而引出一段风流韵事。我彻底放弃了主动搭话的打算。我对这种街头交往一窍不通，加上我相貌平平，导致我做出最后的消极决定。

我只有等待一种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她来主动搭话。因此，我将自己的幸福押在了一场希望渺茫的赌博上了。在这种赌博中必须先赢一次才能取得再赌的权利，而只有赢了第二次才能获奖。事实上我必须先找到她，然后才谈得到她跟我搭话。我有一种沮丧、失望和头脑发胀的感觉。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继续思考着应取的态度。

于是，我幻想着她先同我打招呼。比如她向我问路或打听某公共汽车站。根据这个话头，我一连几个月牵肠挂肚，愁眉不展，焦灼不安，全力以赴，并且满怀希望地编了一连串不同的回答方式。有时我能言善辩，滔滔不绝（实际上我从来不是这样的人）；有时又十分拘谨；还有时我想象自己十分和蔼可亲。最不正常的是有时我竟粗鲁地回答她的问话，甚至满腹怒气；（在我想象的相遇中）有时由于我无缘无故地发火，粗野地骂她，责怪她问我些没有意义或未加思索的问题，结果一场相会闹得不欢而散。我往往因此而痛苦万分，一连几天责备自己的愚蠢，责备自己失去了同她建立关系的一次可贵的机会。幸亏我最终意识到了这一切都不过是想象中的事，至少仍存在

着真正建立关系的可能性。于是我重新以更大的热情做着准备，想象着新的更有效的街头交谈方式。一般说来，最大的困难莫过于把她的问话同抽象的艺术，或退一步讲，同我画中的小窗口给她留下的印象联系起来。因为这些东西太抽象，而且与日常生活相去甚远。当然，如果时间充裕，在不慌不忙的情况下，这样的联系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并非完全不合逻辑。在社交场合，时间绰绰有余。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场合极适宜在一些毫不相干的事物间建立联系。但是很明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熙来攘往的街道上，在乘坐集体计程车的人中间，在人流的裹挟中，这样的谈话几乎不可能实现。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我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就不能放弃这种努力。于是我又重新构思着直率而又卓有成效的交谈方式，这种交谈从“邮电总局在哪儿”这句问话开始，直到讨论起有关表现派或超现实主义绘画的问题为止。当然，一切都并非轻而易举。

在一个失眠的夜晚，我得出一个结论：做这种谈话的准备既没多大用处，又太伤脑筋。还不如孤注一掷，大胆提问，开门见山。比如，上来就问她：“您为什么只盯着那小窗口？”在夜晚失眠的时候，一个人往往比在白天更容易下决心。第二天，当我冷静地分析了一下之后，我的结论是我没有足够的勇气脱口问出这样的问题。同往常一样，怯懦使我跌进另一个极端：我开始构思一种间接的提问方式。比如：“您对艺术感兴趣吗？”这样提问几乎需要经过很长的交往过程才能触及到我所关心的问题（即小窗口）。

我已记不得我思考过的所有交谈方式了。只记得有些办法太复杂，根本不实用。不知锁头什么样，就想用一把事先准备好的钥匙打开它，这样的巧合大概太渺茫了。但是，当我反复推敲这些迥然不同的方式时，常常把问话同答话搞混了，弄得颠三倒四，就象一个人在脑子里回想走过的棋局一样。我还常常把一种交谈方式里说的话变成了应该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说的话，结果是可笑又可悲。比如，叫住她，告诉她一个地址，立刻却又问她：“您对艺术很感兴趣吗？”这简直莫明奇妙。

每当出现这种情形，我索性连续几天停止胡思乱想。

六

一看到她在对面人行道上走着，各种交谈方式一股脑涌进我的脑海里来。惶惶之中，我感到事前准备好的，又经过长时间演习过的话一套套地涌上心头：“您对艺术感兴趣吗？”

“为什么您只盯着那小窗口？”等等。其中有句粗俗的话，即：

“您喜欢卡斯特尔吗？”我原本不想用它了，而这话却不断出现在我脑子里，当时这使我十分羞愧，感到异常尴尬。

各种各样的句子混在一起，乱哄哄地在脑子里转来转去。最后我终于意识到，这种焦虑毫无用处；我想起了应该是她主动上来搭话。这么一想我又愚蠢地平静下来了。“现在就看她如何行事了。”

虽然找到这样一个理由，但是此刻我仍紧张而激动，只顾

跟着对面人行道上的她往前走，忘记了如果象我想的那样，她来向我问路，还必须穿过马路走到我跟前来。很显然，再也没有比设想她从街对面喊叫着向我问路更荒唐的事了。

怎么办呢？这情形得持续多久呢？我感到十分晦气。我们走过了几条街区。她仍然一径往前走。

我心情很沉重，但又必须坚持到底。决不能在等待了几个月之后又错过这个机会。随着急匆匆的脚步，我的思想也犹豫不定，这使我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我的思想如同一只没头苍蝇被关在一辆疾驰着的汽车中。

拐过圣马丁大街街口，她又往前走了几步便进了“T”公司大楼。我意识到必须立即做出抉择了，便随后跟了进去，尽管此时我觉得自己在干一件不合时宜的怪事。

她在等电梯。只她一个人。奇特的胆量促使我脱口问出一句极其笨拙的话：

“这是‘T’公司大楼吗？”

一块长长的招牌就装在大楼正面的墙上，证明这里正是“T”公司大楼。

尽管如此，她仍回转身子，认真地回答我是这里。（后来，一想起我问的话和她回答我时那平静、真诚的态度，我就会认为，不管怎么说，许多情况下一个人会看不到巨大的招牌；所以我的问话也就不象我最初想象的那么愚蠢了。）

但是，当她看见我时，脸立刻就红了，红得那么厉害，我明白了她这是认出了我。这却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事，不过，非常合乎逻辑，因为我的相片曾多次出现在报纸和杂志

上。由于过分激动，我只问了她一句不该问的话。我唐突地说：

“您为什么脸红了？”

她的脸更红了。正待回答我什么，我此时却完全失去了自制，又冒冒失失地说道：

“您脸红是因为您认出我来了。您以为这是偶然的巧遇吗？这不是巧合，从来不存在什么巧合。几个月来我一直想念您。今天在街上碰到了，我就一直跟着您。我有重要的事问您，是关于那小窗口的事，您明白吗？”

她惊讶了。

“小窗口，”她喃喃地说，“什么小窗口？”

我觉得双腿一阵发软。难道她不记得那小窗口了？那么她从来就没有留心注意过小窗口，当时看它不过是出于一般的好奇？我感到很狼狈，懊丧地想，几个月来我思索过和做过的一切（包括眼前的情景）真是荒唐可笑到了极点。这一切纯粹都是我的幻想。我太自信了，仿佛根据一块破碎的脊柱骨就能复制出一条恐龙似的。

姑娘几乎要哭了。我觉得世界倾倒了，我找不出任何有效或可靠的补救办法，只找到一句我现在羞于写出来的话：

“看来我弄错了。午安。”

我匆匆走出大楼，差不多小跑着朝一个方向走去。刚走出一个街区便听到身后有人叫我：

“先生，先生！”

是她，她一直跟着我没敢吱声。她此刻站在那儿，对眼前

发生的一切茫然不知所措。她低声对我说：

“请原谅，先生……请原谅我的愚蠢……刚才我吓坏了……”

几分钟之前，整个世界似乎都乱作一团，现在我觉得又恢复了原状，一切都井然有序。我默默地听着她讲。

“我刚才没意识到您问的是画布上的小窗口。”她的声音有点发抖。

不知何时我已抓住了她的一只手臂。

“这么说您想起来了？”

她沉吟了片刻，两眼看着地面。然后缓缓说道：

“我一直记着那小窗口。”

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她似乎对自己讲的话后悔了，只见她蓦地回转身，一下跑开了。我愣了片刻，也跟着她跑去。跑着跑着，我意识到这场面不太雅观。于是我朝四下看了看，随后改用正常的步子，继续快速往前走去。我这样做有两个原因：其一，一个为人熟知的男人在街上追赶一个姑娘实在不成体统；其二，这样追她也没有什么必要。这是最根本的一点：我将能够在任何时候，在办公楼的进口或出口处见到她。有何必要象疯了似的乱跑呢？最重要，最最重要的是她仍记得画面上的小窗口。她一直记着那小窗口。我很高兴，一切都令人振奋，只是对自己刚才在电梯旁失去理智的行为感到内疚。现在，明明知道任何时候都可以在这楼里见到她，我却又一次象疯子一样跟在她后边跑。

七

“她在这座楼里办公？”我突然大声问自己，几乎喊起来。我感到双腿又开始发软了。谁跟我说过她在这座楼里办公？难道只有在此工作的人才能进入这里的办公室吗？想到又要一连几个月或者永远地失掉她，我一阵晕眩。顾不上考虑许多了，我急急忙忙向前跑去。转眼又来到“T”公司大楼门前，到处都不见她的踪影。大概她早已乘上了电梯？我想问问电梯服务员，但是，怎么问呢？很可能已经上去许多妇女了。这样我就必须详细讲她的特征。而电梯服务员将怎么想呢？我在人行道上踱了半晌，心里犹豫着。后来，我穿过人行道，察看了一下大楼正面，我也不知是为什么。也许是希望看到那姑娘从某个窗口探出头来？然而，希望她探出头来同我打招呼，做手势什么的真太荒唐了。我只看见一幅巨大的招牌，上面写着：

“T”公司

一眼看上去，这招牌占去了大楼正面二十多米长的空间。这个估计更增添了我的烦恼。但我现在没有时间考虑这些了，也许以后平静下来这件事还会纠缠我。眼下我只好进去了。我大步走进楼里，等待电梯降下来。但是，在等电梯的时候，我发觉自己的决心开始动摇了。与此同时，惯常的胆怯心理激烈地膨胀起来。因此，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我已经做出了最后

决定：什么话也不说。不过，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乘电梯呢？但是，旁边的人都看到我等电梯了，如果不走进去，会令人感到突然。这种行为怎么解释呢？除了乘坐电梯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了。当然，我要保持沉默，这一点完全可以做到，而且合情合理。正常情况下，谁也无须在电梯里讲话，除非某人是电梯服务员的朋友，这种情况下他们一般会谈谈天气或生病的小孩。但是，由于我没有什么熟人，而实际上到那时为止我从来未见到过这类熟人。我只要保持沉默就决不会惹出半点麻烦。有人在场对我的行动更有利，因为我做的事无人会察觉。

我神态自若地走进电梯。事情完全象我预见到的那样发生了：有人同电梯服务员谈论起闷热的天气，这种谈话对我十分有利，因为这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判断。当我说“8层”的时候稍稍有些紧张，但只有了解我现在打算干什么的人才会察觉这一点。

到达8层楼以后，我看到另一个人和我一同走出电梯。事情有点复杂了。我放慢脚步等待那人走进一个办公室，与此同时，我仍旧沿走廊往前走。到这时我才安心地喘了口气，在走廊上转了几圈，走到一端的窗口前，从那儿眺望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景色。然后又转回身去乘电梯。片刻之后我站在了大楼门口，没遇到任何我原先所担心的不愉快的场面（电梯服务员的怪问题等）。我点燃一支烟。未等完全点着，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这种平静毫无道理：的确没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但是，也的确什么都没有得到啊。或者坦率地说，再也找不到那位姑娘了。除非她就在这里的办公室中工作，因为，如果她只是来办

点事，那么可能已经上楼去过又下来了而没有碰到我。转而一想：“当然，如果她是来办事的，也有可能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事情还没办完。”这么一想我便又打起了精神，决定在楼门前等一等。

我等了足足一个小时不见有什么结果。我分析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例如：

事情拖得很长；这样就必须继续等待。

在发生这一切之后，她也许太激动了，在办事之前先去散散步；这种情况下也需要等待。

她在这里工作；这种情况下就要等到她下班。

于是我得出结论：“只要我等到下班时间，3种可能性都不会错过。”

我觉得这个判断无法推翻，心里平静了许多，便决定平心静气地在街角的咖啡馆里等着，从那边的人行道上可以监视走出大楼的人。我要了份啤酒，看了看表：3点一刻。随着时间的飞逝，我越来越相信最后一种推测了：她在这里工作。6点钟时我站了起来，因为我觉得最好在楼门口等，很可能许多人一齐拥出来，而在咖啡馆里可能看不到她。

6点钟刚过，工作人员开始走出来。

6点半钟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走光了。我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走出来的人越来越少了。到6点三刻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出来了。偶尔走出来个别高级职员；除非她也是高级职员（我认为：这不太可能）或是某高级职员的女秘书（这有可能，我抱着一线希望想）。

到7点钟时希望彻底破灭了。

八

我一边垂头丧气地往回走，一边企图清理一下思绪。我的脑子里象开了锅的水似的。每当我激动的时候，脑袋里就象演着一台令人眼花缭乱的芭蕾舞。尽管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我才逐步学会了严格地控制和支配自己的思想。否则，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发疯的。

我说过，我在极端颓丧的情况下往家里走去，但我并未因此而放弃整理自己的思绪，因为我觉得有必要清醒地思考一下，如果我不打算永远失去唯一理解我的画的那个人。

或者她去办公室办什么事情，或者她就在那里工作，二者必居其一。当然，后一种设想最为有利。按照第二种情况，她与我分手之后大概感到心绪纷乱，便决定回家去了。那么，这需要我第二天再到大楼门前去等。

接着，我又分析了另一种可能性：即她去办公室办事。也许碰到我以后，她心绪乱了，便回到家中，决定把事情放到明天去办。这种情况也需要在门口等待。

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比较有利的。另一种情况最可怕：当我到达公司大楼后，在上下电梯的过程中她已把事办完了。也就是说，我们错过了见面的机会。这段过程时间很短，不大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是也有其可能性：比如，她完全可能只是去

递送一封信件。如果是这样，那么明天再去等待也没有用了。

尽管如此，仍存在着两种有利的可能性；我思想上拼命抓住这两种可能性不放。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家里。一方面，每当想起她说的那句话（“我一直记着那小窗口。”）心就猛烈地跳动，觉得眼前展现出一幅暗淡的，然而却是广阔和雄伟的前景。我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以前一直蕴藏在我身上，此刻正爆发出来；另一方面，我又担心重新找到她会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必须找到她。我反复地大声说着：“必须找到她！必须找到她！”

九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站在“T”公司办公大楼门前了。职员们都进去了，但她却没有出现：很显然，她不在这里工作，虽然仍有一线可能是她病了，这两天不能来上班。

即便如此，她仍旧有可能前来办点事，因而我决定在街角的咖啡馆里等上一个上午。

眼看着没有什么希望了（大概是11点半左右），正在这时，我看到她从地铁出口走了出来。我的心狂跳起来，腾地站起身朝她跑去。她一看到我便陡然停住了脚步，仿佛突然之间变成了一尊石像。她显然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真奇怪，我内心猛烈的悸颤却赋予我一股特殊的力量。我觉得浑身是胆，满身是劲，什么都敢干。于是，我近乎粗暴地抓住她的一

只手臂，一句话也没说，拖着她沿圣马丁大街朝广场上走去。她似乎不知所措了，沉默着。

直到走出两个街区她才问我：

“您带我去哪儿？”

“去圣马丁广场。我有许多话要对您讲。”我一边说一边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仍旧拖着她的胳膊。

她嘟哝了几句关于“T”公司的什么话，但我却依旧拖着她走，她讲了些什么我根本就没听见。

我又说：

“我有很多很多事要对您讲。”

她并不反抗，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条奔流的大河挟着一根树枝。

我们来到广场上，我找了个僻静去处路边的靠椅。

“您为什么逃走？”我开口就问她道。

她抬眼看了看我，那表情我见到过，昨天她对她说“一直记着那小窗口”时就带着这种表情。这是一种奇特的眼神，专注而又锐利，似乎在哪儿见到过；这目光使我想起了什么，一双近似这样的眼睛，但却记不起在何处见到过。

“不知道。”她终于说道，“我现在仍想逃走。”

我紧紧抓着她的手臂。

“请您答应我不再逃走了。我需要您，我非常需要您。”我对她说。她重新审视了我一番，但是没有说话。然后她把目光移向远处一棵树上。

从侧面看，我觉得她很陌生。她的脸很漂亮，但有点冷

峻。一头栗色的长发。从外表上看，她最多才26岁，但是却有一种与其年龄不相仿的气质，一种饱经世故的人特有的气质。这不是因为她头上有白头发等一类的特征，而是一种无法确定的，大概是精神方面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她那种眼神。但是，谁又能够说人的眼神是一种身体特征呢？也许是因为她那抿嘴的方式。然而，虽然嘴和双唇都是身体的一部分，可闭嘴的方式和呈现的线条却也是精神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我当时无法确定，现在仍然无法确定到底是什么东西使我觉得她饱经世故。我想也可能是她讲话的口气。

“我非常需要您。”我又说了一遍。

她没有回答，仍旧看着那棵树。

“您为什么不说话？”我问。

她仍盯着那棵树回答说：

“我不是没有个性的人。您是大艺术家，我看不出您为什么需要我。”

我粗鲁地对她喊道。

“我对您说过了我需要您！懂吗？”

她还是瞅着那棵树，低声道：

“为什么？”

我一时语塞了。我放开她的手臂，陷入了沉思。是啊，为什么需要她呢？到此时为止，我问的问题一直不清楚，也许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我拾起一根树枝在地上胡乱画着。

“不知道。”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含含糊糊地说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紧张地思索着，一边用树枝在地上画着，越画越乱。

“我的脑袋里象一座漆黑的迷宫，偶尔会闪过几道电光照亮一些通道。我总也搞不清自己干某些事的目的是什么。不，我是想说……”

这会儿我觉得自己真蠢。可我从来不是这种人。我在心中极力安慰自己：难道我不清醒吗？正相反，我的脑子一直象一台计算机一样运转着。就拿眼前的事为例，我不是一连几个月推理，猜测，反复推敲各种可能性吗？再说，不正是由于我善于逻辑推理，才终于找到了玛丽亚吗？我感到真理就在眼前，近在咫尺。我生怕失掉它，便鼓足勇气喊道：

“不是我不清醒！相反，我总是思路清晰。但是，您想一想，就如同一位船长每时每刻都在准确地判定所处的方位，沿着十分精确的航线驶向目的地，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里，您懂了吗？”

她困惑不解地看了我片刻，然后重新转过身去看着那棵树。

“我预感到您对我今后的事业是不可缺少的，虽然我还没发现其中的道理。”

我又用树枝乱画着，一边仍在搜肠刮肚地思索。过了一会儿，我又说道：

“我突然想起来了，是与那小窗口的场景有关；您是唯一注意那场景的人。”

“我可不是文艺批评家。”她喃喃道。

我火了，叫起来：

“别跟我提那些笨蛋！”

她吃惊地回转身来。我于是放低声调向她解释为什么我不信任文艺批评家。总之，我向她举了外科手术一类的例子。她听着，眼睛一直不看我。当我讲完后，她说：

“您在抱怨，可批评家们却总是赞扬您的。”

“这更糟糕！您不明白吗？这是使我感到痛苦的事，并使我感到自己走上了邪路。就拿这次沙龙中发生的事为例，在这些夸夸其谈者流中没有一个人注意到那场景的重要意义。只有一个人看出来，这个人就是您。而您并不是评论家。不，实际上还有一个人注意到这场景了，但他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指责这一场景，对此深怀疑惧，甚至厌恶它。与此相反，您……”

她一直注视着前方，缓缓地说道：

“我不是也可能会有同样的观点吗？”

“什么观点？”

“同这个人一样的观点。”

我焦急地看了看她；然而，侧面看上去，她的面部毫无表情。紧闭着双唇。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您和我想的一样。”

“您是怎么想的呢？”

“不知道，我无法回答您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说您的感觉和我一样。我和您一样地看待那画上的场面。我不知道您想些什么，也不知道我自己在想什么，但我知道您和我想的一样。”

“这么说您作画不加思索吗？”

“以往作画我思索得很多，因为每创作一幅画就如同造一幢房屋。对这幅画就不同了；我当时觉得应当这么画，却又不知为什么。现在我仍不清楚。实际上，这小场景与画面其余部分毫无关系，我甚至认为是某个傻瓜让我添上去的。我在盲目探索，我需要您的帮助，因为我知道您和我想的一样。”

“我不十分清楚您在想什么。”

我开始不耐烦了。粗暴地回答她道：

“我不是对您说了吗？我不知自己想什么。如果我能说清楚我感觉到的东西，那也就是说我思想很明确，不是吗？”

“不错，是这样。”

我停了片刻，思索着，力图理出点头绪。随后又说道：

“您可能会说我这幅画的整个前景很平淡。”

“什么前景？”

“就是小窗口前面的画面。”

她重新盯住我看了看，然后说：

“不，并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那画面并不平淡。”

那幅画到底怎么样呢？直到那时为止，我还未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我察觉到了，我把那小窗口的场面画得多么具有梦幻色彩。

“不，那画面并不十分平淡。”我象自言自语似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这一切与整个人类相关联，您懂吗？我记得在画这幅画的前几天读到一本书。书中说在一个集中营里有人要求给点吃的东西。于是他们便强迫他吞食一只活老鼠。有时，我觉得世间一切都毫无意义。在一个从几百万年以来就毫

无目的地运行着的小小星球上，我们这些人在痛苦中降生，成长，奋斗，患病，受苦，也使别人痛苦；我们喊叫，死亡，别人也在死去；而另外一些人又在降生，然后，他们又开始一幕无聊的喜剧。”

果真如此吗？我开始反复思索这个问题。我们的全部生活就是在冷冰冰的星球上，在大沙漠中的一连串陌生的呼喊吗？

她仍旧沉默不语。

“这个海滩上的场面使我害怕。”过了半晌我又说，“尽管我知道它有更为深刻的含义。不，我是想说，它从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我’……是的。它没有清楚的含义，还没有，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我’。”

只听她说道：

“也许，那意味着失望？”

我急切地望着她：

“对，”我说道，“我觉得是意味着失望。您看，您不是和我的感觉相同吗？”

过了一会儿她又问道：

“您觉得这种失望情调值得赞许吗？”

我惊讶地看着她。

“不，”我回答说，“我不这样认为。您是怎样想的呢？”

她没有回答。过了很久，她终于转过脸来，目光落在我身上。

“赞许这个字眼不该用在这里。”她说道，似乎是在回答自己的问题，“重要的是真实。”

“您认为这场景是真实的吗？”我问。

她有些冷峻地说道：

“当然是真实的。”

我急切地看着她那冷峻的面容，冷峻的目光。“为什么如此冷峻？”，我暗自思忖，“为什么呢？”也许她感觉到了我渴望友谊的焦急心情，因为，有那么一刻，她的眼光变柔和了，似乎给我提供了一座交往的桥梁；但是，我却感到那是架在深渊上的一座一纵即逝，极不稳固的桥。她改变了语气说道：

“我不知道您见到我会有什么好处。我会给所有接近我的人带来不幸。”

+

我们决定尽快见面。我当时不好意思对她讲我想第二天就见到她，或者说我希望就在那儿守着她，希望她再也不要离开我。虽然我的记忆力出奇的好，但是眼下在我的记忆中却意外地出现了不可解释的空白点。我现在已记不起当时对她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她说她该走了。

当天晚上我给她打了电话。是一个女人接的。当我告诉她我想和玛丽亚·伊利瓦内小姐讲话时，对方似乎犹豫了一下，但随后说她去看看小姐在不在。片刻之后，我听到了玛丽亚的声音。她的语气象是在打官腔，我心中不由咯噔一下。

“玛丽亚，我要见您。”我对她说道，“自从我们分手以

后我一直想念您，每秒钟都在想。”

我颤抖着停住了。她没有答话。

“您为什么不说话？”我益发紧张地问道。

“请等一下。”她回答说。

我听到她放下听筒。顷刻之后，重新听到她的声音。这次是她真正的声音，现在她似乎也在颤抖。

“我刚才不能讲话。”她解释说。

“为什么？”

“这儿出来进去尽是人。”

“现在怎么可以讲了？”

“因为我把门关上了。我一关上门，他们就知道不应打扰我了。”

“我要见您，玛丽亚。”我莽撞地又说了一遍。“从中午到现在我一直想您。”

她没有回答。

“您为什么不说话？”

“卡斯特尔……”她不知所措地说。

“别叫我卡斯特尔！”我生气地叫道。

“胡安·巴勃罗……”于是她又怯声说道。

听到这几个字，我感到一股幸福的热流通遍全身。

但是，玛丽亚又停住了。

“怎么啦？”我问，“为什么不说话了？”

“我也同样。”她喃喃地说道。

“什么我也同样？”我急切地问道。

“我同样也一直在想。”

“但是，您在想什么呀？”我仍一个劲地追问。

“什么都想。”

“怎么什么都想？想什么？”

“我在想这一切都很奇怪……想您那幅画……想昨天的相遇……今天的相遇……还有别的……”

这种模棱两可的话真让人恼火。

“嗯，不过，我已对您讲了，我一直不停地想您。”我说道，“您却不对我说您也想我。”

停顿了片刻。然后她说：

“我说了我什么都想。”

“您说的不具体。”

“因为一切都十分意外，都那么奇特……而且我现在又思绪纷乱……当然，我也想到您……”

我的心狂跳起来。我需要知道细节；细节能使我激动，而笼统的话语是不会打动我的。

“但您是怎样想的，怎样想的？……”我更加急切地问道，

“我想到了您的每一个特征：您看那棵树时的神态，您那栗色的头发，走路的姿势，冷峻的眼光怎样突然变得柔和起来……”

“我必须挂掉电话了。”她突然打断我的话道，“有人来了。”

失望之中，我刚刚来得及对她说：“明天一早我给您去电话。”

“好吧。”她匆匆地回答。

十一

我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尽管我有好几次打算画点什么，但却什么也画不出来。我便走出去散步，不觉来到柯连特大街。^①我感到很奇怪：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抱有好感。我好象说过，我打算如实地讲述这个故事，而现在就是一个证明。我正在向大家供认自己的致命弱点：我过去总是用冷淡，甚至厌恶的眼光看人，特别是看聚在一起的人群。我一向不能忍受夏季的海滩，但个别孤独的男人，孤独的女人却使我倍感亲切。我也曾羡慕别人（我并非嫉妒心强的人），也曾对别人有过好感。我一向对孩子们怀有怜悯和温柔之情（特别是当我尽量忘却他们最终也会成为同那些人一样的人时）；不过，总的说来，我一贯对人类感到厌恶。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有时看到一张面孔我会一整天吃不下饭，或一个星期画不了画。从一张脸上，一种走路的姿势中，一道目光里，可以看到贪婪、嫉妒、狂妄、粗野以及人类所具有的全部特质，真令人难从置信。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后，一个人没胃口，不想作画，甚至不想活下去，也都成为很自然的事了。尽管如此，我想声明，我并不对自己这种性格感到骄傲。我明白这是一种自命清高的表现。

① 柯连特大街：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大街。是电影院、旅馆、咖啡馆和商店集中的繁华街道，夜生活非常活跃，被认为是随处可以听到探戈舞曲的街道。

我也知道，我心中何尝不是多次被贪婪、狂妄、贪欲和粗野所占据呢？但是，我说过，我准备完全公正地讲述这个故事，我一定做到这一点。

这天晚上，我对人类的蔑视似乎消失了，或者，至少是暂时消失了。我走进马尔索托咖啡馆。我想诸位都知道人们去那里是为着听探戈。不过，是象信奉上帝的人聆听教堂音乐一样去欣赏探戈。

十二

第二天上午10点钟左右我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还是前一次那个女人。当我问起玛丽亚·伊利瓦内小姐时，她对我说“今天一早她去乡下了”。我的心凉了。

“去乡下了？”我问。

“是的，先生。您是卡斯特尔先生吗？”

“是的，我是卡斯特尔。”

“她给您留下一封信，在这里。不过，对不起，我没有您的地址。”

我原来满心希望在当天见到她，一直期待着这次至关重要的相会，而这个消息却使我变成泄了气的皮球。我脑子里涌出一连串的问题：她为什么决定去乡下呢？很显然，这个决定是在我们俩的电话交谈结束之后做出的。否则她大概会对我提起出门的事，而且她也就不大可能同意我第二天上午再给她去电话

了。那么，如果这个决定是在打电话之后做出的，也许就是电话交谈引出的结果了？如果是这样，又为什么呢？她打算再次摆脱我吗？她对那天的相遇感到害怕了吗？

她这次突然下乡引起了我最初的怀疑。象往常一样，我开始在以前未加注意过的一些小事上寻到了可疑迹象。为什么前一天在电话里她会变换语调？那“出来进去的”都是些什么人？是他们妨碍她随便说话吗？此外，这说明她很会装假。当我问起伊利瓦内小姐时，那接电话的女人为什么要犹豫一下？然而，最使我感到别扭的还是那句话：“我一关上门他们就知道不该打扰我了。”我想，在玛丽亚周围一定有许多阴影。

我在去她家的路上第一次产生了这些想法。她没打听过我的地址，这真是件怪事。相反我却知道她的住址和电话。她住在波萨达大街，靠近赛维尔大街拐角处。

我来到6层楼上，按了按门铃。此时，我心里怦怦直跳。

开门的是个佣人，看样子大概是个波兰人。我报了姓名后，他领我走进一个摆满书籍的客厅里。客厅四周靠墙摆满了书架，一直抵到天花板上，甚至连两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上都堆满了书籍。许多又大又厚的书卷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站起来浏览着这图书室。突然，我感到有人在背后默默地观察我。我车转身，见客厅另一端有个男人，高高的个子，身材瘦削，一头漂亮的头发。他微笑着，但那笑容看去却飘忽不定。虽然他大睁着双眼，我仍旧看出来他是个瞎子。于是我明白了那些书为什么特别厚大。

“您就是卡斯特尔吗？”他很亲切地对我说，同时伸出手来。

“是的，伊利瓦内先生。”我回答，同时心慌意乱地伸出手去，心里却想着玛丽亚和他在这个家里是何亲缘关系。

他一边示意我坐下，一边略带讥讽地微笑了一下说：

“我不姓伊利瓦内，请不必称我先生。我叫阿连德，是玛丽亚的丈夫。”

也许他早就惯于揣测和理解各种沉默的含义了，立即又补充说：

“玛丽亚总是用她独身时的姓。”

我象石雕泥塑的一般呆坐在那里。

“玛丽亚多次对我谈到您的画。由于我刚失明不几年，所以还能很好地想象一切事物。”

他仿佛在请求原谅他的失明。我不知该说什么好。我多么渴望独自跑到大街上好好想想这一切啊！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

“这是那封信。”他很随便地说，似乎一切都不足为奇。

我接过信，正要收起来，这时，那盲人好象看见了我的动作，说道：

“您这就看看吧。虽然玛丽亚的信一般不会有什么急事。”

我的身子在颤抖。我打开信封，这时，他递给我一支烟，然后自己也点燃一支。我抽出信纸，上面只有一句话：

我也想念您。

玛丽亚

当瞎子听到我叠信纸的声音时问道：

“我想没什么急事吧！”

我费了很大劲才回答他说：

“没有，没什么急事。”

看见那瞎子大睁着双眼，微笑地看着我，我有一种魔鬼附身的感觉。

“玛丽亚就是这样。”他说，似乎在想什么。“许多人把她的一时冲动错当成什么紧急的事。实际上，玛丽亚办一些无关大局的事往往很急。我怎么跟您说呢？”

他茫然地注视着地面，似乎在搜寻一种更清楚的解释。有顷他说：

“就好象一个置身大沙漠中的人突然迅速地变换了地方。您懂吗？速度在此无关紧要，因为他仍在同一个环境中。”

他吸了口烟，又想了一会儿，仿佛我根本不存在一样。然后他说：

“尽管我这样说不知是否准确，我不擅长比喻。”

我找不到机会逃出那倒霉的客厅。但是，瞎子似乎很从容不迫。“这是一幕多么令人作呕的喜剧啊？”我心想。

“比如说今天，”阿连德接着说，“她一早起来就对我说她要去庄园。”

“去庄园？”我不由自主地问道。

“对，去我们的庄园。也就是说，去我祖父的庄园。不过，现在那庄园归我表弟翁特尔了。我想您大概认识他。”

这个新发现使我惴惴不安且又大失所望。玛丽亚从翁特尔那个无耻，好色的笨蛋那儿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我尽量安慰自己，心里想着她不是为翁特尔才去庄园，而仅仅因为她喜欢乡

村的幽静，因为庄园是全家人的。但是，我仍然很懊丧。

“我听别人说起过他。”我说道，心中颇不是滋味。

未等瞎子开口我又匆匆补充说：

“我得走了。”

“真是，太遗憾了。”阿连德说道，“我希望咱们还能见面。”

“是的，是的，当然喽。”我说。

他送我到门口。我握了握他的手，跑了出去。在电梯里我气恼地想：“这是一幕多么令人作呕的喜剧啊！”

十三

我需要清醒一下头脑，冷静地想一想。我沿着波萨达大街朝莱科勒塔区走去。

我的思想成了一团乱麻。各种各样的念头：爱情、仇恨、怀疑、烦恼以及回忆都交织在一起。

比如，让我去她家取一封信，而且由她丈夫亲手交给我，这是什么用意呢？她怎么没事先告诉我她是有夫之妇呢？她和那个不要脸的翁特尔在庄园里搞什么鬼名堂？她为什么不等我的电话？而这个瞎子又是个什么东西呢？我说过我对人类抱有反感。现在我还应承认，我对瞎子也毫无好感。在他们面前我觉得就象站在冰凉、滑腻、一声不响的蛇面前，如果再加上当着那瞎子的面读一封他老婆写的信，信上是“我也很想念您”，

人们就不难体会我当时的厌恶感了。

我企图将混乱的想法和感情理出点头绪，象平时一样拿出办法来。必须从头开始思考，而这个头（至少是最近的那个头），显然是那次电话交谈。其中有几点不清楚的地方。假如在她家中，正如通过她丈夫传递信件所证明的那样，玛丽亚与男人们交往是很正常的事，那么为什么在关上房门之前她要用一种平平淡淡，近乎打官腔的语气讲话呢？还有，那“我一关上门，他们就知道不该打扰我了”的解释又意味着什么呢？看起来她似乎经常关起门来打电话。然而，不大可能是关起门来同女朋友们做平平常常的电话交谈，可以想象，大概是类似于我们之间的这种谈话。那么她周围一定还有另外一些象我这样的人。有多少呢？他们是谁呢？

我首先想到了翁特尔，但立刻又排除了他。既然玛丽亚随时都可以在庄园见到他，有什么必要打电话呢？既然如此，那另外一些人是谁呢？

我想，打电话一事是否就分析到这里为止。不行，不能结束，还有她回答我的提问那件事呢。我痛苦地发现，当我问她是否想念我时，她兜了半天圈子才回答说：“我不是对您说了，我什么都想吗？”这种用问话作为回答的方法说明不了问题。总之，她在第二天（或当天晚上）认为有必要写一封信做出明确的回答，而恰恰证明她原来回答的不清楚。

“现在分析这封信吧？”我心里想。我从衣袋里掏出信又看了一遍。

“我也想念您。

玛丽亚”

字迹显得有些激动，或者至少是一个心情激动的人写的字。这就与前边的分析不相符了，因为，假如我开头分析的对，而这里却流露出了一种激情，因此，也是对我有利的迹象。不管怎样，玛丽亚的签名使我激动不已。纯朴的“玛丽亚”三个字。这种纯朴使我产生一种模糊的念头，我隐隐约约感到这姑娘已闯进了我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说，她已属于我了。

唉！我的幸福感总是那么短暂……比如，我眼前这种感觉就丝毫经不起推敲：她丈夫不是也叫她玛丽亚吗？翁特尔一定也这么称呼她，否则他怎么叫她呢？还有她关着门同他们讲话的那些人呢？我想谁也不会同一个恭恭敬敬地称呼着“伊利瓦内小姐”的人关起门来讲话。

“伊利瓦内小姐！”现在我明白了第一次打电话时那女仆犹豫的原因了。真可笑！仔细一想，这又是一个证据，说明这种称呼并不新鲜了。很显然，第一次有人问起“伊利瓦内小姐”时，那女仆惊异之余一定少不了加以纠正，强调一下她是夫人。但是，次数多了以后，自然而然地那女仆便认为最好不要一一纠正，耸一耸肩膀也就罢了。她的确犹豫过，但这很正常。所以她没有纠正我的话。

再回到这封信上来，我认为应该做种种推测。我从最奇怪的那件事入手：即传递信件的方式。我想起了女仆对我说的话：

“对不起，我没有您的地址。”不错，玛丽亚既没要过我的地址，我自己也没想到过要主动告诉她。但是，我若处在她的地位，第一件事就是到电话簿上去找。这不可能仅仅是由于她一时

懒惰。那么只有一个结论：玛·丽·亚·想·让·我·去·她·家·，·面·见·她·丈·夫·。然而，这是为什么呢？问题至此出现了极为复杂的局面。难道利用丈夫做中间人会使玛·丽·亚·感·到·一·种·乐·趣·？难道她丈夫会感到是乐趣？还是他们俩都能从中得到乐趣？除去这两种病态的可能性，唯一合乎情理的理由是玛·丽·亚·想·让·我·知·道·她·是·有·夫·之·妇·，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宜继续发展。我相信许多阅读此书的人也会赞同这后一种推测，并且会认为只有象我这种人才相信别的可能性。以前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曾多次嘲笑我的怪癖，因为我对事物的选择往往与众不同。我总是想，为什么现实必然是简单的呢？经验告诉我，恰恰相反，现实从来都是复杂的。有些看起来一目了然的东西，表面上十分简单的事情，往往内里却包藏着极其复杂的因素。一个最平常的例子是人们对乞丐的施舍。一般来说，肯施舍的人被看作是慷慨之人，比不肯施舍的人要好。而我对这种简单化的理论却颇不以为然。尽人皆知，给一个比索，送一块面包解决不了乞丐的问题（一个真正的乞丐的问题）；仅仅从心理角度解决了那位爱施舍的先生的问题，因为他几乎没破费什么便买到了精神安慰和慷慨的好名声。请您评判一下，这种人多么吝啬啊！他们每天只花一个比索就能保证自己精神上的安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摒弃这种虚伪（又常见）的行为，人们则需要多么高尚的情操和巨大的勇气才能承受人类的贫穷啊！

我们还是回到那封信上来吧。

只有思想浅薄的人才会赞同上面的最后一种猜测，因为只要稍作分析，这种猜测就站不住脚了。“玛·丽·亚·想·让·我·知·道·她

是有夫之妇，不宜发展我们的关系。”太妙了。但是，既然如此，她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繁琐而又残忍的办法呢？难道她不能当面奉告或打电话告诉我吗？即便没有勇气对我说，难道不能给我写封信吗？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既然如此，她为什么不在信中说她是有夫之妇？为什么不要求我冷静地对待我们的关系呢？不，先生们。恰恰相反，那是一封旨在巩固我们之间关系的信，它促进并把这种关系引向更加危险的道路。

看起来还是前两种推测可信。大概玛丽亚利用阿连德当中间人会觉得有乐趣？或是阿连德本人寻求这样的机会？还是命运把这两个气质相同的人捏在一起加以嘲弄？

我突然又对自己如此钻牛角尖后悔了。都怪我一贯对发生的事和说过的话分析起来没完没了。我想起了玛丽亚一边听我说话，一边盯着广场上那棵树时的目光；想起了她那羞怯的样子和第一次见面时逃走的情景。一种不可遏制的柔情沁入我的心田。我觉得她简直是一个处在充满丑恶和贫困的残酷世界中的脆弱的小女孩。自从沙龙相遇之后，反复涌上我心头的一种感觉又出现了：她与我性情相仿。

我暂时忘记了那些恼人的猜测和粗暴的结论。一心回想着她的脸庞，目光（这目光使我朦朦胧胧想起了什么。）以及那深沉、忧郁的处事方法。我感到在独身生活期间积蓄起来的满腔爱情全部倾注到玛丽亚身上了。我怎么能再胡思乱想呢？

于是我极力要忘却所有那些关于电话、信、别墅和翁特尔的愚蠢的推论。然而，却做不到。

十四

后来几天我是在焦躁中度过的。匆忙之中我没有问玛丽亚何时从乡间庄园归来。那一天我从她家回来后又打电话探问过，女佣对我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于是我向她要了乡间庄园的地址。

就在同一天晚上，我急不可耐地写了一封信，打听玛丽亚的归期，并要求她在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时给我来个电话或写封信。为了少冒风险，我一径来到邮政总局将信挂了号。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说过，我在焦躁中度过了几天。从波萨达大街探访归来后，那些折磨人的模糊想法又千百次地回到我脑海里来。我做了这样一个梦：黑夜里，我见到一所孤寂的旧房子。是一所我从童年时代就无限渴望过的，似曾相识的房子。因此，我一走进去就有一些记忆引导着我。但我却不时地迷失在黑暗中，时而觉得有隐藏的敌人可能从后面突然袭击我，时而感到有人交头接耳议论并嘲笑我，笑我幼稚。他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然而，不管怎样，站在这所房子里，我感到青少年时期那遥远的爱情在我身上又复苏了，仍旧令人兴奋得发抖，有一种近乎疯狂、害怕而又心旷神怡的感觉。当我醒来时才明白，那所梦中的房子代表着玛丽亚。

十五

在收到她的信之前的那些日子里，我的思想如同一个在大雾中迷路的探险家，东走西撞，竭尽全力才得以辨清那飘忽不定的人与物的形体和难以预料的危险与深渊的轮廓。那封信的到来如同破雾的阳光。

但是，这太阳却是黑色的，黑夜的太阳。我不知是否能这样说。可是，尽管我不是作家，尽管我不敢保证其准确性，但我仍不想收回“黑夜的”一词。在构成我们的不完善的语言的全部词汇中，这个词用在玛丽亚身上也许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这是她写给我的信：

我度过了奇怪的3天，大海、沙滩、道路不断地勾起我对往事的追忆。不仅有形象，也有往日的话语，叫喊声和漫长的沉默。真奇怪，但是生活就在于勾画未来的回忆。现在，面对大海，我明白自己正在编织着精巧的回忆，总有一天，这些回忆将给我带来悲伤和失望。

大海仍在那里翻腾激荡。我以往的涕泪都于事无补；我立在孤寂的海滩上，凝视着大海等待，亦是无谓的等待。你已理解并描绘出了我的回忆吗？或是你描绘出了，许多和你我相同的人的回忆？

但是，现在你的身影出现了，你站在大海和我之间。我的

眼睛看着你的眼睛。你伫立不动，面带忧伤，目光似在向我求援。

玛丽亚

这封信引出我多少美好的情感，使我对她了解得多么透彻啊！她用“你”字称呼我，这使我马上确信玛丽亚属于我了，她只属于我一个人：“你站在大海和我之间”；这里没有第三者，只有我们俩，正同我初次在画展上见到她时产生的感觉一样。说实在的，既然我们从千百年前就一直相识，她怎么能不以“你”“我”相称呢？当她停在我的画前盯着那小场景，竟至对周围的人群毫无觉察时，我们互相似乎就在以“你”相称了。而且我立即就知道她是谁了，知道了她的性格如何，我多么地需要她，而她也同样需要我。

唉！尽管如此，我却杀死了她！杀死她的人竟然就是我！我，曾经象透过一堵玻璃墙壁那样看着她热切而沉默的面庞，可望而不可即！我太蠢，太瞎，太自私，太残酷了！

莫再感慨万端了。我说过我将客观地讲述这个故事，我一定做到这一点。

十六

我热烈地爱上了玛丽亚。但是，在我俩之间还未用过“爱”这个字眼。我急切地等待着她从别墅归来，好对她说出这个“爱”字。

但是，她没有回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快要发疯了。我给她写了第二封信。信中仅写着：“我爱你，玛丽亚，我爱你，我爱你！”

两天后我终于收到了一封回信，上面仅写着：“我怕给你带来不幸。”我立即回信说：“你给我带来什么后果我都不在乎。假如不能爱你，我就活不下去了。看不到你，我每时每刻都在遭受折磨。”

我在煎熬中度过了几天，玛丽亚仍旧没有回音。绝望之余我给她写道：“你在践踏这份爱情。”

第二天，我在电话中听到了她那遥远而颤抖的声音。我除了反复念叨“玛丽亚”之外再也不知说什么好了，也根本说不出来了。我的喉咙哽咽，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她对我说：

“我明天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到达后我会马上给你去电话。”

第二天下午，她从家中打来了电话。

“我想立刻见到你。”我说。

“好吧，我们今天就见面。”她回答。

“我在圣马丁广场等你。”我对她道。

玛丽亚似乎顿了一顿，然后答道：

“最好在莱克勒塔街。我8点钟到。”

我不知怎样才挨到那个时刻的。为了消磨时间，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转了多久啊！我心中多么甜蜜啊！周围的一切，夏日的黄昏，街头玩耍的孩童都多么的可爱啊！现在想想，爱情是多么能迷惑人而且具有多么神奇的改变世界的能力啊！一个

美妙的世界！真让人笑掉大牙！

8点过几分时，我看到玛丽亚在黑暗中走来，正寻找我。天色已晚，看不清她的面孔，但我认出了她走路的样子。

我们坐了下来。我挽住她一条手臂，痴呆呆一次又一次地唤着她的名字；除此之外，我想不起别的什么话了。她则一直沉默着。

“你为什么去庄园？”我终于唐突地问道，“你为什么撇下我一个人？为什么把这封信留在你家里？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有夫之妇？”

她没有回答。我夹了一下她的手臂。她呻吟了一声。

“你要把我弄伤了，胡安·巴勃罗。”她轻声说道。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为什么不回答？”

她仍旧缄口不言。

“为什么？为什么？”

她终于开口了。

“为什么事事都要回答呢？还是不要谈我吧。咱们谈谈你，谈谈你的工作和你关心的事。我一直想着你那幅画，想着你在圣马丁广场上对我说过的话。我想知道你目前在做什么，想什么，是否创作了新画。”

我再次气冲冲地夹紧她的手臂。

“不，”我回答她说，“我想谈的不是我，我想谈我们俩，我需要知道你是否爱我。就谈这件事。我要知道你是否爱我。”

她不吭声。黑夜使我无法通过她的眼睛猜出她的思想。我

对这种黑暗和静默有点沉不住气了，便划着一根火柴。她飞快地转过头去，把脸藏了起来。我用另一只手扳过她的脸，迫使她看着我。她在悄悄地流泪。

“噢……那么你不爱我。”我痛苦地说道。

但是，就在火柴熄灭的一刹那，我看到她那么温柔地注视着我。随后，在黑暗中，我感到她的手在抚摸我的头。她柔声对我说道：

“我当然爱你……有些事为什么非要说出来呢？”

“是的，”我回答她道，“不过，你怎样爱我呢？爱有很多的方式。人们可以爱一条狗，爱一个孩子，而我想说的是‘爱情，真正的爱情’，你懂吗？”

我突然有一种预感，有如我迅速划着一根火柴。恰象我感觉到的那样，玛丽亚在微笑。我是说，她已经不笑了，但十分之一秒之前，她在笑。我时常会觉得有人在跟踪我，然而，当我突然转过身来，却什么人也没有。尽管如此，我仍觉得周围的寂静是刚刚出现的，有某种东西刚刚消失，似乎空气还在轻微地抖动。类似这种情况。

“你刚刚在笑。”我愤怒地说。

“笑？”她吃惊地问。

“是的，你在笑。我可不那么容易受骗。我很留心各种迹象。”

“你刚才发现什么迹象了？”她问

“你脸上流露出来的，笑的痕迹。”

“我能笑什么呢？”她说，口气变得严肃起来。

“笑我的幼稚，笑我问你是否真爱我，或者笑我象个孩子，谁知道笑什么，但你肯定笑了。我毫不怀疑这一点。”

玛丽亚倏地站起身来。

“怎么了？”我吃惊地问。

“我走了。”她冷冷地答道。

我象弹簧一样跳了起来。

“怎么，你要走？”

“是的，我走了。”

“怎么，你要走？为什么？”

她不作声。我几乎是用双臂摇晃着她问：

“你为什么要走？”

“恐怕你根本不会理解我。”

我气极了。

“怎么？我问了你一件在我看来生死攸关的事，你不但用微笑作为回答，而且还发火。别人当然无法理解你。”

“你幻想我在笑。”她冷冷地说。

“我敢肯定。”

“你错了。你这样对待我真叫人伤心。”

我不知自己在想什么。严格地说，我并未看见她微笑，只是在一张严肃的脸上看到一点类似的迹象。

“我也不知道，玛丽亚，请原谅。”我丧气地说道，“但我肯定你刚才笑了。”

我沉默了；心中沮丧极了。过了一会儿，我觉出她的手温柔地抓住了我的胳膊。我立刻听到了她那痛苦而轻柔的声音：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几乎哭出来了。

她按我重新坐下身来，象刚才一样抚弄着我的头。

“我提醒过你，我会给你带来不幸。”沉默了片刻之后她对我说，“你已看到我说的有道理了。”

“这都怪我。”我回答说。

“不，也许是我的过错。”她若有所思地说道，似乎在自言自语。

“多奇怪啊！”我心里想。

“什么奇怪？”玛丽亚问。

我惊诧了，甚至认为（许多天后亦如此）她能看透人的心思。现在仍说不准是否我在不知不觉中把想说的话说了声。

“什么奇怪？”她又问了一遍，因为我只顾惊讶而没有回答她。

“你的年龄多奇怪啊！”

“我的年龄？”

“对，你的年龄。你多大了？”

她笑了。

“你认为我有多大？”

“这正是奇怪的地方。”我答道，“初次见你时，我觉得你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姑娘。”

“现在呢？”

“不，不。从一开始我就搞糊涂了，因为某种非身体的特征使我觉得……”

“使你觉得什么？”

“使我觉得你年龄很大。在你身边我有时会觉得自已是个孩子。”

“你年龄多大？”

“38岁了。”

“实际上你的确很年轻。”

我又大惑不解了。并不是因为她以为我年龄很大，而是因为无论如何，我比她要大许多；因为，无论如何她不可能超过26岁。

“你很年轻。”她又说了一遍，也许她猜到了我惊诧的原因。

“你呢？你年龄多大？”我问。

“这有什么关系呢？”她一本正经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要问我的年龄？”我说，差点又要发火。

“这种谈话太荒唐了。”她回答说，“这都是些傻话。我很奇怪你竟关心这类事情。”

我关心这类事情？我们在谈这类事情，可也是，我怎么想到这些事的呢？我糊里糊涂地连引出这些问题的原因都忘了。不，应该说我没有研究问题的起因。直到几个小时以后回到家中，我才意识到这表面上不值一提的谈话有其深刻的意义。

十七

连续一个多月，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我不愿仔细回想在那

段美好而又可怕的时光里发生的一切。有许多事情回忆起来太让人伤心了。

玛丽亚开始到我的画室来了。与那晚燃火柴时差不多的情景又发生了两三次。有一个想法一直纠缠着我：她的爱顶多是母亲对儿子或姐姐对弟弟的爱。因此，我觉得只有肉体的结合才是真正的爱情。从现在起我要说这是我那许许多多天真的想法之一。大概正是这些天真的想法才使得玛丽亚在背地里笑我。性爱非但不能安慰我，反而更加剧了我的困惑，带来折磨人的疑点，出现了痛苦的隔阂以及残酷的尝试。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俩在画室中度过的那些时光。在那段时间里，面对玛丽亚的矛盾而又怪诞的举动，我的感情一直在最纯洁的爱情和最疯狂的仇恨之间游移。我会突然怀疑起她在作戏。有时我觉得她是个纯洁的少女，忽而又会觉得她是个荡妇，于是一大串问号便在我脑子里旋转起来：在哪儿？怎么？谁？何时？

每当这时，我就不可避免地生出一种想法：玛丽亚正在演一出颇具匠心而又残忍的喜剧。我在她手中如同一个幼稚的孩童，略施小计便能骗得我俯首贴耳。有时一种疯狂的廉耻感会驱使我匆匆穿上衣服，然后冲到街上清醒一下头脑，思索种种疑问和猜想。也有的时候正相反，我表现得主动而带点粗鲁：我扑到她身上，紧紧抓住她的双臂，把她的胳膊扭到身后去，目光盯住她的双眼，企图从她眼中看到真正的爱情。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我想要说的话。我应当承认，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所谓“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意思。真奇怪，虽然在我产生疑问时曾多次使用这个字眼，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

深入地分析其含意。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含有性欲的爱情？也许是急于同玛丽亚拉紧关系时所寻求的那种爱情。我敢说，有几次我们的心相通了，但却那么脆弱，短暂，微不足道。随之而来的是比以前更令人失望的不满足，也就是当我们想重温梦中的情爱时所体验的那种说不出的遗憾。我知道，我们的情感有时候会意外地得到交融。在这种时候，忧悵就能减轻。也许是由于美好的时刻太短暂，忧悵往往总是伴随着我们。只要我们互相看上一眼就能知道我们俩想的一样，或者，确切地说，我们俩的感觉一样。

当然，为这些短暂的时刻，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随后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十分荒唐或愚蠢。我们干的每一件事（谈话，喝咖啡）都使人痛苦，因为它证明了我们之间感情的沟通是转瞬即逝的。更严重的是它们造成了我俩之间新的距离，因为当我想不出办法巩固我们的感情时，我迫使她从肉体上与我结合了。而我们得到的却仅仅是证实了通过具体的行动不可能保持或巩固这种爱情。不过，把事情搞糟的是她，因为，也许她想打消我的顾虑，表面上装作感受到了真正巨大的快乐。于是就出现了我匆匆穿好衣服，逃到街上去的场面，出现了我粗野地抓住她的双臂并试图迫使她说出真实的感情和感觉的情景。这一切是如此粗暴。致使玛丽亚一觉察到我们即将发生性爱时便企图逃避。最后，她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神经过敏者，并力图使我明白，这不仅无助于我们之间的爱情，甚至会损害这种爱情。

她这种态度只能使我更加怀疑她对爱情的诚意。因为，我

弄不清楚她是否在做戏，并怀疑她在提出肉体结合有害无益的论点后能否在将来避免这件事。既然事实上从一开始她就讨厌这样做了，那么，她的快乐就是装出来的。这一来矛盾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她根本无法说服我，反而使我产生了新的更尖锐的怀疑，因此又出现了许多更加复杂的新问题。

最使我生气的是在这个假定的骗局中，我完全象个孩子一样毫无戒备地倾心于她。

“假如我发现你欺骗了我，”我愤愤地对她说，“我就要象杀死一条狗一样杀死你。”

我把她的胳膊拧过去，目光死死盯住她的双眼，目的是想从中看出点迹象，某种可疑的神色，或些微嘲讽的眼神。但是每当这时，玛丽亚就象个孩子一样吃惊地望着我，或是露出悲伤、温顺的神情，同时默默地穿好衣服。

有一天，我们争吵得比往常都凶，最后我骂她是婊子。玛丽亚呆住了。接着，她慢慢地走到模特儿用的屏风后一声不响地穿衣服；当我在仇恨和懊悔之间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跑去请求她原谅时，我看到她泪流满面。我不知所措了：我亲吻她的眼睛，哀求她的原谅，我当她的面哭了，我责骂自己不是人，是个狠心、蛮横、爱报复的家伙。就这样一直到她不再伤心为止。但是她刚刚平静下来，便又幸福地微笑了，我开始觉得她不再悲伤有点异常了。她完全可以平静下来，但在我向她喊出那样的字眼之后，她能够这么快就高兴地忘情，则十分可疑了。我觉得任何一个女人，包括妓女在内，被人这样骂也会感到抬不起头来；然而却没有一个女人能够这么快就重新高兴起来。

除非那样称呼当真有些道理。

这类情形几乎天天出现。有时候结局比较平静，于是我们来到法兰西广场上散步，如同一对年轻的恋人。然而这种甜蜜的时刻却越来越短暂，越来越罕见了，就象阴云密布，狂风大作的天空中偶尔露出的太阳。我内心的怀疑和问题渐渐压倒了一切，就象一根巨大的青藤，一点一点地将公园里的树木缠死了。

十八

我心中的疑问与日俱增，这是她的沉默，她的目光，她那些令人迷惑的话，去庄园旅居，还有她的爱造成的结果。一次我问她为什么让人叫她伊利瓦内小姐，而不是阿连德太太。她笑了，回答我说：

“你真孩子气！这又有多大关系呢？”

“我认为很重要。”我审视着她的眼睛回答。

“这是家里的习惯。”她回答我，不再笑了。

“尽管如此，”我又说，“我第一次往你家打电话时问起‘伊利瓦内小姐’，女仆在回答我之前停顿了一下。”

“那是你的错觉。”

“有可能。但是，她为什么不纠正我呢？”

玛丽亚又笑了，这次笑得更厉害。

“我对你讲过了，”她说，“这是我们的习惯，因此，女仆也很清楚。大家都叫我玛丽亚·伊利瓦内。”

“叫玛丽亚·伊利瓦内这很正常。但我感到奇怪的是当叫你‘小姐’时，那女仆有点惊奇。”

“啊……我没想到是这件事让你奇怪了。那么，她还没完全习惯这种叫法，也许这是女仆犹豫的原因。”

她陷入了沉思，似乎刚刚注意到这个问题。

“尽管如此，她可没有纠正我。”我又说。

“谁？”她问，似乎刚把思路扯回来。

“女仆。她没纠正我对你的称呼。”

“可是，胡安·巴勃罗，这丝毫也不重要，我不知你想说明什么。”

“我想说明这大概不是第一次有人称呼你‘小姐’。第一次时那女仆也许会纠正的。”

玛丽亚失声笑起来。

“你完全是想入非非。”她几乎是开心地说，同时温存地抚摸着我的头。

我仍旧很严肃。

“另外，”我接着说，“你开始接电话时，在关上房门之前，语气冷淡，近乎在打官腔。接下去却用温和的声音讲话了。为什么出现这种变化？”

“胡安·巴勃罗，”她收起笑容回答道，“我怎么能当着女仆的面这样同你说话呢？”

“是的，这可以说得通；但是你说过：‘我一关上门，他们就知道不该打扰我了。’这话不可能是指我说的，因为我第一次和你通话。也不可能是指翁特尔，因为你随时都可以在庄

园见到他。我认为显然是另外有一些人与你通话，或是通过话，是不是？”

玛丽亚用悲伤的眼光看了看我。

“你回答吧，不必用悲伤的眼光看我。”我生气地说道。

“可是，胡安·巴勃罗，你现在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当然，有另外的人通电话，表兄弟的，我家的朋友，我母亲，还有别的人……”

“但是我觉得这一类交谈根本不必躲躲闪闪。”

“谁允许你说我躲躲闪闪的！”她发怒了。

“你别激动。是你自己有一次对我说起一个叫理查德的，他既不是你表兄，也不是家中的朋友，更不是你母亲。”

玛丽亚沮丧极了。

“可怜的理查德。”她深情地说。

“为什么可怜？”

“你很清楚他自杀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怪我。他给我写过一些可怕的信，然而我却无法帮助他。可怜，可怜的理查德。”

“我希望你能让我看看那些信。”

“为什么？他人人都死了！”

“没关系，死与不死我都想看看。”

“信我都烧了。”

“你完全可以一上来就说信都烧掉了。可是相反，你对我说：‘为什么？他人人都死了！’你净耍这一套。另外，即便你真的把信烧了，又为了什么呢？在另一个场合你对我说过，

你保存着所有的情书。大概这个理查德的情书会有损于你的名誉你才烧掉它的。不对吗？”

“我烧掉那些信不是因为怕败坏名声，而是因为那些信太悲观。影响我的情绪。”

“为什么影响你的情绪？”

“不知道……理查德是个意志消沉的人。他很象你。”

“你当时爱他吗？”

“请你……”

“请我什么？”

“不要这样，胡安·巴勃罗。你的每一个想法……”

“我看不出这想法是荒唐的。他爱你，给你写了一些你认为最好烧掉的可怕的信，他自杀了，你认为我的想法荒唐。为什么？”

“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从未爱过他。”

“为什么？”

“不知道，真的。也许因为情趣不同。”

“你说过他象我。”

“上帝啊，我是想说他在某一点上象你，但不是说 he 同你一模一样。他是个毫无创造性的人，却具有破坏性。他是个意志消沉、疑心很重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与你的不足之处相似。”

“很好。但是，我仍然弄不懂有什么必要烧掉信件。”

“我再说一遍，我烧信是因为这些信影响我的情绪。”

“不过，你可以保存起来不去读它。这只能证明在烧掉之前你常读这些信。既然你常读这些信，其中必有缘故，大概他

在某一点上吸引了你。”

“我并没说他没有吸引我的地方。”

“你说过他与你情趣不相投。”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死亡也不是我的情趣，可是却不止一次地吸引过我。理查德吸引我就如同死亡或虚无吸引我一样。但是我认为一个人不应该沉湎于这种情感之中。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喜欢他。所以我烧掉了他的信。他一死，我就决定毁掉所有能勾起对他的回忆的东西。”

她心情很不好，我也再找不出一句关于理查德的话来了。不过，我还要说一句，最使我烦恼的不是这个男人，因为无论如何，我对他已经知道得够多的了。使我烦恼的是那些陌生的人，那些她从未提起过的影子，虽然她不说，我仍旧感觉到了这些隐匿的影子正悄悄地在她周围游动。我认为玛丽亚最恼人之处都与这些隐秘的影子有关。有一句话曾折磨过我，而且至今仍折磨着我，那是有一次我俩枕边交欢时从玛丽亚嘴里冒出来的。

但是，在所有复杂的质问当中，有一个问题无情地揭露出玛丽亚的爱情。

十九

不言而喻，由于她与阿连德结了婚，自然会使人想到她大概曾对此人产生过感情。我应该说这个姑且称作“阿连德问

题”的问题是最关心的。我想解开的谜有好几个，但是，特别重要的只有两个：她曾经爱过阿连德吗？她现在还爱他吗？这两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们与其余的问题相互关联：假如她不爱阿连德，那么她爱谁呢？爱我？爱翁特尔？爱那些电话中的隐秘人物？或者可能她同某些男人一样，用不同的方式爱着不同的人？不过，也可能她谁也不爱，只是不停地对我们这些可怜虫、毛孩子中的每个人都说是她“唯一的情人”，其他人都是些影子，她只不过表面上同他们保持一种平淡的关系罢了。

有一天，我决定将阿连德问题挑明。我开始问她为什么当时同阿连德结婚。

“我当时很爱他。”她回答我。

“那么现在你不爱他了。”

“我并没说我已经不爱他了。”她回道。

“你说的是‘我当时爱他’。你没说‘我爱他’。”

“你总是抓话把儿，曲解别人的意思。”玛丽亚抱怨说。

“我说嫁给他是因为当时爱他，并不意味着我现在不爱他了。”

“啊，那么你还爱他。”我立即叮问一句，似乎想在她前边的回答中找出毛病来。

她不说话。神情很懊丧。

“你为什么 not 回答？”我问。

“我觉得说也没用。这样的谈话在咱们之间有过多次了。”

“不，这次与过去不一样。我刚才问你是否现在仍然爱阿

连德，你回答我说是。我似乎记得有一回在码头上，你对我说过，我是你爱慕的第一个人。”

玛丽亚又沉默了。我很生她的气。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话前后矛盾，还因为要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从她嘴里挤出点情况来。

“你做何回答？”我又问。

“喜欢和爱慕有许多方式。”她有气无力地回答，“要知道我现在已经不可能用前些年我们刚结婚时的同样方式爱他了。”

“什么方式？”

“怎么？什么方式？你当然知道我想说什么。”

“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对你说过许多次了。”

“你说过，可你从来没解释过。”

“解释过了！”她痛苦地叫道，“你说过上千次了，有些事无法解释，现在你却让我解释这么复杂的问题。我对你说过无数次的，阿连德是我的亲密伙伴，我象爱兄长一样爱他，照料他。我十分同情他，十分钦佩他的高尚情操。我觉得他处处都比我强，和他相比我感到自己是个卑俗之人。你怎么能认为我现在不爱他了呢？”

“我没有说你不爱他，是你自己跟我说现在你不象刚结婚时那样了。也许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你结婚时对他的爱就象现在对我的爱一样。此外，几天前在码头上，你对我说过，我是你真心爱恋的第一个人。”

玛丽亚伤心地看了看我。

“好吧，咱们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我继续说道，“不过，再回到阿连德身上来。你说你象爱兄长一样爱他，那么，我只要你回答一个问题：你和他仍睡在一起吗？”

玛丽亚更加悲伤地看了看我。沉默了片刻之后，她用异常痛苦的声音问道：

“连这样的问题也必须回答吗？”

“是的，必须回答。”我的口气很硬。

“我觉得你问得太可怕了。”

“这很简单，你只要说是或不是。”

“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不这样做。”

“很好，”我冷冷地道，“这就是说是这样。”

“好吧，是。”

“那么你这样做是心甘情愿的了。”

我边说边仔细观察她的眼睛。我说这话是别有用心的：这一问妙在能得出一连串的结论。我并不认为她真的心甘情愿（尽管根据玛丽亚的性情也有这种可能性），而是想迫使她讲明白那“对兄长的爱”。正如我预料的那样，玛丽亚迟迟不开口，很可能她在措词。最后她说：

“我说了我和他一起睡，没说我心甘情愿。”

“啊！”我得意地叫起来，“这就是说你这样做并不心甘情愿，可是却让他相信你是心甘情愿的！”

玛丽亚脸色大变，泪珠挂满了双颊，目光暗淡下来。

“我并没这样说。”她有气无力地说道。

“因为这很明显，”我仍然不肯让步，“假如你表现出无动于衷，不甘心情愿的样子，你就无法证明肉体的结合是你做出的一个牺牲，是出于对他的好感，出于对他的高尚情操的钦佩；那么阿连德也就不会再和你睡觉了。换句话说：他仍然同你睡觉说明你不仅能在感情上欺骗他，而且能在身体感觉上骗他。你对身体快感的模仿能够做到天衣无缝。”

玛丽亚默默地流着泪，眼睛盯着地面。

“你的心简直太狠了。”她终于说道。

“我们把讨论的方式先放在一旁，我感兴趣的是问题的实质。实际上，你能够在几年中间欺骗你的丈夫，不仅在感情方面，而且在身体感觉上欺骗他。于是，连小学生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难道你不会同样欺骗我吗？现在你也许明白我为什么要三番五次地考验你的感觉是否真实了吧。我一直记着苔丝狄蒙娜的父亲怎样提醒奥瑟罗^①说，一个欺骗过丈夫的女人，也可以欺骗另一个男人。你在几年当中一直欺骗阿连德，这个事实我永远也忘不掉了。”

停了一下，我想索性一狠到底。尽管我意识到这样做太粗俗，太愚蠢，还是加上一句：

“你在欺骗一个瞎子。”

^① 苔丝狄蒙娜和奥瑟罗：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奥赛罗》中的人物。

二十

话未出口，我已经后悔了：在我准备说这句话并企图从而得到一种罪恶的满足的同时，一个更加纯洁和温和的念头已经准备弥补这恶狠狠的话所造成的后果了。实际上，在这句无用的蠢话出口之前，（说这句话能得到什么结果呢？）玛丽亚已经一声不响地准备离去了。因此这句话刚要出口，那心中的念头已经吃惊地意识到了。尽管如此，它似乎不肯相信这句话会说出来。随着话一出口，纯洁的念头便开始支配我的意识和意志。几乎是及时地作出了决定，以阻止这句话说完。话音刚落（因为这句话到底还是说完了），这念头已完全控制了我，并促使我请求原谅，向玛丽亚陪情，承认自己说了蠢话，心肠太狠。我思想上的这种矛盾状态破坏过我多少事啊！当一种念头让我采取良好的态度时，另一个念头却在谴责这是虚假、伪善、故作慷慨；当一种念头促使我辱骂别人时，另一个念头却同情被骂之人，将我骂人的话一股脑栽到我自己的头上；当一种念头注意到世界的光明面时，另一个却向我揭露其丑恶和荒谬。总之，要想愈合玛丽亚心灵上的创口，无论如何都已经晚了，无可挽回地迟了。玛丽亚默默地站起来，疲惫不堪。她的目光重新变得不可捉摸了。我猛然意识到，这吊桥已经永远不会降下来了。痛悔之中，我再也不怕丢脸了：我吻她的双脚。我得到的仅仅是她用怜悯的眼光看了看我。有一瞬间，那目光

变得柔和了。但那是一种怜悯，仅仅是惻隐之心。

她一边走出画室，一边再次对我说她决不记恨于我。我的意志完全崩溃了。我神情恍惚地立在画室当中，目光痴呆地凝聚在一个点上。过了半晌，我蓦地意识到我应该采取行动。

我冲到街上，玛丽亚早已无影无踪了。我跳上一辆计程车向她家奔去，因为我估计她不会直接回家，所以我要等她回来。我白白等了一个多钟头。我从一间咖啡馆里打了个电话，得到的回答是她不在家。从4点钟起（这是她去我画室的时间），她一直没回家。我又等了几个小时。后来又打了个电话，他们对我说玛丽亚直到晚上也没回家。我焦急万分地四处奔跑去找她，也就是说，我跑遍了我們平时约会和散步的所有地方：莱克勒塔街、森特奈里奥大街、法兰西广场、新码头。哪儿也看不到她的影子。最后我明白了，很有可能她恰恰不去这些地方。因为这会勾起她对以往的回忆，大概她到别处去了。我重又跑到她家，但是太晚了，她大概已经进家了。我又打了个电话。不错，她已回来了，然而对方告诉我说她躺下了，不能接电话。我报了姓名，终于无济于事。

在我们之间，有某种东西破裂了。

二十一

我回到家中，有一种极度落寞惆怅的感觉。

平时，这种与世隔绝之感出现时，总掺和着一种自命清高

的感情：我鄙视所有的人，视他们为肮脏、丑陋、无能、贪婪、粗俗、庸碌之辈。我不怕孤独，甚至引以为荣。

这一次与以往相同，我又孤零零一个人了。这是我的坏毛病和不光彩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平时出现了这种情形我会觉得世界可憎，但也明白我亦是其中之一员。每当这时，我会产生一种疯狂的毁灭欲，听凭自杀的欲望抚摸我的心。我酗酒，嫖妓女，并且对自己的下流行为，对于发现自己并不比周围的肮脏家伙更好而产生某种满足的感觉。

这天晚上，我在巴霍区一家咖啡馆中喝醉了。就在酩酊大醉的时候，我对身边的女人和周围的海员感到万分厌恶，于是起身跑到了街上。我沿着维阿蒙特大街向下一直来到码头上。我坐在那里哭了。脚下的黑水吸引着我。为什么要受这份罪呢？自杀是最便捷的办法，只需一秒钟，这个荒谬的世界就会象一个巨大的幻影倒塌下来。仿佛这世上的摩天大楼，铁甲军舰，坦克和监狱都不过是些易碎的幻影，它们同恶梦中的大楼、军舰、坦克、监狱一样容易破灭。

按照这个理论，生活就象一个长长的恶梦，但是，一个人可以用死来摆脱这场恶梦，这也是一种苏醒。可是，为什么而苏醒呢？对投向永久的虚无的踌躇阻止了我所有自杀的打算。不管怎样，人对生存还是眷恋的，因而最终宁肯忍受自身的缺点和痛苦，放弃用自己的行动消灭自己。结果往往是，当我们由于恶贯满盈，无可救药，濒于绝望而准备自杀的时候，任何积极的因素，不管多么微小，都有着特殊的价值，最终将成为决定性因素；而我们会抓住它不放，就象我们在滚进深渊之前

急忙抓住眼前的任何什么小草一样。

当我决定回家的时候，已是清晨了。然而，虽然我决定回自己的家（这我记得很清楚），却记不起我是怎样突然站在了阿连德家的门前了。这段过程当中事我记不清了。真是件怪事。我曾经坐在码头上，盯着黑水想：“现在我该睡觉了。”后来，我就站在了阿连德家门前，看着5层楼上。看什么呢？打算在这时候看到她根本不可能。我怔怔地呆了许久，最后突然有了主意。我跑到街上找到一家咖啡馆打了个电话。根本没有考虑这种时刻打电话怎么向对方解释。5分钟之后才有人接电话，我却张口结舌说不出话了。我呆呆地挂掉了电话，出了咖啡馆，信步走去。突然，我又走进了那家咖啡馆。为了不引人注意，我要了杯杜松子酒，边喝边决定了还是回家。

过了很长时间，我终于回到了画室里。我和衣倒在床上，睡着了。

二十二

我正要叫喊的时候醒来了，发现自己正站在画室中央。我做了个梦：我们好几个人要去一位先生家赴约。我到他家后，走了进去，从外面看那房子平平常常。一进去我立刻就发现并非如此，它与别的房子不同。主人对我说：

“我正在等你。”

我感到自己落入了圈套，想逃走。我拚命使劲，然而迟了，

我已经身不由己了。只好听天由命，装作发生的事与我无关。那人开始将我变成鸟，一只与人体一样大的鸟。从双脚开始变起。我眼看着双脚怎样一点一点变得象鸡爪子一样了。后来，接着变身体，由下至上，就象池塘中的水往上涨那样。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只有等朋友们到来了，不知为何他们没来赴约。当他们终于来到的时候，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没有觉察到我的变化。他们象平时一样待我，这说明在他们眼里，我与平时一样。我想是巫师点化的幻觉使他们看我与正常人一样，便决定把事情捅破。虽然为了防止行为过于激烈而惹怒巫师，恶化形势(这样一来有可能促使他更狠地整治我)，我打算平心静气地说这件事，但是我却喊叫起来。于是我看到两件怪事：我口中想说的话说出来成了刺耳的鸟鸣，一种急促的怪叫，这也许是由于我变化了的缘故；更可怕的是我的朋友们如同看不出我的身体变成了大鸟一样，也听不到这鸟叫声。相反，却象是听到了我平时的声音，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诧异。我惊慌失措地闭上了口。于是，那位主人，眼里闪着讥讽的光，几乎令人觉察不到地瞅了我一眼，然而我却注意到了。此刻我明白了，谁也不会发现我变成鸟了。我完全毁了，这秘密将随我一同埋进坟墓。

二十三

我说过，当我醒来时，正站在屋子中间，浑身冷汗。

我看了看表，上午10点钟。我跑到电话机旁。对方告诉我

她已经去庄园了。我顿时泄了气，倒在床上躺了很长时间，不知怎么办好。最后我决定给她写封信。

我现在记不清信中都写了些什么，因为信写得很长，大致是我请求她原谅，我是个无耻的人，不值得她爱，应该惩罚我，让我一辈子没人理睬。

一直熬过了几天没有她的回信。我又给她寄去了第二封信。后来是第三封，第四封。内容大都一样，但却一封比一封更加伤感。最后一封信中，我决定把我们分手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她。我没有丢掉任何细节，包括我干的丑事，当然也坦白地告诉了她我曾经想自杀。把自杀作为武器使我感到脸上很不光彩，但我还是使用了这个武器。应当补充一点，当我在信中描绘我的丑行和那天晚上站在波萨达大街她家门前那种焦急、孤独的情景时，我甚至怜惜起自己来了，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我满怀希望，相信玛丽亚在读这封信时大概会有同感。这么一想，我心中畅快多了。当我将信挂了号发出去后，心情完全开朗了。

玛丽亚立即回了一封信，信中充满柔情。我感到我们俩最初相爱时的感情又在恢复，即便不象原来那么美好，至少本质上也相差无几，就好比一国君主，尽管手下的权奸时有会背叛他、诽谤他，但他仍不失为君主。

玛丽亚希望我去庄园。我象疯了似的准备了一个提箱，带上画具，直奔宪法火车站。

二十四

阿连德车站是个普通的乡村火车站，站上有几个农民，一位挽起衣袖的管事，一辆大轱辘马车和一些牛奶桶。

有两件事激怒了我：玛丽亚没有来，来了一位司机。

我刚下火车，那人就走上前来问我道：

“您是卡斯特尔先生吗？”

“不，”我板着脸回答。“我不是卡斯特尔先生。”

我立刻又想到，在车站上等候回去的火车一定不容易，也许要耽误半天左右。于是我满心不快地决定承认自己的身份。

“是的，”我马上又转口说道，“我是卡斯特尔先生。”

司机惊讶地看着我。

“拿着！”我对他说，一边把我的箱子和画具交给他。

我们走到汽车旁。

“玛丽亚太太身子不舒服。”那人解释说。

“不舒服！”我暗自嘟哝着。这类托辞我太了解了！我又一次想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了。不过现在除了等车之外，又多了一个麻烦：必须让司机相信我不是卡斯特尔，或者，大概必须让他相信，我即便是卡斯特尔先生，也不是个疯子。我迅速地权衡了一下几种办法，最后得出了结论：任何情况下都很难说服司机，我决定让他拉我去庄园。除此之外，我回去又会怎么样呢？不难预料，将会是以往情形的再现：我独自生闷气，

由于不能向玛丽亚发泄而气上加气，由于看不到她而痛苦万分。我将工作不下去，而所有这一切只是由于我臆想玛丽亚回心转意了。我用臆想一词是因为无法证实她是否真的回心转意了。

翁特尔长得有点象阿连德（我大概说过了，他们是表兄弟）；高高的个子，黝黑的皮肤，清瘦的身材，只是目光里透着油滑。我心想：“这是个懦弱的人，一个伪君子。”这个想法使我欣慰（至少当时我这样认为）。

他待我礼貌得有些过份。向我介绍了一位叼着长烟嘴的瘦女人。她说话带着巴黎口音，名字叫米密·阿连德，是个长相阴险的近视眼。

但是，玛丽亚躲到什么鬼地方去了？她真的身感不适了吗？我心中焦急，甚至差点忘记了眼前有人。但是，当我猛然意识到我的处境时，便蓦地掉转身去查看翁特尔的神色。这是对付这种人的有效办法。

翁特尔正用嘲笑的目光看着我，见我转身，立时收敛了原来的神情。

“玛丽亚有点不舒服，已经躺下了。”他说道，“不过，我想她很快就会下来的。”

我心中不由得咒骂自己掉以轻心。对这种人需要时时严加防备。此外，我还暗下决心，要摸清他们的思想方式，开什么玩笑，怎样接人待物以及他们的性格特点。这一切对了解玛丽亚都有很大用处。于是我准备看一看，听一听，并尽量心平气和地去做这件事。我又想到，翁特尔和那瘦女人的虚伪外表使

我感到高兴。尽管如此，我的心境仍然很沉重。

“这么说您是画家喽。”近视眼的女人说道，她象遇上大风沙一样眯起眼睛看着我。大概由于她没戴眼镜又想看清楚东西才这样眯起眼睛的。（仿佛戴上眼镜她就更丑了似的）这一来反倒给她脸上更增添了几分傲慢和虚伪。

“是的，夫人。”我生气地回答。我敢肯定她还是个小姐。

“卡斯特尔是位出色的画家。”翁特尔解释说。

随后他又赞不绝口地说了一些蠢话，不过是重复评论家们在美术展览会上评论我的那些蠢话。不可否认，每当这种场合我总会感到有些滑稽。只见米密再次眯起了眼睛审视我，一想到她也许要议论我一番，我就浑身感到不自在。我对她还很不甚了解呢。

“您喜欢哪一类画家？”她问道，仿佛是在考我。

不，现在我想起来了，这是在我们下楼后她才问我的。刚刚介绍过这位坐在花园中一张摆着茶具的桌子旁边的妇人，翁特尔便领我进了屋，来到他们为我安排的房间里。上楼的时候（这是所二层楼房）他告诉我说这房子修缮过，但基本上还是他祖父在曾祖父的旧田产上建起这幢别墅时的老样子。“这与我又有何相干？”我心里想着。这家伙显然想装出很随便和诚恳的样子，尽管我猜不透他的用心。他一边在说什么日光钟表或与日光有关的东西，我一边在想玛丽亚也许就在这楼上的某个房间里。也许翁特尔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

“这里有好几间寝室。实际上，房间还是相当舒适的，虽

然整个布局过于死板了些。”

我想起了翁特尔是建筑师，要知道，他懂得什么样的建筑不漂亮。

“这是祖父的老房间，现在我住在里边。”他指着中央的一间对我说。那房间正对着楼梯口。

接着他又推开另一处房门。

“这是您的房间。”他道。

他把我自己留在房里，并说他在下边等我去喝茶。一旦剩下我一个人，我的心就开始狂跳起来。因为我想，玛丽亚大概就在某个房间里，也许就在隔壁房里。我站在屋中央不知干什么好。突然我生出一个念头：我贴近另一边的墙壁（不是朝翁特尔房间的墙），轻轻地用拳头敲了几下，然后等着回音，但是没有结果。我跑到走廊上，看看是否有人，随后挨近隔壁门前，十分惶恐地举手去叩门。然而我没有足够的勇气，于是又跑回我的屋里。后来，我决定到花园里去。我脑子里乱哄哄的。

二十五

刚刚在桌旁坐定，瘦女人便问起了我喜欢哪些画家。我心不在焉地说了两个名字：班果和戈莱科。她嘲笑地瞥了我一眼，象是自言自语般地说：

“呵！”

接着又道：

“我不喜欢名声太大的人。我告诉你，”她转向翁特尔继续说，“我讨厌象米盖尔·安赫尔或戈莱科这样的人。高傲和炫耀是最伤人的！你不认为这是一种缺乏教养的表现吗？我认为艺术家应当克制自己，不引人注目。过份的炫耀和与众不同最使我反感。你想想，与众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反衬别人的平庸，对这种行为我颇不以为然。我认为，假如我会画画或写小说，那么任何时候我的行动也不会引起别人注意。”

“我毫不怀疑这一点。”翁特尔话中有话地说道。

接着他又补充说：

“比如，我相信你决不愿意写《卡拉玛佐夫兄弟》^①。”

“太可怕了！”米密两眼一翻叫道。然后又说，“所有的人物似乎都是觉醒的新贵，包括那个教父，他叫什么……索西迈。”

“米密，你为什么他不叫他作邵西莫呢？除非你一定要用俄语讲话。”

“你又开始咬文嚼字了。你知道，俄国人的名字可以有多种叫法。就象一出喜剧中的人物讲的那样：‘托尔斯泰或托尔斯苔，这两种叫法均可。’”

“大概正因为如此，”翁特尔道，“在我刚读完的一本翻译小说中，译者把托尔斯泰就写成了托尔斯苔伊。”

“噢！我就喜欢这种事。”米密高兴地说，“有一次我读了一本法文版的契诃夫小说，你在书中会遇到类似‘伊切鲍尼

① 《卡拉玛佐夫兄弟》：俄国心理小说大师妥斯托耶夫斯基的代表作。

克’这样的词，并有注解。你在书页底下找就会找到它的含意。比如，‘波尔得乌罗’，^①你想想，这么一来就会有人不明白为什么不把类似‘尽管’或‘……之前’这类的词都用俄文写出来。你说呢？告诉你，我很喜欢翻译家的做法，特别是当他翻译的是俄国小说时。您读得进俄国小说吗？”

她突然转向我发问起来了，然而，未等我回答，她又重新转向翁特尔继续说道：

“你想想看，我从来没读完过一本俄国小说。都那么洋洋大观，书中出现数不清的人物，到最后也不过只有四五个人物。不过当然喽，开始读时有一位叫亚历山大的先生，后来却又叫萨沙，然后又变成了沙契卡，接下去又叫沙琴卡，忽而似乎成了大人物，叫什么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诺维奇·布尼纳，再到后来又总是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诺维奇了。你刚刚摸到点头绪便被搅昏了头。就这样无休无止，每一个人物都好象一大家子人似的。你不用对我说你有耐性，你也会有同感。”

“我再跟你说一遍，米密，你没有必要用法语讲俄国人名。你为什么要把契诃夫说成柴阔夫呢？说契诃夫不更象原文吗？此外，‘同感’这个词更是令人悚然的法国语风。”

“请别这样，”米密哀求说，“你不要这么不耐烦，路易斯。你何时才能学会掩饰自己的学问啊？你是那么有耐心……您说呢？”她突然向我说道。

“是的。”我几乎还没明白过来她说的是什么就回答了一

① 波尔得乌罗：法语脚夫，搬运夫一词的音译。

句。

翁特尔不无嘲讽地瞥了我一眼。

我伤心极了。后来，他们说我没有耐心。至今我对当时那么专心地听完了那些无聊的话仍然感到惊讶。而且，我更惊讶自己能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些话。奇怪的是我当时一边听着这番话，一边宽慰自己。我想到：“他们都是轻浮、浅薄之辈。这种人只能使玛丽亚感到孤独。这类人决不是我的敌手。”然而，尽管如此，我仍旧高兴不起来。我感到心灵深处有个人在让我伤心。当找不出悲伤的根源时，我变得心情不好，焦躁不安了。我一心指望一个人好好分析一下情况，也好稳定稳定情绪，然而不起作用。我也曾想过悲伤的原因可能是玛丽亚不在场。但我又发现这只能使我生气，而不是伤心。这不是原因。

他们现在又谈论起侦探小说来了。我突然听到那女人在问翁特尔是否读过新出的一本“第七类小说”^①。

“读这种书干嘛？”翁特尔回道，“所有的侦探小说都如出一辙。一年出一本还可以，但是一个星期出一本，我觉得这说明读者太没有想象力了。”

米密生气了。我的意思是说她佯装生气了。

“你别说傻话了。”她道，“这是我现在能读得进去的唯一的一种小说。情节是那么复杂，侦探都十分出色，无所不知：中国明代的艺术品，辨认笔迹，爱因斯坦的理论，棒球运动，考古学，指纹学，政治经济学，印度养兔业的统计数字等

① “第七类小说”：指文学作品中的侦探小说类。

等。故事结尾他们都料事如神，令人兴奋。是不是？”她又向我提问了。

她问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竟一时张口结舌。

“对，是的。”我应付道。

翁特尔又嘲笑地看了我一眼。

“你去对博尔赫斯^①说你厌烦侦探小说。”米密一本正经地瞅着翁特尔又说。

“我并没说我讨厌侦探小说。我只是说，我觉得这类小说全都相差无几。”

“不管怎么说，你去对博尔赫斯讲。幸亏不是所有的人都象你这么炫耀学问。比如，卡斯特尔先生就喜欢侦探小说，对吗？”

“我喜欢？”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当然，”米密不待我回答。目光便又转向翁特尔继续说，“如果所有的人都象你这么博学，那日子就没法儿过了。我相信你大概有整套关于侦探小说的理论。”

“不错。”翁特尔微笑着承认。

“我没说错吧？”米密一本正经地说，她再次转向我，似乎让我作证，“没错，我对他了如指掌。那么，你不妨炫耀一番。你大概早就急不可耐地想讲解你的理论了。”

翁特尔的确没让她再多费口舌。

“我的见解是这样的，”他说道，“20世纪的侦探小说

① 博尔赫斯：阿根廷著名诗人，小说家和散文家。曾一度赞赏侦探小说。

相当于塞万提斯时代的骑士小说。不仅如此，我认为还可以把它比作《唐吉珂德》，即对侦探小说的绝妙讽刺。你们可以想象一个读了一辈子侦探小说的人，最后想入非非，认为世界正象尼乔拉·布拉克或埃勒里·奎恩小说中写的那样。可以想象这可怜虫最后离家出走去破案，在现实生活中遵循这类小说中侦探的行为行事。我相信一定会有可乐的事，悲伤的事；有典型意义，具讽刺意味且又妙趣横生。”

“那你为什么不去试试？”米密取笑地问道。

“有两个理由：我不是塞万提斯；而且我又十分懒惰。”

“我觉得有第一个理由就足够了。”米密道。

随后她又转向我说：

“这个人，”她侧着身子用长烟嘴指着翁特尔说，“他贬低侦探小说是因为他一本也写不出来，哪怕是世界上最没意思的小说，他也写不出来。”

“给我一支烟。”翁特尔对他表妹道。然后又说，“你什么时候才能不夸大其词啊。首先我并未贬斥侦探小说，我只是说可以写当今的唐吉珂德一类的人物。其次，你误以为我完全不会写这类小说。有一回我曾有过写一本侦探小说的美好想法。”

“别吹牛啦！”米密叫道。

“真的，我告诉你，这是真的。你听着：有一个男人，他有母亲、妻子和一个孩子。一天晚上，有人秘密地杀死了他母亲。警察调查不出任何结果。过了不久，她妻子也被杀了，仍旧没查出原因。最后他儿子也被杀死了。那男人要疯了。因为

他爱他们，特别是爱他的儿子。绝望中他决定自己调查这一罪行。他用侦探小说中的天才们惯用的归纳、推理、分析、综合等方法得出了一个结论：杀人犯将在某天某时某地进行第4次谋杀。他认为杀人犯现在要杀他了。在预计的那一天，那一时间，这男人来到杀人犯将进行第4次谋杀的地方，等待着那家伙到来。然而杀人犯没来。他重温了一下原先的推断。也许估计错地方了；不，地方不会错。可能估错了时间；不，时间也对。结论令人不寒而栗：杀人犯大概已经在场了。换句话说，杀人犯正是他自己。他在下意识的状态中犯下了罪行。侦探和杀人犯是同一个人。”

“太离奇了！”米密说道，“小说结尾怎样？你不是说应当有第4次谋杀吗？”

“结论很明显，”翁特尔懒洋洋地说，“那男人自杀了。留下了一个疑点：在这件普普通通的谋杀案中，他是因悔恨而自杀了呢？还是杀人犯的我杀死了侦探的我？你喜欢吗？”

“我觉得很有意思。不过，讲故事和写小说可是两回事。”

“当然。”翁特尔坦然承认说。

后来，米密又谈起她在银海城认识的一位指纹专家，谈起一位有远见的太太。翁特尔开了个玩笑，米密不高兴了。

“别这么随随便便开玩笑。”她道，“她丈夫是土木工程系的教授呢。”

他们后来又讨论起了第六感官，我却因见不到玛丽亚而焦急不安。当我再次拉回思路时，他们正在谈论雇工的条规。

米密手里捏着烟嘴，如同拿着根指挥棒，正在发表议论：

“事实上，这些人都不想干活。”

谈话临近结束时，我突然心中一亮，那莫名其妙的悲伤顿时烟消云散了。我感觉到这位米密即将收场了，并觉得玛丽亚不下楼来是为了逃避米密和他表兄的大发议论（也许玛丽亚早就腻烦了）。但是，现在想起来，这种感觉并非出自偶然，这是我们来别墅的途中司机对我说过的几句话产生的效果。最初我对这些话毫不在意。他谈到先生的一位表妹刚刚从银海城来这儿喝茶。事情很清楚，玛丽亚对这个女人的突然到来感到很丧气，便借口不适，把自己关在房内。她显然忍受不了这种人。由于这种推理，我觉得心中的悲伤都消散了。到这家以后，看到翁特尔和米密是些虚伪和浅薄的家伙，我心里似乎是高兴些了，因为我看到翁特尔不可能与我匹敌。但是，一想到玛丽亚也是这圈人中的一个，想到她或多或少大概也有类似的性情，我的心灵深处就又布满了阴云。

二十六

正当我们从桌旁站起身来准备去花园散步时，我看到玛丽亚向我们走来。这恰恰证实了我的猜想：她等到这时才来找我们，为的是避免听到餐桌上的无聊谈话。

每当玛丽亚当着别人的面朝我走来时，我都会想：“在我 and 这个出众的女人之间有一种隐密的关系。”事后，当我分析自己的感情时，我发觉她已经成了我不可缺少的伙伴（就象一

一个人在荒岛上遇到了伙伴一样），再后来，摆脱了可怕的孤独，她成了我引以为荣的一笔财富。正是在这第二个阶段，我的爱情遇到了重重挫折。就好象一个人，当他饿得要死时，会无条件接受任何食物；一旦危机过去，便开始越来越多地抱怨这不好吃，那不合适了。近几年，我见到一些移民，他们刚刚逃脱集中营的屈辱生活，对任何生活条件都不挑剔，高高兴兴地从事最下等的工作。但是，十分奇怪的是，人不会满足于摆脱折磨和死亡而高高兴兴地生活。一旦生活有了新的保障，骄傲、虚荣和妄自尊大等等一些似乎永远消失的东西，就又开始象惊散的野兽重新聚拢来了。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来得比以往更毫无顾忌，仿佛他们为落到这步田地感到耻辱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干出忘恩负义的事来。

现在我可以冷静地分析一下我的感情了。我认为在我同玛丽亚的关系当中有与此相同的地方。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为自己的冷漠付出代价，因为我同玛丽亚的感情未达到一致；正是她的这种感情把我从孤独中挽救出来（暂时的）。这种自豪产生的快感和独自占有的欲望提醒我，由于虚荣心和狂妄自大，我已走上危险的道路。

此刻，看到玛丽亚走来，这种自豪感差不多被负疚和羞愧的感情一扫而光了。因为我想起了画室里那可怕的一幕，想起了我的蠢行、冷酷，甚至卑鄙地咒骂她“欺骗一个瞎子”。我感到两腿发软，脸色苍白，面颊冰凉。我竟在这些入中间如此出丑！我决不能低声下气地请求她原谅以平息她对我的嫌恶和鄙视！

但是，玛丽亚似乎并未失去自制力，我立刻觉得下午那种悲伤感渐渐地涌上心头。

她不露声色地问候了我，似乎真在两位表兄妹面前证明我们俩之间不过是一般的友谊。我浑身不自在地想起前几天对待玛丽亚的态度。有一次，我在极度兴奋中对她说，我想找一个黄昏站在一个山丘上眺望圣格明拿诺^①的塔尖。她热烈地望着我说：“太好了，胡安·巴勃罗！”但是，当我提议当晚我俩一同私奔时，她吓住了，脸色沉了下来，阴郁地说：“我们没有权利只考虑自己。世界太复杂了。”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更加忧郁地回答道：“幸福周围充满了痛苦。”我猛然撇下她走了，连个招呼也没打。当时，我无比清楚地感到，我将无法同她完全结合在一起，我必须忍受稍纵即逝的感情交融；这种时刻得来非易，就象重温梦中之事或象欣赏动人的乐章一般。

现在她来了，克制着每个行动，斟酌着每一句话，注意每个表情。她甚至还对那另一个女人微笑了一下！

她问我是否带来了素描。

“什么素描！”我愤怒地叫道，心中明白她又在搞什么鬼点子，尽管会对我们有利。

“你答应让我看的素描，”她心平气和地接着说，“在码头上画的素描。”

① 圣格明拿诺：意大利城市，该城有11至15世纪建成的石碑、教堂、宫殿和尖塔等古迹。

我恨恨地看了看她，然而她却平静地迎着我的目光。有那么一瞬间，她双眼露出柔和的光，似乎对我说：“原谅我的所作所为吧。”亲爱的玛丽亚，亲爱的！我对你这瞬间的哀求和屈服感到多么痛心啊！我爱怜地看了她一眼，回答她说：

“我当然带来了。在我的房间里。”

“我很想看看。”她说，又恢复了初时的冷淡。

“咱们可以马上去看。”我揣摸着她的心思说道。

我真担心米密也会掺合进来。但是，玛丽亚比我更了解她。她当即补上一句话，阻止了米密的企图。

“我们很快就回来。”她说。

话音刚落，她就果断地挽住我的手臂，带我朝房中走去。我飞快地瞥了一眼留下的两个人，似乎发现米密在看翁特尔的时候眼里闪过一道恶意的光。

二十七

我原想在庄园住几天，然而却只过了一夜。第二天太阳一露头，我就提着箱子和画具徒步溜走了。表面看来，这一举动有些失常，但大家会看到我这一举动多么合乎情理。

我们一离开翁特尔和米密，就走进房子，上楼去找所谓的素描。后来，又带着画具和画夹走下楼，以便权且充作素描。这办法是玛丽亚想出来的。

那一对表兄妹已不在了。于是玛丽亚的情绪开始好转，当

我们穿过花园向海滩走去时，她已经热情洋溢了。同我的烦恼中认识的玛丽亚截然不同，她更活泼，更主动了。我感到在她身上出现了一种我所不熟悉的敏感，对色彩和气味的敏感：一段树干，一片枯叶，一只昆虫的颜色以及夹杂着海腥味的桉树的沁香，都会奇怪地激发她的热情（我感到奇怪是因为我本人往往心理上敏感，是纯粹的想象敏感）。对此，我不但不高兴，而且更悲观失望了，因为我发现玛丽亚这种表现是我完全不熟悉的。相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热情应属于翁特尔或别的什么人。

我越来越伤心了。也许是让越来越清晰的海潮声搅的。当我们走出丛林，眼前出现海滩的一片天空时，我感到这悲伤是不可避免的；是在美景面前，或者至少是在某种美的事物面前所必然产生的伤感。不知人人都有同感呢，还是我这个倒霉蛋身上的怪癖？

我们坐在礁石上，倾听着脚下浪涛的拍击声，长久地沉默着。浪花时而冲上礁岩，飞沫溅到我们的脸上。风云变幻的天空使我想起了汀托莱托^①救那个伊斯兰教徒时的天空。

“我一直向往着同你分享这里的大海和天空。”玛丽亚说道。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

“有时我会觉得好象我们已经共同享受了这情景。看到你

^① 汀托莱托：收藏在维也纳大学的一幅名画。画中描写圣马尔科斯救一名海上遇难的伊斯兰教徒。

画的那小窗口上的孤独女人时，我感到你和我一样也在盲目寻找什么人，寻找一个不会说话的交谈者。从那时起，我一直想念你，多次梦见你来到这里，来到这块生我养我的地方。有一天，我甚至想去找你，告诉你这一切。但是，我怕自己错误地估计情况。因为我以前搞错过一次。于是就等你来找我。每天晚上我都唤着你的名字。我相信会找到你的。当在电梯旁遇到你时，我却吓呆了，只说了一句蠢话。你认为自己弄错了而痛苦地走开去后，我象疯了似的随后追赶你。后来才有圣马丁广场上的约会。你认为有必要向我说明情况，而我却想迷惑你，一直犹豫不决，一方面害怕永远失去你，另一方面又怕给你带来不幸。但是，我确实想过要熄灭你的热情，使你认为我不懂你那模棱两可的话和那些暗示。”

我沉默着。听着她美好的声音，脑子里许多美好的感情和忧伤的念头在旋转。我沉浸在快乐中。落日的余辉将天边的云彩点燃了一大片。我感到这魔幻般的时刻将一去不复返。“一去不复返，一去不复返！”我想。与此同时观察起脚下的峭壁，想到把她和我一起拖向深渊该有多容易啊。

我时断时续地听到：“我的上帝……许多事情，我们在一起时……可怕的事……我们不仅是这景色，也是渺小的具体的人，那么丑恶和庸俗……”

大海变成了一个漆黑的怪物。夜幕突然降临了，脚下的潮声发出悲怆的呼唤。我竟会想到这很容易！她说我们是丑恶和庸俗的人。不过，尽管我明白自己有多么下流，但是想到她也能干出这类事，想到她一定能干得出这类事我就难过。怎么

干？和什么人？什么时候？我思索着。心中悄悄滋生出一个念头：扑到她身上，用指甲撕碎她，掐住她的脖子弄死她，然后把她抛进海里。蓦地，我又听到几句不连贯的话：她谈起在乡间度过的童年；听她似乎在谈发生在那表兄身上的什么“可怕而残酷”的事。我觉得玛丽亚向我敞开了美好的心扉，而我却象个傻瓜，把她丢掉了。

“什么可怕而残酷的事？”我喊起来。

但是奇怪，她好象没听到我喊叫。她也浸溺在沉思中，忘掉了周围的一切。

过了很长时间，大约有半点钟光景。

后来，我觉出她在抚摸我的脸，象往常在这种场合时一样。我说不出话来，象小时候和母亲在一起时那样，把头偎在她的腿上。就这样，我们滞留在静止了的童年和死亡之间。暗地里竟有许多可疑而无法解释的事，真是遗憾！我多么希望是自己搞错了，多么希望玛丽亚永远象现在这样啊！然而却不可能如此。我倾听着耳边她那心脏的跳动声，她用手抚弄着我的头发，与此同时，阴郁的思想如同掉进一处泥泞的地窖，在我阴暗的头脑里蠕动；它们在泥浆中粗声粗气地哼哼着，挣扎着，等待出来的时刻。

二十八

出了件怪事。我们回到家中时见翁特尔激动异常（虽然他

是极不愿流露激情的人），他企图掩饰自己的心情。但是，显然出了什么事。米密已经走了，饭厅里一切准备就绪，很显然我们回来得太迟了，因此我们刚进门，仆人就迅速而有条不紊地摆上了饭菜。吃饭时大家几乎都无话。我留心着翁特尔的每个表情，每一句话，因为我感到这有助于我去联想，并能证实我的想法。我也随时注意玛丽亚的表情。她却不露声色。玛丽亚为了缓和气氛谈起她在读一本萨特的小说。翁特尔满脸不快地道：

“当代小说。让他们写吧，写吧，没人管……不过，你们都去读这种小说吧！”

大家都不作声了。翁特尔也不缓和这番话造成的紧张气氛。我明白了，他是对玛丽亚不满。但是由于我们去海边之前没出现任何异常情况，我的结论是：他对玛丽亚的不满是在我们俩谈话期间产生的；这就很难说不是由于我们的谈话，或者由于我们在海边呆得时间过久而引起的。最后结论是：翁特尔妒嫉了。这证明在他和她之间有某种超越一般亲友的关系。当然，并不是说玛丽亚会爱他；相反，而是翁特尔看到她对别人感兴趣更易激怒。

不管怎么说，如果翁特尔因吃醋而发火，必然会迁怒于我，因为在我和他之间没有其它矛盾。就是这样。假如没有别的迹象，那么只要玛丽亚提到海边一事时，翁特尔能瞟上我一眼，我就能从中看出端倪。

我借口累了，离开饭桌就回房去了。我的目的是获取更多的依据，以便分析眼前的情况。我走上楼来，打开房门，扭亮

灯。象有人关门那样撞了一下门，然后立在敞开的屋门口听动静。我立即听到了翁特尔的声音，激动地说了一句话，只是分辨不清说的是什么；玛丽亚没有回答。翁特尔更加激动地说了一串比前一句更长的话；玛丽亚低声说了些什么，与他的最后几句话混在了一起。接着是椅子的响动，片刻之后我听到上楼梯的声音。我飞快地关上门，仍通过钥匙孔听着动静。不一会儿，脚步声穿过了我的门前：是女人的脚步声。我很久很久睡不着觉，思索着发生的事，想听到点动静。但这一夜我什么也没听到。

我无法入睡，原先未预料到的许多问题在折磨着我。我突然发觉最初得出的结论太幼稚了，我曾认为玛丽亚不爱翁特尔，但后者也会吃醋。这个结论一度安定了我的情绪。现在我意识到，如果说玛丽亚没必要爱他的话，那么她爱他也并非就无可。

玛丽亚能够爱翁特尔，尽管如此，这家伙还是会吃醋的。

现在看来，可以认为玛丽亚同她表兄有什么瓜葛吗？我认为很有理由！首先，如果翁特尔的醋劲常叫她难堪而她又不爱他，她为什么还要经常到庄园来呢？平时，这里除去翁特尔以外没住任何别的人。（我不知他是光棍，鳏夫还是离了婚的人，虽然玛丽亚似乎对我说过他同妻子离婚了。但是，关键问题是这位先生一个人独居在庄园里。）其次，怀疑这种关系的另一个理由是玛丽亚从来没对我谈过翁特尔，她对此漠不关心，也就是说，她用谈论家中亲人的坦然态度说起他。但是，她从来

没对我谈起过或暗示过翁特尔爱她，更没说过他爱吃醋。第三点，玛丽亚这天下午对我说起过她的弱点。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在信中曾对她讲过我的一些不光彩的丑事（酗酒过度和嫖女人），可现在她却对我说她能理解我，她本人也不是一块无瑕的碧玉。这除了说明她生活中也有类似我那样的丑事外还能有什么意思呢？她和翁特尔的事难道不会是这种下流的情欲？

我辗转反侧，一整夜都在从各种角度分析这几种结论。最后我得出我认为最可靠的结论：玛丽亚是翁特尔的情妇。

天刚亮，我就提上箱子和画具下楼了。我碰到一个仆人，他正打开门窗做扫除。我托他问候翁特尔先生并请他转告先生，我有急事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了。那仆人用吃惊的目光看着我，当我告诉他我将步行去火车站时，他更诧异了。

我必须在那小车站上等几个小时。我不时想玛丽亚可能会出现。我怀着一种悲伤的满足期待着她的出现，就象一个把自己关在什么地方孩子，因为觉得别人委屈了他，正等待着大人前来寻找他，向他承认错误。但是，玛丽亚没有来。当火车驶进站时，我最后一次朝路上望了一眼，希望在最后一刻她会出现在我眼前，然而我没有看到她，只觉得心中好不凄凉。

火车朝布宜诺斯艾利斯飞驰，我从车窗里望出去。我们从一座茅屋前驰过；一个女人站在屋檐下看火车。我突然冒出一个愚蠢的想法：“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这个女人了。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她了。”我的思想就如同在一条陌生的河流中漂浮着的一块木头。它围绕着屋檐下的女人漂浮了半晌。这个女人与我有何相干？然而，我却不能不去想她。对我

来说，她确实存在过一瞬间，而且决不会再出现了。依我看，她似乎等于死去了。火车的误点，茅屋里的呼唤，还有那女人，都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似乎一切都那么短促，毫无意义，似是而非。我的脑袋不好使了。玛丽亚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眼前，带给我一种说不出的悲哀。只有过几个小时之后，我的思想才能重新达到平时那样的敏捷和果断。

二十九

玛丽亚临死前的几天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我不可能把我想到的，干过的，感受到的事原原本本都写出来，因为即便我对许多事记得很牢，仍有的时候，甚至许多天，我都仿佛是处于一些模模糊糊，畸形怪状的梦幻之中。在我的印象中，有好几天我是醉醺醺地躺在床上或是在新码头的一间酒吧中度过的。我清楚地记得，一到宪法火车站，我就进了那家酒吧，接连要了几杯威士忌；然后，我模模糊糊记得我站起身，坐进一辆出租汽车，我来到五月二十五号大街或者阿莱姆大街的一间酒吧间。接着又是嘈杂声，音乐声，喊叫声，我在狂笑，几个瓶子摔碎了，刺眼的灯光。再后来，我记得在警察局的监狱里，非常气闷，头痛得厉害，一名狱警打开牢门，一名警官对我说了些什么，随后我发现自己又来到街上，东倒西歪地走着。大概我又进了一家酒吧。过了几个小时（或几天），有人

把我丢在我的画室里。然后我做了许多恶梦，梦见我在教堂的屋顶上走着。我还记得曾醒来一次，房间里黑糊糊的，我生出一个可怕的想法：房间变得无限大了，拼命跑也跑不出去。不知过了多久，一缕晨曦从窗口钻了进来，于是我爬进洗澡间，穿着衣服跳进浴缸。冷水使我平静下来，头脑里开始不连贯地出现了一些发生过的事，尽管都是些支离破碎的回忆，就象一场洪水过后最先露出来的东西一样：站在礁石上的玛丽亚；拿着长烟嘴的米密；阿连德火车站；车站对面一家叫作挚友的商店；玛丽亚问我素描，我喊道：“什么素描！”；翁特尔斜眼瞟着我；我在楼上焦急地偷听表兄妹之间的谈话；一名海员摔碎了一个瓶子；玛丽亚目光冷淡地朝我走来；米密在谈契诃夫；一个浪女人在吻我，我狠劲给了她一拳；虱子咬遍了我全身；翁特尔谈起了侦探小说；庄园里的司机。还有一些梦的片断：教堂落进了黑夜里，无边无际的房间。

然后，我渐渐清醒过来，那些零散的记忆与我心中的另外一些想法融为一体了，正在组成当时的情景，虽然这情景象洪水下面露出来的场面那样凄凉、空旷。

我走出洗澡间，脱去衣服，换上干净衣裤，开始给玛丽亚写信。首先我写道我希望向她解释一下我逃离别墅的原因（我划去“逃离”添上“离开”）。又说我非常感谢她对我的关照（我划去“对我的”改为“对本人的”）。我明白她是宽怀大度和感情纯真的人，虽然她亲口对我说过她有时也会萌发“下流的情欲”。我对她说我赞赏她对无瑕的碧玉的正确评价，因为正如她想象的那样（我划掉“想象”写上“估计”），保持

或体验一种爱情还远远不够：我仍弄不明白的是象她这样一个对丈夫和对我都能做到情话缠绵的女人，怎么可能同时又和翁特尔睡觉。更严重的是（我继续写道），她也常同丈夫和我同床而眠。最后写道，大概她看得出来，这种行为实在发人深省等等。

我把信从头读了一遍 觉得这种明显的变化足以伤害她了。我把信封好口，来到中心邮局把信挂了号。

三十

刚一走出邮局我就发现了两个问题：我在信中没说为什么认为她是翁特尔的情人；另外，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这么狠心地伤害她的。假如我没猜错的话，难道是为了使她改变自己的性情？可这样做显然太过份了。为了使她倒向我？用这种手段以求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仍旧这样想，在内心深处盼望着玛丽亚回到我身边来。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对她讲呢？可以不伤害她，解释清楚我离开庄园是因为发现翁特尔吃醋。总而言之，我说她是翁特尔的情妇，除去伤人以外也毫无根据。无论如何这只是一个猜想，只能引导我将来去进行调查。

由于我写信从来不假思索并马上发出去，因此，我又办了件蠢事。重要的信件至少应当留上一天，待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估计到之后再发出去。

现在只剩下一个应急的办法了，收据！我翻遍了所有的衣兜也没找到。大概我糊里糊涂地把它扔掉了。尽管如此，我仍跑回邮局，站在了寄挂号信的队伍里。当轮到我时，我一边费力地强装出一副笑脸，一边问那女职员：

“您认不出我了吗？”

那女人惊讶地看着我。她一定认为我是个疯子。为了消除她的误解，我告诉她说我刚才给“栎树庄园”发了一封信。那笨女人好象更惊奇了，她转过脸去和一位男同事交换了一下眼色，大概想让他也参与一下这件事，或者想听听别人的意见。她又重新看看我。

“我把收据弄丢了。”我解释说。

她没吭声。

“我是说我需要那封信，但却没有收据了。”我补充说。

那女人和另一位职员象一对牌友那样交换了一个眼色。

最后，她用十分惊讶的口气问我：

“您想要回那封信吗？”

“是的。”

“连收据也没有了吗？”

我只好承认，我确实丢了这份重要的证据。那女人惊讶极了。咕哝了几句什么话，然后又转身去看她那同事。

“您想要回一封信吗？”她结结巴巴地说。

另一个家伙极其笨拙地微笑了一下，目的是想表现他为人热情。那女人看了我一眼道：

“这根本办不到。”

“我可以给您看我的证件。”我掏出几样证件说道。

“什么也不必拿了。按规定是不允许退信的。”

“您知道，规定应当合情合理才对。”我激动地叫道，同时，那女人脸蛋上的一颗长毛黑痣激怒了我。

“您知道这儿的規定吗？”她爱搭不理地问我道。

“我根本没有知道它的必要，太太。”我冷冷地回答，心里明白“太太”一词大概会刺痛她。

那女妖精的双眼顿时愤怒得发亮了。

“您要知道，太太，规定不能不合乎情理，它必须由精神正常的人来制定，不能让疯子来制定，假如我发了一封信后马上又来请求你们把信退还给我，这是因为 I 忘掉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合乎情理的做法是满足我的要求。难道邮局坚持要把不完整或错误的信件发出去吗？邮局是通讯部门而不是强制部门，这再清楚不过了。邮局不能强迫别人寄信，假如我不愿意的话。”

“不过，这可是您自愿的。”她回答。

“不错！”我喊道，“但是，我再对您说一遍，我现在不愿意了！”

“别冲我喊叫。别这么缺乏教养。现在已经晚了。”

“并不晚，信还在那里。”我指着剩下的一摞信件说。

后边排队的人不满地骚动起来。那老姑娘的脸气得直哆嗦。我十分厌恶地感到，我全部的仇恨都集中在那颗黑痣上了。

“我可以向您证明，我就是寄那封信的人。”我又重说了

一遍，并拿出身份证给她看。

“不用喊，我不是聋子。”她又说道，“我不能做主。”

“那么，请您去问问上司。”

“不行。很多人在等着发信。我们这里很忙，您懂吗？”

“这也是您份内的工作。”我说。

几位排在队伍里的人提议他们干脆还我那封信，以便继续工作。

那女人犹豫了一会儿，同时假装在干别的事情：最后她进里边去了，过了好半天才气乎乎地走出来。她在筐里找了一下。

“什么庄园？”她问，那声音活象毒蛇发出的咝咝声。

“栎树庄园。”我故意不紧不慢地回答。

在假装翻寻了一阵之后，她手中托着那封信，象买东西怕上当一样仔细地察看。

“只有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她说。

“这又怎么样？”

“您有什么证件可以证明您是发信人？”

“我有草稿。”我边说边拿给她看。

她拿过去，看了看又还给我。

“我们怎么能知道是这封信的草稿呢？”

“这很容易，我们可以打开信封对照一下。”

那女人想了想，看了看封着的信皮，然后对我说：

“既然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您的信，怎么可以拆开来看呢？我不能这么做。”

人们又开始抗议了。我真想撒野。

“这证件不顶用。”那女妖精说。

“您觉得身份证可以顶用吗？”我故作谦卑地问她。

“身份证？”

她想了一下，重新看了看那封信，接着开了腔。

“不，光有身份证不行，因为上面只有您早期的情况。您还必须给我看看居住证。或者兵役证也行，因为兵役证上填有家庭住址。”

她想了想又说：

“很难说您从十八岁起到现在一直没搬过家。因此，必须看一下您的居住证明。”

一股压抑不住的怒火终于在我身上爆发了，我觉得这股火是冲玛丽亚去的，更奇怪的是还包括米密。

“你就这么寄出去吧，不得好死的东西！”我冲她喊道，然后拔腿就走。

我怒气冲冲地走出邮局，甚至想回到那小窗口，用什么法子点着那筐信件。不过，怎么点呢？扔一根火柴？这很容易在中途就熄灭了。事先洒上点汽油效果一定好，只是这么一来事情就复杂了。无论如何，我准备等到他们邮局下班，好把那女光棍骂一顿。

三十一

等了一个小时以后我决定走了。说到底，把那蠢婆娘骂一顿又能得到什么呢？另外，在此期间，我反复考虑了半天，最后平静下来了。那封信写得很好，但愿它能落到玛丽亚手里

（我常常碰到这种情况：我盲目地反抗某种阻力，因为它阻止我去干我认为必要的和有益的事。我愤怒地忍受着失败，最后过了一段时间，事实证明我原来是正确的）。实际上，当我开始写信时，并没有经过周密的思考，以至有些伤人的话本不值得一写。但是，现在我回顾写信前发生的一切，忽然想起在一个醉酒的晚上做过的梦：我从一个藏身之处向外窥视，看到我正坐在一把椅子上，椅子摆在一间阴暗的房间里，这房间里没有任何家具，陈设。在我身后有两个人，他们脸上带着狠毒的嘲笑互相盯视着。一个是玛丽亚，另一个是翁特尔。

一想起这个梦，无法解脱的悲伤就压倒了我。我离开邮局的门口，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去。

过了不久我已坐在莱科勒塔大街一棵大树下的路椅上了：我们相好时呆过的地方。树木，小路等开始改变我的想法。说一千道一万，具体说来我在哪一点上反对玛丽亚呢？我们相爱时的美好情景（她的某个表情，温柔的一瞥，用手抚摸我的头发）开始慢慢占据我的心。这种占领来得如此小心翼翼，就象从地上抱起横遭车祸，再也经不住最轻微的碰撞的亲人一样。

我渐渐挺起身来，悲伤逐步变成了期望，对玛丽亚的仇恨变成了恨自己，原来的麻木不仁变成了急于回家的迫切心情。快走到画室门口时我才明白自己想干什么：往庄园给她打电话，要快，不能再耽搁了。怎么先前我就没想到这个办法呢？

当电话接通时，我几乎没有勇气讲话了。一个仆人接的电话。我对他说我要立即同玛丽亚太太通话。片刻之后，同一个声音对我说，太太过一个钟头左右再给我来电话。

我觉得这种等待似乎无休无止。

我现在记不清我在电话中说了些什么话，不过我记得我不但没请求她原谅我那封信（这是我和她通话的原因），反而对她说了些比写在信中的更厉害的话。当然，我这样做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一开始我是低声下气，十分温和地同她讲话的。但是，她那痛苦的声音渐渐激烈起来，再加上她根据她的习惯，一个问题也不作正面回答。这场对话倒不如说是我一个人在说，越说越激烈，越是激烈她好象也越痛苦，而我也就因此越加气愤，因为我心中有数，道理在我这一边，她没有理由伤心。我最后大声喊着对她说我要自杀，说她是演戏的，并说我要马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到她。

她没有理会我的任何提问，但是后来，由于我一再追问并威胁说我要自杀，她才答应我第二天回布宜诺斯艾利斯，虽然她“不知为什么回来”。

“我们唯一能够得到的，”她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是再一次冷酷无情地伤害我们自己。”

“你如果不来，我就自杀。”我最后又说了一遍，“你在做出决定之前要好好想想。”

我没再多说便放下了听筒。此刻我真的下定了决心，如果她不来说明情况我就自杀。决心一下，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你等着瞧。”我心中暗想，仿佛正在复仇。

三十二

这是该诅咒的一天。

我气冲冲地走出画室。尽管第二天就能见到她了，我仍旧心情不好，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恨。现在我认为当时我恨的是自己。因为我心中明白，我那些恶毒的辱骂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我愤怒的是她不自卫。她那痛苦而屈辱的声音不仅不能平息我的怒气，反而更激起我的火来。

我鄙视自己。这天下午我开始酗酒，后来又在莱安德罗·阿莱姆大街一间酒吧里寻找事端。我找了一个我认为最淫荡的女人。接着又向一个海员寻衅打架，因为他同那女人开了个下流玩笑。后来的事我记不太清了，只知道我们打了起来，众人兴高采烈地劝架。随后，我记得我和那女人来到街上。凉风吹得我清醒了许多。清晨时分我把她带进了画室。进门后她看着画架上的那幅画笑了。（我不知说过没有，我这幅画从小窗口的背景开始渐渐地变了，仿佛我原来那幅画上的人和物遭受了一场宇宙大变动。后面还要谈这件事，因为现在我只想谈谈那

关键的几天当中发生的事。) 那女人笑着看了看画，然后目光转向我，好象在要求我解释。你们可以猜得到，那贱货对我的画持何看法我毫不在乎。我对她说不要浪费时间了。

我们上了床。突然间，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这罗马尼亚女人的表情很象有一次在玛丽亚脸上见到过的表情。

“婊子！”我发疯般喊叫起来，厌恶地推开她，“就是婊子！”

那罗马尼亚女人象蛇一样窜起身咬住了我的手臂，直到咬出血来。她以为我是骂她。满怀着对整个人类的蔑视和仇恨，我把她从画室里踢了出去，并告诉她，如果她不马上走开我就要象杀死一条狗一样杀死她。虽然我随后扔给她不少钱，但她还是高声叫骂着走了。

我站在画室里怔怔地呆了半晌，不知该干什么，也理不清心中的苦恼和各种念头。最后我做出了决定：我走进洗澡间，把浴缸里放满冷水，脱光衣服跳了进去。我打算理一理各种想法，因此我在浴缸里一直呆到头脑完全清醒。慢慢地，我的大脑能正常运转了。我想仔细地思考一下，因为我觉得关键时刻已经到了。最初的想法是什么？随着我给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脑海里出现了一些单词。这些词是：罗马尼亚女人、玛丽亚、娼妇、快乐、装假。我想，这些词大概反映了实质性的东西，反映了某种深刻的道理，我应该从这里入手。为了把这些单词理清楚，安排好，我费了很大劲，终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可怕而又不容置疑的想法：玛丽亚和那妓女有着相同的表情；
妓女佯装快乐；玛丽亚也佯装快乐；玛丽亚是妓女。

“婊子！婊子！婊子！”我喊叫着跳出浴缸。

我的头脑已经恢复到了最佳状态下的冷酷无情。我清醒地看到这一切该收场了，我不能再一次被她痛苦的声音和虚假的神情所蒙骗了。我必须让自己严格地按逻辑思考问题，应该毫不畏惧地从头至尾清理一遍玛丽亚说过的所有可疑的话，所有的表情和态度暧昧的沉默。

这一切如同恶梦中的幻觉，在一盏魔灯的照耀下飞快地在脑子里闪过。我迅速地穿着衣服，与此同时，所有疑点全闪过我的脑海：第一次电话交谈中她那不露声色的语气说明她多么会装假，而且一定经过了长久的练习；玛丽亚周围的神秘影子，那是从她那闪烁其词的话语中流露出来的；她曾担心“给我带来不幸，”这只能意味着她在说：“我将用谎话，自相矛盾的话，不可告人的事，伪装感情和身体感觉来使你不幸。”因为，有真正的爱情她就不会给我造成不幸了；还有那划火柴的令人痛苦的一幕；还有最初她怎样躲避我的亲吻以及怎样在逼迫她说出是否讨厌我，或者，她的爱是否具体和真诚的时候，她才以身相许；当然，这件事使我很难相信她那极度快乐的样子和她说过话以及心醉神迷的表情；她那些关于对丈夫的爱解释只能更加让人觉得她很会用虚假的感情和感受骗人；还有她周围的亲戚，都是些伪君子和骗子；还有当时她用根本不存在的港口素描骗两位表兄妹时那种沉着、巧妙的神情；在别墅吃饭的场面，楼下的谈话，翁特尔的妒嫉；还有她在海礁上说漏嘴的那句话：“因为我曾搞错过一次。”同什么人？什么时间？怎么搞错的呢？还有发生在那位表兄身上的“可怕而

又残酷的事”，这也是她无意中说出来的，正如她不回答我的问话所证明的那样，她没听见我的话，因为她确实没听见，她仿佛回到了童年，也许当时是她唯一的一次把心真正掏给我；最后出现在脑海里的是同那罗马尼亚女人，也可能是俄国女人在一起的可怕的一幕。嘲笑我的画的脏货和鼓励我画画的那个薄情女子，在她们的生活中有时竟有同样的表情！我的上帝，一想到在圣洁与肮脏之间有时竟掩藏着黑暗、污浊的隧道，真让人为人类的本性而悲伤！

三十三

在这番清清楚楚但又是捕风捉影的回顾当中，有许多结论不过是些猜测。尽管我相信自己不会弄错，但是也不能说出口。不过，我突然发现，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调查途径：即旁人的看法。我十分清醒地，非常得意地想起了这条渠道，这还是第一次。我想到前面提起过的一个人：拉狄盖。他是翁特尔的朋友并与他交往甚密。当然，他也是个无聊之辈：他写过一本诗集，谈的是人类一切行为都意味着虚荣，但是他一直抱怨没颁发给他全国大奖。我没多犹豫，虽然心里厌恶这个人，但还是毫不迟疑地给他打了个电话，我告诉他说有急事要见他。我在他家见到了他，先赞扬了一番他的诗，然后（他很不高兴，因为他仍想多谈谈他自己）我向他提了一个事先想好的问题，把他吓了一跳。

“玛丽亚成为翁特尔的情妇有多久了？”

我母亲从来不问我们是否吃了一个苹果，因为我们可能会矢口否认。她总是问吃了几个，用这种巧妙的办法把她想了解的事了解到：即我们是否吃过苹果；我们被数目牵住了鼻子，于是回答说只吃了一个苹果。

拉狄盖爱好虚荣，但人却不是傻瓜：他怀疑我的问题中有什么蹊跷，想回避正面作答，他道：

“关于这件事，我什么也不知道。”

他又开始大谈诗集和文学奖。我无比厌烦地对他喊道：

“他们对您的书真太不公平了！”

我跑走了。拉狄盖不是个傻瓜，然而他没发现他的话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已经是下午3点钟了。玛丽亚大概已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了。我等不及回到画室，就在一家咖啡馆里打了个电话。她一拿起话筒我就对她说：

“我必须立即见到你。”

我掩饰着心头的仇恨，因为我怕引起她的疑惧而不来赴约。我们讲定5点钟在莱科勒塔大街老地方会面。

“虽然我看不出我们会得到什么好结果。”她悲伤地说道。

“很多东西，”我回答说，“很多东西。”

“你这样认为吗？”她用失望的口吻问。

“当然！”

“但我认为，我们只能给自己再增添新伤痕；把沟通我们

关系的不稳固的桥梁破坏得更厉害一点；更加冷酷地伤害我们自己……我这次回来是因为你拼命要求我这样做，但是，我原本应该留在庄园：翁特尔病了。”

我心想：“这又是一派谎言。”

“谢谢。”我冷冷地回答，“那么一言为定，咱们5点整见面。”

玛丽亚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三十四

5点钟之前我来到莱科勒塔大街。坐在那条过去常坐的路椅上。我原本心情就沉重，一看到作为我们爱情的见证人的树木，小路和座椅，我的情绪更是一落千丈了。我无比伤心地想起了我们在莱科勒塔街心公园和法兰西广场度过的时光，想起在那似乎已非常遥远的当时，我怎样相信我们的爱情是永恒的。一切都象奇迹一般，充满光明，而眼下，在这个冷漠而缺乏理智的世界上，一切都变得暗淡了，冷若冰霜了。

有那么一瞬间我又犹豫了，害怕毁掉我们仅存的一点爱情，担心自己会彻底孤独。我想，也许能将这些恼人的疑点抛在一边。只要我和玛丽亚有情，她其它的行为与有什么关系？看到这些树和路椅，我想，即便我们那神秘的爱情和感情交融的时间很短促，一旦失去她的支持我也将无法忍受。我越是这么想，越倾向于无条件地接受她的爱，也越害怕失掉一

切，所有的一切。从这种恐惧中，我逐渐生出一种忍让的态度，只有毫无选择余地的人才会有这种态度。最后，当我发现自己什么也没失掉，而且从现在起，我还可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时，又禁不住高兴起来。

不幸的是，玛丽亚又一次欺骗了我。5点半钟时，我焦急、暴躁地给她打了个电话。对方告诉我她突然回庄园去了。我忍不住对那女仆大叫起来：

“可是，我们早就说定5点钟要会面的！”

“我什么也不知道，先生。”她有些吃惊地回答我，“太太在一个小时之前开车去的，她说至少要在那儿住一个星期。”

至少一个星期！犹如天塌地陷了一般，我觉得一切都难以置信，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我如同梦游一样走出咖啡馆。我看见许多荒唐的东西：路灯，来来往往的行人，仿佛这些东西都有用似的。这就是我那么需要她，那么强烈地要见她一面的结果！我就差苦苦哀求她了！

但是，我万分痛心地说道，毫无疑问，她把我撇在公园里，自己却去庄园陪翁特尔睡觉了。想到这里，我脑子里产生一个想法。不，确切地说是某个想法成熟了。我奔过最后几个街区，跑进画室，又往阿连德家打了个电话。我问那女仆，太太临走前是否接到过从庄园打来的电话。

“是的。”女仆人犹豫了一下之后回答说。

“翁特尔先生打来的，对吗？”

女仆又犹豫了一下。我注意到了她这两次犹豫。

“是的。”最后她说。

顿时，一阵悲苦之感象魔鬼一样朝我扑来。果然给我猜中了！无限的凄凉伴着冷冷的自豪侵入我的心中：我自豪自己没有弄错。

我想起了马培利。

想到这儿，我拔腿就朝外跑。我跑进厨房，抓起一把刀又回到画室。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的那幅画还有什么意义！那些把我比作建筑师的蠢货们这回该有理由得意了！好象一个人能真正改变其禀性似的！他们当中有谁曾注意到在我这些建筑下面，以及思想性下面，有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呢？谁也没有注意！他们会有足够的时间看到这些断碎的柱子，残破的雕像，冒烟的废墟和地狱般的阶梯！这些东西好象一座恶梦化石博物馆。或一座绝望和耻辱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但是，有一样东西我打算毁得不留任何痕迹。我先看了看它，觉得喉咙痛苦地收紧了，但我没再多迟疑：我泪眼模糊地看到，那片海滩，那远方的女人，那焦急的等待怎样变成了碎块。我用脚践踏着一条条的画布，直到把它们搓踏成肮脏的碎片。那麻木不仁的等待再也别想得到回答了！现在我更清楚了，这种等待完全是枉费心机！

我跑到马培利家，但没找到他。听说他大概在比亚沃书店，我又跑到书店，在那儿找到了他，我扯起他的胳膊走到一边，对他说我要用用他的汽车。他奇怪地看看我，问我是否出了什么严重的事。我思想毫无准备，但仍旧临时想到对他说我父亲病重，当天没有火车了。他愿亲自送我去，但是我拒绝了，我对他说我要自己去。他再次惊讶地看了看我，但还是把车钥匙交给了我。

三十五

已经下午6点了。有了马培利的车，我估计4个钟头之内即可到达，这样，10点钟将能赶到庄园。“时间正好。”我想。一上通往银海城的公路，我就把车开到时速130公里。我开始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现在想起来是因为我终于要对她采取点具体措施了。对她，她曾经如同一个站在玻璃墙后面的人，我看得到她，但却听不到也摸不着；我们曾这样分隔在玻璃墙两边，在期待和悲伤中度日。

在这奇特的感觉中，时隐时现地包含着负疚、仇恨和爱恋的感情。她假说有病，这使我伤心；第二次往阿连德家打电话证实了我的猜测，这使我痛苦。她，玛丽亚，竟能轻狂地讪笑，能委身于那无耻的好色之徒，那自鸣得意的假诗人！我是多么蔑视她啊！我从回想她那背信弃义的最后决定中找到一种痛苦的满足：一方面是我，还有那天下午会面的诺言；我为何去那里呢？为了谈些忧伤而难堪的事，为了尽量理解对方的意思，为了徒然地想穿过玻璃墙触到对方，摸到对方，爱抚对方，为了重新梦见这不可能实现的梦。另一方面是翁特尔，他只需拿起电话一声召唤，她就会跑到他床上去。这一切多么可悲，多么卑鄙。

10点一刻时我赶到了庄园。为了防止发动机的声音惊动他们，我把车停在了大路上，然后下车步行。天气闷热难当，空

气似乎凝结了，只有大海的叹息声依稀可闻。月光时而透过云层倾泻下来。我从两排桉树中间的甬道上顺利地走了过去。当走近那高大的房子跟前时，我见底层的灯都亮着，心想，他们大概仍在饭厅里。

这种可怕的闷热是夏季暴风雨的前奏。饭后他们肯定会出来。我藏在花园里的一处地方等着，从那里可以监视从大门台阶上出来的人。

三十六

这是一种无止境的等待。我不知钟表走过了多长时间，这是全世界所有钟表上的共同时间。时间不了解我们的感情、命运，不了解爱情的成功和失败，也不了解等待死亡时的滋味。但是，在我的时间表上，它却是浩瀚的和复杂的，充满波折和反复，有时它象波浪翻滚的大河，有时又异常安静，象风平浪静的大海。我和玛丽亚面对面站在海边呆呆地对望着；又有时，它重新变成大河，如同做梦似地把我们带回童年，我看到她骑在马上奔驰，头发随风扬起，两眼晶莹如泉。我还看到自己在南方的家乡，我关在病房里，脸儿贴在窗玻璃上，闪着明亮的眸子看白雪。我们仿佛曾生活在相互并行的窄巷或是地道里，并不知道我们正在同时往一起聚拢，就象两颗气质相近的心朝一起聚拢那样，最终注定要在地道里的一幅画前相遇，那是我作的画，似乎是给她的暗示，秘密告诉她我到了那里；

告诉她地道终于相通了，相遇的时刻到了。

相遇的时刻到了！但是，地道真的相通了吗？我们的心真的沟通了吗？我这些想法都是些多么愚蠢的幻想啊！不，地道仍象以前一样是并行的，尽管现在隔开两条地道的墙似乎是玻璃墙，我可以象看到一个碰不着，不出声的影子那样看到玛丽亚……不，就连这堵墙也不总是玻璃的；有时它又变成黑黢黢的石墙，于是我不知道墙那边发生了些什么，此时她怎样，出了什么怪事。我甚至想象，在这段时间里，她的脸发生了变化，一只假牙使她的脸变了形。还想象她大概正与另一个男人调笑，我知道，地道里的一切全是我的想象，是可笑的虚构，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一条漆黑、孤寂的地道；我所在的地道；一条贯穿了我的童年、青年和整个一生的地道。在那石头隔墙的一段透明的地方，我看到了这位姑娘，并天真地认为她正由另一条平行的地道向我的地道走来。然而事实上，她属于一个广阔的世界，属于那些不生活在地道中的人所拥有的无边无际的世界；大概她是出于好奇才走近我那地道的一处奇特的窗口，来窥视我的无法解脱的孤独处境的；或许是我画里的无声语音，那关键的部分引起了她的好奇，因而在我沿着地道不停地前进的同时，她在外边过着正常的生活，也就是那种荒谬、怪诞，充满舞会、晚会、欢乐和悲哀的动荡生活。有时，当我经过一个地道窗口时，她正默不作声地，焦急地等待着我（为什么等待我？为什么默不作声和焦急呢？）；但是，也有时她没有按时到达，或者她忘记了我这个被囚在地道中的可怜人。于是，我把脸贴在玻璃墙上，看见她在远处微笑或无忧无虑地

跳舞。更糟糕的是有时完全看不见她，只能想象着她在什么难以接近的，不体面的地方。于是，我觉得自己命中注定要永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孤独。

三十七

就这样，我满脑子里转着大海和地道。过了很久，终于，他们从台阶上走下来了。当我看到他们挽着手臂时，我感到心凉了，僵了，仿佛变成了冰块。

如同那些没有任何急事要办的闲人一样，他们缓步走下阶梯。“他们有什么可着急的呢？”我痛心地想。然而，她却知道我需要她。知道下午我曾等过她，知道空等时的每一分钟我都在受熬煎。而且她还知道在她悠哉悠哉的同时，我正在冥思苦索的地狱里受折磨。在这个心灵极其脆弱的女人身上，暗藏着多么无情，多么冷酷，多么肮脏的兽性啊！她居然能用这样的神情望着天空，挽着他的手臂散步，（挽着这个下流胚子的手臂！）挽着他的手臂在花园里漫步，坐在他身旁的草地上，呼吸醉人的花香；尽管如此，她知道我此刻没有等到她，大概会给她家去电话，并已经得知了她来庄园的消息，她知道我可能觉得仿佛跌进了一片黑暗的荒漠，无数饥饿的小虫正噬咬着我的五脏六腑。

她居然同这丑八怪聊天！玛丽亚和这种不地道的人有何可谈的呢？她用的是什么谈话方式呢？

也许我是恶魔？此刻他们该不会在嘲笑我吧？我不是笨蛋吗？地道中的蠢人和传出秘密信息的人不都是我吗？

他们在花园里缓缓地踱着。暴风雨来临了，黑云压顶，还夹着电闪雷鸣。疾风从潘帕斯草原上吹来，开始下雨了。他们只好躲进楼里。我的心痛苦地狂跳起来。我躲在树丛里，心中感到我终于要揭破一个令人恶心，但却是多次想到过的秘密了。

我观察着二层楼上的灯光，那里仍是一片漆黑。不久我看到中间那一间的灯亮了，那是翁特尔的房间。至此为止一切正常：翁特尔的寝室正对着楼梯，自然应该首先亮灯。现在，另一房间的灯该亮了。玛丽亚从楼梯口走到房间的几秒钟时间里，我清楚地听到自己心脏猛烈跳动的声音。

然而，那另外一盏灯没亮。

上帝啊，我没有勇气说出是一种什么样的孤独忧郁压迫着我的心头！我觉得好象最后一条能够救我离开荒岛的船没有看到我的呼救信号，从远处驶了过去。我的身体慢慢瘫倒了，仿佛一下进了衰老期。

三十八

我站在随风摇摆的树丛中，被雨浇得透湿，我觉得过了一段无法平静的时光。最后，我那被泪水和雨水蒙住的眼睛看到另一个房间的灯亮了。

我只记得后来发生的事如同一场恶梦。我顶着狂风暴雨，

沿着窗栅栏攀上顶层。然后我顺着阳台摸到一扇门前。我来到走廊上寻找她住的房间：她门下的一道亮光向我指明了她住的房间。我手里攥着刀，颤抖着推开门。当她大睁着双眼看我时，我已立在了她的房门口。我走近她的床前，当我停在她身边时，她悲伤地说道：

“你要干什么，胡安·巴勃罗？”

我左手揪住她的头发回答说：

“我要杀了你，玛丽亚。你抛弃了我。”

于是，我流着眼泪将匕首刺入她的胸口。

后来，我重新摸到阳台上，迅猛异常地爬了下去，好象魔鬼附身了一样。闪电最后一次向我展示了我们曾一起呆过的地方。

我跑了。凌晨四五点钟时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从一家咖啡馆往阿连德家打了个电话，叫醒了他。我告诉他我要立即见他，一分钟也不能耽搁。随后，我直奔波萨达大街。那波兰仆人正在大门口等我。来到5层楼上，只见阿连德正大睁着无用的双眼候在电梯门前。我抓住他的一条手臂把他带进屋里。那波兰人象傻子一样跟了进来，吃惊地打量着我。我把他赶了出去。他刚走，我就对瞎子喊道：

“我刚从庄园回来！玛丽亚是翁特尔的情妇！”

阿连德的脸象死人一样绷紧了。

“蠢货！”他恨恨地咬牙切齿道。

我被他的怀疑态度所激怒，对他喊道：

“你才是蠢货！玛丽亚也是我的情妇和许多人的情妇！”

我感到有一种可怕的满足。与此同时，瞎子站在原地，如同石雕木刻的一般。

“是的！”我向他叫道，“我曾经欺骗了你，可她欺骗了我们大家！不过，现在她再也不能欺骗任何人了。你懂吗？再也不能了！再也不能了！”

“混帐东西！”瞎子象野兽一样嚎叫着，伸开爪子一样的双手朝我扑将过来。

我往旁边一闪，他绊在一张小桌子上摔倒了。他飞快地爬起身来，在大厅的椅子和家具中间跌跌撞撞地紧追着我，一边还嘶哑地干嚎着，嘴里只喊着一句话：“混帐东西！”

我推倒了企图拦阻我的仆人，顺着楼梯逃到了街上。我心中充满了仇恨，轻蔑和怜悯。

当我来到警察署投案自首时，已经快6点了。

透过牢房的小窗口，我看着新的一天怎样到来：天空的阴云已经散去。我想，许多男人和女人正在起床，然后吃早饭，读报纸，去办公室上班，或者给孩子喂奶，给小猫喂食，谈论头天晚上的电影。

我觉得体内有一个黑洞正在慢慢涨大。

三十九

在这几个月的监禁期间，我多次想弄明白瞎子说：“混帐东西！”那句话的原因。但是，一种极度的疲惫，或者，也许

是一种本能再一次阻止了我的企图。也许总有一天我会弄清楚的，那时，我就可以分析阿连德自杀的原因了。

虽然我疑心医生们在背后嘲笑我，就象在审讯过程中我疑心警察会在我说到画面上小窗口时嘲笑我一样，但是我至少仍旧可以画画。

只有一个人曾理解我的画。而现在这些画一定会越发清楚地向医生们证实，他们的观点是多么愚蠢。这样一来，这座地狱周围的墙壁也将越来越密不透风。

路易斯·恩里克·德拉诺是智利颇享盛名的现代作家，1907年出生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曾任驻欧洲记者，在许多国家担任过领事职务，后来又担任智利著名进步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私人秘书。他是位多产作家，作品有杂文、报导和小说。主要的小说有《被囚禁的女孩》(1928)，《岛上的亮光》(1930)，《在专制皇帝们的城市里》(1940)，《火的港口》(1955)，《支部》(1958)等。他的作品大都反映了作者对当前社会和政治的忧虑和不安。

50年代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独裁统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支部》的作者以独特的手法表达了那个时期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人民可歌可泣的斗争史实。作品虽然以政治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处于非法的共产党基层支部的活动，但它仍不乏浓厚的生活气息，再现了一群被崇高的共同理想紧密联系起来的普通人的爱和憎、欢乐和忧伤。小说以一对青年人的爱情为线索，通过对主要人物的细腻刻画描绘，有力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一部分青年人在共产党的教育下对光明未来的向往。

书中的主人公奥尔加是个在党组织多年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有理想有抱负的姑娘，她冲破世袭保守的家庭羁绊投入革命的洪流，并在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平时，她对党的工作任劳任怨、不畏艰险；对待自己的同志满腔热忱；在对待爱情上，她摒弃了资产阶级社会青年人的虚伪追求，经过长时期的了解和观察，同青年工人帕托建立了同志式的深厚的爱情关系。从此以后，帕托在奥尔加高尚的情操的影响和熏陶下，由一个胸无大志的电影迷终于成长为一名立志为正义事业献身的坚强战士。

作品虽然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但它并没有给读者留下忧伤的感觉。相反，通过支部书记格林对奥尔加的回忆描写，更加突出了主人公的英雄形象。最后，当格林去医院看望帕托时，他们的一番对话，使我们确信：革命虽然遭到了暂时的失败，但埋在人民心里的革命火种终归有一天要燃烧起来的。

本书似乎对帕托的思想转化过程描写得过于简单，但对主人公奥尔加的塑造还是成功的。总之，《支部》是一部值得向我国青年读者推荐的一部好作品。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天津外语学院中文教研室陈邦俊同志的大力帮助，在此特表示谢意。

第一部

餐馆里

一

“喂！达林，今晚咱们到哪家影院？”

刚说完这句从罗克·赫德森的一部影片里模仿来的台词，我觉察到自己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向我走过来的姑娘。奥尔加漫不经心地瞅了我一眼，顿时我觉得四周的血液一下子涌到了脸上，一阵尴尬，整个脸都涨得通红。

“您还要些什么？”她可能认为我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又过来问我。

我连忙趁机摆脱了愣怔怔的神态，清醒过来后，又要了杯咖啡和几片面包。不一会工夫，她送过来，放在桌子上。

餐馆老板彼得罗先生从收款处若无其事地向我点头微笑，好象注意到了我的惶恐不安。我对他寒暄了几句，赶紧低头默默地使劲搅动杯子里的咖啡。黑色的液体快速地翻腾，它犹如我的生活。

奥尔加又朝我看了一眼。我注意到她略带红色光亮的黑发

垂至双肩，一束发波掩遮住右耳，晶莹的左耳露在外面。不知为什么，她那只花瓣似的粉红色透亮的耳朵竟招我如此迷恋，要是能过去吻它一下该多好哇！啊呀！帕托，你想到哪里去了？

她和这个餐馆过去的一位服务员马利亚迥然不同。那时，马利亚到“兰加吉纳”工作后的第三天，我就邀请她出去散步。我们还有过两个月的交往呢！后来不知为什么我就讨厌起她了，很快就断绝了往来。没过多久她又跟化验厂的一个小伙子好上了；接着，“阿吉拉”印刷厂的一个排字工人又取而代之。她同这个工人如胶似漆，经常在一起厮混，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接吻，连彼得罗先生也不回避。后来排字工人离开了她，她又同一个新入伍的士兵纠缠不休。每逢星期六晚上，小伙子必来找她，坐在餐馆里等着，直到彼得罗先生关了门，他们才手挽手消失在朝阿拉梅达方向的马依波大街昏暗的林荫道上。

奥尔加是马利亚走后一个星期到餐馆来的。据说马利亚这会儿混得还不错，一个宪警军官看上了她，还给她买了栋房子。这并不奇怪，因为她长得并不丑，就是为人有点轻佻，心肠也有点柔弱。论她的相貌，着实惹人喜爱。不仅这些，她的身材也很美，有着两条挺动人心弦的长腿。奥尔加刚来的时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尽管许多人象我一样，一天要到“兰加吉纳”去好几趟。她就是那么一个人，乍看上去会使你有一种错觉，觉得她的相貌并不十分出众。但只要你仔细端详她那细腻白嫩的皮肤，就会发现她有一种难以描绘的内在

魅力。因为除嘴唇涂一点口红外，她并不注重化妆，微微弯曲的细眉下面，两只不怎么深陷的眼睛却显得格外清澈明亮；她的嘴似乎有些大，但两片嘴唇实在是独有妙处。不过最使人羡慕的还是那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

我慢慢喝完咖啡，却没有理会它是什么滋味，因为我正在凝视着奥尔加，似梦非梦地想着什么。此时此刻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唯一的希望是她能转过身来象电影里达纳·安德罗斯或柯克·道格拉斯那样，用羡慕的目光来瞧我一眼。我不时地向她望望，却总也发现不了她在看我。不过后来我们的视线还是相遇了，我们相互微笑了一下。我顿时觉得无限的欣慰，我知道我的冒险已初见成效。

“小姐，请来杯啤酒。”

可是，偏偏这会儿她过去招待新来的顾客。我暗自担心这么一来，她会把我们刚刚开始友好讯号忘掉。但出乎我预料，不一会她走了过来，大大方方地坐在我的面前。

“您可能还以为我是白痴吧！”我说，“我曾想引起您对我的注意，但看来您鄙视那种装腔作势的样子……您还是有理智的……总而言之，我想请您去看场电影……如果您认为方便的话，我将非常高兴地陪您。”

“谢谢！”她说，“现在不行，11点我才下班……改天吧……”

“明天？”

“明天？明天星期几？……星期三，也不行。大概星期六可以……星期六我9点下班，那天您可能还有约会吧……”

“没，没有。即便有，我也会改期的……我同意在星期六……您别忘了。”

我三口并作两口喝完了已经放凉了的咖啡，向奥尔加微笑着走出了餐馆。这是我们最初的接触，尽管有些不自然，但还算成功。离星期六还有3天，3天，要等待3天才能同她会面，对我来说可真太久了。到那天，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就达到了某种程度。譬如说，我就能吻她那花瓣似的耳朵了吧。

第二天中午，我又到了“兰加吉纳”。平时，我回家同母亲和弟弟一块用午餐。这天，我决定到这里来吃午饭。这是一顿很糟的快餐，用餐的人很多，他们全是附近化验厂和印刷厂的工人。我们厂只有技工班长索托师傅和一个看管油泵的小伙子在这里吃饭。索托师傅是因为家住得太远才来的。大部分桌子被化验厂的年轻女工们占了，她们还系着散发出苯胺酸味的白围裙，几个女工自己带着三明治和水果，只买杯咖啡或汽水，就匆匆忙忙地吃起来了。

奥尔加和另一个临时帮忙的招待（我不喜欢这样的称呼，可是在“兰加吉纳”，人们都这么叫）显得格外忙碌。彼得罗先生从他高高的收款台上用平静而机警的目光俯视着整个店堂。他曾经说过，望着他的餐馆里络绎不绝的顾客，简直是一种美的享受，不仅仅为了现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钱柜，而且也为了所有这些人，排字工人、化验厂的女工愿意光顾他的“兰加吉纳”而不到附近别的餐馆而感到骄傲。

我坐在靠近大桌子的座位上，想找机会能跟奥尔加攀谈几句。她用眼睛向我默默致意，而后就赶忙去伺候别的顾客了。

厨房里一锅滚开的热汤溢出来流到炉灶上，发出一阵阵咝咝的声响，紧接着，令人惊恐的火苗骤然升起，大家警惕地回过头，唯恐一场火灾就要发生。但过了一会儿，一切都平静下来了，厨师胡妮达这才松了口气，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奥尔加一会儿走进厨房，一会儿又走出来。她把顾客们的饭菜单交给厨师，又端着两盘热气腾腾的菜出来放在顾客面前；斟咖啡，上面包，摆餐巾纸，满面笑容回答顾客们的提问。她干活显得那样娴熟利索，井井有条，纹丝不乱。难怪两天前当我付啤酒钱时，彼得罗先生对我说：

“你觉得这个新来的招待怎么样？帕托（我的全名叫帕特里西奥·拉米雷斯，可是大家都叫我帕托），她和马利亚不一样吧？你瞧，她对顾客照顾得多周到……一分钟也不偷懒；从没有出过差错；更不会发脾气，尽管那些粗鲁的印刷工人大声地催促她，还说些不中听的话……她可是个规矩正派的姑娘，这样的人现在可真少有哇！帕托，我得留住她，星期六我付给她第一周的报酬后，马上给她增加工钱。你说呢？”

我望着她从一张桌子向另一张桌子走去。

“先生，可口可乐没有了，来杯汽水吧？”

“好吧。”

“小姐，给我来个奶酪蕃茄三明治。”

“马上就送来，请等一会儿。”

快到一点了，化验厂的女工们陆续离开了餐馆，只剩下了“阿吉拉”印刷厂的几个排字工人。

“到这儿来以前您做什么工作？”我问，“您一定累了

吧？”

“是的……有点儿累。”

“您几点吃饭？”

“一会儿就吃，等这几位印刷工人走了以后。”

“这么忙，您不应该在这里待下去，您看，这儿连……”

出于习惯，我正要说不撒尿的工夫也腾不出来，忽然，一种无形的力量告诫我收住了口。可是，在我同马利亚的交往中可不曾忌讳过这类粗话。这种自我告诫却使我立即意识到跟这位姑娘说话可不能随随便便……

“活是不少，但在午饭和晚饭之间有一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利用这段时间我还可以看会儿书……”

“您喜欢读小说？”

“喜欢。”

“我也喜欢，喜欢读有刺激性的小说。”我用自以为是的口气说，目的是想让她对我称赞几句，“现在我正读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书名叫《刚果的血》。如果您想看，可以借给您。”

奥尔加笑了。她这么一笑，使我在这24小时内第二次感到自己的愚蠢。这女孩子到底喜欢读什么样的书呢？我真希望从我对文学的爱好中能多找些我们共同的语言。

“我不太喜欢读这类书。”她说。

“那么您一定是喜欢看描写爱情的书喽？”

“不管是爱情的还是别的什么，我喜欢读反映现实生活的，而不是幻想的小说。”她顺手从桌子下面拿出一本书——“现在我正在看这本书。”

那是本题为《不幸的情人》的书。啊哈！我明白了，原来她喜欢看带刺激性的爱情小说，就是人们常说的色情小说。但是我却装腔作势地对她说，我也希望能够阅读她喜欢的文学作品。不过我想，最使我激动的还是我们的星期六的约会。她会在星期六看到，帕托·拉米雷斯将比她的那些《不幸的情人》幸福得多。

二

对星期六的约会我已经作了非常周密的安排。我仔细翻阅了报纸广告副页，终于找到一部她可能喜欢看的电影，由夏娃·加德纳主演的《一贫如洗的伯爵夫人》。准备去看夜场，然后陪她到塞佩林跳舞。再后来嘛……那就取决于我了，但根据我的经验……在电影院里趁黑暗我可以跟她拥抱；然后在舞场上朦胧的灯光下紧紧地搂住她跳探戈舞或欢快的曼博舞^①，总而言之，这些都是节奏感很强的舞蹈。难道不是吗？

我还得想办法把奥尔加缠住，不让她在电影散场后离开我。难道她不会借口第二天要早起吗？不会的。“兰加吉纳”星期天不营业，因为化验厂停止工作，印刷厂的工人不上班，只有少数的职员工作。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块儿玩个通宵呢？

4点多钟我干完了修理厂的工作。老板让我留下再整修一台发动机，还答应付给我额外工资。我说我有急事，星期一再

① 曼博舞是古巴的一种节奏很强的舞蹈。

干吧。他没有办法，只好依了我。我连手上的油污都没来得及洗，跳上自行车往家赶。我还顺路到餐馆再向奥尔加提醒一遍不要忘记。她笑容满面地迎出来。

“9点整？”

“对，9点整。”

我向她点了点头，骑上车不大一会功夫就蹬到家了。母亲已经出去，不在家倒也好，每当她看见我从柜子的衣架上取下那件蓝上衣和尼龙衬衫时，总是问这问那，唠叨个不停。真讨厌！那件尼龙衬衫是我从阿里加的走私商那里买来的；那条深紫色斜条纹的领带嘛，是我弟弟劳尔在圣迭戈大街的一家商店里发现的。一天晚上他对我说：

“帕托，我发现一条领带，和蒙哥马利·克利夫特在电影《熄灭的野心》里系的那条一模一样。”第二天我赶快去把它买下了。那商人竟然向我要价700比索。但它确实和影片里的领带一模一样。

冲完淋浴刮过脸，换上衣服梳了梳头。穿起蓝上衣再配上尼龙衬衫和时髦的领带，对着镜子一瞧，真够精神的。可是奥尔加会怎样评论我呀？难道我不如小说里的“可怜的情人”漂亮吗？

提前一个小时离开了家，9点整便出现在“兰加吉纳”门口。奥尔加一见到我真大吃一惊，她睁大眼睛看了我半天，仿佛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您下班后穿这身衣服看上去挺合身，尤其是这蓝上衣，太好了。”当我们向阿拉梅达方向走去的时候，她这样评论。

“谢谢！”

她尽管没有特意化妆打扮，还是选择了她最好的一件夏装，一件带图案的咖啡色短袖衫。说真的，她的衣着虽不象我的蓝上装、时髦的斜条领带那样引人注目，但她还是显得那么漂亮、端庄、文雅、大方。蓬松的黑发散披在肩上；刚涂过口红的双唇使她的嘴不怎么显得大了，这会儿我才觉得那是张我从未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嘴。

我们迈着愉快轻盈的步子，迎着夏夜拂面的清风，感到无限的清新舒畅，她那袒露的手臂有节奏地挥动着手里的提包，仿佛忘记了我的蓝上衣，忘记了我在她身边，忘记了所有的一切。这时我多么希望她能对我的领带评论一番，或者问问我用的什么牌子的发蜡。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但她仍旧漫不经心地微笑着缓步往前走。

“我们去看什么电影？”她突然发问。

我正要告诉她《一贫如洗的伯爵夫人》，又连忙收住口，想先试探一下她的意思。

“您希望看哪部电影？”

“我想看看《大街》。”她直截了当地回答。

“《大街》、《大街》。”我机械地重复着，“哪家影院放这部影片？”

“旗帜影院。”

“那么咱们去吧！”

《大街》是一部相当粗糙的片子，演员也都没有什么名气。它描写的是一个到处流浪的杂技演员如何绝望地杀死一个可怜妇女的故事。它一点儿也引不起我的兴趣，既没有漂亮的

女明星，也没有色情的镜头，更没有身高1米90、穿戴时髦系着我这种领带的美男子。但是却有不少感人的场面，我几次觉察到奥尔加伤心地抽泣。我想低声跟她说话，她好象嗓子里堵了什么东西，一句话也说不出。

那时我可真有点儿害怕，扯了一下她的手，大概她有些愕然，慢慢地把手缩了回去，仍然全神贯注地望着银幕。这是我伸出手臂搂住她的后腰使我们的头靠在一起的最好时机，然后还可以吻她。通常总是这样，而实际上我没有这样做。

我不能，因为同她在一起还是谨慎为妙。顿时，一种难以忍受的自我怨恨油然而生。自己也弄不清从什么时候起我在一个餐馆的小小服务员面前竟会如此胆怯？难道我是第一次同姑娘打交道吗？我鼓足勇气决定去拥抱她。不过得找个更适当的时机。我从侧面看了她一眼，她依然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前方：鼻梁周正，鼻尖微微上翘，双唇紧闭，嘴角稍微下垂，下巴略向外突出。从长长的脖子一直到双肩和领口袒露的皮肤在昏暗的光线下都显得模糊不清……

我不能！很简单，不能这样放肆地去拥抱她。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不得不告诉他，不知道。

我们夹在杂乱的人流中离开了影院。我发现奥尔加这时的微笑仍略带忧伤。此刻，仿佛我们之间有些疏远，看来这会儿邀她去塞佩林跳舞太不是时候。也就是说，我原先的计划安排已经全部落空。由于这场倒霉的电影，奥尔加的兴致早就跑到了九霄云外去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冒昧地问她：

“咱们去喝点冷饮或跳会舞行吗？”

她看了我一眼，象是先试探一下我的意图。

“好，那就去喝杯咖啡吧。”

我们坐在大学对面阿拉梅达的一家咖啡馆里，奥尔加不管我爱听不爱听，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了那部影片的艺术价值和其他的事情。此时此刻，我穿着这身衣服，系着这时髦的领带，头梳得油光锃亮，和一个漂亮的姑娘坐在一起喝咖啡，要是让我的朋友们看到，他们该会说些什么呀！

三

星期一，我又看见她系着白围裙，两手捧着一大摞盘子，在桌子间不停地走来走去，显得格外忙碌。这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她就是跟我在阿拉梅达并肩散步、后来又送她回家的那个既有点儿忧郁又有些羞涩的姑娘。那天晚上，凉爽的微风阵阵吹拂，树上的枝叶飒飒作响。奥尔加头也不抬，只顾往前走，不时扭过脸向我微笑。大概她猜出了我的心思，或许是意识到了我难以掩饰的颓丧心情，因为我原先的安排全都落空了。

“帕托，今天晚上我非常愉快。”她说，“看来您有点儿不太高兴，是吗？这很自然……我可能不是您所想象的那种姑娘……我不会讨人喜欢，我就是这种人。但我有我的爱好，也有我的欢乐。只是这种欢乐不在舞场，也不在碌碌无为的消遣上……我想似乎我已经使您失望，因为我没有服从您的支配，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本想否认她的话，可又觉得我的心扉犹如一扇透亮的窗子，实在无法隐瞒我的情感。

看我不吱声，奥尔加又接着说：

“好啦！我是第二次经历这种事了。一个小伙子曾经爱过我，只是由于性格和爱好的不同，他始终不能理解我……”

她这番话使我产生了同她分手的念头，但这时自己的内心又感到非常矛盾。在朦胧的路灯光下，我望了她一眼，发现她的容貌比任何时候都令人陶醉迷恋。我怎么能舍得斩断我们刚刚建立的一缕情丝呢！同她一刀两断的想法简直难以见于行动。奥尔加用那双动人的眼睛也看了我一眼，张了张嘴没有说话，似乎想让我先开口。

第一次约会我们没有很好地相互了解，难道就此分手吗？不能，绝对不能。我冷静下来仔细地分析了我们隔阂的根源在哪里，得出的结论是这种隔阂本来就不存在。大概问题在我这方面，那天晚上我只是单纯地想同她在一块儿待个通宵，通宵跟她……可后来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呀！尽管这样，也不至于就此结束我们刚刚开始友谊。看来任何事情都不宜操之过急，最好是继续保持我们的关系。

马路上两辆汽车风驰电掣地驶过，好象在进行一场比赛。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突然停下来。

“好吧！”我颇有些胆怯地小声说，因为我的力气不是用来发表演说的，“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差别，爱好也不会完全相同。我觉得时间长了咱们是能够相互了解的。奥尔加……我认为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不可消除的障碍。过去不认识，现

在认识了。将来我们还会更好地了解。”

她的眼睛里立刻闪烁起光亮，令人满意的是我终于把鼓敲到了点子上。

奥尔加突然转过身挽起我的胳膊，亲切地对我说：

“帕托，这才是我希望听到的。”她又用手攥住了我的手腕，说道，“你真的喜欢我吗？从见面的第一天起你就喜欢我，是吗？我想今后你会更喜欢我的。”

“第一次见面我就爱上了你。”我厚着脸皮撒了个谎，但我不得不这样说，“后来就越来越喜欢你了……”

奥尔加的脸上终于绽出了满意的的笑容。她笑得是那么甜蜜自然，并且越加亲昵地挽住了我的胳膊。这时，我心里觉得甜丝丝的。

拐过巴西大街，朝她家的方向走去。到门前，我看见一幢好象比我家更简朴的小房子，我已经知道了不少关于她的情况：她是个孤女，同她做家庭裁缝的姐姐相依为命。奥尔加读到人文学三年级就不得不停学找了工作，但她仍然坚持读夜校，修完了四年级的课程。她喜欢学习读书，但为了维持家庭的生活，她忍痛放弃了学习机会。她曾经做过许多工作：当家庭教师、帮人看孩子、在市中心的一个商店里当售货员……

“凭你受过的教育，你完全可以胜任办公室秘书的工作。”我说。

她又笑了，而且笑得那么自然。

“我也那样想过。我还在一个财产经纪人的办公室里工作过两个星期呢。一天，主人亲昵地邀请我晚上同他出去……我

非常气愤，当即就辞掉了工作。他们那些人希望雇员什么都应该干……帕托，我可不是那种女人，我甘愿做一名正派的工人，不愿当卖弄风骚的职员。”

“那么你对餐馆的服务工作满意吗？”

“有可能的话，我当然希望找一个比这更好的职业。但是在这里起码工人们都是些正派人，他们尊重我。”她笑了一声，“你不知道，他们第一天给我的印象可好啦……他们还争着给我小费：‘小姐，这是给您的。’把一两张10个比索的钞票硬往我手里塞……我不得不一个一个地说服他们，不要付我小费，我在这里工作，老板已经付给我工资了，在劳动人民之间付小费不合适，这是一种侮辱……只有资产阶级才那样呢。”

在她家门口，我们站着交谈了10多分钟。时间过得真快，我多么希望跟她谈个通宵啊！奥尔加也让我讲了许多我的经历，我对她说了我在工艺学校学习的情形，以及又为什么不得不辍学工作，挣钱来接济母亲和弟弟的生活。当我说到我的爱好是踢足球、看电影和读带刺激性的小说时，她竟然放声大笑起来。但她这时候的笑已经不再使我面红耳赤了。告别时她答应借给我几本书看。说真的，那天晚上过的确实愉快，而且比我原先设想的更愉快。

我坐在大桌子旁，耐心地等待着她能腾出空来跟我说上几句话。天十分闷热，我要了杯啤酒坐在那里消磨时间。她可能也发现我的穿着变了，一件灰色的短袖衫，而且两手油污。讨

厌的油污，尽管我用浸汽油的棉丝擦洗了许多次，渗到皮肤细纹里的还是怎么也洗不干净。

好不容易她才走到我跟前坐下。正午的闷热，厨房里难以忍受的呛人的油气，再加上她来回不停地走动，本来红嫩的面颊变得没有光泽，显出疲惫不堪的样子。她拿出手帕，缓慢地擦去前额的汗珠。

“你可真忙啊！……”

“嗯……这会儿是顾客最多的时候。”她把手伸进餐具柜里，我见她腋下的衣服湿了一大片。“这是我给你带来的一本书，拿去看吧！这里面可没有那么多带刺激的东西，不过等你习惯了这类作品，会觉得它们非常有意思。”

“谢谢！”

我顺手翻了翻那两本书，一本《不幸的情人》，一本马克西莫·高尔基的《母亲》。我凝视着后一本书作者的肖像，他是位唇上蓄着短髭、头上留着短发、身穿短上衣的老头。这时我发现奥尔加在大桌子的另一端同一个男人在说话。起初还以为是顾客，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要。他穿件灰色上衣和敞领衬衫，看上去他刚刮过脸，两腮还有些发青。他向奥尔加问了些什么，她低声地回答。我仿佛听到“同意”两个字。过了一会儿，那人笑了一下便走出了餐馆。

我真不喜欢这种事，可又无法去向她问个究竟。只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自言自语地说，嫉妒是不是还太早，但我真的没有勇气向她询问他是谁，而她对我也只字未提。疑虑在我内心深处开始萌发，我想总有一天，她会对我解

释明白的，那时就能知道那个穿灰上衣的不速之客到底是什么人了。

四

她告诉我9点下班，让我路过餐馆时顺便陪她回家。

“我骑自行车，”我对她说，“但我可以把车存放在修理厂。”

“为什么？难道不能骑车带我吗？”

“当然可以，我还带过比你重的人呢！”

“那末……”

她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两手搭在我扶车把的手上。我比驾驶一辆凯迪拉克56型汽车还要得意地开始蹬起来。她的后背和肩膀偎依在我胸前，被风扬起的长发几乎拂在我的脸上，随着车速的加快，她的整个身子越加紧紧地贴在我的怀里，再加上她的秀发散发出来的强烈芳香，我仿佛有些陶醉了。为了多享受一会儿这美好幸福的时刻，我故意放慢速度让车子滑行，拐过阿古斯蒂纳斯大街，自行车缓缓地朝她家的方向滑去。

车子载着它的主人和他心爱的乘客，贴近人行道徐徐向前。这时候我真有些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要同她接个吻真是再方便不过了。然而，一到巴西大街，是她首先回过头轻轻地吻我一下，作为对她友好表示的回答。我将面颊更紧地贴在她的头发上。就这样一直到了她家的门口。

她敏捷地一跃从车上跳了下来，我把车停稳，和奥尔加一

块儿站在门前。

“这种散步可真有意思！”她说着顺手拉住我的胳膊，
“蓝上衣诚然漂亮，但我更喜欢你穿这件短袖衫。敞开衣领，袒露双臂，这样看上去你显得更结实，年轻，活泼。”

我伸开双臂激动地把她搂在怀里，我们的嘴唇接触在一起。这种出于内心冲动和喜悦的亲吻包含了无限的深情。它使人真正感受到热恋的甜蜜。她赤裸的双臂也用力将我抱住，我的嘴唇居然触到了她整齐的牙齿，我越加陶醉了……几分钟过后我们才松开手，奥尔加仿佛刚从梦中惊醒，羞答答地急促后退了一步。在不很暗淡的路灯下，我注意到她的脸象朵盛开的玫瑰。

“你过于激动了！”她头也没抬说，“我也……咱们可得注意呀！帕托……”

“说得对，我亲爱的……”

“今后可不能这样轻易地冲动……”

“嗯……”

“这多么危险。”

我什么也没有说，她拿出钥匙开了门。

“明天见！帕托。你回家吗？”

“当然。”

“晚安！”

她飞快地又过来吻我一下，转身消失在门里了。

再上自行车之前，我呆呆地站在原地冷静了好长时间。每当我回想起那天晚上奥尔加对我流露的深情时，我仿佛觉得真

正的生活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的。

星期三，在修理厂和“兰加吉纳”，人们谈话的主题，不外乎工人统一工会发动的全国范围的总罢工。一个工友问我对此有什么想法，我耸了耸肩膀没有回答。他们都知道我对政治一向漠不关心。我在工艺学校念书的时候，同学们时常对我谈论起这类事情，但说什么我也听不进去。学校里的党派五花八门，什么激进党、社会党、共产党、长枪党。他们都争着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然而我对任何党派统统不感兴趣。虽然他们都是很好的小伙子，是同我非常要好的同学……干嘛一定要卷到那些党派之争和政治搏斗的旋涡里去呢！那时我心目中的英雄、最崇敬的人物，是萨波·利文斯顿，罗基·马西亚诺，卡洛斯·加德尔，托尼·柯蒂斯，约翰·雷。他们都同政治毫不相干，自然我也不应该参与。

所以，我长期以来甘当自由战士。我弟弟劳尔是民主党人，他曾希望我参加他们的集会，我没有同意。在修理厂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是社会党人。他们挖苦我是非政治主义者。对他们的讥讽我只付诸一笑。一如既往，我们仍旧是很要好的朋友。

在餐馆的饭桌上，几名印刷工人大声谈论着，他们认为这次全国性的工潮将是史无前例的。

“政府会垮台吗？”

“谁知道呢？……依我看还是垮台好。”

“他们扬言要把所有卷入罢工的政府职员和大学教师统统

开除。”

“让他们开除吧！”

“他们不敢。”

“学生联合会已经通过决议，要配合罢工的行动。”

和前几次一样，我仍坐在大桌子旁。因为在这个位置上能有机会同奥尔加聊几句。

“你们修理厂也罢工吗？”她走过来问我。

“正准备呢，还没有最后决定。今天下午投票表决。你呢？亲爱的。”

“我也停止工作，已经告诉彼得罗先生了……他不得不关门停业。看见了吗？印刷厂和化验厂都罢工了。”

“也就是说明天咱们就不能见面了。”

她沉默了。

“喂，我想起来了，咱们可以去看电影。”

“所有的影院也都停演，帕托。再者我要到阿尔德萨诺斯广场参加集会……如果你愿意，用自行车带我去好吗？……”

“当然可以：我的心肝。”

商定了第二天再见面，我便赶紧回到修理厂。全厂的工人已经集中在大车间里讨论要不要罢工。老板也在那里一声不吭地低头抽他的美国烟。平时他和工人们相处得还算不错，人们还经常拿他的烟抽呢。一个机械师首先发言，他认为没有必要进行罢工。“如果是为了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我第一个投票赞成。”他说。接着社会党人班德拉斯讲话，说了将近20分钟，他谈到了关于通货膨胀和向当局示威的问题，最后号召大

家起来举行全面罢工。

末了，大会秘书让大家表决：响应工人统一工会号召同意罢工的举手。

刚才一直低头大口大口抽烟的老板这时突然抬起了头，把炯炯的目光投向举手的工人。

绝大多数工人都举起手。尽管我的赞成并无关全局，我也举起了右手。

散会后，我推着自行车往外走的时候，看见老板站在厂门口，若有所思地用手理着剪得很短的花白头发向街上张望。平时他跟我的关系不错。每当我在干一件难度较大的活时，他总喜欢站在我跟前看我干，有时点头称赞，有时给我指点几句。

“最好先把这个螺母拧下来……”一般说来，他说的有道理。他是一名老练的机械师，或者说他以前是，只不过现在的工作只是监督我们干活了。

“再见！恩里克先生。”我向他告别。

他嘟哝了几句。我没有听清他说的什么。只见他用埋怨的目光瞟了我几眼，仿佛对我也赞成罢工的行动表示强烈的不满。

我有些悔恨自己，干嘛要举手呢？当时我的动机一定是希望博得奥尔加的高兴。

阿尔德萨诺斯广场上人山人海，热闹异常。推着自行车根本无法走近主席台。我们只好在离主席台较远的地方站着。我遇见了许多熟人，他们大都是“兰加吉纳”的常客。“阿吉拉”印刷厂的工人们佩带着写有他们工会名称的宽布带。奥尔加兴

致勃勃地向在主席台上演说的人热烈鼓掌，同大伙一起唱歌，呼口号；购买报纸和宣传品。当动员为工人统一工会募捐的时候，只见她慷慨地从钱包里拿出一张50比索的钞票投入募捐箱里。她还是个颇孚众望的活跃分子。认识她的人可真不少，示威群众里许多人兴高采烈地向她打招呼，问候，致意。对她来说，简直是在过节日。

可是我却有些不耐烦了，想赶快离开这里。最好能去公园换换空气，从这儿能望见森林公园耸入云天的高大树木。到那里我们可以手拉着手坐在长椅上。奥尔加可能看透了我的心里，回过头对我说：

“如果你愿意，咱们走吧！帕托。”

我点头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开始穿过拥挤的人群往外走。过了桥，她又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我们沿着玛波丘火车站向西边骑去。在这远离汗气蒸腾的群众会场的地方，夏天的傍晚显得分外静谧。一阵微风迎面吹来，拂起她那秀丽的长发，几乎蒙住了我的眼睛。奥尔加和我都佩带着写有工人统一工会缩写字母的红布带。可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骑到街角拐弯的地方时，一个宪警恶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多管闲事！难道连佩带标志的自由都没有吗？岂有此理！我学着他的样子，也回敬了他一眼。大概是想找我麻烦吧！可是我的自行车有脚蹬，车灯、手闸，样样齐全。兴许是不允许骑车带人吧？

到了她家的门前，我们亲吻告别。每次同她分别总有些难分难舍，要是能永远呆在一起该多好哇！开始那种一见到她就有些胆怯的心情已经逐渐消失。那个时候，我曾不断地告诫自

已，在她面前说话可得注意，绝对不能冒出半句粗俗低级的傻话。我总担心，象在我们初交时说的那种不中听的愚蠢言语再脱口而出。好几次话到了嘴边，又咽下去了。仿佛有人在不断地提醒我：奥尔加可不愿意听这类粗话。然而，我不吭声倒也好，听着她滔滔不绝的演说，还增加了不少知识。我知道，在她面前我未免过分装模作样了。但我宁愿这样，也不能信口开河，在她的眼里降低我男子汉大丈夫的尊严。

那种持续的戒备状态随着我们之间关系的发展逐渐消失了，更确切地说，就是在我们第一次正式接吻的那天之后，那种戒备便不复存在了。但这也不是说该轮到我不宰她了，不是的。她接受了我的亲吻，就意味着她已经把我当作她的知心人了。因此，我的自卑感也随之消失了。然而，我又开始感觉到我就是我，谈吐应该落落大方，坦然自若。

刚才我们骑车回来的路上，还筹划一次有意义的旅行：一块儿到卡塔赫纳海滨，到海里去游泳。

“奥尔加，咱们可以这样。我现在正修理一辆道吉牌小轿车，我同恩里克先生说说，星期天我去试车。这样咱们可以开车到海滨去。”我原以为她听了以后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可是出乎意料，她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你不愿意吗？亲爱的。”

“当然愿意，但依我看没有必要开车去，路上车辆很多，别万一出什么意外。何必呢？……再者也没有人强迫咱们开车去，为什么不可以跟大家一样乘火车去？车票钱同开车去来回的汽油钱也差不多。”

“当然不一样喽！”我有些不高兴地说，“开车去又怎么了？我要是不会开车，也就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了。”

“我不是怀疑你的开车技术，帕托。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为你好，不想让别人对你的工作提出半点非议。另外，我们又不是资产阶级，何必摆那个阔气呢！”

这是我第二次，也许是第三次听奥尔加用资产阶级这个词。我还不十分清楚资产阶级的真正含意，但就我从书中所见，我想大概指的是那些大腹便便、衣冠楚楚的富翁吧。

“我们当然不是资产阶级！”我有点儿生气地辩解说。

“那么……”

很快我们就达成了协议，我负责购买车票，她准备吃的东西，为了避免到饭馆吃饭。我们计划乘第二天早上6点到海滨的短途旅行列车。我们还打算在那儿多晒会儿太阳，多呼吸些那里新鲜的空气，尽量晚点儿回来。

“你有游泳裤吗？”

“有，你有游泳衣吗？”

“有，不过是旧的，但还可以穿。”

“比基尼！”

“不，帕托，当然不是。”

五

星期天，车站里的拥挤场面简直无法形容。一群群的旅行度假的人们，有背行李包的，有提食品袋的，有扛活动帐篷

的，还有腋下夹毛毯或吉他的，人流从公共汽车上泄下来匆匆忙忙地向后站台上拥去。6点整，一列旅游车靠了站，人们争着拥向车门。我拉着奥尔加的手在欢腾的人流中往前奔跑，我们终于上了车，还占了两个座位。在车厢里，人们仍然吵吵嚷嚷，为了座位争吵不休。喧闹声、呼唤声连成一片，不一会儿车厢里便塞满了人。

“我们这边晒太阳……”

“好啦！我的宝贝，忍一会吧！我们差点儿占不上座位，”

奥尔加快活得简直象个孩子。她穿件咖啡色运动衫和一条深绿色麻纺紧身的裤子。她的这身穿着使我记起了卡特琳在一部我不记得名字的影片里的模样。但我不想对她说这些。这时她兴奋地哼起了歌曲，一会削水果，一会从纸袋里拿出葡萄；有几个年轻人齐声唱起了时髦的流行歌曲。我相信要是奥尔加会唱的话，一定也会附和着他们唱起来。

满载乘客的列车一声长鸣，愉快地驶出了车站。铁路两旁碧绿的葡萄园、一片片金色的麦田和偶尔出现的家禽饲养场，被呼啸的庞然大物抛向后方；时而还望见稀稀疏疏的农家草舍的房顶上晾着黄灿灿的玉米。

沿途的车站一个接一个地在我们面前展现：迈依普、乌尔塔多、马约科、塔尔甘德、埃尔蒙德、奇尼格、埃尔马尔科、迈里比利亚。当列车在迈里比利亚一停下来，一群小贩立即围过来，乘客们从车窗伸出手购买三明治、甜食、水果、奶酪等。

“你想吃点什么？亲爱的。”

“什么也不想吃，早餐吃得很饱……咱们不是还带着午餐吗？”

列车又启动了，铁路两旁的景象逐渐变得荒凉了：埃斯梅拉达、普安格、莱依达、马尔维利亚。这时带有咸涩味的海风开始从车窗吹进来。奥尔加扭过脸看我一眼，啊！大海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它在夏日骄阳的照耀下显得分外妩媚多姿。列车停靠在圣安东尼奥站，几群人吵吵嚷嚷地拥到了月台，列车象是喘了口气，鸣叫一声继续向前，沿着曲折的海岸飞奔。不一会儿卡塔赫纳的房屋渐渐呈现在前方。

我肩背食品袋，一手拎着上衣，另一手拉着奥尔加，下了火车随着人流向拥挤不堪的镇子里走去。穿过狭窄的街道，就望见一群人正同吐着白沫的波浪扑打，更多的人头戴奇特的遮阳帽和墨镜，在松软的沙滩上晒太阳或散步。这里是小海滩。我们这些刚下车的人不得不擦肩穿过那些玩得正在兴头上的人群。我们这支长长的队伍千奇百怪，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穿长裤的姑娘，有肩背大口袋或扛着西瓜的男人，有淘气的小孩，还有行动艰难的胖女人。大家都步履艰难地向前方更宽阔的大海滩前进。

我和奥尔加脱下鞋子踩着时而被海水淹没的沙滩继续往前走。暴怒的海浪不断向我们扑来，瞬间又从我们脚下溜掉，隐退到汹涌的大海里。在这刹那间，海滩显得更加空旷和荒漠。我们远离那些游泳的人和摄影者们搭的帐篷，一直走到海滩尽头靠近岩石的地方。

“你累吗？”

“不累，咱们别再往前走了。”

我们决定就地扎营，我卸下肩上的重负，脸朝上躺在松软的沙滩上，享受着太阳赐给的温暖。这里的一切都令人陶醉，我慢慢闭上眼睛，倾听着海浪拍击岩石的节奏明快的声音，仿佛进入了美好的梦乡。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只见奥尔加已经换上了游泳衣，正向我走来。她身体的线条显得更清晰了，我瞪大眼睛仔细地端详，好象我是全智利选美评判委员会的成员，正在进行工作。她被我选中了。她高高的身材，宽宽的肩膀，微微隆起的乳房，腰部和双腿及各部位的肌肉都得了满分。

“我穿这合适吗？”

“太美了，美极了，简直成了海滨之花，全智利的美女皇后……”

她没有让我说完就躺在我身边，用她那灼热的带咸涩味的嘴唇堵住了我的嘴。

六

我换好游泳裤，我们手拉手跑到海里发疯似地尽情嬉戏打逗。玩累了，我把她抱到沙滩上双双躺下，让海浪任意向我们冲打。突然，她象条鱼似地从我身边溜走，在银灰色的沙滩上滚动。得把她抓住！我跟过去拉着她的两只脚拖了好几米远，她湿漉漉的头发沾满了细沙。在笑声和叫声中，我把她压在身体下面，不断地亲吻，她那富有弹性的乳房在我赤裸裸的胸脯

下面随着激烈的心跳急促地上下起伏。为了不使偏激的行为发生，我赶忙滑到海里，游了一个来回，又过来躺在她身旁。但是，说什么我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

“注意！那边来人了。”

一个骑马人沿着海滩朝这边走来。马蹄在沙滩上留下深深的圆坑，但很快又被海浪冲平。

我们仰面躺在那里，阳光迅速地晒干了身上的水珠。奥尔加侧过身子从口袋里掏出我们带来的食品：面包、三明治、蕃茄、烤肉、干酪、水果和甜食。我们活象几天几夜没有吃饭的海上遇难者，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远处的大海滩那边游泳的和晒太阳的人们熙熙攘攘如同蚁群；而这里却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是这里的主人，眼前的沙丘、海滩、浪花和即将西下的太阳统统属于我们的。此时此刻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幅绝美的图画之中：身后岸边山坡上的树木郁郁葱葱，面前已经停止咆哮的大海在夕阳照射下波光粼粼，清澈蔚蓝的天空，远处飘浮着几片奇形怪状的彩云，它正在缓慢地向遥远的天边移动。

“高兴吗？”她问我。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个星期天，亲爱的。”

“比踢足球还快活吗？”

“足球？这怎么说呢？”

提到足球，想起了我弟弟昨天给我说的科洛科洛队同奥达斯的比赛。他总喜欢用他惯用的含糊的语言表达：——第一场，两队不相上下；第二场嘛，不堪入目，简直糟透了。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学来那么多俏皮话，说一样东西往往滥起名目，

我们去酒吧喝酒，他管黑啤酒叫黑沫，管蔗酒叫甜水，管酒杯叫玻璃筒。

我侧身躺在沙滩上，她的头就枕在我胸前。我两手紧紧将她搂住，就这样，我们不知道在那里呆了多长时间。

“几点了？”

我欠起身子看了看表。

“6点了。”

“哎呀！已经6点了！帕托，咱们永远呆在这儿该多好啊！……”

“真的吗？”

“不，我们得回去，回到圣地亚哥那个火炉里，回到那通货膨胀的都市……”

“嗯！……”

“帕托，一个人是不能脱离生活的。”

“这不也是生活吗？”

“对，但这样的生活不是我们劳动阶层经常可以享受的，有钱人可以年年到这里来消暑度假几个月，可我们来往多不方便，还得乘火车。”

“看你说的，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咱们开车来呢？”

她嗤的一声笑了。

“快把脸扭过去，看着那边的十字架，我该换衣服了。”

“我也该穿衣服了。”

我一只手揽在她的腰间，她把头依偎在我的肩上，我们迈着蹒跚的步子沿原路往回走。夕阳余辉映射，眼前是一片金色

的世界；大海停止了翻腾，顿时这里的一切显得那么安谧宁静，唯剩下我们踩着沙滩的脚步声。仿佛我还听到一种别的轻微而有节奏的声音。兴许有人在后面跟踪我们！我谛听了好久，才发现原来是她走动时裤子摩擦发出的窸窣声。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声音使我产生一种甜蜜的感觉，它犹如一曲迷人的音乐。此后它经常不断唤醒我对奥尔加的美好怀念。

车站已经挤满候车的人，有的毫无顾忌地大声说笑，象是酒后胡言。如果把他们的酒囊倒过来，肯定是点滴不剩了。

没等列车停稳，我们就挤上去了。还算运气，又占了两个好座位，经过一天海滨阳光的暴晒，游客们个个都变了模样：鼻子象被慢火烤烘过似的变得通红发亮，额前头发零零乱乱，一个个疲惫不堪、昏昏欲睡的样子；本来欢蹦乱跳的孩子们这会也变得无精打采，搭拉着脑袋，偎依在父母身边。即刻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酸臭味渐渐充满了整个车厢，它同海滨带有咸涩味的新鲜空气多么不同呀！远处的大海又翻起了波浪，喷吐着白沫的海又拼命地向岸边扑打。从车上望过去，那汹涌澎湃的波涛象是一条弯弯曲曲细长的白色带子在海水和沙滩之间上下不停地飘舞。

奥尔加真累坏了。我把一只胳膊垫在她背后，因为木条板的靠背实在太硬了。她仍然头倚在我肩上，睡着了。看着她晒红的前额，听着她有节奏的呼吸，在这星期天的愉快与劳累之后，我也不知不觉地入睡了。

七

有时候，在某些方面我对奥尔加真有些捉摸不透，久而久之，在我的脑海里，她的形象仿佛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阴影。至于在经济方面无可非议，她处处事事十分认真，不管是我们一块儿去看电影或看戏，她从不让我替她付钱。一次到安东尼奥贝拉剧院看话剧《阿帕夫拉萨寡妇》，我正要给她买票，她却抢先自己付了钱。

“别这样，亲爱的……”

“不，帕托。你我都是一般的工人，再者你家里还有负担，我怎么能让你替我付钱。别忘了我也有工作，尽管挣的不多，一个月看场戏的开销还是有的。”

每当这类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的男子汉大丈夫的自豪感便受到一次严重的挫伤。但奥尔加懂得如何使我忘记这些，她甜蜜的微笑和情意深长的亲吻立即把我的疑虑和不安驱散。

从卡塔赫纳海滨回来后的一天，我第二次看见那个穿灰上衣的陌生男人来找奥尔加。当时，我正站着同化验厂的几个朋友说话，瞥见他进了餐馆径直走到大桌子跟前，奥尔加迎上去亲热地跟他交谈。那人还交给她一卷象是报纸的东西，不一会儿就走了。

我仍然没有问她那家伙是谁。在她面前提到他，肯定我会脸红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忍耐。可是，偏偏在这时候奥尔加又对我说，我们原订那天晚上8点钟的约会她不能去

了。于是我忍耐已久的怨气一古脑儿发泄了出来。

“那么你同……那个人去会面吗？”我酸溜溜地问她。

“同哪个人？帕托……你不要这样说话好吗！”

“那个穿灰上衣的人，就是给你送报纸的那个人。”我鼓足勇气说。

奥尔加怔了一下，望了望我的眼睛，难堪地沉默了半天。似乎她根本没有料到我会竟然醋意大作。我也知道对她的行动的任何干预都会给我们的爱情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几乎是亲戚。”她严肃认真地说，“你不应该吃别人的醋，太荒唐了，帕托。你应该了解我，我可不是那种人。”

“但是，亲爱的，咱们事先约好的……可他这么一来，你就改变了主意。我怎么不联想到是他破坏了咱们的约会呢？”

“也可以那么认为……他来通知我去办一件急事……但这和你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帕托。”

我没有吱声，觉得周身不适，两个肩膀沉甸甸的，象一场重感冒即将发作似的。我同她告别，她目送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往外走。

回到厂里，我没有心思干活，将怨气一古脑儿发泄在机器上。把螺丝扭得咯咯作响，似乎这样可以驱散我心里的烦恼。

不一会儿恩里克先生走过来了。

“怎么搞的？帕托……想把扳子扭断是吗？”

我瞥了一眼，想骂他一句但没有骂出声来。只是低着头心烦意乱地干活。看来整个下午我只能把气往肚里咽，自我忍受

痛苦的折磨了。

不知为什么奥尔加却一直占据在我的脑子里，想来想去莫非是我错怪了她……难道我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为什么我一定要主宰她的生活呢？这时，我们在卡塔赫纳海滨度假的场景象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又在我脑海里闪现：她那情意深长的拥抱和亲吻；我们在沙滩上的打逗嬉戏，我怎么会轻易地忘却。她只告诉我那个穿灰上衣的人是一个朋友，几乎是亲戚，但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放下手里的活坐下来，我开始苦思冥想起来。得想个办法首先搞清楚他们的关系，我决不会让别人任意戏弄。跟踪她！

主意既然拿定，决不轻易改变。不是不知道我要担的风险，因为奥尔加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姑娘，一旦被她发现，事情就糟啦。对，我懂得用什么办法最合适。总而言之，我不能继续在烦恼和疑虑中生活。

8点差几分，从我隐蔽的地方看见她走出了餐馆。为了不让自行车成为我的累赘，事先我把它存放在修理厂。要是她乘公共汽车，我还可以跟着她上汽车。但只见她沿玛依布大街步行，后来又向埃拉斯莫埃斯卡拉大街拐去。我跟她保持一定距离紧盯着她。夜幕开始降临了，奥尔加穿的白花蓝底罩衫印在深色的临街墙壁上，显得格外分明。

她突然停下来，环顾了一下周围，象是看看附近有没有监视她的人（当时我已经迅速地躲进一家人的门洞里）。看了一会，转身走进一幢很普通的小房子里。我在原地呆若木鸡，一动不动，一股难以忍受的酸溜溜的滋味骤然涌上心头。一个月

来，不，一个多月来猜疑嫉妒的源头原来就在这所不起眼的房子里。

两个男人从马路对过的边道上转了一下，也走进去了。那个穿灰上衣的，也就是最使我伤脑筋的那家伙，一会儿也来了，他头也不抬地从我身旁擦过，也走进那个门洞。

我又等了十来分钟，没有见再过来任何人。我从我隐蔽的门洞里走出来，焦急不安地在那幢倒霉的房子前踱来踱去，象是等待儿子降临的父亲一样。而我期待的不是儿子，却是为了恢复我们的爱情和信任要探查个究竟。

我买了盒香烟，开始心烦意乱地抽起来，只有在苦闷和忧愁时我才抽烟。在那所神秘的房子前，我不停地走来走去，可什么也没有听见，任何异常的现象也没有发现。

将近10点，天完全黑下来了。突然房子的门打开了，在朦胧的路灯光下，我看见一对男女从里面走出来，我和他们打了个照面，但没有人注意我。而我却象对付不共戴天的敌人要同他们决一死战似地恶狠狠瞪他们几眼。女的有40多岁年纪，长得不算丑，穿着很讲究，留着微曲的短发，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男的看上去比较年轻，工人打扮，未经修理的胳膊胡子几乎遮满了脸膛，两只深陷的眼睛炯炯有光。他们转过前方的街角消失在往阿拉梅达的方向。

过了一会儿，走出来两个年轻男人。他们边走边谈。当从我身边经过时，我隐约听见其中的一个说：“我并不认为那种干预是正确的。”

5分钟过后又有4个人出来：奥尔加、灰上衣的人和那两

个一同进去的男人。他们先是环顾了一下周围，然后才上了便道。奥尔加同灰上衣的人走到前面的街角便分了手；灰上衣的人朝阿拉梅达方向走去，奥尔加向她家的方向走。

我尾随在后面，望着她远走的背影，想追上去让她立即给我解释个明白……但我没有那样做。我得认真思考一番。我又慢慢返回来，再一次从那幢房子前走过。它的大门还半敞开着，门里迎面放着几块普通涂有颜色的玻璃屏风，从屏风的后面还散发出卷心菜烧的汤味。

在那儿呆站了一会儿，我只好拖起沉重的脚步往家走。这时我完全沉浸在愈加忧愁和疑虑的汪洋之中了。

八

第二天，由于心情格外矛盾，几乎连抬头看她一眼的勇气也没有了。一方面我觉得对她的跟踪和在埃拉斯莫埃斯卡拉大街长时间的盯梢是玷污我们纯洁爱情的不道德行为；另一方面，我的嫉妒急切地需要我那样去做，了解事情的真相（为了消除我内心的疑虑，也只能那样做）。跟她在一起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在那幢不起眼而又隐蔽的房子里干什么呢？

出于嫉妒，我曾作了许多荒唐的设想：多次对自己说，一切全完了，我怎么能跟一个经常出入于我所想象的那种场合的女人相爱呢！

同她吹了？可也不大容易。我望着她和平常一样走来走去忙忙碌碌地伺候顾客，还和平常一样一见到我就跟我点头微

笑，我的心情就愈加难堪。我鼓足勇气问她，我们晚上是不是可以见面。她欣然同意了，让我9点去找她。

我事先在脑子里准备好了一连串复杂的问题，准备同她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只要她希望继续我们的关系，务必对上述问题作出毫不含糊的解答。可是事与愿违，当她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就活象只瘪了气的皮球，连说话都张嘴结舌了，我只能支支吾吾地让她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妨碍了我们那天晚上的约会。奥尔加犹豫了一下，用一种罕见的目光望了我一会儿，向我担保她并没有做任何有损我们爱情的事。

“但我没有必要告诉你，因为我不能说。它关系到一个秘密，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秘密。”

“当然，”听了她含糊其词的回答，我简直不知所措地咆哮起来，“这个秘密涉及到许多人，穿灰上衣的人，那个留短头发的女人和其他5个人，还有你们在埃拉斯莫埃斯卡拉大街的活动。”

听完我说的，她突然怔住了，停住了脚步，张了张嘴仿佛要申辩几句，但又改变了主意，继续往前走。肯定她是在竭力使自己冷静下来。我们默不作声地走过了一个街区，她才开了口。

“你跟踪了我，帕托。你这就不对了，怎么能这样呢！你也太不相信我了。要是这样，咱们还是趁早分手。”我没有再说话，但我知道我们的爱情似乎已经到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前面。她接着说：“帕托，对你的这种做法，我实在感到遗憾。因为我们之间已经产生了爱情，而且我对我们的未来还充

满了美好的幻想……”说到这里她冷笑一声，“哈！幻想……你最好去找一个你信得过的百依百顺的姑娘吧！那样你就不会象密探似地盯梢她的行动了。”

我仍没有吱声。

“怎么不说话呀？帕托。”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当然我也可以抱怨你的失约……我倒看不出来你做的工作有多大的危险，连我都要保密。”

我们彼此都沉默了，只听到我们单调的脚步声。到了街角，奥尔加站住了。

“就到这里吧，没有必要再往前走了。”她冷冰冰地对我说，“我应该重新开始一个人走路的习惯了。再见！帕托。”

“再见！”我尽量模仿她的语气说。

她继续往前走。我象傻子一样呆在原地看着她远去的背影。这时候我的脑子里好象塞进了一堆乱麻，从此以后，我将陷入无限的空虚。

前方隐约可以看见奥尔加的蓝色罩衫，想追上她求她原谅，但是又确信一切都是枉然，她会继续坚持她的意见，我只能忍受嫉妒的痛苦和折磨。不，既然她这样，为什么不趁早跟她吹了！

对我来说，至关紧要的是完全彻底地把她忘掉，当然这不是那么容易办得到的，因此，必须付出巨大努力才行。首先我决心不再跨进“兰加吉纳”一步，设法寻找些其他娱乐活动分分心。

我准时回家吃晚饭，刚一吃完，劳尔见我心情十分忧郁，

① 建议我陪他出去兜一圈。我明白他说的兜一圈无非是从“新世界”酒吧开始，那里往往有他的朋友在等他。他们一块儿喝几杯布尔戈尼红葡萄酒以后，再到某个乡间别墅或舞场跳阵子舞，还会有什么呢？我决定同他一块儿去。

“咱们先到哪里去？”我问他，这似乎是多余的问话。

“‘新世界’。”

听了以后我又犹豫了。

“那儿太远了。……”

“我们乘公共汽车去。”

“那就走吧。”

为了忘掉内心的烦恼和悲伤，那天晚上我本想多喝几杯，但越喝却越加心烦。奥尔加的形象不停地在我脑海里萦绕：我们分手时她严肃的表情，逐渐远去的背影，她高高的身材和秀美的披肩长发仿佛近在眼前；回想起她情意绵绵的言谈，她甜蜜的亲吻，我们在卡塔赫纳海滨度过的美好时刻，以及她在海滩上走动时裤子摩擦发出的富有音乐感的沙沙声……我一杯接一杯地灌，舌头已经有点儿不听使唤，可是她的形象仿佛在我的记忆里愈加清晰。一会儿我感到一阵绝望，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将在我面前毁灭。我赶紧捧起酒连饮两杯，但又什么味道也觉不出来。好象隔着一层薄薄的迷雾听到有人在议论。

“你哥哥可真是海量。”

“是的，我也看出来……是不是跟情人吵嘴了？”

“他的情人对他好吗？”

“不是情人而是未婚妻……他们可能闹矛盾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酒吧，来到圣巴勃罗大街的一家舞厅，那里没有多少人，几个打扮妖艳、象小丑似的怪模怪样的女人嘻皮笑脸地走过来坐在我们的桌旁。劳尔和他的朋友们跟那几个女人跳舞去了。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女人坐在那里。我抬起头睁开惺忪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瞥了她一眼：瘦长的脸上嵌着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突出的颧骨上涂着不均匀的脂粉。

“您跳舞吗？我的宝贝。”

“不，”我回答，“我不跳，心情不好。”

我希望能引起她的同情，希望所有的人，甚至全世界都为我的遭遇表示同情。

“所以您才拚命地喝呢！”她迟疑了一会说。

“对，我要喝它个通宵，明天、后天还要喝，直到喝死。”

那瘦女人又倒满了两杯酒。

“干杯！”她说把杯高高地举起。

一会儿工夫，我们就消灭了一瓶，我又叫来一瓶。

“您到底有什么伤心事呢？”

不知道瘦女人是对我伤心的缘由感兴趣呢，还是对我的酒感兴趣。我不喜欢她那张长脸和长满小牙的嘴巴，她衣服上散发出的那种令人作呕的怪味也使我讨厌。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把心里的苦楚说给她听，就象酒厂的推销员任意找个小饭馆尽快把商品销售出去一样。

“我被人骗了。”我说，“被奥尔加骗了。”我说这话，就象对方知道奥尔加是谁——她跟那些在埃拉斯莫埃斯卡

拉大街的一幢房子里的人有关系。

我滔滔不绝地对她说起了我的不幸遭遇。最后她问我有没有什么打算，我惶惑不安地告诉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难道您不打算给她点厉害尝尝，让她放老实点吗？……吓！还不找他算帐？”

“找谁？”这女人指的是谁呀。

“他，就是她的情人……”

我嗤的一声笑了。

“不只是一个人，他们好几个人呢……至少有 5 个人跟她在一起。”

“哎呀！那还得了，她简直成了妓女！”

我迷迷糊糊听着她的议论不知道说的是谁。当时要是我明白她说的是奥尔加，我非狠狠训斥她一顿不可。

跳舞的人已经回到了桌旁，我弟弟对我的忧伤深表同情。

“帕托，别去想她了！”他安慰我说“来吧！咱们干完这一杯就回去，反正你已经醉了。”

九

后来的几天，我心情格外沉重。这次，我又身不由己地朝“兰加吉纳”走去。走到半路却又赶紧折回来。我自言自语地说，到那儿去干什么！奥尔加跟我已经毫无关系了，想喝杯咖啡或啤酒，就多走几步到别的餐馆去。

然而，我心里老忘不掉她，总惦记着她。即便是从远处看她一眼，也好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我们的分离也使她伤心，是不是她和我一样地正在忍受着痛苦的折磨，她会不会还在惦念着我。

这样的状况竟持续了 8 天，漫长的 8 天对我来说犹如 8 年。干活时我也难以将她的形象从我的脑海中驱散。我想方设法把她忘掉。当我专心致志地修理一个损坏的散热器或堵塞的汽化器时，能在那 20 分钟内停止了对她的思念，我便会骄傲地认为，这是我自我克制的丰硕战果。酒对我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总之，任何东西也解脱不了我内心的烦恼和忧伤。

我经受了几乎是彻夜难眠的 8 天痛苦折磨之后，决定再到餐馆去一趟。很简单，我的目的就是去看看她。下午 6 点钟到了那里，通常上午 11 点以后“兰加吉纳”便陆续坐满了附近的居民，他们一边玩骨牌，一边喝啤酒。

一进门我就看见她目不转睛地盯住门口，似乎正在等待我的到来。我故意装出一副冷淡的样子，向彼得罗老板问声好坐了下来。

“帕托，好久没有见到你了，病了吗？”

“没有。”我回答说，“这几天实在是太忙了。”

她从容不迫地从她大桌子旁的座位上走到我身边，若无其事地问我，好象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似的。

“你需要点什么？帕托。”

我望了望她的眼睛。

“下班后我们可以谈一会话吗？”

“你不再欺侮我吧？”

“不会的，奥尔加，我跟你谈谈……想请求你……好吧，我会告诉你的。”

“我8点下班。”

“谢谢！请来瓶啤酒好吗？”

她把一瓶打开的啤酒和一只杯子放到桌子上，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三口并作两口喝完啤酒，起身用手势向她告别，她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我转身走出了餐馆。

回到修理厂，老板一看见我就说：

“帕托，你赶快把这辆车的汽化器修理好，我开它回家。我的车借给塞尔达先生了。”

“现在就修吗？恩里克先生……已经晚了……”

“对，赶快开始干吧！”

说完老板就向外走去，我向他瞥了一眼，这倒霉鬼想让我同奥尔加失约吗？赶快换上工作服，拿来工具，撑起车头盖。这是辆老掉牙的汽车，汽化器外面渗满了汽油。毫无疑问是损坏的漂子灌进了油沉到了油槽底部，使油溢出来了。首先得把漂子焊好，换个衬垫。好在是辆老型号车，把汽化器拆下来擦洗并不象别的新型号车那样复杂。

首先卸下空气过滤器和加速器上的弹簧，退出上半部分一看，完全证实了我的判断：沉下去的漂子果然挡住了油孔的通路；漂子的小轴在这里碍事。我伸进手去用棉丝取出了小轴。老板是不准这样的。他说棉丝掉下来的纤维会堵塞油孔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这部分显然已经脱焊。我连忙涂上一点准备好

的焊油，打开焊机。好了！我找了一小团棉丝裹在起子上擦拭油孔和叶片；又用一个特殊的起子将支架的螺丝加固，然后把里外擦干净，用嘴对准油孔吹了口气。好啦！油孔通畅无阻，立刻把它装在原来的位置上。

几点了？对我来说同奥尔加的约会比这辆破汽车，比老板，比全世界都更重要。

“索托师傅，几点了？”

“7点10分。”

我得快点儿干。装好了下面，又检查了一遍上面，找了片橡皮，用剪子剪了个垫圈搁上，再把滤油器安好，放下车头盖，跳上车子握住驾驶盘踩着了发动机。车子缓慢地向前移动。我用力再踩一下加速踏板，怎么搞的，已经给足了油，为什么不加速呢？我正纳闷，恰好老板走过来了。

“修好了吗？帕托。”

“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能加速。”

“噢！当然，恩里克先生说，‘塞尔达大夫已经对我说过，他的车子不能加速，忘记告诉你了。’”

见鬼的老板！幸亏我的声音低，他没有听见。我想，既然加速器不起作用，油槽往外溢油一定是因为气泵毛病，还得把导管和附件卸下来直接连在汽化器上。又赶紧松螺丝，把活塞同连杆、弹簧和皮圈取出来。哎呀！这皮圈也裂了。向老板领了个新的换上……表针在一秒一秒地移动。

“劳驾索托师傅，几点了？”

“差一刻8点。”

“谢谢。”

我用最快的速度装好了所有的部件，然后又上车打着火踩住加速踏板。成功了！由于我使劲过猛，车子向前弹了一下，前进了。

“修好了！恩里克先生。”我大声嚷叫着。

我把工具检起来胡乱地扔到工具箱里，反正明天有的是时间。仅用一分钟洗了手，30秒钟脱下工作服，换上我自己的衣服就急急忙忙走出了修理厂。我边走边想：同奥尔加会面对她说些什么呢！8点整我到了“兰加吉纳”门口，奥尔加一看见我，拎起提包走了出来。

我们默不作声毫无目的地一步一步往前走。我实在想不出适当的话来打破这尴尬僵持的局面。我侧过脸在明亮的路灯光下仔细端详着奥尔加的表情和神态，希望在她的脸上找到分离的痛苦所留下的泪痕。

“奥尔加，”还是我先开了口，“这些日子我实在烦闷透了，真可怕……”

“你以为我就好过吗？”

我以同情的目光向她望望，原来她和我一样也承受着这分离的苦痛。

“奥尔加，我希望请求你的原谅，当时我实在是太卤莽了，可我不是那种人……我只是嫉妒，简直要发疯了……”

她知道，我无休止的表白会使我愈加难堪。

“我理解你的心情，帕托。不必多说了。另外，我告诉你：对我来说这些天也不太好过，要是你今天不到餐馆来找

我，明天我就给你发信，我早就把信写好了……我们可不能再继续这样折磨自己了！帕托……至于那天晚上的事，我想解释给你听。”

“不用了，什么你也不要对我解释了，我也不想听。”我打断她的话，“从今以后我决不会再那样对待你了，决不再为难你了，对你我百分之百的信任。”

她的眼睛里立刻闪烁着喜悦的泪花。

“帕托，现在我可以吻你吗？”

我们往前挪了几步，避开路灯的亮光。我伸出双臂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我们毫无顾忌地亲吻起来，甚至连对面人行便道上走过的两个男孩子的大声嘲笑也不理会。这次长吻一直持续了几分钟。

而后，她亲昵地挽起我的胳膊继续往前走。

“帕托，这会儿我还不想回家，咱们去吃点夜宵行吗？我带着钱了。”

“我也带了。”我说，“亲爱的，咱们当然应该庆贺一番喽！咳！我们真傻，白白受了8天的折磨……离这儿不远的罗萨斯大街有个小餐馆，咱们到那儿去行吗？”

“随便，帕托，只要跟着你，哪儿去都行。”

一个人当他由悲观沉郁转到愉快舒畅时，会觉得时间过得比飞还快。几小时之前我还是那样萎靡不振，甚至想方设法将奥尔加的形象从我的记忆中抹掉。而现在，我一下子又变成了世界上最快活的人。许多天的沮丧和气馁已经成为往事，将被我们彻底遗忘。奥尔加和我仿佛是一对新人，我们之间不再会

有不愉快的事情产生。

我们坐在罗萨斯大街那家餐馆里，要了烤肉和凉拌蕃茄。为了庆贺我们重归于好，还特意买了瓶酒。我告诉她，在我们发生口角的那天晚上，我喝了许多酒，想忘掉……奥尔加有点沉不住气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一直在思索，觉得责任全在我身上。帕托，是我首先对你没有充分的信任。当然，正如那天晚上我说的，这不仅仅是关系到我一个人的安危；但无论如何对你我应该信得过，相信你不会出卖我……”

“亲爱的，你说到哪里去了，我当然不会那样……但现在你没有必要跟我说这些……”

“不，我还是应该向你说明白，帕托，只是不知道从何说起……好，就说那天晚上吧，我们几个人那次聚集在埃拉斯莫埃斯卡拉大街的那幢房子里，并不象你想象的是开舞会，而是进行一次政治活动，你明白吗？”

听奥尔加这么一说，我开始一下子给怔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逐渐明白过来。我可真糊涂啊！那时我怎么不会往这方面想呢！……

“共产党？”我问。

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停了一会儿，我以另一种新的目光投向奥尔加，但这种目光并没有失去对她的爱慕和崇敬。原来如此，她是个共产党人。

共产党的活动到处受到严密的限制和监视，他们不得不极

其秘密地进行，特别谨慎地相互通知每次会议的地点。而我在他们举行会议的房子前踱来踱去，象个疯子似地盯着从那里走出来的人。

奥尔加在气头上说我象个密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二部

奥尔加同志

一

同帕托闹别扭的那些日子里，我心里烦恼极了。不但吃不好睡不好，而且干活时也是无精打采的。作为餐馆的侍者对顾客要热情相待，笑脸相迎。其实这并不难，因为顾客们都是印刷厂、化验厂、修理厂的工人和附近居民，他们通情达理、和蔼可亲。然而，那些天说什么我也笑不出来。我需要帕托，可他却那么突然地离开了我。怎么办？难道我去对他说，他所猜忌的并不是事实；埃拉斯莫埃斯卡拉大街的那栋房子不是什么娱乐场所；最使他伤脑筋的那个灰上衣的人跟我有什么爱情关系？

同样我的颓唐情绪还影响到我的政治活动。我曾无缘无故地缺席过一次支部生活会呢！缺席的原因只是因为我的心情不好，实在无法集中精神听同志们的发言，去参加又有什么用呢！

我准备找格林（他本来不叫这个名字，这是他搞地下工作的化名）去谈谈我的心事，想请求他给我出个主意。他是我们支部唯一看问题比较全面的人。我还想找其他同志聊聊，只是有的跟我不十分熟悉；至于奥费莉亚，我们常常在她家里开会，但是我相信她不会给我讲出太深的道理来。她会先给我沏杯茶（有时转弯抹角总也谈不到问题的实质），然后，用她那双细眉下面漂亮的眼睛仔细打量我一番，对我说道：“是的，奥尔加，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吧。那小伙子不是党员又有什么关系呢，今后，他入了党，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也就是说奥费莉亚一定会说些最中听的话来宽慰我。

我还想到卢丘，卡斯蒂略，一个身材魁梧的铁路工人，45岁年纪，他是几年前我们支部发展的党员。现在他负责工会的组织工作；但是他还照例参加我们的支部活动。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政治以及其他生活琐事。一个星期天在卡奥波里干广场集合，出来后他邀请我到 he 家里吃饭。他住在马塔大街一栋干净朴素，使人感到亲切的房子里。我同他妻子和孩子们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在他家里我真正感受到同志间的温暖。卡斯蒂略同志战后曾经在苏联待过，他对那里的每寸土地，那里的人民和他们所从事的一切都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

至于谈论起我个人的这类问题他会怎么说呢？他可不是那种不知道体谅人的人。因此我能猜出他的态度，他对这种事的解决办法：“当然，奥尔加同志，这确实是个严肃的问题，毫无疑问，一切思想问题都是如此。这就要求你应该慎重地考虑，

详细分析他的思想状况，看看他对你是有真正深厚的感情，还是一时感情冲动。要是没有感情基础的一时冲动，那末你就忘掉他，振奋起精神多做些政治工作，把精力花在工作上。在苏联我遇到过一个和你情况类似的姑娘……”

他会滔滔不绝地给我谈起那里的青年人如何工作，如何生活，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政治、文化、艺术的学习上，同时也不放松自己的思想改造，每时每刻他们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跟我接触比较多的另一个同志，索妮亚·托雷亚尔瓦，是个作家。曾经送我一本她的作品《又是空网》。我并不十分爱读，觉得它有点儿象它的作者本人那样抽象难懂，而且知识分子味道十足。有几次散会后我们一道走过几个街区，或一块儿去喝杯咖啡，我明白在那鬈曲的短发和宽边玳瑁镜框眼镜的下面隐藏的是位朴素单纯的女性，自从同她丈夫分居后她显得十分孤僻。大概她也渴望自己能成为温柔的妻子，可是她那知识分子的外表象假面具似的，一直难以卸掉。因此，她在家里的表现、会上的发言，甚至她写的作品，有许多地方我都难以理解（相信大多数同志和我有同感）。

如果我把心事说给索妮亚听，她会对我说些什么呢？完全可以想象……她会问我，帕特里西奥是什么人。我将告诉她，他是个普普通通的小伙子，受的教育不多，对政治毫无兴趣，而且还从电影上沾染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些庸俗。听完，索妮亚一定会轻蔑地做个鬼脸，然后对我说：“去他的，奥尔加，这种人不配作你的朋友，你需要的人

到时候会有的，要耐心等待嘛！’即便我给她解释也是白搭；因为我不是她那样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餐馆侍者。她无情的结论将是：“不着急，要耐心等待！”

问题的关键是我并不想等待，因为我自己的良心对我说，帕特里西奥正是我需要的人，尽管他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不能因为他有嫉妒心，我就离开他。我想大概已经到时候了，应该把我真正身份告诉他，告诉他为什么每星期我要到埃拉斯莫埃斯卡拉大街的那栋房子里去一次。

而格林，他会对我说些什么呢？他所持态度也不难想象。开始说出他的看法之前，他会两手插入他那件磨花的灰上衣的口袋里，先拿出烟斗，而后两眼瞅着地上，慢条斯理地说起来，好象听话人不在身边似的。他还会不时地抬抬眼皮用两只象他上衣一样灰的眼睛看我一下。他的建议肯定会减轻我内心的痛苦，因为他有能力这样做。他不只一次地帮助我和支部的大部分同志解除过思想上的烦恼……但是，我怎么能开口同他谈起这类事情呢？

这是当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有了好感时才这样想的。并不是说格林疯狂地爱着我，不，绝对不是这样。但是某些迹象表明他对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意思的。譬如跟我谈话时，他那看人的方式，温和的语调等等，这些细小的情节我都有所觉察。同志们非常熟悉格林的为人，他对所有的人都那样和蔼可亲，对支部的其他两个女同志也不例外。但是在他同我的接触中，有那么一种特别亲切的地方。其他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可我早有察觉，看来我的感情好象有点儿过敏，是的，至少关系到我自己时，

我还是能够将一个男人的礼貌相待同别种感情区分开来……。

尽管格林想方设法抑制自己的冲动，许多次仍被我发现。总而言之，我自己心里明白。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为什么格林不采取主动呢？很简单，因为他是个诚实的人。他已经结婚，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当然不会在别的女同志面前谈论这类事情，可是能觉察出来，他内心充满着矛盾。格林是个模范党员，他不仅有着朴素的外表，而且还有着高尚的内心世界，这使他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我想我在无意中对他流露的那点儿情感，该给他带来多么大的思想负担啊！

他有弱点吗？我认为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是有的。但他知道咬紧牙关竭力约束自己的言行来维护他正直的为人。有一天，格林、支部的另一个同志和我，我们三人共同去执行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这一点。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们装扮成照像馆的摄影师秘密地进入梅利皮亚附近的一家庄园，它是参议员毛里的财产。为了在进步刊物上揭露那里非人的生活条件，我们在一名同情我们党的农工的协助下去实地了解情况。这项工作要冒很大的风险，我们必须迅速地进行，因为随时随地都有被毛里的工头们发现的可能。我们一到那里，埃斯特万和格林就向围拢来的农工们讲起建立工会以及与临近庄园的工友们取得联系的问题，与此同时，我和妇女们也聊起来了。把我们带去的报纸和杂志分发给她们，还给孩子们糖吃。

傍晚，我们的农工朋友急匆匆地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行动

被人告发了，毛里参议员已经全副武装领着他的人骑马来抓我们了。大家都知道毛里为人狠手辣，办事从来是说一不二的。他从来不许可任何人干预他的事务，甚至连参议院对他也不能有丝毫约束。我们相互看了一眼，露出焦急不安的神色。

“你们跟我来！”农工朋友对我们说“我得赶紧把你们藏起来。”

他领我们走进一间破烂不堪的堆放牲畜饲料的草棚里。

“你们藏在这里吧，他们走远了我再来叫你们。”

毛里带领打手们在庄园里到处搜索。我们躲在乱草堆里一动不动，可我一点儿也不能平静，心怦怦直跳，好象要从胸膛里蹦出来似的。总是在想，要是万一被发现一切都完了。突然我还想到要是万一被抓到，他会给我们带上镣铐，关进他公馆的地下室里严刑拷打，用烧红的铁棍烫我们，逼我们招供……一会儿我又想到了梅利皮亚的宪警，可能还想到了那些惨无人道的便衣特务，我们支部有的同志可尝到过他们的厉害……我越想越害怕，不禁全身哆嗦起来。至今我还能回想起我当时吓得面无血色手脚冰凉的狼狈相。突然，我觉得一只手放到我的胳膊上，那是一只温暖友好的手，它暗示我不必紧张，要沉着冷静，危险不会发生。我回过脸，在昏暗中同格林的视线相遇了。他轻轻地点了点头，就在那一刹那，我觉得心豁然亮了，也不再害怕了。我们隐蔽的地方十分狭小，要是分散隐蔽，被发现的危险就会更大。所以我们挤在乱草堆里，靠得很近，我不时地还感受到从格林身上传过来的温暖。

不一会儿，他放在我胳膊上的手拿开了，一种惶恐不安的感

觉立即又向我袭来，仿佛一种最坏的可能立刻就要发生。这会儿我主动地将手伸过去在黑暗中摸索，一触到格林，他用力地握住了我的手，通过我们的手传过来的力量立即使我又鼓起了勇气。

直到很晚，我们的朋友才来叫我们出去。他领着我们绕小路走出庄园上了公路。这时天空已经布满了星斗，我们坐在地上等待开往圣地亚哥的夜班公共汽车。我们在毛里封建专制的领地里已经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而在我心里却埋下了感情上的惶惑和不安。

除去那一次极细微的、别人难以察觉的温情外，我再也没有领受过格林的其他表示。我觉得即便是那点儿微不足道的感情，也是在高度的自我约束下才表露出来的。

因此，我不能去向格林请教我和帕特里西奥之间所发生的感情冲突。

二

真有意思，我们之间的误会就这样自然而然云消雾散了，可我心里还有点儿不踏实。但是，我并没有同支部的任何一个同志谈起过跟帕托的矛盾，也没有把这事告诉姐姐。切拉属于对过去较好的家境留恋的人。也就是说，昔日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比现在优越，她往往以那时的眼光来看待当前的现实。

切拉比我大8岁。父母去世后，我们的生活便陷入拮据。靠着慈善事业的一点儿微薄救济，她仍坚持让我继续上学。遗

憾的是我辜负了她的美好期望，没有读到人文学四年级便停了学。就是说我可以继续读下去，只是姐姐得不分白天黑夜地拚命操劳，靠缝纫来供养我。我对她说，这样不行，我必须工作。我的行动使姐姐很不高兴。

但最惹她生气的是我竟然放弃了找到的办公室秘书的工作，反而到一家普通的餐馆当侍者。至于我本来的想法，只不过是希望改变我当秘书的处境，但事实并非那么容易。切拉没有直接责怪我在漫长的生活道路上刚迈出的这第一步，她只是叹息，长时间地凝视着墙上挂的父亲遗像。

“他要是看到这一切，”她说，“该会多伤心啊！奥尔加，他一定会伤心的。”

我没有同她争辩，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当她开始意识到我的反抗已经到了难以驾驭的程度时，她只得忍受着莫大的悲痛，祈祷上帝来保佑我。她从来没有问起我是否参加了什么党派，但我猜想当她看到我带回家的书籍和报纸时，会自然作出一些联想。我知道，每当发生罢工和集会，而我又偏偏在这时回家特别晚时，她总是在恐惧和颤栗中等待我的归来。她惋惜我，她的妹妹，一位已故军官的小姐竟然在“低贱的人们”中间生活，还伺候那些衣着褴褛、双手沾满油墨的印刷工和那些她视之为下层的人。

“难道你愿意我继续为曼里克斯工作，而且同他睡觉吗？”

她没有作声，只是紧皱着眉头。因为她不喜欢我经常如此露骨地说话。她宁愿不把事情那样明说，如果万不得已的话，她喜欢用自己更有趣的委婉说法来表达。那些保守、陈旧观念

使她的精神仍然囿于一个与现实隔绝的小天地里。她温和而善良，总希望我的行为不要逾越维护一个败落家族的纯洁的道德标准。

我和帕托恋爱，知道的人不多。有几次姐姐隐约听见了帕托送我回家时，我们从自行车上下来的声音。她还仿佛看见了我们在门口接吻。我想，无所顾忌地同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相爱，在她看来简直是不太可能。然而，切拉有时却发现我忧心忡忡，话也比平时少了。甚至还会听到我把嘴埋在枕头里呜咽的声音。尽管如此，我仍然故作镇静，没有告诉她这些她难以理解的事情。她曾经问起过我，他是谁，是不是正派人家的子弟，干什么工作。我告诉她，他是汽车修理厂的机械师，穿起他那件蓝上衣是个挺标致的小伙子。其实只不过是工人。她听了，脸上仿佛露出了一丝苦笑。

有时我想我不应该如此对待切拉，但我又没有勇气做类似这样的自我批评。大概因为我一想到姐姐就得出我对她太自私的结论吧！既然我能为同志们的痛苦感到忧虑，那么我更应该关心自己姐姐的苦楚吧。但我又能为她做些什么呢？假如我舍弃她，自己去过无所作为的生活，也就是跟我同年龄的姑娘们过的那种入时的生活，那么我的过错就会更大。然而我没有离开她，也没有离开她那毫无意义的生活方式，去碌碌无为地过日子，而是投身于一个伟大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事业。有时我对自己说，从我入党的那天起，便开始了神圣的工作，这个工作同样也是为了姐姐，为了有一天把她从她的狭窄小天地里，从每天12小时关在家里缝纫的单调生活里解脱出来。因

为她几乎没有勇气顶住社会偏见，到工作量轻挣得多的工厂里去做工。

那天晚上帕托来找我，误会消除了！他没有再问起我开会的事。在高兴之余，我信口告诉他我们在埃拉斯莫埃斯卡拉大街的那栋房子里的活动。可能我考虑得不够周全吧！但当我把此事向支部会议汇报，并说明我希望让帕托参加我们的支部活动时却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当然，在带领帕托参加我们的会议以前，我给他讲了许多政治方面的道理。我的话使他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逐渐开始懂得我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我们的奋斗目标。我还借给他格林推荐的最基础的理论书籍。后来同志们知道了我的秘密，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帕托，他的进步也愈加显著了。

当我认为帕托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决定带他去参加我们的支部会议。那时他非常激动，在他的想象里，我已经被党的概念所代替。他穿起他那件合身的蓝土装，手里拿着最近读过的两本书。

“你觉得我这样行吗？”

“什么行吗？”

“穿这件衣服……”

“当然行喽！帕托，同志们不会评论你的衣着。”

“自然，但是因为是头一次……我就不发言了；是这样吗！”

“如果你想说，就发言呗……要是你不想，谁也不会强迫你。”

“因为刚开始……我知道的不多，就是你教我的这些……”

“帕托，支部的同志谁也不是学者，我们只是来研究些事情，相互交换些意见……每个人可以不拘形式地畅所欲言，懂吗？……没有必要作报告或进行演说……”

“是的，但这次我什么也不说，今后可能……”

“当然，帕托，当你习惯了以后……”

这是他最担心的，我们几乎头一个到了奥费莉亚的家。只有女主人和埃斯特万在，埃斯特万是和帕托同年龄的青年同志。我给他们作了介绍以后，他们便开始互相询问起对方的工作情况。后来格林来了，他满面笑容，紧紧握住帕托的手。我看得出来，这时帕托的醋意全消失了，张了张嘴仿佛要说些什么，大概向格林供认两个月以前对他还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呢！

接着莫拉莱斯，卡斯蒂略和索尼亚·托雷亚尔瓦也陆续来到。索尼亚好奇地用她那双隐藏在镜片后面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帕托。这是她近视眼看人的习惯，但这种过分仔细的端详可能有些失礼。我还担心帕托会对索尼亚的粗鲁行为予以回击，好在他没有意识到。这时，他正和他的同行莫拉莱斯兴致勃勃地谈论他们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这人曾经和帕托在同一家修理厂工作。

我们集中在奥费莉亚的餐厅兼工作间的屋子里开会。房间里陈设很简单，一个上面摆着几本书的书架，墙上挂着一本日历和一张她已经去世的丈夫的相片。格林看了看表。

“同志们！时间到了……咱们开会吧。”

我看见帕托神经质地动了一下双手。我们8名党员开始了一周一次的组织生活例会。

“好吧！同志们！”

“主持会议的同志……”

“我建议由奥尔加同志主持。”卡斯蒂略第一个说。

我推辞了一会儿。我希望那天的会议由别的同志主持，这样我可以更好地对帕托进行引导。实在推托不掉，我不得不担任了那次会议的主席，格林给我说了会议的议程后便开会了。

对帕托来说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政治活动，可能使他感到有些厌烦，尽管会后他对我说那一切都挺有意思。会上谈到了许多事情，大家主要议论了当前食品涨价的问题。主讲的同志解释说，必须向人民说明造成涨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要使政府意识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愤慨。最后，我们一致通过决议：第二天晚上分成两组上街在市区的墙上，电杆上书写抗议涨价的宣传标语。

然后，格林发言。他代表支部向帕托表示欢迎。他说，从那时起，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了，我们衷心希望他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为使自已成为一名优秀的党员而努力。我向帕托瞧了一眼，作为对他的祝贺。他可能太激动了，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来。冷静了片刻，结结巴巴地发了言。他表示一定要按照同志们的希望去做，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恳求大家今后对他多多帮助。

“我不知道怎样感谢奥尔加同志，她使我擦亮了眼睛，将我带到这里来……”

就这样他结束了简短而又朴实的发言。当他说到“奥尔加同志”时，我的嗓子里感到热辣辣的，这个称呼仿佛是从他的

嘴里对我倾吐的成千上万句爱情的话语中最甜蜜的表达。

我们走出了奥费莉亚的家，主人连一杯茶也没有招待我们喝。我想这些日子她的生活可能又陷入了困境。为了去看个明白，我决定第二天再到她家去，看看是否可以给她些帮助。格林同我们一起出来，他邀请我们去喝杯咖啡。在咖啡馆里，我们谈到了第二天写标语的任务，把同志们分成两个组，我们还拟订了几条标语的内容。

11点半我们告别了格林。帕托亲昵地挽起我的胳膊。我感到他的温存似乎又增添了新的热量。我们并肩默默地走着，他时而侧过脸看我一眼，我注意到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幸福的微笑。

“我觉得现在咱们离得更近了。”他说，“这会儿你对我该没有什么秘密了吧？”

“没有。现在我们是同志了。”

“奥尔加同志……”他重复了一句。“同志”这个词儿听起来给人一种惬意的感觉，似乎比任何其他表示都意味深长。

到了我家的门前，我们亲吻告别。如同在卡塔赫纳海滩和所有的这样满天星斗的夜晚，他的吻是那么亲切而更富于深情。

……

三、对事情

……

我们这一组由4个人组成：马丁内斯同志，他是名黑白混血种工人，有一双象闪电般明亮的眼睛；米盖尔·罗夫莱斯，

他是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帕特里西奥和我。夜里11点，我们在事先约好的地方集合。罗夫莱斯和马丁内斯还带来了颜料和刷子。

那里有一面高大平滑的墙壁，于是他们就在那面墙壁上开始刷写起来。我的任务是负责警戒望风，注意附近街道上的动静，因为我们进行的是件非法的工作。过去，作为竞选宣传的一部分，书写和张贴标语的活动我们已经干过不少次，只不过那时不至于冒什么风险罢了。事先到警察局去登个记，不论值班警官愿意不愿意，只要填写一张卡片再盖上印记就行了。如若被宪警发现，把卡片拿给他们看，仍然可以继续写下去。但是这次就不同了。为了不被宪警发现，必须高度警惕。

帕特里西奥和另一个同志迅速地完成了一条标语，墙壁上顿时留下了墨迹淋漓的30厘米高的醒目大字：

通货膨胀是对智利人民健康的危害！

下方写道：

克莱因——萨克斯使团滚回去！

写完了这面墙又换了个地方继续写。不大一会儿工夫，附近的墙壁都被我们写满了类似的标语口号。到了马依布大街，我们4个人分成了两处，正当其他两个同志在一所公立中学的围墙上写着：孩子们需要面包，美国佬滚回去！帕托和我在不远的一面暗绿色墙壁上也写了起来。就在我们稍微放松警惕的几分钟里，宪警突然出现了。我猜想，在这之前，他可能是在马路对面的一家门洞里打瞌睡。他不声不响地站在我们旁边开始以讥笑的样子不停地摇晃着身子，这时帕托还没有回头，只顾

专心地在写：反对通货膨胀！美国佬……

逃跑已经来不及了。顿时我愣住了，好象在等待他向我们开枪。我思忖着，得赶快想个办法，以免帕托——这个没有经验的新同志——会干出某种卤莽过火的事来。宪警仍用讽刺的眼光瞥着我。这时帕特里西奥回过头望着他那草绿色的制服和腰间插的黑乎乎的手枪，接着又瞧了我一眼，仿佛向我询问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晚上好！”我故作镇静地说。

他没有回答。

“几点了？”我又问道“您带表了吗？宪警先生。”

“已经是该睡觉的时候了。”他冷冰冰地回答，“大概你们在家待腻了，今天晚上想跟我到监狱里去吧！”

“为什么？”我装出天真的样子问道。

“因为你们在刷写辱骂政府的口号。”

“辱骂政府？这里明明写的是‘反对通货膨胀’我想，宪警先生……您的薪金一定很高吧。涨价对您没有妨碍，是吗？”

他不说话了。他是个上年岁的人，胡子已经有些花白，可他的制服上既没有臂章也没有缎带，一看就知道他还只不过是一名普通宪警。

“通货膨胀确实也影响到我们。”他不满意地嘟囔着。

“对呀！因此我们才反对它。”帕托抢着插了一句。

“是的，我们用标语口号……”

“做一点是一点，宪警先生……尽管是些标语口号，它却表达了人民的心愿。”我接着说。

“好啦！好啦！”他用严厉的口气说，“我不是来跟你们讨论这个的。如果你们不想跟我到宪兵队去，就赶快回去吧……”

“好的，”帕托说。“我们这就走……”

“等一会儿！帕托，”我转身对宪警微笑着说，“对，我们马上就走，但我想对您说，您是我遇到的宪警中最通情达理的。”

“嗯……”

“那末，为什么不让这小伙子把这条标语写完呢？”

“但……”

“半分钟时间就行了……”

帕特里西奥没等回答，把刷子往颜料桶里蘸了一下，拿出来赶紧写上了几个粗大的斜体字母：滚回去！

“晚安！”

他没有回答，迈开沉重的脚步穿过马路，肯定又回到他原来的门洞里继续打他的瞌睡去了。大概他依然那么乐观，但是我想在他入睡前，一定会思考一番我们刚才的谈话。

到了街角，我们同罗夫莱斯和马丁内斯会合，他们已经把公立学校的围墙全都写满了。

“你们遇到了麻烦？”

“没有，只不过同一个宪警有过一次友好的接触。”

“啊……我们的颜料已经用完了，你们还剩了吗？帕托。”

帕特里西奥看了一眼手里的颜料桶。

“还够写两条小字标语。”

“好吧……那就在这里写吧！”

写完标语，我们和他们分了手。帕特里西奥手上沾满了颜色，裤子上也溅了不少，但看上去他的表情十分愉快。

“你高兴吗？”

“当然，当一个人能做点儿有益的事儿，他会觉得自己是有用的人……”

我亲昵地挽起他的胳膊。

“你说的是实话吗？”

“我也不知道自己过去怎么象白痴一样地生活，有空就泡在酒吧间和舞场里。”

“好啦！帕特里西奥，有时跳会儿舞还是需要的……跳舞有什么不好呢？你可以带我去跳舞吗？”

“你？去跳舞？”

“是的，为什么我就不能跳舞呢？难道我不是青年人？……”

“只不过，亲爱的……当然是，但我觉得……事实上我不能把你同舞场里那些整天跳舞的姑娘们相比较……现在我才觉得你真了不起……当宪警出现的时候，我从心底里佩服你的沉着和冷静。”

“冷静！是的，表面上看我挺冷静，可实际上我心里也真够害怕的……特别是我想到你要是莽撞行事的话。”

“要是你不在场我真的会把颜料桶扣在他脑袋上。”

我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

“你太没有策略了，帕托。”

“那么应该怎么办呀？”

“你应该赶紧通知其他同志。”

我们朝我家的方向走去，~~拂~~过一个街角看见迎面走来一群人。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怦怦直跳。这是某种不祥的先兆……我经常有这种预感。想着想着……这种预感随着人群的逐渐走近开始变成了现实。趁着路灯的光亮，我终于看清了他们是谁。

“帕托，他们走近了你，千万不要吱声……就装成不认识他们……”

“但是……”

“别说了！帕托……”

我们几乎同他们打了个照面。他们是格林和卡斯蒂略，被两名宪警用枪押着。我装出一副好奇的样子望了他们几眼，隐约听见他们的谈话。当走到我们跟前时，格林连头也没有抬，只顾对一个宪警说话：

“……这并不犯什么罪，宪警先生……就在昨天，我还同阿门瓜尔议员谈起过，他告诉我……”

他们朝警察局的方向走远了，只听见逐渐消失的脚步声，什么话也听不清楚了。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把他们带走！奥尔加！”

“不，我们得赶紧想办法营救……这儿哪有电话？”

“这附近……你等一会儿……在加西亚雷耶斯的服务站里有。”

“赶快到那里去！”

我向阿门瓜尔家里要了电话，告诉他所发生的事。他说马上就到警察局去，20号以前被捕的同志一定能获得释放。

四

几天以后，格林又出现在“兰加吉纳”。他来交给我几本进步出版社新发行的书籍，还告诉我一件一直关心的事。

“今晚你几点下班？”他问我。

“8点……如果有要紧事，彼得罗先生会允许我提前下班……”

“没有必要，奥尔加。是关于索尼亚……最近她又犯病了。最好你能去看看她，支部里只有你同她还谈得来。”

我不很同意他说的，相反，索尼亚是个捉摸不透的人。在她高兴时还拿我的劝告取笑呢。不过如果需要我帮助她做些什么，我倒愿意去帮忙。

“是老问题……”

“对，可她总不以为然，而事实是，她同胡安·马塔斯分居前并不象现在这样。”

“你说得对，好吧！今晚我就去。”

“谢谢！奥尔加……我走了。你的老板在用冷眼瞟我……他倒替帕特里西奥吃醋呢！”

他站起身来挥手向我告别，走出去了。

格林一向很少为自己着想。他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忧愁和烦恼，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忍耐着，相反经常想到的却是别人。他是多么高尚的一位同志啊！对帕特里西奥，他以真诚相待，热情地帮助他进步，不仅借给他书看，还经常找他谈思想，有时

到他的厂门口等他下班，两个人坐在小广场的长凳上一聊就是大半天。

一天，帕托和我约好晚上一起出去，可是他下午6点钟就匆匆忙忙来找我，向我请求原谅，说晚上不能陪我出去了。因为格林让他马上一块儿去修理党的一位领导同志的汽车。

“你同穿灰上衣的人走了，所以就把我给晾在这里了！”我装做生气的样子说。

“亲爱的！我多么想跟你一块儿出去呀！但这是一项重要任务，它涉及到一位正被警察缉捕的同志的安全。他不能在街上步行，你懂吗？没有办法，只能坐汽车。”

“那他不会待在家里不出来？”我又假装成不通情达理的样子问他。

“当然不能！”帕托严肃地说，“他是一位领导人，党中央书记处的成员，他必须去参加会议，还要……”

“好吧，要是那样的话……”

他走了。他的脸上充满了骄傲的神情，因为他要去执行的是一项对他高度信任的任务。第二天我们一见面，我就问他头天晚上到什么地方去了。表面上是顺便问问，实际上我是想试探一下他能不能严守秘密。他只是含糊地说到纽纽阿去了，并没有告诉我哪条街道和他见到的人叫什么名字。我喜欢他的慎重。帕托终于开始懂得了他是属于党的，维护党的利益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那天晚上下班后，我径直向昆敏大街索妮亚·托雷亚尔瓦的住处走去。她开了门，我走进她乱七八糟烟雾腾腾的卧室。

索妮亚只穿着睡衣，从她那没有整理的床上便可以知道她已经卧床一整天了。由于颓唐和烦恼，她无休止地抽烟，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冒了尖。

“你好……”

“你好！奥尔加，请进来……你想喝杯咖啡吗？”

“好，我自己来……”

“有现成煮好的……我已经喝了一整天了……”

“还象只烟筒冒了一整天的烟……”

“怎么，奥尔加，你也不同意我抽烟！以前他……哎呀！昨晚我头痛得要命，脑浆好象要流出来似的……我不得不吃好几片安眠药，才睡着了。可是今天早上起来脑袋直发蒙，轻飘飘的……”

我走进她的厨房，也是乱七八糟的。先把窗子打开通通风，又热了点水，把堆在那里的盘子和杯子洗刷干净。回到卧室，这也是索妮亚吃饭和工作的地方，想帮她整理一下。椅子上胡乱地堆满了衣服，地板上横七竖八到处是书、杂志和纸片。

“趁炉子上的水还没有开，我来帮你收拾一下房间……”

“你别动手了，明天我自己整理……现在没有必要……”

我没有理会她，动手归置好椅子上、地上的东西。倒了烟灰缸，又把散得到处都是的白纸和打字机的稿纸理好放在桌子上。起初索妮亚看着我干，过了一会儿也帮着整理。我们一起把床单和床罩铺平；把沉淀着一层厚厚的咖啡的杯子统统放到厨房里，再把拆皱的衣服都塞到柜子里去。然后，当她收拾洗漱间的时候，我到厨房沏了两杯咖啡，一杯淡的给她，一杯浓

的给我自己。我又找到火腿，照餐馆的做法，做了几片三明治。我又发现了一瓶桃子罐头，把它分成两份，作我们的甜食。当我把这些东西放在托盘上端到房间里的时候，索妮亚坐在背靠书橱的长沙发上，她的脸色已经不那么憔悴和阴沉了，但嘴唇仍有些发青。

她用感激的眼光望着我。

“真奇怪！……你一来，这里一下子就变了样。奥尔加，你真是一个天使……”

“对，”我笑着说，“三明治天使来了，请用！我的主人……保证从早晨到现在你还没有吃东西吧……别抱怨，这咖啡是淡的，专门给你准备的，浓的你喝的太多了，也许有点儿中毒了。”

“哦！我想起来了……你说得对，从昨天晚上起，我就没有吃东西。中午觉得有点饿，可又不想起来做饭，当我埋头创作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又开始构思一部小说了，只是还没有动笔，仅仅做了些笔记并有了一个轮廓。你知道吗，这本书的名字将叫《永别的雾》。它描写的是一个抛弃了自己丈夫的女人。当她发现自己的丈夫同警察有秘密联系时，并没有离开他。她是人民运动的同情者……她拿到丈夫的一份文件后，立即交给了组织。从这份文件中发现警方正在加紧策划一次大的挑衅行动……”她拿起杯子喝了口咖啡，“噢！这些家伙多么卑鄙啊……”

“你喝这淡咖啡可能好些，索妮亚。”

她把杯子放在一边吃起桃子来。看来她已经忘记了小说的

情节。我坐在她的对面的一张椅子上看着她身后的书橱，里面放着弗吉尼亚·吴尔夫的《到灯塔去》，帕斯科·普拉托里尼的《我的家庭记事》，索尼亚·托雷亚尔瓦的《在黑暗的沙滩上》，奥尔德斯·赫克斯利的《对歌》，鲁文·阿索卡尔的《岛上的人》，托马斯·伍尔夫的《来自时间和来自河流》……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使索尼亚说出她烦恼的原因，得想办法让她讲出真情实话。她的乖僻和孤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及她将要着手写的那部小说的动机。也许索尼亚正寻思着如何把话题往这方面引，但她突然问我：

“你和帕特里西奥的关系如何？”

“还好，没有什么问题……自从他参加组织的活动以来，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们不常见面，他只顾读书，和同志们交换思想、工作……”

索尼亚手里不停地摆弄着她的玳瑁眼镜。只有在她讲话的时候才戴起它，好象一个修理工，当他修理一台机器时才拿起他必不可少的工具一样。

“他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小伙子，十足的男子汉……你要好好引导他，奥尔加，从知识分子的观点出发帮助他进步……”

“但，索尼亚，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工人……没有一点儿知识分子的素养……”

“亲爱的！（自从她前年从欧洲旅行回来，就开始用这个词儿来称呼我。）亲爱的，你不要过低地估计自己……你只是临时在餐馆当名雇员，我确信你一定希望从事较好的更有意义的职业……”

“当然，总有一天我会放弃这个，再找别的工作。但是我只不过才读完人文学四年级的功课呀！索尼亚……”

“这个我知道……你从小的愿望是什么？”

“我曾想当一名历史教师。”

“啊！太好啦……现在努力还不晚，尽管你没有大学的文凭……可以研究历史，真正地掌握它，用我们的观点教学生……”

“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

“对。”

“啊！索尼亚，这对我来说可太难了。”我说“无能为力……”

我觉得我们的谈话扯得太远了。我真傻，竟让索尼亚问起我来了。而我的意图是想同她谈谈她的问题。当时我决定把话题转过来。

“星期天我在人民阵线总部见到胡安·马塔斯了。”

“你看见他了？是在开会的时候吧？”

她连忙戴上眼镜。

“不，是在散会的时候，我看见他走出来……”

“你同他说话了吗？”

“说了几句。”

“噢！……他问起我了吗？”

“是的……”

“你对他说些什么？”

索尼亚又摘下了眼镜，象演员卸下假胡须那样，可能是为

了更舒服些。现在她恢复了她应有的理智，急切地希望知道我同她丈夫的谈话。

“我已经说了，我们只谈了几句话。他问我党内的的工作忙不忙，我告诉他有很多事要做。胡安还知道了格林和卡斯蒂略被捕过的消息。我觉得他一直非常关心你……”

“啊！亲爱的，这只是你自己的判断罢了……”

“对，因此我才这么说，我觉得……他虽然没有专门提到你，但他说：你们应该注意保重。我认为他对你要比对我们想的更多……因为除了格林和我，支部的其他同志他并不认识……”

“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确实是这样，索妮亚，我已经对你说过……”

她又把眼镜架在鼻梁上，点燃一支烟……

“要是他真的在想着我，为什么不给我来电话……”

“可能……”我说，“万事开头难呗……我可有这样的体会……你知道帕特里西奥曾经妒嫉过……我们闹了8天的别扭……我差点儿难受死了……最后我实在受不了啦，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还好，没等我把信发出去，他来找我了……”

“当然不太容易……这个我明白，亲爱的（她又拿下眼镜），半年来我一直装出跟胡安毫不相干的样子，甚至有的时候我终于使自己确信这是真的……但是，没有办法，奥尔加，告诉你，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尽管如此，表面上我不得不装出一副同胡安分居使我更快活的样子……”

“如果你允许我的话……”

她马上集中注意力，把正在抽的香烟使劲地按在玻璃烟灰缸的底部，连忙又戴起了眼镜。

“我允许你什么？”她有些焦急地问。

“哎哟！我差点儿给忘了……下星期六的娱乐活动在洛西塔·卡斯特罗的庄园别墅举行……你去吗？”

“不知道……我倒买了一张票，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去……”

“我也要给胡安代买一张……就是送给他一张这种容易购买的娱乐票也是自然的……你说呢？”

“要是他问起我，你就告诉他……但无论如何他会知道。”

索妮亚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房间里踱了几个来回，然后打开衣柜，拿出一件黑白图案相间灰底的薄衣服，脱下睡衣换上。

“要不我说你简直是个天使，亲爱的！……你一来，一切都变得光明了……”

“那么现在我走了……你又要回到黑暗里去了……”

“不，我要陪你出去走走，亲爱的，我想散一会儿步……我在这儿憋得实在难受，一直抽烟喝咖啡……我要出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咱们出去吧！奥尔加。”

五

洛西塔·卡斯特罗的庄园别墅位于市郊雷娜区，那里景色别致，环境宜人，是举行这种夏季娱乐晚会最理想的地方。园内树木繁茂百花争艳，芬芳幽静的小径曲曲弯弯地通向绿树掩

映的亭阁；它的深处一条清澈的山溪潺潺流过。傍晚，岸边的青蛙在叮当作响的流水伴奏下唱起动听的歌。下了公共汽车好不容易才到了那里。一走进凉爽舒适的庄园，便受到女主人殷切招待，使人有一种心情舒畅的感觉。可是这时，圣地亚哥市内气温已达30多度，晒热的柏油马路烤得人们难以忍受。到了晚上从这里望过去，它简直成了一座光怪陆离的城市，千万道绚丽多彩的光柱射向夜空，隐约还听到那里传来的喧闹声。

洛西塔·卡斯特罗是我们党的好朋友，她的别墅经常用来举行这种具有双重意义的活动：同志们和党的同情者一方面欢聚一起联欢交谈；另一方面，通过门票收入，为党提供急需的活动经费。洛西塔不仅借出她的财产，还让我们随意安排布置。女主人穿着朴素的羊毛织的裙子和黑色罩衫站在门口，彬彬有礼地向来宾问候致意，寒暄交谈，时而从树上摘下熟透的桃子送给身边的客人；时而同孩子们拉起圈子玩一会儿；时而又停下来加入别人的讨论，还说上几句尖刻的话，但她的脸上一直挂着和蔼可亲的笑容。

她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但精力还相当充沛。她有一个儿子，是工程师，也是我们的同志，还有两三个孙子。洛西塔原籍欧洲，出身豪门。她自幼学习绘画和音乐，这是那个时代她的阶层的女孩子们所受的必不可少的教育。尽管她一直没有成为画家和歌唱家。但她有一副嘹亮的好嗓子。有时候，我们在她家里合唱，她还给我们伴唱呢。那天下午她看见我挽着帕托的胳膊去了，她热情地把脸伸向我，让我吻她。

“奥尔加，我的孩子，我从来还没有见过有人陪你来……快

把你的朋友给我介绍介绍。”

“这位是洛西塔·卡斯特罗……他是帕特里西奥·拉米雷斯。”我为他们相互作了介绍。

帕特里西奥穿着他那件漂亮的蓝上衣和白衬衫，他弯下腰握了握洛西塔的手。

“奥尔加，看来你真有眼力，多好的小伙子……”

“这个……谢谢！”帕托腼腆地说。

洛西塔用眼睛向我微笑。

“关于她，帕特里西奥，我能对你说些什么呢？……世界上可没有第二个奥尔加呀！……”

“我也是这样想的，夫人。”帕托有礼貌地说。

“好吧！年轻人，你们去玩吧，大厅里可能还有舞会。”

她转身又去向新来的客人们问候。帕特里西奥可开了眼界，望着豪华的宅第和宽敞的庭院不停地点头赞叹，但并没有露出任何拘谨的神色。我也一样，处身洛西塔那幽静的庄园和坐在奥费莉亚家简陋的草垫上，同样感到轻松愉快，心旷神怡，只不过她们的接待方式和周围的环境气氛相异罢了。

我们悠然自得地在园中崎岖的小径上漫步，我指给帕托看一尊雕像，他仔细地观赏，仿佛着了迷。他对我说，在这之前，他还以为只有公园里才能见到雕像呢。我们见到了许多熟人和朋友，我骄傲地把帕托介绍给他们。

“他们都是我们的同志吧？”

“不都是。傻瓜，党员连 1/4 都不到……大部分是党的朋友和同情者……”

我不高兴的是几个姑娘用挑逗的眼光望着帕托，好象馋得要流出口水。我气愤地向她们瞥了一眼，用手理了一下头发，又拉了一下有点儿箍肩膀的黄绸子罩衫，更使劲地挽住他的胳膊继续在铺满落叶的小径上漫步。

几个同志正热烈地争论某个理论性问题。当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本想加入他们的讨论，可是我突然笑了一声对他们说，在党内应该作出决定，今后在类似这样的娱乐活动中应禁止谈论政治问题。

“当然啦！我们不能跟你比呀，你有人陪着呢……”

我没有说话，把脸贴在帕托的肩上，继续往前走。

“你瞧那房子多漂亮……有点儿象……”

他立即停了下来，好象又要说出一句冒失话。

“有点象什么？”

“没有，我又要冒傻气了……”

“说呀！”

“好吧，我觉得那房子有点儿象哪部电影里的建筑。”他用怀疑的眼光望着我。

“确实。”我接着说，“我也有这种感觉，特别是……你看！帕托。”

花园的那边，在一棵枝叶繁茂的无花果树下，一对男女正坐在石头长椅上窃窃私语。他们是索尼亚·托雷亚尔瓦和她的丈夫胡安·马塔斯。

“是索尼亚。”

“对，别去打搅他们……”这时胡安正在给索尼亚点烟。

“帕托，咱们最好离这儿远点，他们正说知心话呢。”

我们迎着山坡上刮来的凉爽的微风，在树丛和花草间并肩走着，土壤和绿叶散发出来阵阵的清香，沁入肺腑，令人陶醉。这时，一个人抽着烟斗向我们走过来，原来是格林。我们高兴地向他打招呼。

“我们去喝杯冷饮吧！”格林对我们说，然后他转身就走。

在树丛间的一个凉亭里，设了冷饮点，五六个女同志负责出售。同一个女同志对我们说：“欢迎光临，请即取冷饮。”

“你喝点儿什么？奥尔加。”我问那个女同志，她递给我一杯“柠檬水。”

“你呢？帕托。”我问另一个女同志，她递给我一杯“啤酒。”

喝完杯子，我们三人又接着散步。这时夜幕渐渐降临了，整个花园变得愈加迷人。万物竞相吐露出芬芳，使人有置身仙境的感觉。这时，一个女同志对我们说：“你们遇到支部的同志吗？”

“只见到索妮亚了。”我说，“但我们没有跟她打招呼，她正在同马塔斯促膝交谈呢。”

“多亏了你呀！”格林对我说，然后又补充道，“现在我担心的是米盖尔·洛夫雷斯，这个青年同志因为政治观点同他父亲有分歧，跟家里闹翻了……他父亲是个彻头彻尾的右派……一场激烈的争论之后，他父亲把他从家里赶出来了……”

帕特里西奥连忙插嘴：“格林，你别担心，米盖尔是个好人。”

“我家的条件虽不好，如果洛夫雷斯同志愿意，我可以在我的房间里给他安排个床位。

“不用了，帕托，没有必要……昨天晚上他已经搬到我家住了。但根本的问题不在这儿，而是他目前的精神状况，情绪非常低沉。因为他平时很爱他的父亲，又敬重他的母亲……他自己认为他的行动是对父母的大逆不道……另一方面他又不甘愿陷入这意识形态分歧的旋涡中，你懂吗？……我们得想办法帮助他，给他鼓励，使他增长斗争的勇气……”

“现在轮到咱们支部对他帮助了。”我说，“一个同志的问题刚解决，另一个同志的问题又来了……”

“的确是这样……无论如何必须帮助米盖尔……在下次的支部会上，我们大家来共同想想办法。再见！”

大厅里几对年轻人正在跳节奏紧张的曼博舞，欢快的舞步，飞速的旋转，简直使人头晕目眩。人们进进出出，熙熙攘攘。突然有谁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我扭过身看见索妮亚的一张笑脸。她意味深长地在我脸上吻了一下，又在她丈夫的陪同下一阵风似地转身走了出去。接着，一阵急促的汽车马达声逐渐在黑夜中消失。

六

星期一我带着烦恼和厌倦的心情又去上班了。每当我同帕托或同志们度过一个快活的周末以后，尤其是那次从卡塔赫纳海滩回来和这次在洛西塔·卡斯特罗庄园别墅的娱乐之后，

这种心情就愈加明显。给顾客斟咖啡、送面包、涂黄油、做三明治、开啤酒瓶，这些活使我厌烦透了。有时我对自己说，这里的工作实在单调粗俗，只不过是些体力活。我常常思忖着我总不能就在“兰加吉纳”这样待下去，我理想的工作比这儿更好，更有意义。

支部的一些同志这时正经历着精神上的折磨，非常需要帮助。大概我跟索妮亚同样感到幸福，因为为她 and 马塔斯和好，我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她简直象换了一个人，脸上总挂着笑容，仿佛也年轻多了，对党的工作也更积极了。她告诉我，她的作品《永别的雾》正在以异乎寻常的速度顺利地进行着。

可是，现在问题又出在米盖尔身上。他是一位名律师的宠儿，经过长时间严峻的考验和对马克思理论认真的学习，终于入了党。他虽然是支部较年轻的同志，却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他懂得运用分析的方法发现问题的实质，往往得出我们认为比较正确的结论。因此，当大家知道了他由于政治观点上同自己慈爱的父母发生了分歧，他离开了他们，正遭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就觉得格外痛心。

他住在格林家里，整天埋头读书。有时估计他的父亲不在家，便给他母亲去个电话或回家看看。要不，他母亲就乘出租汽车来看望一下自己的儿子，给他送来些衣服和钱。

为了减轻米盖尔精神上的苦痛，帕托和我常去看望他。有时我们在晚上陪他去看场电影或去散会儿步。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些。支部的其他同志都曾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去住，而我没有

这个条件。其实，我认为居无室所并不是米盖尔忧愁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他失去了自己的家庭温暖。

姐姐患了感冒，一连几个晚上我一直照料她。切拉的身体一向很糟，体重从没有超过50公斤，而且脸上总显出病态的苍白。我想方设法让她出来走走，看场电影或到森林公园换换空气。甚至我还计划陪她到海滨待几天，可是遭到了她的拒绝。她成年累月生活很单调，每天早上上街去买回一天吃的用的东西，星期天到教堂或到我们父母亲在世时的几家老朋友家里去看看。我已经同他们很少有往来，就连切拉几个至交的女友也是一年最多才见一次面。那是在姐姐的生日那天，她们到我家来给她祝贺。切拉买回几瓶汽水和几盒蛋糕，还做几样她拿手的点心，再买几只烤鸡，对半切开摆在盘子里，浇上用肝、鳄梨和黄油做的汤，用来招待朋友们。她的朋友们都穿着黑色的礼服，有的撑着伞，陆陆续续地来到家里。往往每人要送给她一件小小的礼品：几条手帕，一只别针或一块绣边的呢子。切拉把那些礼品包一一打开察看。最后才给她的朋友们展示我送她的东西。当看到我送的是本书时，她们便开始议论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起她们最近读过的书。一般来说，那天总是很晚才吃饭，因为大家在一块儿，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很快。说真的，那天我有些心烦，尽管我竭力克制自己。我主要的任务是帮助姐姐应酬客人，给她们倒咖啡切蛋糕。有的时候我不得不去参加支部的会议，不能在家料理，切拉只好一个人照应。每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都为我唱歌祝福……你们看见了吗？这个疯丫头又去跟那些共产党掺和去了。

因此，切拉从没有放弃使我回归正路的企图，敢保证她还不只一次地在上帝面前为我祈祷。她希望我能继续同老朋友们保持往来，放弃我的政治狂热，跟那些“短头发”或普通的“下层人”断绝关系，并且在一个有钱人家找个体面的工作，或是在某个部里当名雇员。那才是她真正的幸运呢！

一天晚上，她听见我从帕托的自行车上下来，随后帕托就走了，他从来没有跨进过我家的门。我一进门，切拉显得有些不高兴。但在一般情况下，她是个非常有理智的人，这时突然问起我那个朋友是谁。我告诉她了。

“在哪里工作？”

“一家修理汽车的工厂。”

她叹了口气。

“修理厂……但他是正派的人吗？”

“你指他是不是一个贼、一个贪小便宜的人、一个酒鬼，或者在监狱里待过没有，是吗？”我笑着说，但话头有点儿生硬，“告诉你吧，他是个非常正派的人。”

“有文化吗？”

“嗯……跟我的学历差不多，为了帮助母亲不得不离开学校。但是现在他尽可能地自学，他读了许多书。我们一起去看戏，还去听交响音乐呢。”

“他的家庭呢？”

“不太了解，我觉得和咱们家差不多。”

我满以为这样可以打消长期以来使姐姐痛苦的疑虑，但事实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

“而你们的关系……已经很成熟了吗？”

“对，切拉。我们相互都很爱……但还不想很快就结婚，想等我们双方的经济条件改善一些再……”

“但是，奥尔加，结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你必须对他彻底了解清楚……他的为人，他父母是什么样的人，这小子有没有恶习……”

“恶习倒没有。”

“无论如何……”

“现在我们不谈这个，切拉。到时候再说，行吗？……”

“当然，如果要结婚，就必须放弃你现在的工作，我真不愿意你……相信你的未婚夫也不愿意他未来的妻子的工作是……”

她一直这么坚持，一定要我离开“兰加吉纳”。

“我也想早点儿离开那里。”我安慰姐姐说，“我刚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工作。几个朋友替我找了很久了，可能一位建筑师的办公室要雇我。”

切拉笑了。我为能使她微露笑容而感到高兴。事情是这样的，几个搞建筑的同志准备合作成立一个建筑公司，想让我当秘书兼打字员。但这只是个计划，看来离现实还远着呢。他们正筹集资金，准备办理起照手续，而在这个时候一切都决非那么容易。

“你可以请这小子到咱家吃饭，或在星期天来吃些点心。”

“请帕托吗？”

“我听说过你这样称呼他。”

“好吧，抽时间我请他来，就是他有点儿……胆怯。但他会很高兴地认识你的，切拉。”

我发现姐姐长期以来的疑虑烟消云散了。如果认识帕托能使她高兴的话——相信她一定会高兴的——为什么不让她高兴高兴呢？我确信，当她看见帕托是那么标致的小伙子，宽宽的肩膀，梳得整齐的头发，修长的身材再配上他那件漂亮的蓝上装和时髦的领带，她一定会着迷的。既然如此，我干嘛不带他来呢？

七

一眨眼3月到了。夏天的余热还没有完全消失，人们的衣着可变了，整个城市仿佛迁来了新的居民；街上过往的女小学生已经换上蓝上衣白围裙的校服，公共汽车尽可能地多运送乘客。没有几天，城市又恢复了在炎热夏天失去的正常节奏。外出的人陆续结束了他们的旅游生活。索妮亚·托雷亚尔瓦和玛塔斯也风尘仆仆地从基斯科度假回来了；米盖尔仍待在格林家继续钻研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当帕托和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伏在桌上写读书笔记。他住的房间很窄小，身旁的一个长沙发是他睡觉的地方。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做笔记。他父母亲跟往年一样，已经到维尼亚德马尔度假去了。母亲从那里不断地给他寄来长长的调解信，里面还夹着钱。可是固执的父亲连一点怜惜之情都没有，尽管他和妻子同样承受着独生

儿子离去所造成的悲痛，但仍旧顽固地坚持自己订立的家规。

当政府公开宣布一系列商品涨价的消息后，我们这些同下层群众有广泛接触的同志们开始觉察到人们的普遍不满。在餐馆里，我每天都有所感受。那些连围裙都还没来得及解下来的化验厂女工们开始讨论纷纷，对物价的上涨发泄不满。她们到餐馆只能吃 160 比索的经济餐那算是什么饭呀！一盘切得烂碎的菜叶子煮的汤，里面有一小块奶酪和一小片肉，象大海里的遇难者飘浮在水面上。“阿吉拉”印刷厂的工人们也是牢骚满腹，他们说话毫无避讳，粗声粗气，有时甚至还骂上几句当政者。帕托的同事，修理厂的工人们和其他的顾客也都不停地抱怨。所有的人都对通货膨胀发出有声或无声的抗议。

当报纸登载出公共汽车票价也上涨的消息后，人们的愤怒更加剧了。一天中午，我在给一个排字工人开啤酒时，他气愤地唠叨个不停。

“一切都完了……看来我们不得不都到街上去让这个M政府看看我们还没有死绝。一个人可以勒紧肚皮少吃点儿少喝点儿，可是不能靠两条腿穿过整个圣地亚哥来干活呀！我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上街去示威游行……”

我用赞同的眼光望了他一会儿。眼看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即将到来……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做好组织工作，以防当局挑起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当然，说起来容易，在理论上倒也讲得通，但究竟如何去实地开展工作呢？

工会已经做了大量的鼓动工作；刚刚回到课堂的大学生们号召人们走向街头，抗议直接威胁群众生活的公共交通费用的

涨价。

星期五，奥费莉亚到“兰加吉纳”来找我，前一天她被所在的工厂解雇了。关于这种事情，我们很清楚，由于经济危机，工厂需要裁员，所以一部分工人就要被迫失业。我替她向彼得罗先生求情，在餐馆是不是可以给她安置个工作。结果却非常失望，那里没有一个空额。

“奥尔加，一般只要你提出来，我都会满足你的要求的，但是，你也看到了……我实在无去安置她，没能力给她开工资呀！现在所有的行业都纷纷提价，只剩下咱们这里了。尽管我有这个权利，但我也知道顾客们实在多付不起了……唉！一切都完了。”

我没有再说话，彼得罗先生回到他收款处的座位上。

“我们到别的地方再看看。”我说，“这里没有希望……你需要钱吗？”

“不，我还能维持几天。”

奥费莉亚曾经在二十几个工厂做过工，什么工作她都干过。有几次因为带头罢工被开除了；另外几次有时是工厂裁员，有时是由于工厂倒闭，总之全是危机造成的。奥费莉亚35岁年纪，看上去矮小体弱的样子，但是相当泼辣果断。她的丈夫曾经是党的优秀干部。他高大魁梧，蓄着大胡子，是个建筑工人。在我还没有入党的时候，经常听到同志们和奥费莉亚本人称赞彼得罗·古铁雷斯的勇敢和坚强。可惜的是4年前他在一次脚手架倒塌的重大事故中丧失了性命。

“我一听到他死的消息，觉得整个世界就要毁灭似的。”

奥费莉亚曾对我这样说，“我们没有孩子，也没有什么牵挂。可他竟死得那么惨，我真连想都不敢想……你见过他，他结实得简直象头牛，宽大的肩膀、粗壮的胳膊和有力的双手。只要他一拥抱我，我就觉得我要在他怀里粉身碎骨似的。奥尔加……他是多么好的人呀！……他就那么突然地离开了我……8月的一天，公司来人告诉我他已经死了，对这突如其来的灾祸，我连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尽管我象疯子似地嚎啕大哭，可我根本不相信那是真的。甚至当我看见他血肉模糊的尸体躺在地上的时候，我仍旧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半张着嘴、满脸是黏乎乎暗红色的血迹，已经辨不清五官。当人们把他埋葬以后，我还是不相信，奥尔加……你不知道我是怎样熬过来的……说真的，要不是党，也不会有我的今天……要不是同志们，真不知道我会怎么生活下去。所以我发奋为党工作，虽然我们的活动还处于非法，但是当时我却成了有名的鼓动分子……现在我已经习惯于独身生活了，任何事情习惯了就好啦……”

“但是，奥费莉亚，”我对她说，“你不能总这样下去呀！趁你还年轻，可以再结婚嘛……”

她瞧了我一眼。她一双漂亮的淡咖啡色的眼睛，鬈曲的黑发和美丽的细眉使她显得俊秀、温和而又坚毅。

“当然，我可以再结婚，几个男人也曾经追求过我，甚至还建议我……但我说什么也忘不了他，往往拿他们同他相比较，奥尔加，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的……他是个少有的好人呀！”

我跟帕托和其他同志谈到了奥费莉亚的处境，我们商定必须尽快地为她找个工作。去开支部生活会的那天晚上，我给她

带去了三四个招工单位的地址。可是出乎意料，我看见奥费莉亚没有一点儿忧愁的样子，她喜笑颜开地给我们倒了一杯茶，对我说她已经找到了工作，是马丁内斯给介绍的，而且比她以前的工作更理想。

有人敲门了，是卡斯蒂略和马丁内斯他们来了。马丁内斯跟平时一样，浓密的络腮胡子几乎遮住了脸，从来没见过。在他茂密的眉毛下面闪烁着一对乌黑发亮的眼睛。

“你们好！同志们……奥费莉亚，解决了吗？”

“已经解决了，今天我已经上班了，一切都挺顺利。马丁内斯同志，我很高兴，真是个好机会……太感谢你了。”

“这有什么感谢的，奥费莉亚同志……”

同志们陆续到齐了。最后来的是格林和米盖尔。奥费莉亚把茶壶从厨房的炉子上拿到了开会的桌子上。我们轮流使用她家仅有的一只茶杯，一个人用完后，洗了再给别人。

“这茶真香，奥费莉亚。”马丁内斯说。

“不过你喜欢喝的是啤酒和布尔戈尼亚红葡萄酒……”

“你不要败坏我的名声，卡斯蒂略……怎么我听说茶还要加热才能喝，是吗？”

“不对……中国人喝茶为的是振奋精神。”

“不需要加糖。”

“什么？没有糖怎么行啊……”

“哎！听在中国待过的查孔同志说，在一杯开水里放上几片茶叶就行了……”

格林看了看表。他是每次例会的召集人，因为有两位同志

还没轮到喝茶，会议还不能开始。他把手伸进口袋拿出烟斗，好象他的烟斗里总是填满了烟丝，一拿出来就点着了。一缕芳香扑鼻的青烟在他的头上缭绕，帕特里西奥着迷似地瞅着格林低声问我，他也抽烟斗合适不合适。

“当然可以喽！傻瓜。”

“真的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

“格林的灰上衣，不十分整齐的头发，跟他的烟斗很相称……”

我望着他那傻乎乎的样子，真想过去吻他一下。如今他对格林的钦佩同几个月前的嫉妒是多大的转变呀！现在格林简直成了他崇拜的偶像。他还想方设法模仿和学习格林，尤其是格林对待同志满腔热情的工作态度，无论对谁，总是那样。他甚至还羡慕他那件已经磨损了的灰上衣。他说他的蓝上装看上去有些呆板。

这次轮到埃斯特万主持会议。米盖尔在会上宣讲他在格林授意下准备的政治报告。他对于由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政治形势作了40分钟的发言，并且系统地分析了全国的形势：工人阶层的不满；危机直接受害者的处境；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和商品奇缺。问到关于人民对此形势有何反应时，他确信人民群众会自发地走上街头奋起抗议通货膨胀。这样的行动好不好呢？如果它是在统一工会和人民进步党派直接的领导下，它将是一场革命的行动。但是，如果人们出于愤怒，无组织、无计划，无领导地冲上街头去战斗，这一行动对工人阶级势必酿成

一场悲剧。

我们聚精会神地听他一字一句地演说，我有意向帕特里西奥看了一眼，发现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光亮。似乎他刚刚又懂得了一个新的道理。仿佛他心底里的亮光反映到了他的眼睛里。

米盖尔继续说，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什么呢？他认为全体党员必须走上街头，要站在这次运动的最前列，要防止斗争半途而废；更要紧的是必须警惕当局的挑衅行为，同时还要避免警方对示威群众的肆意迫害。而实际上政府已经调遣了炮兵来对付群众，看来一场残酷的镇压就要开始。难道这就是他们的法律、传统和习惯吗？因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今后不是特别重要的会议不要召开，但支部的同志必须经常保持联系。大家一致同意设立两个联络点：一个是我所在的“兰加吉纳”，另一个是帕特所在的修理厂。

在会上，我们都发了言。对当前的形势每个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连由于胆怯平时很少说话的帕特也讲了话：“我们并不是在进行一场革命。”他直接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谁也不会怀疑他对当前的形势有十分清楚地了解，“而是让政府知道人民不同意涨价，他们要求一个新的经济政策。”

在离开奥费莉亚家的时候，我们仿佛受到了一种新的光辉的沐浴，在一种不久即将显示的战斗精神鼓舞下，我们更加意气奋发、斗志昂扬地去迎接新的考验。

八

抗议示威终于以雷霆万钧之势在全国范围迅速展开。政府

不但不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来缓和人民的怨愤，反而大规模地调兵遣将，对人民的正义行动进行野蛮的镇压。这只能激起工人、职员、学生、铁路员工、教师和政府雇员更加愤怒的情绪，他们以罢工罢课来回答当局的镇压。

对我来说，最伤脑筋的是我姐姐对这场轰轰烈烈运动的态度。实际上她早就惊恐万状了，总是用恳求的眼光望着我。

“今天下午你几点下班？”她问我，可她一向回避提我工作的地方。

“8点钟，有什么事吗？”

“能马上回家吗？”

“不知道，切拉……也许要到阿拉梅达去转一圈。”

“奥尔加，我求求你别到那惹是非的地方去了……谁也预料不到会出什么事。”

我本来还想对她解释几句……但是要解释的实在太多了，觉得这不是时候。我想找个机会同她好好谈谈。

“不会的。”我说，“你放心好了，我跟帕托一块儿去，看一会儿就回来。”

“你老是到那个地方去，我真担心那儿多乱呀！……他们会开枪的。”

“你放心吧，切拉，我会注意的……我一定早点儿回来。”

“那我等着你，咱们一块儿吃饭。”

“不用了。你自己先吃吧，你知道有时餐馆里可能有事，要耽误些时间。但无论如何我会早点儿回来的，切拉。”

切拉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些日子电台和报纸报

导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再者，人们到处议论的主题不外乎公共交通费用的上涨，宪警干预在阿拉梅达的群众游行，大学附近及圣达鲁西亚山下学生的示威活动。

11点帕托来了，什么话也没有说，伸手递给我一张新出版的《最后一点钟》报，并指给我看下半版的一条消息：“罢工的铁路工人准备成立秘密行动队的阴谋已被揭露（内务部发言人证实说），其成员已全部被捕。目前正遵照民主防范条例对他们进行训导。在被捕的人员中有卢丘·卡斯蒂略（内务部发言人还说），在他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大量革命宣言的传单。”

我看完把报纸还给他。

“你的看法呢？”帕托问我。

“不知道……可能是政府搞的骗局，也可能是真的。帕托，最好咱们今天晚上就到卡斯蒂略家里去看看，你有别的事吗？”

“没有。”

“那你8点来找我好吗，他住在马塔大街，离这儿很远……”

“好吧，如果你愿意，咱们骑车去。”

“那就更好。”

我已经习惯出门让帕托骑车带我了，自行车的大梁虽不是什么舒适的座位，但我紧紧地依偎在他的胸前，他把半张脸贴在我的头发上，会使我闻到令人陶醉的健康男性的气味。由于感情的冲动，我会猛然转过脸去亲他一下，这时我们靠得更紧了。无论我们在车上做什么动作，车都能靠两个不停转动的轮子平稳前进。

已经到了。我们原以为卡斯蒂略的妻子和孩子们正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出乎意料，玛丽亚镇静自若，就和平时我们见到她时一样。她对我们说，卡斯蒂略昨天晚上在工会被捕，今天早晨6点，特务们又来搜了家。

“他现在怎样？你知道吗？”帕托问。

“被关押在附属监狱。”她说，“是律师要求把他们换到卡普其诺斯大街的这个附属监狱的。我到那里去给他送了几件衣服、床垫、小刀、几本书和一些吃的东西。”

“可以去看他吗？”

“不，现在还不行。他们还不让他同外界接触。如果星期天解除隔离的话，上午10点到12点可以探望。”

“玛丽亚，我们能帮你做些什么呢？你需要钱吗？……”

“不需要，谢谢！工会会给补助的……最多他们象过去那样把卢丘关一些时候……”

“他已经被捕过许多次了吗？”帕托象个新闻记者似地问道。

“不说许多次，反正也有几次了。”她笑着回答，“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头一次是他刚从苏联回来，被关了一个星期。他们把他带回来的东西全部都没收了，还借口说那些东西是共产党的宣传品，甚至把他给我们大女儿爱莲娜买的一件刺绣罩衫也拿去了……因此，我们对逮捕并不觉得特别害怕。”

我们得和这位坚强勇敢的妇女告别了。她一再留我们在她家吃饭，但是我们还要到阿拉梅达去看看。我们上了自行车，沿着普拉特大街向前蹬去。人行道上，到处是被打碎的玻璃，

它意味着阿拉梅达不久前曾是一场激烈巷战的战场；一群群大学生仍然在大学生联合会附近高声呼喊，似乎骚乱才过去，宪警刚刚撤离现场。

“帕托，几点了？”

我真傻……圣·弗朗西斯科教堂顶上的大钟就在眼前，它的指针正指在9点20分上。

“送我回家吧！帕托，要不切拉又该着急了……这儿没有什么事，你认为呢？”

“没有事，现在挺平静的。”帕特里西奥好象有些遗憾地说，“明天我们早点来。”

星期六的《世纪》报刊登消息说被捕的铁路工人被允许探望。星期日上午10点，我们夹在附属监狱大门外等候探监的人群中间。走进洒满阳光的监狱大院之前，我们必须把身份证交给一名宪警班长。院子里放着几条粗糙的长木凳，囚犯们坐在那里等候着来探望的人们。

从老远便看见卡斯蒂略，他刚刮过脸，穿件深颜色的衬衣，正向我们大步走过来。

“喂！奥尔加，喂！帕特里西奥。”他热情地握住我们的手，“你们看见我妻子了吗？”

“听说你被捕的那天，我们去看她了……相信她一定会来的。”

格林和米盖尔来了。一会儿奥费莉亚和索妮亚·托雷亚尔瓦也来了。

“我们7个人了，”卡斯蒂略诙谐地说，“可以举行支部会了……在监狱里开会不错嘛……米盖尔，你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噢！”他说，“忙了一个星期，从明天起行动将进入高潮……昨天晚上，我同智利大学生联合会的同志们谈了，他们说大学生的动员工作要加紧进行。看来抗议浪潮将会更加猛烈……同志，你呢，他们会怎样对付你？”

“这个嘛……他们对我的起诉，90%属于捏造出来的。速审官说，我们很快就会获得释放……同志们，请让我同格林单独谈谈行吗？啊！……瞧！我妻子和孩子们来了……请原谅……”

玛丽亚穿着节日的服装，带着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孩，12岁，小的是男孩——走过来了。孩子们一见到父亲，飞似地扑了过来。一位被指控对国家的安全犯下滔天罪行的革命者，热泪盈眶地紧紧拥抱着自己的孩子，这场面不能不使人感动啊！玛丽亚同我们站在一起看着这情景默默地落下了眼泪。然后她走到卡斯蒂略跟前深情地同丈夫拥抱，接着把一口袋水果交给他。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女儿问。

“噢！明天或者后天……你们在家表现好吗？孩子们。”

“好。”

“这我就高兴了，要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生气。”

院子里挤满了欢快的人群。靠墙边一个年轻的囚犯正在拼命地吻他的未婚妻。卡斯蒂略的孩子们已经加入其他孩子们的

拉圈子游戏。

索妮亚摘下眼镜毫无顾忌地仔细观察着监狱大院里这动人的会见场面，似乎她正在对每个细节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以便为她将来的小说提供素材。

“昨天晚上你到阿拉梅达去了吗？”她转身问我。

“去了，你呢？”

“我没能脱身，从明天起，我要天天去，高潮快来临了。”

“我也有这种感觉。”

卡斯蒂略和格林两人正在并肩散步，边走边说，他们在热烈地谈论着什么。我猜想卡斯蒂略一定对格林叙述着铁路工人运动的细节问题，让他时刻关心对斗争的领导。这时，工人统一工会的领导人也来了，他们热情地向囚犯们问候致意。格林他们的谈话中止了，卡斯蒂略走到工会领导人跟前。

“我们回去吧！”格林说，“奥尔加，你现在走吗？”

“我们现在就走，帕托，你带给卡斯蒂略的香烟交给他了吗？”

“已经给他了。”

“那末我们走吧，奥费莉亚呢？”

“她还没有过来，我在这儿等一会玛丽亚和孩子们。”

我们向卡斯蒂略和铁路工人们挥手告别，走出了附属监狱，那里的囚犯们还在尽情地享受着他们难得的出访日。到了班德拉大街，我们分了手。索妮亚、帕托和我，我们一块儿到阿拉梅达去喝杯咖啡，格林和米盖尔要去中心市场买一些水果。

九

如果上帝安息日休息的话，学生们也应该有这个权利。星期天，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太阳也不象前些日子那样烤得人们难以忍受了。这真是个难得的好天气。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和平时一样顺利地各自在各自线路上行驶，没有任何人阻止它们的正常运行。宪警们分成小队懒洋洋地沿街巡逻，他们中间有的人还毫无顾忌地咧开大嘴打起了哈欠，手里的武器——卡宾枪和对付游行群众的棍棒——好象成了他们的累赘。多好的天气呀，要是到公园去游玩该多好哇！

我到姐姐的身边安慰她几句，告诉她整个圣地亚哥就象一杯牛奶那样平静，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然后去找帕托，想跟他出去散散心。我们买了几片三明治和一些水果带上，来到肯塔诺尔马尔公园的树荫下的草地上。

索妮亚自从那天在阿拉梅达同我们分手后，很少再同她见面。星期天她有睡懒觉的习惯，我想这会儿她一定在家享受着第二个（也许是第三个或第四个）蜜月的幸福。这次和好之后，马塔斯对她倍加宠爱，即便是在朋友们或同志们面前，也毫不掩饰，依然对她十分娇惯。肯定他的行动是想弥补她过去精神上受到的损失，同时让别人忘记几个月来为索妮亚被遗弃所产生的怜悯。其实，谁也不明白他们闹矛盾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但是，象胡安·马塔斯那样一位仪表堂堂，具有上等职业的又

有声望的工程师竟然同妻子分居，在人们看来自然而然地要归咎于男方，毫无疑问妻子是受害者。我不知道索妮亚的具体情况是不是同人们想象的一样，但事实是对马塔斯谁也不了解。至于他的生活作风，不象是那种终日跟不三不四的女人鬼混的好色之徒；也不象一个朝三暮四、热衷于寻花问柳的浪荡公子。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多愁善感又不注意修饰的人，这是在他们分居的那些日子里，我同他谈过几次话之后的结论。难道他知道索妮亚同我的关系比较好，才故意在我面前装出的那副样子？但是我确信他的表情还是自然的。记得当我去卖给他一张洛西塔·卡斯特罗庄园别墅的娱乐活动入场券时，他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盯着我问道：

“你们支部的人全……全都去吗？”

“不全去。”我回答，“但我知道一些同志，象索妮亚、米盖尔，洛夫莱斯、格林他们一定去。”

我仿佛看到他深陷而乌黑的眼睛里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拿出500比索交给我，十分肯定地说，那天他一定去，并且还说 he 非常乐意参加这样的娱乐活动。

这一切使我感觉到由于分居，双方都在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折磨。这种纯属夫妻间的纠纷，到一定时候别人最好能出面相劝。否则，事情有可能恶化；双方互不相让，甚至到了发疯的程度……最终相互忘记对方；但是，也会有下面的情况，矛盾既然发生了，两人都能相互忍让，逐渐消除矛盾重归于好。索妮亚和马塔斯，帕托和我，我们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当然，我所说的这些事情有时是这样，有时是那样，或许

有时事情会更简单。关于这方面我可没有太丰富的经验。另外，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存在不可思议的、甚至连法律也难以约束的东西的话，那就是爱情。谁也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相爱，为什么有的男人同妻子有了矛盾能重新和好，而有的男人还受过高深的教育，看来十全十美，却淡漠地把妻子遗弃。

我不禁想到有关我自己的情况，两个男人几乎是同时闯入到我的生活里来，我知道他们都很爱我。怎么知道的呢？噢！对一个初恋的姑娘来说，对方的这种感情是最容易察觉的。有时一种表情、一句话、一个眼色就足以判断他对你是否有意思。有时甚至连这些表示都没有，也可以猜出他的心思。他们两个是那样的不同，身份地位又各自相异，最主要的是他们成熟的程度，犹如夏天和冬天温度计上的水银柱，差异悬殊真是天壤之别。如果让我在他们两人中选择一个值得爱的男人（我可不是那种姑娘，她们凭空想象或按电影中人物的模式挑选实际生活中不存在的意中人），我会毫不犹豫地选中格林。我喜欢他和他的一切，他微黄的头发，他发亮的灰色眼睛，他那平稳持重的举止，还有他那沉着冷静思考问题的神态，以及他那从不炫耀的渊博学识；他对别人困难的敏感，这种触角式的敏感使他能及时了解到哪个同志有了困难。尽管有难处的同志尽量自己设法克服，他还是象及时雨那样过来帮忙……我还喜欢他朴素的从不注重穿着的外表。虽然我不只一次地思忖，是不是真的在我认识他的那些岁月里他连买件上衣的钱都没有攒下来。他这件人人熟悉的灰上衣已经磨损，边角也花烂了，真该买件新的了。

另一个男人就是帕托。起初我们互不了解，但他给我的印象是有点傻乎乎的。那种从电影里机械模仿来的既虚假又造作的举止与他极不相称，而他的本性却是胆怯的，同电影里的人物截然不同。因为他只能从影片或连环画杂志里盲目地模仿，追求的是模糊不清的爱情生活。在我们最初的接触期间，“兰加吉纳”的厨师告诉我，帕特里西奥曾经跟在那里工作的女招待马利亚有过恋爱关系。

“将来你就知道了，孩子……厨师胡安尼达粗声粗气地对我说，“那是个魔鬼，一个好色之徒……你千万别上他的当……那时他天天来找马利亚，可没过多久他就烦了，跟人家吹了……当然，马利亚也不是好东西，但在这件事情上，帕托做得不对，不该轻易就把人家甩了……”

“马利亚后来怎么样了？”我怀着女人家的好奇心和有些醋意地问她。

“据说一个宪警队长看上她了，还给她买了一栋房子……啊！那可是个美人呀！”

就这样，两个男人轻轻地推开了我爱情的门扉。我不是说从他们两人中选择有什么困难，不，对格林我只不过想想而已，因为他已结婚，还有两个孩子，我不能成为人家美满家庭的破坏者；确信格林也不希望自己的家庭解体。不，人应该明智，通情达理。但有的时候，爱情总是要超越某种障碍，但谁也说不准在什么时候。我有这种体会，当我同格林在一起的时候，觉得总有那么一种东西，那么一种违背他自己意愿的、如电波似的东西向我发射，很快我就有所领会。我们女人对这方面的

感觉尤其敏锐。现在好了，在他们之间我终于选择了帕托。他是个极不成熟的人的典型。并不是因为他年轻，不是因为他没有结过婚，也不是因为看到他的可塑性，可以改变他的习性和爱好。不……那末我为什么要选择他呢？不知道。很简单，这个选择取决于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极其神秘的爱情的魔力。

我们俩躺在肯塔公园柔软的草坪上。几个刚学步的小孩离开母亲的怀抱在我们身旁走几步又趴下来，站起来再走；拄着拐杖的老人三三两两边走边聊；镶着满嘴金牙齿的吉卜赛老太太们有说有笑；抗议的人群已经停止了游行，在远处正没完没了地唱着宗教赞歌；一群群少年吵吵嚷嚷地尾随在几个穿着把大腿肌肉裹得绷紧的牛仔裤的姑娘后面向远方走去；卖冰糕、冰棒、花生、水果、纸制风车和气球的小贩串来串去，高声叫卖；下了班的宪警同他们的情人手挽手幽闲地在散步；有的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从附近放置动物标本的博物馆里走出来。

我仿佛已经进入了半睡眠状态，帕特里西奥猛地拉我一下，伸手递给我两片三明治。

“我不想吃，谢谢！”

对在餐馆里做三明治的人来说，这种食品对他没有多大的吸引力……无论哪儿做的，味道都一样，并不能引起他的食欲。

“那末，亲爱的，你想吃葡萄吗？”

“好吧！”

初秋的太阳温暖宜人，万物争着多享受一会儿它宝贵的光

芒。我们身旁一株高大的棕榈树顶着个极小的树冠，象在站岗守卫我们。

我欠身坐起来，开始品尝帕托递给我的葡萄。这时帕托正狼吞虎咽地吃着捧在手里的三明治，看上去他的食欲是那么好。

孩子们的欢笑声给公园增添了生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星期天自己也那么兴奋，似乎又回到了我的童年；又仿佛觉得这是一场大风暴前的短暂平静。好象孩子们的欢笑声将要猛烈地摧毁一切似的，使我感到无限恐惧和不安。

十

阿拉梅达的第一阵枪声并没有使任何人感到特别震惊。因为它只不过是使整个街道充满刺鼻火药味的巨响罢了。这些天凡是从那里经过的人都会十分清楚地知道那里所发生的一切。人民群众已经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程度，学生们怒不可遏地把过往车辆的玻璃砸得粉碎。看来枪声只能加剧示威群众的愤怒。

帕托和我跟随着络绎不绝的愤怒的群众前进，大声疾呼，高喊抗议涨价的口号。我们的行动是对宪警疯狂镇压的有力回击。为了夺取这场战斗的胜利，我们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我算不上英勇善战的勇士，但也不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我和参加示威的妇女一样，一听到10米远的地方卡宾枪的沉闷射击声，便奋不顾身地往前冲去。这些天，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惊

慌，而是格外冷静地冒着飞起的石块和流弹，躲避敌人的棒击和抓捕；忽儿我们的队伍被宪警冲散，忽而又在对面的便道上重新集合继续向前。我并不感到害怕和孤单，我是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的一员。不仅因为帕托始终在我身边，更主要的是我懂得，我们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几乎所有支部的成员都来到阿拉梅达加入了示威群众的战斗行列：有的喊口号，有的散发宣传品，同志们个个坚强勇敢。开始我们手挽手列队前进，可是不一会儿就被荷枪实弹的敌人冲散，陷入一片混乱。我使劲拉着帕托的手再回到原来集合的地点。这时我发现从乱哄哄的人群里跑出两个人去扯掉电车上方的电源杆子，让乘客们走下来。我仔细一看，他们是埃斯特万和马丁内斯。夜间马丁内斯一双乌黑的眼睛象燃烧的火一样闪闪发亮；在一个街角一位戴玳瑁眼镜的中年妇女正向围在她周围的行人绘声绘色地大声讲解通货膨胀给人民带来的危害，我看清楚了，她是索尼亚。当宪警走过去的时候，人们立即把她团团围在中间，使她免遭敌人的抓捕。星期四晚上，当我们在阿拉梅达同敌人展开激烈搏斗的时候，看见格林穿着他满是灰尘的灰色上衣匆匆忙忙地走过；我们还几次看见米盖尔同其他几个学生边走边议论进了智利学生联合会的大门。

支部的同志正全力以赴地履行着会上通过的决议，每个人用实际行动为抗议涨价而斗争。有一次，我和帕托正随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向阿尔玛斯广场行进的途中，在大学门口碰见了奥费莉亚和仍被囚禁的卡斯蒂略同志的妻子玛丽亚。

“你看见格林了吗？”奥费莉亚问我。

“昨天见到他了，但他没有看见我。”

“他有事要跟你谈。”

我们的队伍到韦尔法诺斯大街时，一队宪警突然挡住了去路，队伍只好停下来。几个学生出面同他们进行交涉。

“5分钟之内你们必须解散！”宪警队长恶狠狠地嚷叫。

“我们组织的是一次和平游行，这是我们的权利。”学生们回答。

“什么权利不权利，这是我的命令……当然你们是明白的……”

双方僵持了一会儿，游行队伍绕道向阿尔玛斯广场跑去，当我们冲破另一队宪警的障碍时，街道两旁的商店一下子都关了门。

“时间到了，必须用武力把他们驱散！”

随着警官声嘶力竭的命令，司号手立即鸣号让全体进入战斗的准备。我只听见一阵卡宾枪的撞击声，紧接着血腥的镇压开始了。顿时，枪声、咒骂声和混乱的人群的嘈杂声汇成一片。住在街道两边高层建筑上的居民从窗口探头高声叫喊起抗议涨价的口号，并谴责宪警的野蛮暴行。气急败坏的宪警举枪向发出声音的窗口射击。顷刻间碎玻璃象降雨似地落到便道乱哄哄的人群的头上……

帕托拉着我的一只胳膊沿韦尔法诺斯大街拚命地向埃斯达多跑去。冷不防一个宪警的棍棒狠狠打在帕托的肩上，他不顾疼痛，象只受惊的猛虎边跑边喊叫。我们混在杂乱的人群中过了埃斯达多一直向广场奔跑。这时几路游行队伍正在往那里汇

集。一伙人已经占据了广场正中间的亭子，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站在上面正向人们发表激昂的演讲。

有人扯了一下我的胳膊，回头一看原来是格林。

“你们过来！”他说，“我跟你们说几句话……在他们开枪以前还有时间。”

我们顺着五月二十一号大街向河边走去。这里还比较平静，只是两边商店的门窗还紧闭着，恐怕骚乱给他们带来灾难。

“我已经看见你们象狮子一样地战斗。”格林满意地微笑着说，“帕托，看来你还挨了一棒子呢！”

“这帮混蛋！”帕特里西奥生气地嘟囔着，用手揉搓一下受伤的肩膀，“我倒愿意跟他们个对个地拚……”

“格林你不是也挨打了吗？”我说，“昨天晚上我看见你倒在地上……”

“是的，在阿尔杜罗大街的拐角一阵子射击，我赶紧趴在地上……还好，我一点儿也没有受伤。”

他迅速地给我们传达了当前的形势以及几个谈判代表正同政府磋商如何缓和目前紧张局面的消息。

“当然，由大学生联合会和工人统一工会出面磋商的基本要点是要求停止通货膨胀。”他说，“如果谈判没有结果的话，抗议示威将继续进行。但话又说回来，要是谈判没有一个强大的群众运动作后盾，政府根本不会轻易作出退让。懂吗？”

“懂。”

“我们支部同其他支部一样应该坚持街头的斗争。我们的口号是：除日常工作外，其余的时间都到街头去……工人统一

工会正在研究决定部分或间断的罢工的可能……号召书正在印刷，让大家必须坚持街头的斗争。明天上午就能印好，他们会装在篮子底下给你们送一部分来……要保存好，向每个同志散发……这样行吗？”

“我没有什么困难。”我急忙说，“我可以先把它保存在餐馆的厨房里。”

“帕托，你呢？有什么不方便吗？”

“没有，没有。我可以把它保存在一辆待修的汽车里，谁也不会发现。”

“太好了……就这些。”远处传来几声呼喊。“看来这地方平静多了。”格林说，“可是在马塔大街和中心车站附近仍有战斗……现在我们到广场去看看。”

广场上紧张的气氛已经缓和了许多。只有十几个人围在那里热烈地争论着什么，武装宪警已经撤离。我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就往回走，走过几个街区才找到一个开门营业的咖啡馆坐下来。格林对我们说，那天下午他在家里突然听见一辆汽车在他家门口停下来的声音。他还以为是警察的车呢，正准备从隔壁逃跑，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是米盖尔的父母来了。

萨穆埃尔先生终于让步了。他的妻子一直坚持让他亲自来找他出走的儿子……自从宪警开枪镇压游行群众以来，米盖尔的母亲便开始惊恐不安地生活。但是萨穆埃尔先生仍然固执己见，死不退让。现在他终于决定迈出父子和好的第一步，到我家来找他。当时我正在隔壁的房间，所以亲眼看见了那个家庭团聚的动人场面……父亲难堪地伸出手，米盖尔激动地紧紧握

住……

“但是父亲的使命完成得一点儿也不顺利，”接着格林对我们说，“这位主观的律师曾经简单地认为只要伸过橄榄枝就足以把儿子从魔掌中解救出来。但事实并非他想象的那么容易，他这会儿看到的米盖尔比想象的更坚决了。萨穆埃尔先生提出和好的先决条件是不准儿子介入街头的冲突，米盖尔当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行，决不能答应这个条件。因为他已经下定决心跟同志们一道参加大学里、街道上和所有地方的斗争。律师先生结果感到大为失望，母亲在一旁又哭起来了。米盖尔满脸涨得通红，对母亲说：‘妈妈，别为我担心，我会小心的，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这是我应尽的义务，在任何时候我也不能逃避斗争……妈妈，我相信你也不希望你的儿子成为可耻的胆小鬼，难道不是这样吗？’”

到此他们的谈判已告破裂。律师冷冰冰地同儿子告别。当他们离去的时候，母亲简直哭成了泪人。米盖尔最关心的是他的母亲，最后答应常给她去电话，并让她多加保重。

“这是正确的立场，也只能这样做。”格林最后说。

帕托和我默默地点头同意，米盖尔真是好样的。

午夜时分，我们告别了格林往回走。初秋的凉风吹在身上，有些冷的感觉。帕托的一只手搂住我的腰，我们加快脚步往家走。我知道在家里等着我的是切拉的责任和抱怨，因为她不可能不为我担惊受怕。

我还没有开大门就听见了姐姐的声音。

“奥尔加吗？”

“对，是我。”

她还没有躺下。茶壶还在灶上放着，她赶忙倒杯热茶递给我。

“我一直在收听电台的广播。”她说，这简短的一句话仿佛是对我严厉责备的开场白，“你真的参加了学生们的骚乱吗？……”

“是的，是真的。”

“但是，奥尔加，你已经不是孩子了！”

“不，我已经长大成人了。这是我的责任……我的社会义务。”我也有些自负地说。

“我可放心不下呀！……”

“切拉，你不用那样担心，我会小心的。”

“对，谁都那么说……那些被打伤的人也那么说……你知道吗，今天又有12人受伤！”

“12个人受伤！”

“是的，而且都很严重，我从广播里听到的。还有70多人被捕，他们都是大学生和共产党……”

“共产党并没有宣布公共汽车票价提高到15比索。”

“但不能为了多5个比索或少5个比索就开枪杀人呀！”我没有讲话。

“奥尔加……”

她突然停下来，但是她悲哀的声调引起了我的警惕。

“奥尔加，你答应我，明天别再去了……宪警已经接到了开枪的命令……这也是广播里说的……”

“切拉，这个我不能依你，很抱歉……”

“但，奥尔加，我求求你，我是你的姐姐呀……”

我想到了米盖尔在他父亲面前的表现和他母亲伤心的眼泪。

“不，”我坚决地说，“切拉，我不能欺骗你，相反我要如实告诉你，明天、后天、今后每天我都要去，只要人民的要求没有实现，街头的抗议斗争就会永远继续下去。”

第三部

穿灰上衣的人

给上级党起草一份报告，我从来还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为难。其实，这个工作对我算不了什么，只要把材料准备好，一会儿工夫就写成了，就象写一封简单的家信那样容易。可是现在……

前天晚上特务们到家里去抓我，我不在家，他们扑了个空。多亏我妻子亚历拉德拉托人带来口信，我才脱了险。事情就是这样，在有可能回家之前，我不得不在外面躲些日子。这并不是说待在朋友家里不舒服，不是的。这里有我需要的一切。但只不过有点儿不太习惯罢了：儿子不在身边，不免有些想念；还有我用惯了的电动刮胡刀；我的书籍和我的烟草罐都

不时地勾起我对自己家的留恋。

在这方面我早就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才行，应该预见到特务们总有一天要登我家的门。往往他们的搜捕是在特定的政治形势下才进行的。“四、二”事件发生后的今天，整个首都圣地亚哥乌云笼罩，恐怖异常，自然他们要把责任统统推到共产党人身上。人民是被迫起来采取行动的，要斗争就会有牺牲，我没有比现在为自己同志的倒下感到更悲痛的时候了。

党组织当然知道我隐蔽的地方，昨天交通员来过了。从他那里了解到外面的形势；同时我也向他报告了一些情况。譬如，“四、二”惨案发生以后，我们支部几乎遭到了彻底的破坏，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活动；帕特里西奥伤势严重，已被送到医院治疗；卡斯蒂略仍被关押；米盖尔，埃斯特万和马丁内斯已经被捕；索妮亚躲藏起来了。至于其他同志的情况我就知道了，交通员也没有对我谈起。而奥尔加，奥尔加……连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亲爱的天使，她竟然在战斗中被夺去了生命。

“同志们：我们对近日来圣地亚哥事件发生的根源以及4月2日惨案的背景很清楚，因此，没有必要详细报告它的过程……在此仅向中央领导汇报我们亲爱的同志奥尔加牺牲前后的一些情况……”

我怎么能写她已经死去！谁会相信我们已经同她诀别。我们再也见不到她了，难道是真的？而事实是，在敌人对人民运动最残酷、最疯狂镇压的那一天，她那张笑脸、她那颗善良的

心和她美丽的容貌竟被子弹无情地夺去了。我们是唯物现实主义者，可是往往当一个与我们休戚相关的生命消逝的时候总觉得难以置信。尤其是奥尔加，她跟同志们心心相印，她的死怎么能不使我们倍感悲痛啊！又怎么能使我们相信那是真的啊！

她第一次出席支部例会的情景仿佛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是195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那时她给我的最初印象不太好，我想她可能属于在党内常见的那种虚情假意的姑娘。当然，党脱离不开社会，党内什么样的人都会有。绝大多数人是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加入我们行列的，并且时刻准备着为无产阶级的事业而献身；可是另外一种人，她们在特殊的情况下，也就是当她们受压抑或遇到不公平对待时，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她们入党的目的单单是为了享受作为共产党人的荣誉。听说她是共产党员，一些人会把她当作英雄来崇拜；而另一些人则会把她当作一个值得同情的精神病患者。他们往往一谈到共产党，就神秘地议论不休。一般来说，这种人在党内不会待很久，因为她们不懂得党内工作的意义，只觉得它单调乏味，所以很快会感到厌烦，没有意思。她们认为共产党的事业只有知识分子能承担，并非所有人都能胜任。还有个别人在工作中遇到了某些挫折时，会对党的事业丧失信心。其实，所有这些人，往往由于一个简单的理由就离开党。她们的资产阶级立场不可能改变；她们永远也脱离不了虚伪而又复杂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当奥尔加第一次在我们支部会上出现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我怎么会对她有那样的印象。大概是由于她那散披在双肩的波

浪形头发吧，右边靠耳朵的地方梳成一个大波纹，几乎遮住了半张脸，一般朴素的姑娘谁梳这种发型。毫无疑问，她一定有点儿不寻常。

在她参加的第一次支部会上，她还发了言，但显得有点胆怯。随着时间的流逝，奥尔加逐渐显示出了她那优秀高贵的品质；她坚强的性格和对新事物迅速接受的特点。她生活朴素、工作踏实认真……奥尔加的优点不胜枚举。然而最使我们喜欢的是她对同志的诚恳热情。她自己经常这样说：“同志们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就象作丈夫的当自己的妻子分娩时，他甘心情愿为妻子分担痛苦那样，奥尔加为支部的所有同志分担过忧愁。她常常忘我地替别人忙碌，为被捕的同志筹款和捐赠衣物，为失业的同志寻找工作，还日以继夜地陪伴刚刚失去丈夫的妻子或失去儿子的母亲，对同未婚夫断了关系的姑娘给予安慰，使她忘记失恋的痛苦；她和同志们的相处不分亲疏远近，对任何人都一样真挚热情。她唯一想得少的是她自己。有一次我不得不命令她至少星期日在家休息一天。

我相信，自从奥尔加来到我们支部不久，我们就渐渐地喜欢亲近她了，这不仅仅是由于她美丽的容貌，主要是因为她有一颗善良的心。亲爱的天使！你现在在我们中间已经不复存在，而你可知道你的光和热对我们支部，对党的工作和我们大家是何等宝贵！

当时我们支部一致同意积极参加大学生开创的街头斗争。从那以后，同志们和人民群众一道在阿拉梅达展开了抗议通货

膨胀的示威游行，同宪警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斗争声势愈来愈大。奥尔加同志在战斗中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她每天都坚持在斗争的最前列。同志们和我本人经常看见她热情地鼓励学生和工人们同宪警搏斗，并且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无所畏惧地率领群众冲锋陷阵。

许多次我看见她在沸腾的阿拉梅达同示威群众并肩战斗。阿拉梅达包括圣路西亚山和布尔内斯广场，是遭到敌人重点袭击的革命营垒。那里街道两旁的商店早已关闭，只有为数不多的汽车和电车冒着示威群众飞起的石块和宪警的流弹急速地行驶。人民群众的口号声和宪警长官声嘶力竭的命令声混成一片。忽然前方的街角停下来几辆卡车，从上面迅速跳下来几百名荷枪实弹的宪警，他们立即把在那里集会的学生和工人围得水泄不通。

在那异常紧急的关头，奥尔加不顾个人的安危，毅然带领几名最勇敢的青年、同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在她牺牲的前一天，奥尔加同志受到了一个被群众嘲弄得恼羞成怒的宪警的袭击。据亲眼看见此情景的两位同志（奥费莉亚和埃斯特万）说，那家伙猛然向她扑过去，举起手里的棍棒不分青红皂白就打。在她身边的帕特里西奥同志勇敢地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敌人的棍棒，飞起一拳将那家伙打翻在地，还没等那家伙从地上爬起来向他开枪，帕特里西奥和奥尔加乘机钻进了人群里。可是，另外两个宪警追上他们，用枪托和棍棒把帕特里西奥打倒在地上，又惨无人道地在他身上乱踢，直到他遍体鲜血淋漓，昏厥过去了。

帕特里西奥，这位见义勇为的年轻人，为了保护同敌人浴血斗争的同志和爱人免遭摧残，他赤手空拳同20多个全副武装的宪警搏斗。所有目睹那一场面的同志都说，他们很少看见过象他那样英勇的青年。他打出的第一拳是那么强劲有力，正当那家伙踉踉跄跄还没有站稳的时候，帕特里西奥的第二拳又飞了过去。那家伙笨重的身体终于象堆烂泥似地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帕特里西奥攥紧双拳，两眼充满了愤怒的火焰站在那儿等着他，这时那个不可一世的宪警，象狗一样趴在地上露出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狼狈相。

上面我叙述的同志们亲眼目睹的场面，正是在奥尔加全力以赴，营救帕特里西奥的时候。她那时的思想已不能受自己理智的支配。我们的同志，以及在场的群众强行把奥尔加搀扶着离开了现场，使她免遭发疯的宪警的报复。奥尔加同志被带到圣迭戈大街的一栋房子里，在那里给她点水喝，还强迫她休息一会儿。后来，奥费莉亚陪同奥尔加出来打听、寻找帕特里西奥的下落。可是，问了许多人，他被关押的地方和伤势情况仍无法得知（那时奥尔加和帕特里西奥已经订婚）。奥费莉亚只好把奥尔加送回家里，交给还不是我们组织成员的姐姐照管。

我不知道该怎样写这份报告。这样空洞地叙述吧，好象她是个遥远而又陌生的生灵；跟现实毫无关系似地，似乎我轻描淡写地描绘一番就可以了。我把笔放在已经写了多半页的报告上，紧闭双眼，奥尔加仿佛又出现在我眼前。在我们一起工作和战斗的美好日子里，同志们推选我任支部书记职务时，我曾

想建议奥尔加当支部委员。她完全有能力胜任这个工作……可我仍有些放心不下；我们必须在一起干许多工作。我知道，那时她在我心目中已经不再仅仅是过去那个漂亮而胆怯的姑娘了，我对她已经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种无法避讳的深深埋藏在心底里的情感。而我从没有向她表露过，可也没有轻易放弃过。我想，她自己也会明白的。实在没有办法，因为这类感情的产生是凌驾于一切人为的最严厉的监督和制约之上的。有时候我意识到我在不自觉地盯着她的眼睛，好象要从她那双美丽的心灵之窗的深处寻找什么东西似的。当我醒悟过来时，赶紧对她说几句玩笑话来消除可能使她由此产生的误会。但是不能保证我这一招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可能我的努力是徒劳的。其实，我对她的情感应该是容易被她察觉的，尽管她从来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表示和流露。

在会上奥尔加总是专心致志地听我的发言，象听一位学者讲课似的……当着同志们的面讲话，我不习惯把视线盯在某个人身上。但是，有几次在支部例会上，我突然发现自己在下意识地看着她的双眼。其实，这并非我的本意。当我一有察觉，就象水手驾驶的小船发现即将触礁似的马上调转船头。我赶紧把视线转到别处，讲话的声调和人称也变了。改用淡漠的第三人称。与此同时，内心里我总要咒骂几句自己的懦弱。

并不是说奥尔加跟我的关系已经超出了一般同志的界限，绝对没有。然而她对我却有着高度的信任，尤其是对我的劝告和我的政治见解。就象小孩子听从自己的父母和兄长的意见那样。有几次散会以后，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聊，她突然挽

起我的胳膊，以青年人特有的那种爽朗豪放对我滔滔不绝地说起些她感兴趣的事。她根本不会想象到，在我们无所顾忌的笑声后面我是多么的惶惑不安。

我决心要更加严格地约束自己。避免一切同奥尔加的不必要的接触。噢！亲爱的天使！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呢！可现在你更无法理解，因为你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现在我来汇报我们的奥尔加同志牺牲那天，即4月1日的情况。正如大家知道的，那天是反通货膨胀斗争最激烈的一天。自然，那一天也是敌人最残酷地镇压游行示威群众的一天。舆论界一致认为，那天是宪警首先挑起了街头的骚乱，他们反而以此为借口对无辜的群众施行灭绝人性的屠杀。

那天上午我没法同奥尔加同志取得联系，我又不能到她所在的餐馆去，只好委托奥费莉亚同志给她送去一个便条，或更确切地说，是党的指示。让她那天下午务必停止参加示威游行的斗争，我们主要考虑到她的健康状况。因为前一天她被敌人追逐和帕特里西奥同志的被捕，使她在精神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我们为寻找帕特里西奥被关押的地方所作出的努力都没有任何结果。我们给医院和公共医疗机构去了电话。我还亲自到他家里去过，都打听不到他的下落。他家里人也十分着急。

下面我引述奥费莉亚同志对我讲的情况：奥尔加拒绝接受我的建议，甚至连奥费莉亚的请求和奥尔加的姐姐的眼泪也没有能够阻止她的行动。奥尔加说，她已经对党起过誓，决不待在家里，她每天都要和人民群众一道走向街头，这是她的责任和义务。

亲爱的天使，你为什么不服从劝告啊！我通过奥费莉亚向你转告党的指示，要你休息一天，你为什么不去执行？况且你完全有休息的权利，至于你的战斗岗位，别的同志自然会来替代……这样的话，你也不至于这么突然地离去！

可是，现在你对我们来说只是过去美好的回忆了。在我避难的这些日子里，你的形象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但那只是你过去的形象，在支部一块儿工作时的形象。现在我想知道，在斗争中究竟是谁给了你那无所畏惧的勇气和力量？是党吗？是因为帕特里西奥同你在一起吗？是愤怒的群众冒着阿拉梅达的枪林弹雨给你做出的榜样吗？我相信主观上你是在有意识地锻炼自己，而你从前可不是这样，你有些胆怯甚至还会颤抖。你还记得咱们一块儿去执行的M行动吗？

坦白地说，当时我也有些惧怕。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正当执行M行动的任务时，事情突然暴露了，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那一天，奥尔加、埃斯特万和我，溜进臭名昭著的参议员毛里的庄园，目的是实地了解农工们的生活情况。谁都知道那是项极其艰巨的工作。我们的行动小组是在自愿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当主持会议的同志问谁愿意参加M行动时，所有的同志都踊跃要求参加，事实上，不可能大家都去，我们必须进行挑选。埃斯特万被选上了，因为他熟悉那里的地形，并且同庄园的农工有过联系。至于奥尔加，我不赞成她去。在会上她立即谴责我“专制”……并且还做了长达35分钟的发言。发言中她言辞激烈地强调了党内生活应该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疯丫头！……说着说着还提到在我们支部有3个女同志，

她们中间理所应当地要有一个参加这一行动。与此同时，3个女同志也不要低估自己的作用，应该坚决地同党内存在的她称之为“大男子主义”的倾向斗争到底……我虽然仍坚持我的意见，可是奥尔加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至于我，同志们几乎对我的申请没有讨论的余地。然而，她并没有为此失去对我的尊重，因为大家信任我。特别是对我的政治判断能力。

其实，M行动开始相当顺利，只是后来遇到了些麻烦。参议员毛里30年来凭着他的终身职务经营着多处农业庄园。他是个极端保守的典型，在他的庄园里至今还实行着残酷的封建统治。其他的庄园主迫于社会和我们生活的时代的压力，不得不作出些微不足道的妥协。可是顽固地坚持最陈旧的社会经济观念的毛里却丝毫没有让步的表现。对他来说，根本不存在社会的法制，在他的庄园里，国家的监督已失去了作用；在参议院里他竭力反对任何改革的倾向（就全国而论，同工业和矿业的发展相比较，农业生产仍处于一个极端落后的状态）。尽管如此，由于人们付出的巨大努力，还是取得了一些微小的进步，有的农民初步认识到了他们的权利，并且为此开始了斗争。但是，分布在圣地亚哥郊区和纽布莱地方的毛里所有的庄园里，似乎时代的车轮已经停止了转动，农业工人们仍旧生活在19世纪最黑暗的年代。那里没有学校，并且禁止运进任何报刊和书籍；在那里，社会的机能都不发生任何作用。甚至负责检查某些安全设施的保险公司的官员们刚刚离去不到半个月，那些设施也就无人过问了。就连政府和部长们对毛里参议员的所作所为也都束手无策。

至于说到选举，他明目张胆地强迫他的农工们投他自己和对他有利的候选人的票。别的庄园在选举后，农工们围着选桌尚可以享受一顿馅饼和葡萄酒的美餐。毛里倒也不吝嗇这点小小的酬谢，但那不是在选桌旁，而是在他自己的庄园里。投票一结束，工头们马上过去检查每个农工的选票，农工们赶紧坐上卡车一溜烟地返回去……

别的同志在类似的行动中曾有过失败的先例。虽然没有成功，但他们终于和一个同情我们党的农工建立了联系。他答应给我们提供进出庄园的便利。我们弄到一张专营放大照片的营业执照和一副镶在非常粗糙的黄色镜框里的像片放大样品——那是一位大胡子老头的肖像。我们的冒险行动开始了。虽然它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但它确实是一次危险性非常大的行动。

乘一个半小时的公共汽车，我们就进入了毛里参议员的神圣领地。同我们联系的朋友带领我们穿过宽阔的金黄色麦田、果实累累的果园和放牧着膘肥体壮的牲畜的牧场，终于来到了他事先召集好一群冒险来听我们演说的农工们所在的地方。我们眼前是一张张刻满皱纹、黝黑苍老的面孔和一双双长满硬茧的手，穿着自制凉鞋露出肮脏脚趾的双脚。每个人都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们，象是在向我们询问什么问题。

埃斯特万首先讲起了像片放大的生意。他对大家说，我们可以把亲戚们的、去世的双亲们的、或过早死去的子女们的小而模糊的照片放大，保存下来作为永久的留念。收费低廉，还可以分期付款……

我向赫利亚，就是带我们来的那个农工看了一眼，他给我使了个眼色，告诉我这个打掩护的开场白应该结束了。我随即开始对那些聚精会神听的人们讲了起来。我说得很快，但很清楚。谈到组织问题的重要性，组织起来是改变他们生活现状的唯一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提到增加工资、享受起码的自由、对子女的教育和改善生活条件。他们问怎样才能组织起工会，我向它们指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还答应给予它们帮助和支持；并且告诉它们，一家刊物还要把这里的贫困和落后向外界介绍，以引起舆论界的注意。

奥尔加好象同几个妇女已经建立了友谊，她们给我们送来了吃的东西：玉米饼、菜豆和酒。我们同他们一起坐在树荫下边吃边聊，因为在毛里的这块封建领地上开展工作，每一分一秒都是宝贵的。

奥尔加送给妇女们几本带来的画报，她们好奇地翻阅着。听到她们其中一个的问话，我感到有些惊讶。

“奥尔基塔^①我们怎样才能认识上面的这些字呀？我们这里没有人识字。”

我不由自主地从心底里佩服她的工作。亲爱的天使！在那不到一个小时的交谈中你竟然博得了那些和你毫无共同之处的、又那么孤僻保守的妇女们如此深厚的友谊。她们还那样亲昵地象对待老朋友那样称呼你奥尔基塔。

“我能认识几个字。”赫利亚说，“我们可以晚上凑在一

① 奥尔基塔是奥尔加的爱称。

起，我给大家念朋友们从圣地亚哥给我们带来的杂志、报纸和小册子……你们同意吗？”

“太好了！赫利亚。”一个黝黑粗壮长着浓密灰白眉毛的老人大声说，“那就看你的了，朋友。”

M行动的危殆时刻终于到了。可能是由于坏人的告密，庄园主已经知道了在他的土地上出现了不速之客，他已经来抓我们了。我们藏身在破旧窄小的堆放牧草的棚子里，3个人勉强挤在一起，赫利亚又在我们身上盖上乱草。我们需要在那里待多长时间呢？到时候我们的朋友会来叫我们的。

“在我来以前你们千万不要动，如果让毛里先生发现了，那可不得了……”

我们答应了，老老实实一动不动地蜷缩在乱草下面。不一会儿，我觉得埃斯特万在我身后不安地动弹，草堆里呛人的尘土使我们难以忍受。朦胧中我看见奥尔加正神色恐惧地凝视着我。

“格林。”

“别出声，埃斯特万。”我说。

我们几乎是身子挨着身子挤在一起，我还注意到奥尔加的额头上象珠子般的冷汗直往下淌。

她大概和我一样感到不安，只是我们的不安有各自的原因罢了。对我来说，这时干草堆里呛人的尘土味已经消失了，只闻到奥尔加披肩的秀发上散发出来阵阵诱人的芳香。尽管它使我感到欣慰，但我还是希望尽快躲开。

天逐渐黑下来了，但我还能模糊地看见她那充满恐惧的眼

睛。我伸手轻轻攥住她赤裸的手臂，想以此来鼓起她的勇气。仿佛她在用感激的目光向我表示谢意。

她那从来没有跟我靠得这么近的身体里似乎有一股热流，正向我袭来。我把攥住她手臂的手缩了回来，但几分钟之后（也许是几小时），我忽然感觉到在这有限的空间里一只手在摸索。这就是她的手，她温暖柔软的手，象一个海上遇难者企图寻找可以救命的东西那样，一触到我的手，便紧紧地抓住。她确实有些害怕（这是她后来对我说的），需要勇气，需要别人的鼓励。我把她的手使劲地握住，象握着一块温暖神奇的宝贝，长时间不舍得松开。在我们长期的交往中，也许这是我最脆弱的时刻，也是我自我控制失灵的唯一时刻。我知道我的行动给她带来了勇气，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也受到了更大的鼓舞。其实，在那漫长而又难以忍受的时间里那是我唯一的享受。

那一天奥尔加同志没有去餐馆上班，整个下午人们都看见她在参加街头的抗议活动。傍晚6点钟左右，我还亲眼看见她在阿拉梅达的圣安东尼奥大街同一群学生在推倒一辆停放在那里的空公共汽车。我本想走过去再次重复让她回家休息的要求，但是我没法走过去。偏偏在这时候，宪警向他们射过去一梭子弹，推车的人群散了，蜂拥着沿街逃去。为了避开敌人的子弹，我从停在那里的一辆辆汽车的间隙里穿行，企图追上她。可是过了一会儿，街上恢复了平静，我却连奥尔加的影子也没看见。

当她跟随着学生们拚命逃跑的时候，她满脸涨得通红，长

发在脑后飞扬，仿佛一种革命的信念在时刻激励着她同敌人斗争到底。在那一瞬间，她想的是什么呢？她想到的是关押在牢房里生命垂危的帕托吧？也可能她不仅想见到他，而且还对他说：“帕托，在你被囚禁的日子里，我一定坚持战斗，决不待在家里休息。”

她胸怀伟大的信念而斗争，又怀着这同一信念在街头倒下。亲爱的天使！当你倒下时你脚上的鞋子也不知道丢失在哪里！

当帕托成了她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以后，我曾暗暗感到惆怅，觉得她离开了我，甚至还意识到我们之间尚存的同志间的友谊关系竟变得那么微不足道、那么渺茫又那么不可思议。然而，好象她在有意地躲着我，因为她心里装的是别人，一个朴实憨厚的青年，就是那天晚上在奥费莉亚家里同我说话，会后我们又一起去喝咖啡的小伙子。

“我正在为发展新党员工作。”她怯生生地说，好象有点儿不好意思。“一个未来的同志，我同他谈了许多，想邀请他参加我们的支部例会……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从她那腼腆的用无人称的语气讲述事情经过的方式来看，似乎这个未来的同志除政治观点外同她毫无关系。我当时认为这里面必有奥妙，就好象在她的袖子里还隐藏着一封不能公开的情书似的。同志们先后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而当索妮亚·托雷亚尔瓦这个冒失惯了的人笑着问他是不是个英俊的小伙子时，奥尔加的脸变得更红了，只是低着头，什么也没有回答。

“他对你特别感兴趣吗？”索妮亚接着问。

“是的，正如你想象的，他对我非常感兴趣。”她鼓足勇气说，“因此，我希望他也能加入我们的党。”

我着重强调了政治方面的条件，还询问了关于小伙子的一些具体情况：职业、性格和政治素养。最后让奥尔加带几本书给他阅读，帮助他提高对党的认识。

从那时起，她就经常对我们说起帕特里西奥——她称他帕托——以及他的进步。一天我到她工作的餐馆去交给她几份材料，在大桌子旁，她小声对我说：

“现在你别回头，你往外走的时候顺便可以仔细看看他。那张桌子就坐他一个人，那个敞怀的就是他。”

就是他，一个结实的男子气十足的青年，乌黑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就是他……正在看一份《世纪报》，或装出看报的样子。当我往外走的时候，偷偷地低下头看了一下他手里的报纸，还好他没有注意到我。我只瞧了一眼便看清楚了：肌肉发达的两臂，紧闭的嘴唇，刮得干干净净的两鬓，还有他穿一双鞋底很厚的胶鞋和没扣上的白衬衣。他前面的桌子上放着两只空杯子和一本我让奥尔加借给他看的书。

一天，在支部的例会上，奥尔加说，她认为她的发展对象入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一个同志却非常严肃地问她，帕特里西奥是不是已经懂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奥尔加回答说，对一个新同志不能那样苛求。否则，我们的党就无法壮大，有可能失去它的生命力。至于他的理论水平，今后在党内生活中还可以逐渐提高。就这样，针对那个同志提出的异议，她竭力替帕特里西奥辩护。最后，大家一致通过了帕特里

西奥的申请。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看见他象参加婚礼似地穿着很讲究，还有点儿象小孩子那样怯生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一开始，他就是个守纪律的好同志，他请求我帮助他提高政治修养。我同他谈过许多次话，不仅借给他通俗的理论性读物看，而且还向上级组织推荐他参加马列主义基础知识训练班的讲座。恰好上级党让我负责组织各支部新党员的培训和编写讲授有关方面的内容，我赶忙将帕特里西奥列入参加者的名单。然而，由于政治形势的急速变化，我们被迫停止所有的讲座和例会，走向街头参加抗议通货膨胀的示威游行。

我常常看见他们两人形影不离，一块儿去参加会议，一块儿去参加娱乐活动，一块儿上街散步，甚至在街头群众性的示威游行中也不分离。我知道他们是真诚地相爱，只要看看奥尔加的眼睛里经常闪烁着幸福的微笑就明白了。尤其是当帕托在她身边时，她愈加感到骄傲和自豪，说话的语调也变得那么温柔。而帕托呢，也显出一副得意的样子，经常抿着嘴笑，不时地用多情的眼睛望着她。

其实，奥尔加还是原来的那样。只是对我来说总觉得些异样，仿佛我们之间长期的那种微妙而又难以形容的关系由于帕特里西奥的到来有些淡漠了。

奥尔加同志的悲剧发生在夜里9点钟左右，在阿拉梅达国立图书馆大楼的台阶旁边。宪警们隔着一个街区向示威群众射去一梭子子弹，一粒飞弹击中了她。据当天晚上尸体解剖报告说，子弹从侧面穿过心脏嵌在肺叶里。事情发生45分钟后我才知道。我分别向4个见证人了解了情况，两个大学生，一

个图书馆的官员和一个当时在场的党内同志。他们一致认为当时那里没有同宪警搏斗的场面，而阿拉梅达的战斗中心是在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旁边。在牺牲前的几秒钟，奥尔加同志正在阅读一个大学生交给她的一份公告（同志们下面将会知道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细节），她所在的地方相对来说是平静的。因此，我们不幸的同志是一颗飞弹的牺牲品的说法完全是根据的。

奥尔加同志一倒下，几个宪警立即跑过去。当时在场的同志（小学教师拉斐尔·埃维亚）用手帕盖在她脸上。随后宪警封锁了那个地方，强行把路过的人和奥尔加牺牲的见证人统统赶走。不一会儿开来了运尸车。人们不知道他们将尸体运到什么地方去。

第二天公立医院发表了尸体解剖报告，但是当我们提出收回遗体时，他们说已经被宪警转移了。谁也不知道她被掩埋在哪里。而我们了解到许多被枪杀的人一起被埋葬在临时挖的沟里，为了不让人们知道死难者的确切人数，连他们的名字也没有核实登记。看来这次血腥镇压的遇难者何止奥尔加一人。

第二天凌晨，两个党员同志（其中之一是我们支部的）给我送来一份供报纸和电台发表用的奥尔加的死亡报导材料。我看完以后没有同意，因为它跟事实不符。报导说，奥尔加同志是在和示威群众手挽手同宪警面对面的搏斗中被敌人近距离开枪打死的。他们还那次实际并不存在的搏斗场面作了一番极其夸张的描写。总之，把我们的同志写成一位象美国西部惊险影片中的主人公那样毫无政治头脑的英雄。

这些同志不知道我反对发表的理由，因为他们看不清我们所处的不利形势。他们说什么党不能把英雄的业迹同我们所投身的轰轰烈烈的斗争截然分开。我反驳说，无论如何奥尔加同志无愧于英雄的称号，尽管她死于一颗飞弹。我还告诉他们，党不能欺骗人民，更不能歪曲事实真相。

好象不按照那些同志们用创作电影的手法来描绘我们的英雄。奥尔加在我们心目中的大理石雕像就要缺少一块似的。他们的立场观点是何等荒谬啊？我让他们回忆一下萨特的话剧《肮脏的双手》。那里充满了极为曲折而复杂的心理描写，它恰如其分地刻画了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的所作所为。

要说贬低英雄的形象，不是别人，正是我，是我低估了奥尔加的某些高贵品质。我们支部的天使，我所认识的最完美的人，是她用柔软纤细的手指轻轻触动了我感情的门扉。如果几个小时以前那两位同志看见我为她的死痛哭流涕的话，他们一定认为我不至于会反对那份与事实不符的报导。要是他们看见我发疯似地向莫尔格奔跑，为了把可爱的人的遗体从刽子手那里夺回来……可是奥尔加已经不在那里。她在医生解剖尸体的白色石板上。

我曾说过在党内已经有类似的先例，它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要尊重事实，只有事实才能让人民信服：那就是雷卡瓦伦事件。开始谁也不会怀疑他的死是反动派蓄谋暗杀的，就连资产阶级政治家们也要就此发表声明，把它当作用来推翻军人统治的有效武器。而我们的党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充分详细地调查了事情的经过，得出了客观的结论。我们党并没有为了

赢得有利的政治形势搞欺骗，而是摒弃了歪曲事实真相的捏造报导，最后果断地宣布：雷卡瓦伦是自杀的，而不是他杀。

看来那两位同志对我的处理意见似乎不太满意，临走的时候明显地感到失望。然而我并没退让，我主张必须客观地报导奥尔加同志的死亡真相，从任何角度也不能否认她是因中了敌人的飞弹倒下的这一事实。尽管如此，她仍不愧是人民斗争的英雄。

奥尔加同志为了劳动者阶层的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因此她完全配得上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找到她的遗体，将她同拉莫娜·帕拉和千百位为正义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同志们安葬在一起。

最后我要告诉同志们，昨天在普拉萨医生的协助下，我到医院去看望了帕特里西奥同志。他向我表示了永远忠诚于党的决心。他口头总结了在这场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还说奥尔加同志所作出的榜样对他是个极大的鼓舞。最后他表示要立志把自己锻炼成一名优秀的党员，一名使奥尔加同志，如果她活着的话，为之骄傲的战士。

他对我还说了许多其它的事情。

我已经接到上级党的指示，除非迫不得已，不要轻易离开我隐蔽的地方。然而我必须去看望他。可怜的年轻人，他不仅仅受到了敌人的残酷拷打，而且还承受着奥尔加牺牲的巨大悲痛。一名宪警持枪看守在帕托住的病房门口，显然他在被监护治疗。普拉萨医生让我把外衣脱下换上医生的白大褂，陪我走

进那间病房。

他在那儿，第4号病床。

帕特里西奥躺在病房角落的一张床上，头上裹着绷带，紧闭着双眼，黑乎乎的胳膊胡子几乎遮住了他消瘦而苍白的脸。我走过去坐在他的病床边上。他缓慢地睁开眼睛，认不出我是谁，喃喃地说：

“大夫……”

“帕托，是我……格林。”

他两眼瞪得圆圆的，试图欠身坐起来。

“是你……”

“不要动，帕托，你还不能动。小点儿声音，门口站着宪警呢，别忘了你还不能同外界接触……”

“是的，我知道。”

“现在你觉得怎样？”

“还好，就是头有时还有些痛……肾脏也……格林，他们不仅在阿拉梅达打我……在军营里他们还继续用卡宾枪打我，把我按在地上使劲用脚踢，还用枪托帕……”

“这帮没有人性的畜生！……帕托，可要特别留神他们的挑衅行为，千万别上当！”

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对他说起奥尔加，正寻思着用适当的不至于使他太伤心的话来同他谈，他自己却首先把话题转到奥尔加身上。

“格林，找到了她的遗体吗？”

他已经知道了。至于他现在能同我谈话，能从白色的绷带

下面望着我并耐心地听我说，是因为他最痛苦、最悲伤的时刻已经过去，失去爱人的绝望时刻已经过去。

“没有，帕托，还没有。我们会找到的，会把她安葬在她应该安葬的地方。”他沉默了，“帕托，你是怎样知道的？”

“在一个护士借给我的一份报纸上看到的，开始我简直不敢相信……后来，我就整天地哭……我曾经也想死……失去她我真不知道生活还有什么意思……”

“帕托，我们大家都很伤心，她是我们支部的天使，大家都哭了。”

他的一双明亮的眼睛在绷带下面直盯着我。

“格林，你也曾经爱她，是吗？”

我没有回答。

“对她最好的怀念，”过了一会儿我突然说，“是振作起来去完成她没有完成的事业。”

“当然，”他接着说，“你别以为这些天我躺在床上什么也没有想……我想了许多，觉得她生前说得有道理，我们没有别的出路，要活下去就得斗争……起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参加党，可能为了整天同她在一起，也可能是为了讨她的喜欢……可是后来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尤其是你，我才慢慢对党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现在我觉得我已经是同志们中间的一员了，希望你们也这样认为。今后你还要对我多进行帮助，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认真工作，去完成她没有完成的事业……你觉得我能成为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吗？格林。”

“当然能。”

“你不是在安慰我吧？”

“不，这是我的真心实话。帕托，你在斗争中表现得勇敢、沉着、坚强、机智，这是最根本的。如果我们所有的党员都象你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不难成功。”

“谢谢！”

他把手放在自己的前额上，仿佛为了驱散头脑里一种模糊不清的悲痛。

“当然，首先我得服刑……他们会判我一年监禁的。”

“不会的，帕托，你先别想这个。”我用确有把握的口气对他说，“党马上就给你去聘请辩护律师，不用说一年，就连一个月也不需要。但是你要尽力为自己，为你的未婚妻辩护，当然这是一回事。没有任何一个法官为此会判你的罪，因为你们所有被捕的人都受到了严刑拷打，凭这些我们就可以马上着手为你们的赦免进行工作……”

“也就是说我马上可以获得释放……”

“大概需要20天左右。今天我就去找律师谈你的情况。尽管外面现在还不平静，但是正义还继续在发生作用……”

“那就太好了！”他兴奋地说，好象喜事就将降临似的。

“要是能出去该多好哇！我们可以在支部会上和同志们一起回忆她，谈到她，同埃斯特万，奥费莉亚……卡斯蒂略仍被关押吗？”

“是的，帕托。米盖尔，马丁内斯和埃斯特万也都被捕了，但我们会很快营救你们出来的。”

“而你，你是怎样脱险的？”

“我躲在一个朋友家里。”

“那你怎样到这里来的？”

“多亏一个朋友，帕托，许多人在秘密地帮助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为他们，为大家而斗争的。他们知道我们是强大的。因为我们是多数人而且是团结的。虽然我们是被压迫者，但是我们是同千百万劳苦大众一条心的，有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他们还知道我们被压迫者是坚强、勇敢的，终将要起来斗争，即使在斗争中遇到了某些困难和挫折，我们永远也不会气馁……”

我看见他的眼睛睁开了，而且睁得大大的，可能这许多天来，他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仿佛奥尔加也坐在我身边的病床上，倾听着我们推心置腹的谈话。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球星在情网中死去

作者= (乌拉圭) 胡·卡·奥内蒂等著 李明德 刘文波等译

页数= 3 7 9

S S 号= 1 0 5 0 1 8 6 5

出版日期= 1 9 8 8 年 0 3 月第 1 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页
附录页

1. 球星在情网中死去〔乌拉圭〕 &胡·卡·奥内蒂著 李德明 刘文波译
2. 宝石与火石〔秘鲁〕 &何·马·阿尔盖达斯著
3. 地道〔阿根廷〕 &埃·萨瓦托著 丁文林 赵德明译
4. 支部〔智利〕 &路·恩·德拉诺著 郭冰肌译